

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

戚本禹回憶錄

(上)

戚本禹

著

内容简介

戚本禹，中共上海地下黨員，中央團校學員，1950年5月，19歲，被選調進入中南海政秘室，在毛澤東身邊工作18年。先參軍，後與衆來信來訪；下鄉勞動與調研；編《群衆反映》。1963年發表《評李秀成自述》，引發風波，獲毛澤東批示支持：“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由此，介入中央高層政治爭鬥。1966年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與1966年、67年文革運動高潮中，中央核心的許多重大決策。作為其許多決策的主要執行者之一，這兩年戚本禹在北京講話最多、出面最多。

1968年1月，戚本禹被清退出政治舞臺，即被關進秦城監獄；文革運動後被鄧小平掌控的中

央審判，判刑18年。戚本禹為其18年的中南海政治生活，付出了18年牢獄生活的代價，而始終不改對毛澤東的忠誠。1986年刑滿出獄後，堅持繼續革命，公開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功過，捍衛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戚本禹更與關鋒並肩戰鬥，在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批判繼承，著述豐厚。他們相信，歷史將證明，他們不但是中國舊文化糟粕的破壞者，亦是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的繼承者，新文化的建設者。中國學術界將有他們的一席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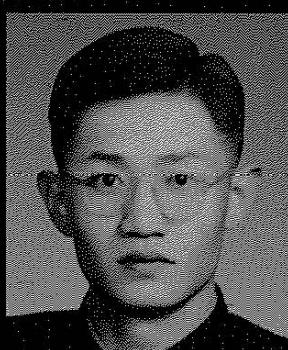
不管你對戚本禹的回憶持支持還是反對的立場，不論研究中國文革運動歷史的學者，還是關注這段不可能抹去與回避的令人刻骨銘心歷史的人們，都應不能不看這本《戚本禹回憶錄》。有比較才能鑑別，史料的真實性是最重要。

作者簡介

戚本禹，文革後應要求改名為戚文。1931年生，山東威海人。早年曾在上海浦東中學、中華理科、南洋模範中學就讀，并于194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選調入北京中央團校學習。1950年5月4日被選調進中南海，任中共中央政秘室見習秘書。自此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十八年，先後任秘書、科長、處長、副局長，《紅旗》雜誌歷史組組長、副總編輯、《毛澤東選集》編委會成員等職。1966-1968年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及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等職。1968年1月被隔離審查，關進秦城監獄，文革後被判刑十八年。1986年至1991年，在上海圖書館從事歷史資料整理和研究工作。1991年以一年半工齡退休，至今二十多年，堅持批判繼承中國傳統文化，著述頗豐。

戚本禹幾十年撰寫和編輯的論著有四十餘種，其中個人著述有十幾種，重要的有《評李秀成自述》、《先秦人物》、《秦代人物》、《兩漢人物》、《三國人物》等。合編著述幾十種，重要的有《中華易學大辭典》、《孫子兵法大辭典》、《周易十講》、《十家論叢》、《大人物的變態心理》等。

戚本禹



戚本禹

戚本禹與關鋒在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界，自成立場
鮮明的一派。其主要著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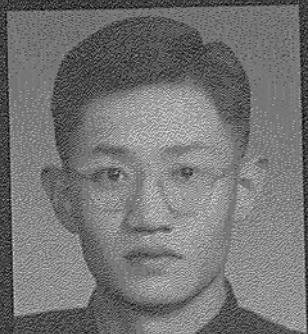
- 《孫承宗》，中華書局出版。
- 《評李秀成》，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
- 《大人物的變態心理》，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
- 《孫子兵法大辭典》，上海科普出版社出版。
- 《墨子十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孫子兵法十講》，安徽文學出版社出版。
- 《論語譯說與孔子批判》，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出版。
- 《十家論叢》第一輯（共八冊）。
- 《十家論易》，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十家論管》，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十家論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十家論孫》，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十家論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十家論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十家論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今古奇觀正續編》，江西百花出版社出版。
- 《三國圖說》，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出版。
- 《屈原與〈離騷〉》，已完稿待出版。

谨以此书纪念
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

戚本禹

2016.3.1

戚本禹



著

戚本禹回憶錄 (上)

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

戚本禹回憶錄

戚本禹 著

本書版權為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所有。除獲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本書觀點不代表出版社立場。

責任編輯：敖本立 司徒君

責任技編：張先枚

封面設計：個性書工作室

香港地址：香港摩利臣山郵政局 47394 號

電 話：00852-53628548

電子郵箱：wengelishi@163.comorn

印 張：50.25

開 本：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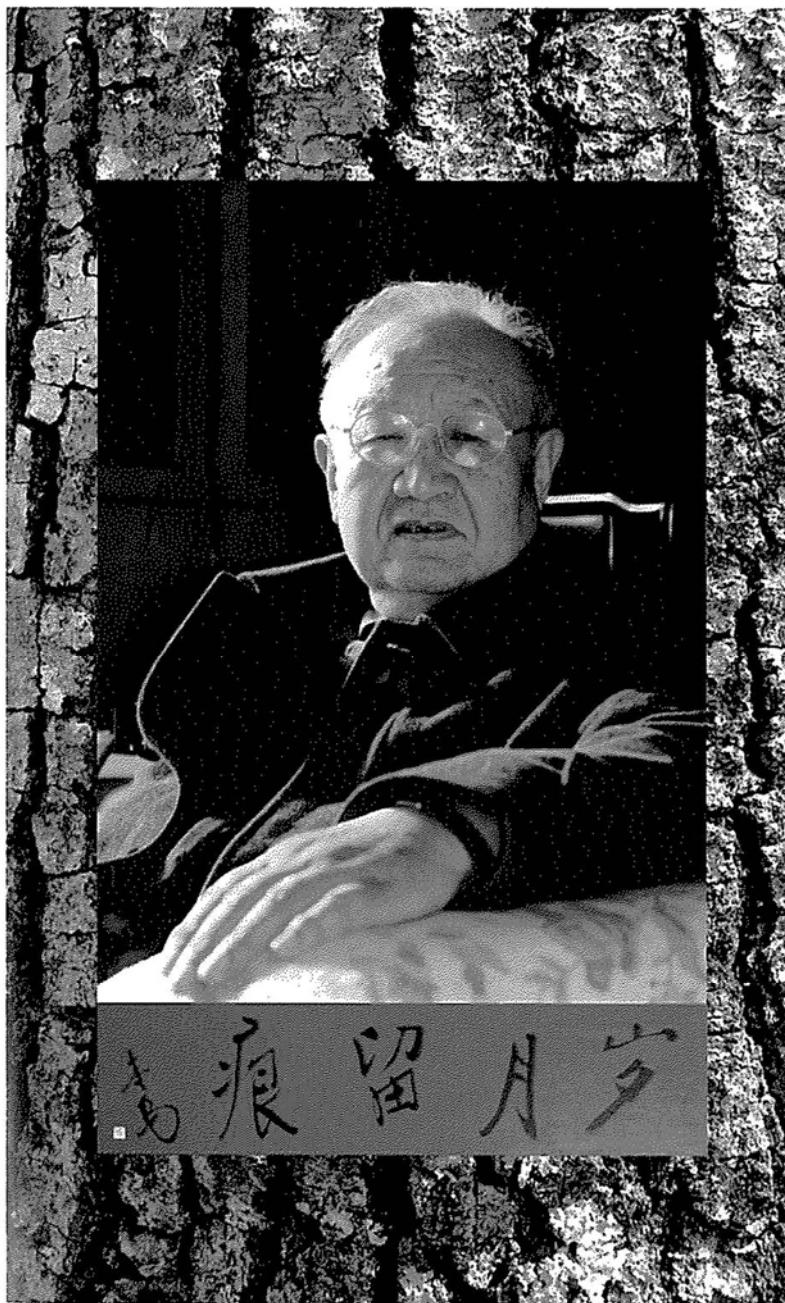
版 次：2016年4月第1次出版 第1次印刷

出版發行：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

國際標準書號： ISBN 978-988-12284-8-2

定 價：港幣 398.00 元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月留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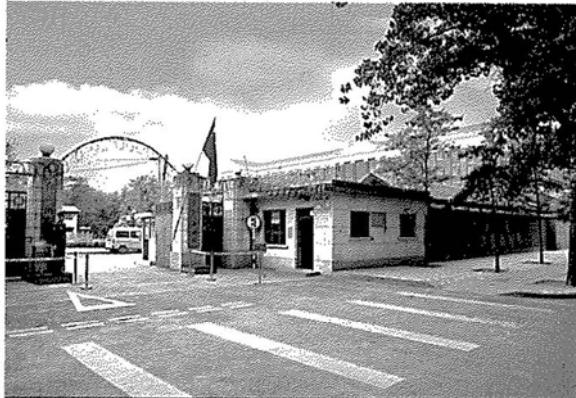
位于威海成山頭的戚繼光抗倭英雄塑像。戚本禹是戚繼光後人，1931年5月出生於威海。



1949年前的上海。戚本禹在此度過了難忘的青少年時光。



中南海入口新華門。戚本禹自1950年5月4日踏入此門，開啟了其人生的輝煌歲月，直至1968年1月被捕離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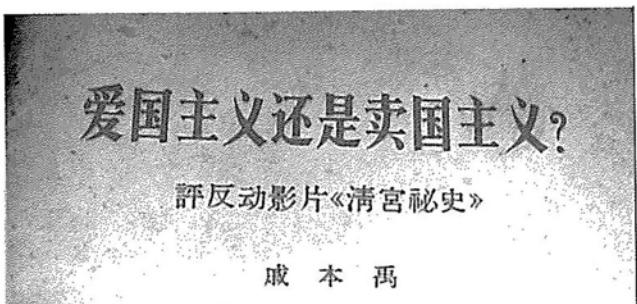


原《红旗》
雜誌社院子。
1964年夏，戚本
禹調到該社任歷
史組組長。

戚本禹曾於
1959年春節後，
受毛主席委派，
跟隨田家英到四
川省新繁縣大豐
公社種試驗田。
2012年4月10日
故地重游。居中
白發老頭即戚本禹



文革中的北
京二七機車車輛
工廠。戚本禹曾
於1960年夏天，
帶領“八司馬”
案中犯錯誤的幹
部在該廠參加勞
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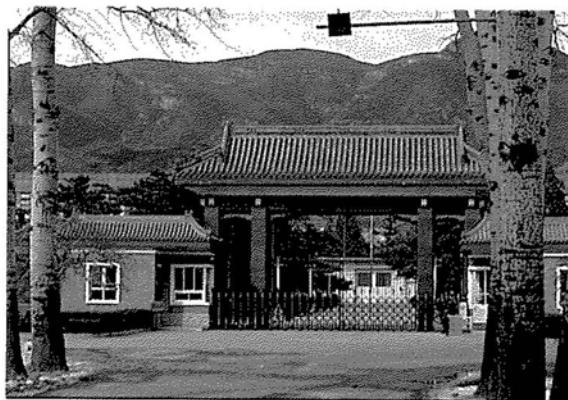
1967年4月，人民出版社为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出版的单行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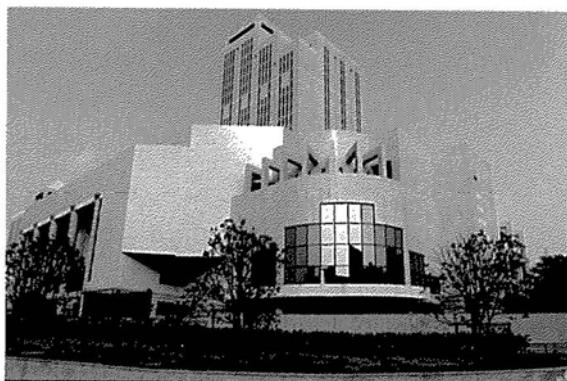
戚本禹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后，先后在钓鱼台第15号楼（左图）和第16号楼（右图）办公。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等人合影，毛泽东左边第一人即为戚本禹。



北京秦城監
獄大門。戚本禹
自1968年1月
12日被隔離審查，
即被關進秦城監
獄，在此度過了
18年的牢獄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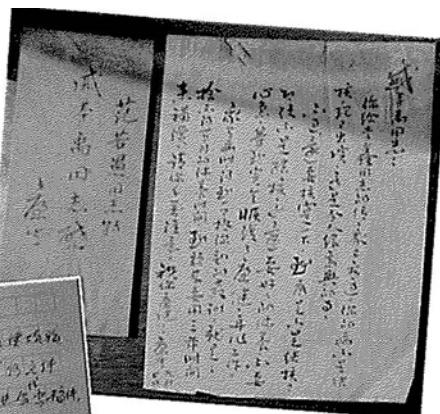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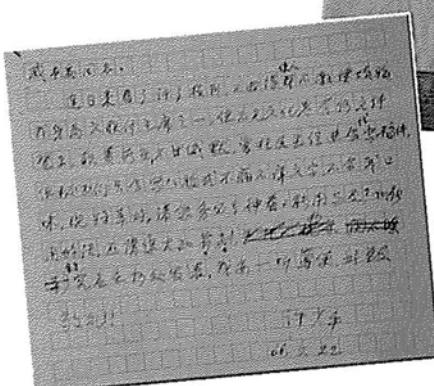


上海圖書館
1986年1月，戚
本禹刑滿獲釋後
被安置到該館任
圖書管理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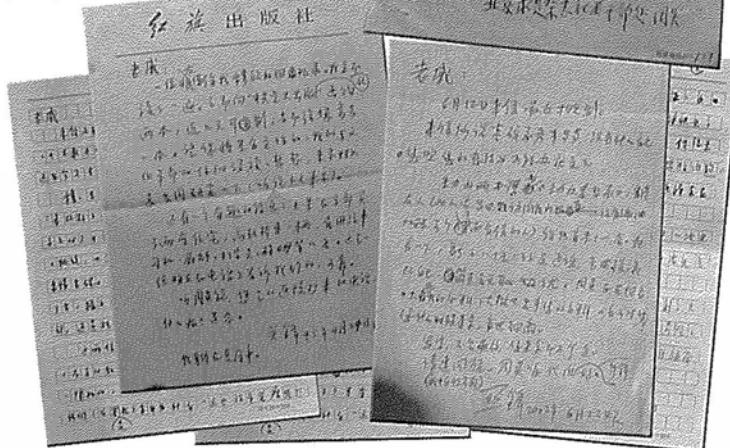
晚年戚本禹
與兩個妹妹、弟
弟合影。

1965年9月，戚本禹在通县参加“四清”运动时由于过度劳累吐血，痊愈后康生给他写信慰问。



1966年5月22日，许广平就批评周扬文章事，写给戚本禹的信。

关锋和戚本禹文革后再次取得联系，信函往来频繁，此为部分信件缩影。



目錄

代序：夜夜空江頭，似有蛟龍起.....	1
獻 詞	3
第一部分 我的青少年時代	
第一章 接受啟蒙：從不懂 “海祭 ” 的威海兒童,到沉迷圖書的上海少年	6
第二章 追求真理：從不滿現實的少年學子,到投身革命的地下黨員	10
第三章 迎接解放：從上海人民的保安隊員，到中央團校的青年學員	32
第二部分 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	
第一章 初進中南海，任政秘室見習秘書	40
1、錄取與報到	40
2、中央辦公廳當時的機構和人事隸屬關係	43
第 2 章 為毛主席讀報、摘報、管理圖書.....	49
1、為毛主席讀報、摘報	49
2、為毛主席管理圖書	53
第 3 章 為《毛澤東選集》當校對和收發.....	61
1、關於編輯《毛澤東選集》的立項.....	61
2、《毛澤東選集》的具體編輯過程.....	62
3、關於《矛盾論》的修改	66
4、《論持久戰》手稿背后的感人故事.....	68
5、參加編輯《毛澤東選集》的編輯校對工作對我一生有特別的影響	71
第 4 章 為毛主席處理群眾來信來訪	73
1、毛主席解決建國初的失業問題	73
2、毛主席關心群眾疾苦,反對用官僚主義態度對待群衆來信...77	

3、毛主席從群眾來信洞悉干部腐化變質并保持高度警惕	80
4、毛主席重視民主人士的來信和友情	83
5、我自己在為毛主席處理群眾來信中的一些感悟	88
第 5 章 第一次感觸黨內、軍內驚心動魄的高層鬥爭	92
1、關於“高、饒反黨集團”案	92
2、關於彭德懷等批判粟裕	101
3、兩次高層鬥爭對我思想的觸動	103
第 6 章 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號召全國人民幫助黨整風	108
第 7 章 反右派運動的起因、	136
1、反右派運動的起因	136
2、反右派運動的發展及其擴大化和後來的平反	139
3、關於反右擴大化的平反問題	142
第 8 章 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的中南海 “八司馬事件”	153
1、序言	153
2、從毛主席最高國務會議講話之後至整風運動之前	156
3、從整風運動開始後到反右派運動之前	157
4、在 6 月中開始的反右派運動期間	158
5、工作組進入階段	160
6、毛主席知情並親自解決問題	161
7、尾聲	165
第九章 毛主席派我們去四川種試驗田	176
1、大躍進中，中南海里也建起了三座小高爐	176
2、從“共產風”、“浮夸風”到“高指標、高征收”	178
3、毛主席根本就不相信報上的“衛星”：畝產萬斤糧	180
4、到四川種試驗田	181
5、與勞動模范羅世發的談話	185
6、給毛主席寫《關於四川新繁縣糧食生產真相的報告》	189
第十章 我所知道的廬山會議的若干情況	194
1、李井泉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	194
2、彭德懷的“意見書”	196
3、李銳的揭發交代與廬山會議的轉向	199
4、田家英叫我們從四川連夜撤回北京	201

5、關於毛主席解救田家英、胡喬木和陳伯達.....	202
6、廬山會議真正的教訓	205
第十一章 去二七機車車輛工廠勞動	208
1、毛主席和人民一起度過困難時期.....	208
2、和以前整過我的人一起下廠勞動.....	209
3、和工人打成一片	212
4、《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	214
5、共同勞動結成的友誼	217
第十二章 天津調查和主辦《群眾反映》	219
1、隨陳伯達、田家英等到天津搞工業調查.....	219
2、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之間的關係.....	222
3、主辦《群眾反映》	223
4、毛主席痛恨腐敗，支持《群眾反映》	226
第十三章 七千人大會和會後黨內出現的兩條道路鬥爭	235
1、關於七千人大會的大會講話	235
2、參加小組的討論	237
3、調查各地餓死人的情況	240
4、關於餓死人的時間和原因	242
5、七千人大會以後黨內出現的分歧.....	246
6、圍繞“包產到戶”問題黨內展開的兩條道路的鬥爭.....	248
第十四章 北戴河會議反對“包產到戶”和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 鬥爭	251
1、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的一些情況.....	251
2、《群眾反映》編印“關於群眾對‘包產到戶’的意見”	251
3、關於八屆十中全會的一些情況	254
第十五章 日記殘頁	256
日記殘頁的全文及說明	256
第十六章 調后樓研究室和去唐山搞四清試點	282
1、從《群眾反映》調去后樓研究室.....	282
2、后樓研究室	283
3、去唐山搞“四清”運動的試點	284
第十七章 《評李秀成自述》	286

1、我為什麼要寫《評李秀成自述》	286
2、圍繞《評李秀成自述》一文的風波	288
3、江青向我傳達毛主席的批示	293
4、後續的事情	294
5、伏契克的呼喊：警惕呀，人們！	297
第十八章 調《紅旗》雜志社和參加通縣的“四清”運動	321
1、調入《紅旗》雜志社	321
2、參加“四清”運動	322
3、因一封批評信而引起的風波	327
4、批評“繁瑣哲學”惹出的麻煩	333

代序：夜夜空江頭，似有蛟龍起

三維空間，四面八方，沒有一點亮光，黑暗統治著世界，空虛包裹著宇宙。

面對著黑暗和空虛，古老的哲人發出了深遠的嘆息：“潛龍勿用。”

但是，你不要以為世界就此永遠沉寂，永遠這樣黑暗、空虛下去了，你不要忘記，這物質世界還有四維……

三維空間是在四維的時間里運動著。四面八方的物質，在時間中發展著，各種能量在黑暗中聚集著，巨大的變動在黑暗中醞釀著，淹沒在黑暗中的一切在黑暗中躍動著。

而且，空間不空，虛數不虛。產生一切的空虛，本來就不空虛，那里有無邊的看不清的物質，還有比光子、微子更無法捕捉的渺小實有。零和負，不就是這些渺小實有的符號嗎？渺小的實有確實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無限渺小的實有卻能聚合成龐大的星系，這無限的宇宙，浩瀚的大千世界都是由無限渺小的實有組合的。沒有這空虛般的渺小實有，也就沒有這無盡的宇宙和浩瀚的大千世界。當你感覺空虛的時候，空虛中那渺小的實有卻正在為組合一個巨大的新的物質聚合體而激蕩著。

“屈之甚者伸必烈，伏之久者飛必快。”黑暗的越厲害，能量的新聚集也越大；空虛的越厲害，物質的新組合也越快。黑暗和空虛壓制了光明和實有，卻也誕生者新的光明和實有。在量變引起質變的節點上，在黑暗與空虛的邊際上，新星就會突然爆發。屆時，她燦爛的光輝將會撼動固若群山般的恒星表，她的巨大輻射，將會改變一切接近她的有生命、無生命體系的命運……統治世界的黑暗、包

戚本禹回憶錄

括宇宙的空虛都要被光明的新世界所更替。

所以，在你感覺黑暗和空虛的時候，注意你周圍正在集聚的巨大能量和正在聚合的渺小物質吧！不要悲觀，不要失望，“夜夜空江頭，似有蛟龍起”，光明在前。

戚本禹

1983.12.26 寫于秦城

1988.12.26 改于上圖

獻 詞

謹以此書獻給偉大導師毛澤東，並以此紀念他以驚人的魄力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50 周年。

這個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規模空前浩大的、有億萬人參加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至今仍被中國乃至世界的反對勢力，加諸種種駭人聽聞的罪名。成千、成萬奮不顧身為這次大革命獻出寶貴生命的革命同志，則被反對勢力妖魔化為紅毛綠眼、為非作歹的野心家和流氓匪徒。他們之中不僅包括在第一次資反路線中死難和受傷的工人、農民、戰士、學生、教師、干部以及社會人員，而且包括在“二月逆流”中，橫遭各地黨內、軍內走資派鎮壓的死難同志；還包括此後因受走資派挑動，而在內戰中犧牲的革命造反派，和因受走資派蒙蔽而為走資派無謂犧牲的工人、農民、戰士、學生、教師、干部以及社會人員。

除此之外，還有數以千百萬計的被強加與錯劃為“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成員(而事實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只有極少數人，且早已被革命造反派反對與打擊)，而遭難的革命造反派同志們。1976 年 9 月 9 日，毛澤東同志去世後，在 10 月 6 日由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陰謀發動的“苦迭打”中，遭到非法拘捕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同志，以及數以千萬計的因此而遭受株連的所謂“三種人”，其中的大多數也屬於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獻身的犧牲者。

我們不否認在這場大革命的洪流中，也混進了一些乘革命之機、圖謀不軌的不良分子，這是歷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運動都難以完全避免的現象。但他們僅是大革命洪流中的泥沙，而且不斷受到大革命

運動的沖洗。大革命運動受到了干擾，但大革命運動仍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前進著，其實干擾大革命運動方向的人中確有一些犯錯誤的革命者，但更多的正是走資派培植的自己人或他們的同伙。有些事情，如“西糾”、“東糾”、“海糾”，和後來的“聯動”中某些人的打、砸、搶和濫打、濫殺，還有抓“516”反革命集團的擴大化，其中大部分就是各級走資派有意製造的。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現在已有證據表明，它其實也是當年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鄧小平等鼓勵和操縱的。但是後來在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敘述中，許多破壞文化革命的事情，竟然變成了革命行動。例如天安門反對文化大革命暴亂中的燒房子、燒車、打人等等劣跡，卻變成了革命行為，歷史的黑白顛倒，莫此為甚了。

希望此書的出版，能對目前黑白顛倒的歷史事實起一點匡正謬誤的作用。我相信廣大革命同志和尊重歷史事實的人們，終能從歷史材料的比較分辨中，認清什么是血淚的事實，什么是無恥的謠言。一時弄不清的問題，許多文革歷史之謎，也能隨著當事人的最後證言和歷史檔案的解密，逐步弄清真相。

我們絕不否認，當年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由於組織隊伍的龐雜和思想認識的差異，加上對毛澤東思想學習的不夠和革命工作經驗的不足，他們在工作中確實犯了許多大大小小的錯誤。工作的失誤給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客觀上幫助了走資派。但是工作的失誤畢竟不是反革命問題，把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視為“十年浩劫”，甚至污蔑之為文化反革命，把為保衛人民革命勝利果實，而與走資派路線生死鬥爭的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加以逮捕、審判，處以徒刑、死刑，恰恰從反面證實了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才是篡奪革命果實、壓迫人民、危害人民、逆歷史而動的社會公敵。

毛澤東思想萬歲！人民萬歲！

戚本禹

2016年1月12日

第一部分

我的青少年時代

第一章 接受啟蒙：從不懂 “海祭 ” 的威海 兒童到沉迷圖書的上海少年

我 1931 年 5 月 8 日出生在山東威海。那一年九月，發生 “9.18 事變 ”，日本侵占了我國東三省。

我父親叫戚以峰，他小時候讀過一點經書，因家道沒落中斷學業之後，為了生計做過多份小職業，先是到鄉下販買蔬菜進城販賣，后由祖父托人進金山頂中學做校工，繼后到蕪湖市米行打工，再后由四姨父介紹到英國船上當海員，最后落腳上海，在一家報關行做小職員。我母親叫叢秀梅，她是我爺爺一個好友的幺女兒， 1930 年嫁給我父親時不到十七歲，她一過門就管起家里的一切，包括奉養那時已經因中風癱瘓在床的公公，即我的祖父，直到他 1941 年去世。我母親身上有山東婦女禮讓溫順的傳統美德。

我祖父叫戚心海，他是晚晴最後的秀才，也是我們家族最有學問的人。他 1929 年中風癱瘓，養病在床。祖父兄弟三個，他是老大，他的二弟早逝，他的三弟，也就是我的小爺爺，後來做了戚家小祠堂的管事。我每年都要隨祖父那輩人到戚家小祠堂向著戚繼光的神像祭拜，從他們那里我知道了戚繼光是我的先祖，知道了戚繼光抗擊倭寇的故事。

祖父是我人生的第一個老師，第一個真正老師。我父親在上海工作，不能照顧我，母親又要操持家務，也沒有功夫管我，祖父就自覺擔負起從文化上教育我的責任。我在三、四歲的時候，常到祖父的病炕上翻跟頭，他就把我抓住，給我講故事，叫我背書，背《四書五經》里的名言，又教我讀書識字，在我四歲多的時候就教了我大半部《三字經》，不到五歲又教起我《周易》、《詩經》，還教我唐詩宋詞。法國思想家、法國大革命思想的實際提供者盧梭，是在他父親的膝蓋上開始讀書的，我則是這樣地在我祖父的病炕上開始接受啟蒙的。我那時什麼都不懂，他講解我也還是不懂，當時對

我有誘惑力的是擺在那里的點心，因為只有背書背對了才能吃到點心。祖父原來想要走科舉的道路，功成名就，光宗耀祖；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制度，中舉這條路對他來說斷了，我父親只能養家糊口，光宗耀祖是不可能了，祖父實際上是希望我將來會功成名就，光宗耀祖。

我關於孩提時代最深刻的記憶，是那次在海邊玩耍，看到海祭卻不知道那是干啥。那是在我大約5、6歲的時候，我跟幾個小伙伴到黃海邊玩水，看到一些老人在海邊點香、燒紙、撒酒，還向海里扔白饅頭，一邊扔一邊哭。那時候，白饅頭珍貴得很，貧苦的人家還吃不起的，為什麼要把它們扔到海里去呢？我們幾個孩子在那里觀看了好久，就是看不懂。回家后，我問祖父，祖父聽了后，嘆著氣說：“哎，都四十多年了，還有‘海祭’！”我問什么是“海祭”，祖父就向我講了甲午海戰的事，說威海的水兵與日本鬼子撞船拼命，成千的人死在大海里。那之后，威海的鄉親百姓，每到過年和清明，都要到海邊去祭奠那些戰死在海里的水兵。早幾年的“海祭”一來，劉公島對面海灘上，香火繚繞，人群密集，慢慢的，年代久了，“海祭”的人就少了。

祖父講的事，我不能都明白，但幼小的心靈卻是經受一次極大的震動，可以說那是一次愛國主義的播種。那時候日本人已經侵占了我國東山省，“海祭”再起，說明威海老百姓有了日本人又要來了的不祥的預感，祭奠亡靈，是在控訴日本當年對我們中國人犯下的罪行，也是在呼喚抵抗侵略、保衛海疆的戰士。

我小名戚英科，大名戚鎮東，1936年秋入小學讀書的時候，祖父按家族宗譜給我起學名戚本玉（我是本字輩）。我因為有祖父給的學前啟蒙教育，一入學就成績不錯，在全校聯考時考得一年級第一名，得了校長親自頒發的獎勵。不料，第二年，“海祭”預示的事情就發生了，日本人占領了威海，威海百姓再一次遭受日本人的凌辱，學校也被迫停課。停課前，老師領著我們學生在國旗下宣誓：永遠愛我們的祖國。校長也來講話，說現在日本人下地了，占領了威海，我們不要忘記祖國，要學岳飛，學戚繼光，要抵抗到底，地

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抗日。我雖然小，卻對校長講的這幾話記憶特別深刻。可是，國民黨的軍隊沒抵抗就跑了。所以，從小開始我就對國軍沒有好印象，覺得他們沒有保衛好祖國。不久，日偽的教育局派了另外的校長來重新開課，校長變了，教書的都還是原來的老師。

那一年戚氏大族長在戚氏宗族大祠堂里召集會議，要各家嫡長子都去參加。我爺爺是長子，癱瘓在床去不了，他的長子，也是獨子，就是我的父親，當時在上海也去不了，我爺爺就讓我小爺爺領我去參加了。在大祠堂里，我按照小爺爺的教導，先隨著大人跪拜祖先戚繼光的塑像，然後就聽族長講話。族長說，日本人下地了，我們大家都要有準備，日本人會找我們戚家麻煩，我們家族跟日本人是世仇，幾百年的世仇……，戚家每個人都是我們祖先的子孫，不要給祖先丟臉，不論日本人怎麼打你，你都不能投降，特別不能給日本人當漢奸，幫著日本人禍害中國人。姓戚的當漢奸，就不要姓戚了，就不是我們戚家人了，戚家的人都可以罵他、打他、殺他。你們不敢殺他，就把他綁到祠堂里來，由我們按家法處置。族長還說，你們的子女能參軍打日本的，就去參軍……。

那時候，我一聽說要殺人就挺害怕，開完會我回來就跟我媽媽學說族長的話。媽媽說，族長講得對。我說他要殺人，媽媽就給我解釋，族長要是不兇，允許人去當漢奸，那就要造大孽呢，是要兇點。媽媽的話，我似懂非懂，稍大一些之後才明白有些壞人是要殺的。

日本人來，不是為報與戚家的私仇，而是要占領整個中國，但大族長的講話對於戚氏一族的人來說是真有用的。因為有幾個年輕人聽了之後就去參軍了，後來在威海也確實沒有姓戚的當漢奸。我的表兄谷源臻（軍人）還告訴我，解放以後在威海找漢奸，也沒有找到姓戚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英國人開始逃離上海。那時祖父已去世，父親擔心英國跟日本宣戰，又惦記妻子、兒女，就通過清華銀樓匯來一筆錢，叫我們趕緊到煙臺乘英國船去上海，否則，

就來不及了，因為英國商船到上海已受到限制，隨時都可能停航。清華銀樓當時是威海最大的銀樓，我祖父在科舉廢除之後，棄文從商，就是轉入這個銀樓經營金銀珠寶。母親對父親的決定很高興，從銀樓拿到錢後，就把家里的東西能變賣的變賣了，能送人的送人了，告別親友帶著我和兩個妹妹到煙臺乘英國船去上海和父親團聚。

從威海到煙臺要坐長途汽車，我暈車，走到半路就嘔吐了。當時，沿途常有抗日游擊隊活動，汽車上有日本兵押運。我一吐，一個日本兵就用生硬的中國話說“小孩是霍亂的傳染大家”，要趕我下車。我母親一個勁地哀求。車上乘客知道那不是霍亂，也幫我媽媽說話，我才沒有被趕下去。不然，後來的一切，包括加入地下黨、到中央工作、十八年牢獄，可能就都不存在了。

我們是 1942 年春夏到達上海的。到了上海後我就在西城小學讀五年級。我受祖父的影響，關心天下大事，喜歡看書，到了大上海，就想看更多的書。我有個老姑也在上海，她告訴我，在膠州路附近有一座兒童圖書館，那里有很多書，學生可以去看、借書。我找去了，發現那是一座光線明亮的小樓，藏書很多。後來我放學以後就常去，不但在那里讀書，還經常從那里借書，文學、歷史、地圖和自然科學書籍，只要我有興趣又覺得能看懂的，就都看、都借，沉迷其中，不知疲倦。

第二章 追求真理：從不滿現實的少年學子，到投身革命的地下黨員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父親所在的報關行生意蕭條，父親的工資減少了，一家生活比較困難。為了節省房租，同時還能改善一家五口的居住條件，1943年我家搬到南市，住在蓬萊路67號。從南市到西城小學，沒有公共汽車，路太遠，我就轉學到家附近的念慈小學。那是一位慈善家為了紀念自己的母親而設立的學校。我在念慈小學讀完六年級，畢業後考上了《新聞報》的貧寒學生助學金，被分配到德潤中學，當時叫建平中學。

為了貼補家用我父母借錢在住家樓下開了一個小店，由母親打理，賣些煙、酒、火柴之類的日用品。小店確能賺點錢，但麻煩也隨之而來。青幫要強迫“保護你”，保護費是盈余十抽一、二。這個錢要是不給，小店就別想開。日本人的稅務局也要抽錢，雖比青幫少些，但大概也是盈余的百分之十。這兩項合計就是百分之二、三十了。還有日偽的小特務，戴著個破徽章，到店里要錢不說，還常常不給錢整條地拿煙，整瓶地拿酒，有時一拿就是幾條煙，幾瓶酒。這麼算下來，小店收入起碼一半就沒了。

有一次，小特務又來了，有瓶好酒，價格很貴，我母親實在捨不得讓他拿走，就想藏起來，但晚了一步，小特務看到了硬是要拿走，母親不給，還據理力爭。那小特務惱羞成怒，就誣說我母親是新四軍的情報員，把我母親抓到日本憲兵隊去了。我下學回來，聽家門口釘鞋的老皮匠一說，就好像天坍了一般，撒腿就往憲兵隊跑。那個憲兵隊，也在蓬萊路上，離我家只有五、六百米，我幾乎一口氣就跑到了憲兵隊門口。我小孩子思維簡單，又一心想找媽媽，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往里沖。好在兩個站崗的日本兵看我是個小孩，沒開槍，一個在原地繼續站崗，一個來追我追到里面一個大樓的門口把我抓住了。當時那大樓里面有日本憲兵隊的軍官正在開會，我把

他們的會議攬亂了。一個戴眼鏡的日本人，可能是憲兵隊的頭頭，通過他的日本翻譯問我來干什么？我就大叫：“我是建平中學的學生，我媽媽給你們抓進來了，我媽媽是很好的人，你們為什麼抓我媽媽？”戴眼鏡的日本人就對著其他人哇哩哇啦說了一通話，我什麼也聽不懂。幾分鐘後就有人把我媽媽帶到我面前來了，她后面還跟了個中國人，那家伙說我媽媽是新四軍的情報員。我媽媽雖然沒文化，但遇到事不怕，很沉著、很冷靜，在威海的時候還幫助我四姨媽給游擊隊偷運過短槍，她說：“不是這個事，我是開小店的，賣煙酒的，給你們做事的那兩個人經常拿我的東西，不給錢，我跟他要錢，他火了，就說我是新四軍的情報員，把我抓來了”，還說：“我是良民，我有良民證”。那些小特務，連我媽媽姓什麼、叫什麼都說不出來，戴眼鏡的日本頭頭聽了我媽媽的聲辯，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把我媽媽放了。

我小時候沒有做什么大事，這次沖日本憲兵隊就媽媽算是最大的一件事。我父親回家聽母親說了這件事，大為高興，第二天就買了一支博士金筆，一本《沉香救母》連環畫，作為獎品給我。那只博士金筆我用了好多年，《沉香救母》我看了一遍就丟下了。我慚愧呀！我沒沉香那本事，不然的話，就早把日本小特務懲治了。不過，這之後，我對於給日偽做事的人就更加痛恨了。

我們建平中學有一個日偽派來的訓育員，姓周，他好歹也是個知識分子，可不知怎麼就是昧著良心替日本人做事，我們罵漢奸“穿個皮鞋嘎嘎響，賣了祖宗再賣娘”，他就在旁邊喪著臉，不高興。德國人打敗仗了，日本人也要完蛋了，我們學生對形勢都知道一點，可他上訓育課，還是大講“大東亞共榮”，“反共才能救國”。我們都討厭他。一次，我們知道他又來上訓育課，就在黑板上畫了個烏龜，烏龜身上十三塊紋道，烏龜舉著日本膏藥旗，旁邊寫著“打倒漢奸”。那烏龜十三塊紋道，四個腿加上一個頭一個尾巴，等于六個腳，合起來是“十三塊六腳”。上海話“十三塊六腳”就是罵人無恥。訓育員進教室一看到黑板上“十三塊六腳”的烏龜，氣得臉刷一下就白了，連忙自己擦掉，還說：“你們老說我漢奸，我

是為了和平反共救中國”，“汪（精衛）主席是孫中山的信徒，是孫中山最好的學生，蔣介石壓迫他，‘和平反共救中國’的口號就是汪主席提出的”，“你們說我是漢奸，我是為中國人利益的，我教過你們當漢奸嗎？我都教你們怎麼樣修身，怎麼樣救中國，我沒有教你們當漢奸吧？！”我那時候也不知道什么是共產黨，只知道老家那個四姨媽是共產黨，具體干啥還不知道。訓育員不承認他是漢奸，我們學生卻不信他，不給他鼓掌，也不說話。他說：“誰畫的，自己出來認個錯，我可以原諒你年幼無知。”他追問了半天，沒人出來認錯，他就把我們所有男生每人打四板子，他認為女學生不會干這事，所以不打女學生。那是我長到十幾歲第一次挨板子。我們挨了板子，還是不服氣，還是沒一個人理他。很多同學回家后跟家長告狀，結果好多家長，有的還帶著親戚朋友，到學校來包圍了校長室。我們學生沒法上課了，都出來看熱鬧。後來校長、校長太太出來作揖，想平息事態，但學生家長說，不行，一定要開除這個老師，向學生道歉！校長太太說給每個學生發一包點心，表示慰問。學生家長說，誰要你的臭點心，我打你兒子，再給你發點臭點心行不行？我自己倒是沒有告訴媽媽，她打理小店很累，我怕再給她添累。家長鬧事后的第二天，學校貼出布告，撤銷那個周姓訓育員的職位，不要他上課了。那個人就再也沒來過。這次勇斗漢奸訓育員取得勝利是我第一次體會到集體的力量。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上海老百姓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都到馬路上狂歡，許多人拿菜葉子或者黃瓜呀，就往天上扔，怎么高興怎么來，還互相擁抱，拍肩膀，蹦啊，跳啊，喊叫啊！不久國軍進城了，我們的學校也恢復原來的校名，從建平中學改回德潤中學了。報上說是蔣介石聯合美英蘇打敗日本鬼子的，中國現在是世界五強之一，美英蘇中法，中國排第四位，揚眉吐氣。人們傳說蔣介石要來上海啦！沒多少天，蔣介石真坐著飛機到了上海。我們學校的學生都跟校長到跑馬廳（現人民廣場）去歡迎蔣介石，去跟著領隊喊“蔣介石萬歲！”“萬萬歲！”又過了不久，國民黨接收大員來了，他們在上海城里大搞“五子登科”，就是借接收大員的

權力，以“接收敵產”的名義，大肆搜刮房子、金子、票子、女子、車子。漢奸敵產他們要沒收，與漢奸沾點親帶點故的人的財產他們也都沒收，還不給收據。文化界、商業界、教育界和其他各業各界的頭面人物，只要沾上點日偽關係的，也都深受其害。接下來就是國民黨的中央銀行狂印鈔票，用低價兌換偽幣的辦法搜刮民財，結果是市場物價大漲，上海老百姓生活頓時就水深火熱。有一首民謠說“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想老蔣，盼老蔣，老蔣來了漲漲漲”。

我們家就慘了，小店原本有些盈余，國民黨要控制煙酒經營，要我們家的小店換經營許可證，不然不讓經營。為了弄到這個證，我家把積攢下來的唯一的一條“小黃魚”（小金條）都用上去打通關節，最後也沒能如願。這等於是搶劫了我父母的血汗錢、我家的活命錢之後，又斷了我們家的生路。為了這個事，我父母都哭了，一家人愁眉苦臉了好幾個月。後來我新添的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都是得了兒童肺炎，沒有錢買藥，很小就死了。

母親小店的遭遇在整個社會上不過是一粒小小沙子，但是這粒小小沙子對我思想轉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我懂了歷史上的官逼民反是怎么回事。

終於，1946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上旬，上海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攤販鬥爭。國民黨上海政府在整頓市容名義下，在幾天之內抓了上千的小攤販進局子，并沒收他們那點可憐的小商品，結果引起眾怒，五、六千個攤販家屬（婦女、老人、小孩）和許許多多被沒收物品、被禁止擺攤的攤販，包圍了黃浦區的警察局，要求釋放被抓攤販，發還被沒收的財物。那天是星期六，我本來是要去父親的公司，走到河南路上看到攤販們一群一群往黃浦警察局奔去，一打聽說是攤販在包圍警察局，就跟著人群進了黃浦警察局前面的廣場。只見廣場上人山人海，群情激奮，後面和旁邊馬路上還有數千圍觀者。警察局門口則是好幾排警察與往里衝擊的攤販發生激烈衝突，警察用警棍打人，用水龍頭沖人，還往天上開槍，攤販們則毫不退讓，一些人還不知從哪兒弄來一筐筐碎磚頭、鵝卵石、西紅柿、臭

雞蛋，往警察局扔，扔得遠的就把警察局的玻璃窗打碎了。一看這陣勢，我就跑過去幫忙給大人遞碎磚頭——我是個小孩，力氣小，碎磚頭扔不遠。警察會閃躲石頭和西紅柿，真挨打的不多，而沖在前面的攤販，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打昏，有的被打傷。即使這樣，攤販們還是不罷休、不退卻。幾十分鐘後，其他區的大批警察，坐著鳴叫的警車趕來支援，他們下車就抓人，我從人群空隙中跑了。攤販們隨後就組織全市商戶罷市。這件事最後以國民黨市長吳國楨講話答應放人、答應退還東西、答應攤販繼續營業而淡化。

1946 年冬天，美國大兵在北京凌辱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由此爆發了津、京、滬的學生大規模游行示威，上海的學生包圍了美軍在上海的海軍司令部，高喊“美軍退出中國”，“美國兵滾出去”的口號。大學教授蔡尚思、馬寅初、楚圖南等名流發表了《對美軍暴行抗議書》。大游行那天，正是 1947 年元旦，學生放假，我聽到廣播後，也到南京路去和市民一起觀看反美大游行，學生喊口號，市民也跟著舉手喊叫、鼓掌、跳躍，一致要求驅逐美軍撤離中國。這是一次全國範圍的“反對美國大兵欺凌中國人，要求美軍退出中國”的人民運動。

這個時期，國民黨發動的內戰已經打得很激烈了，內戰造成大批蘇中戰區的難民，搭船從長江對岸涌向上海、南京、常州、無錫、蘇州等地。進上海的難民最多，一時間在南市、閘北、楊浦，出現無數的貧民窟，難民用木板、硬紙板搭起許多臨時小屋，里面擠滿了人，後來沒地方搭建小屋了，很多人就睡在馬路上。那年冬天上海特別冷，突然有一天，一場寒流襲來，凍死了很多。我第二天清早去上學，在蓬萊路、復興路上就看到隔一段就有一個小孩的尸首。有人在報上說那天死了八百個小孩，有八百個童尸！住在上海的詩人臧克家，目睹了這個慘狀，就寫了一首詩，叫“生命的零度”，副標題是“八百童尸”。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把這詩摘錄成一個小傳單到處散發，我就是在傳單上看到這首詩的。這首詩是反內戰的號角。那些兒童有權利生存下去，卻生命到了零度，凍死在上海的街頭，死的時候眼睛都閉不上，這是為什麼？就是因為國民黨打內戰，

弄得老百姓沒吃沒住。1947年剛來，上海米價又暴漲，比抗戰勝利時上漲了百倍，即使這樣市民還常常排長隊買不到米，而窮人想吃也沒錢買，只好買點豆腐渣參合玉米面混日子，家中來了客人才會到黑市買點大米應付一下，而黑市米價比配給米高一倍到五倍。就在這個時候上海地下黨發起了反內戰、反饑餓運動。國民黨開動宣傳機器說內戰是共產黨挑起的，但誰都不信他們的，誰都知道，是四、五百萬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在美國人支持下，張開大嘴想吃掉共產黨。

我親眼目睹的慘狀對我觸動很大，臧克家的詩又啟發了我的覺悟，我就參加到了反內戰、反饑餓的學生運動中去了（自那時以來我一直很崇敬詩人臧克家，直到二十一世紀初我還到他山東老家去紀念過他）。外灘、南京路、西藏路上，都有大學生、中學生游行示威，我就跟著他們跑，他們喊口號我也喊口號。那時候我還沒參加地下黨，但是我已經知道是地下黨在策動反內戰、反饑餓運動。國民黨警察用水龍頭來衝擊學生，學生不肯退卻。我所在的德潤中學，校長是國民黨，他不準學生參加游行，但我們和郁文杰等七、八個學生，還是到外灘去助威。特務們用一個木頭棍子，上面釘很多釘子打學生，一打就出血，一拉就血肉淋漓！很是慘烈。

學生把照片拍出來，老百姓看了更憤怒了。國民黨命令大中學校提早放課，不準學生在一起。他們以為放課學生就不游行了，其實一放課學生出來參加游行更方便了。

老百姓都知道反內戰、反饑餓其實就是反國民黨，反國民黨給老百姓造成苦難，所以都自愿參加到運動中來。一些工人、職員是直接參加到學生的游行隊伍中來，很多的大小商店則是關門停業，表示對運動的擁護。與上海的運動同時，南京、北平等也出現了反內戰、反饑餓運動，並且所有這些大城市的運動，持續不斷，愈演愈烈，國民黨就出動大批軍隊，殘酷鎮壓游行示威的群眾，製造了死傷大批革命學生的慘案。即使這樣，還是壓不下群眾的反抗。而且上海、南京的工人、市民，大批加入群眾運動中去之後，不像學生那樣溫文爾雅，他們罷工、罷市，包圍警察局，還有許多市民

竟然自發組織搶米風潮。

1947年暑期，我初中畢業，那時我雖然反蔣反美的積極性很高，但還沒有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觀，理想仍然是做個科學家，走科學救國的路，所以考高中我是一心想上名校。報上說，黃炎培等創辦了一個貧寒學生助學金，凡上海市貧寒學生，如能考取這項助學金，就可保送進上海名校浦東中學、滬新中學等。我家境貧寒，就去報考了這個貧寒助學金，結果我幸運地考上了，保送進了浦東中學。但我怎麼也沒想到，浦東中學這個名校竟徹底改變了我自己原來設想的人生道路。

浦東中學是上海名人楊斯盛創辦的，楊斯盛是工人出身，後來成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上海灘上著名的建築設計師，上海許多有名的建築都是他帶領工人建造的。他在晚年毀家興學，捐獻一生積蓄二十四萬金，在上海浦東創辦了這所中學。第一任校長即是黃培炎先生，他是孫中山領導的老同盟會會員。“五四運動”先驅蔡元培曾贊譽楊斯盛是“一代偉人”，胡適則稱楊斯盛是中國的“大豪傑”，“可敬、可愛、可法、可師”。浦東中學在長期的教學中，為社會培養了大批人才，著名的有張聞天、李一氓、蔣經國、莊世平、王淦昌、夏堅白、范文瀾、胡也頻、殷夫、董純才、雷經天、謝晉、何挺穎、葉君健等。

浦東中學一直富有革命傳統，早在“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和“一二九”運動中，就都是革命的先鋒堡壘。在抗戰中校舍被日寇炸毀，學校遷至浦西杜美路（即今東湖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很重視浦東中學，派軍統特務黃星來控制訓導工作，他有權把革命師生送特刑庭，連校長都怕他。上海地下黨則把浦東中學列為中學工作重點，還派了一批地下黨員在學校組織學生運動。我在解放後才知道，我考的那項貧寒助學金，名義上是黃炎培等人創辦的，實際從事具體工作的多是共產黨領導下的進步人士。而我能考上則可能與我之前參加了反饑餓、反內戰鬥爭不無關係。我的英語不好，我很擔心考不取，記得當時面試的時候，一位女老師問我對全市反內戰、反饑餓運動的看法，我根據自己的經歷和見聞侃侃而談了一

番，結果我在回家后的第四、五天，就接到了保送浦東中學的通知。

1947 年秋我到浦東中學報到了，和顧志剛分在一個班級，他就坐在我后排。不久我們成為好朋友，後來是同志加兄弟，彼此生死不渝。顧志剛是青年地下黨員，是當時上海地下黨派到浦東中學組織地下黨支部、開展學生運動的成員之一，和他一起的其他青年地下黨員還有胡令升、張曄、何世和、錢嘉慶、姚堤等，其中胡令升是當時上海地下黨最年輕的區委委員。

1947-1948 年是我一生中思想大變化的時期。這個大變化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我一生的跌宕起伏，高峰低谷，好與壞，福與禍 …… 都與這個大變化有關系。這個大變化又與革命書籍分不開。我對書籍總是如饑似渴，剛隨母親到上海不久，就迷在兒童圖書館的圖書里；在建平中學讀初中的時候，從一個老師那里得知在四馬路（現在的福州路）有個很大的市立圖書館，我就去那里讀過諸子概論、史記和魯迅、茅盾、郭沫若的部分著作，還讀了達爾文、莎士比亞、愛因斯坦。但是，引起我思想大變化的是在浦東中學時期接觸到的革命書籍。

通過地下黨員顧志剛，我先讀到了大量上海進步書店、解放區和香港出版的文藝、歷史、哲學著作，包括《李有才板話》、《王貴與李秀秀》、《李家莊變遷》、《大眾哲學》、《小二黑結婚》、《社會科學概論》和魯迅、高爾基部分著作的單行本等，後又讀到了美國記者斯諾寫的《西行漫記》。《西行漫記》這本書系統講述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革命理想，特別是書中的《毛澤東自述》這篇文章，把毛澤東本人的革命歷史、政治主張坦誠地公諸于世了。這本書打開了我了解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大門。書里的許多事情，如井岡山，反圍剿，萬里長征，都是我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既新鮮又刺激。我一翻開這本書，就像打開了萬寶盒，一連三天三夜，日以繼夜地看，連吃飯、睡覺都忘了，學校里的功課也不做了，有的章節不止看過一遍、兩遍。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好書，它幫助我建立了對共產黨和毛澤東的信念。現今我個人的藏書里有《西行漫記》的三種版本，它們是我的珍愛。現在許多人都在追求億萬家財，想做億萬

富翁，這本書里講的真理的價值豈止億萬！

從《西行漫記》里，我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寫了本《共產黨宣言》，我到處找這本書。後來何世和給我搞來了，他那個書的封皮是《家庭月刊》，里面才是《共產黨宣言》，書沒寫譯者姓名，書的紙張粗糙泛黃，書的第一句話就震撼了我：“一個幽靈在歐羅巴踟躕著，這就是共產黨的幽靈！”“踟躕”兩個字我那時還很生疏，所以印象特別深刻。解放後我看到莫斯科外文局出版的“宣言”譯本，它把第一句譯為“一個怪影在歐洲游蕩著一共产主義的怪影。”我覺得它沒有我們中國人自己翻譯的好。《共產黨宣言》第一章就講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我看了就想，我在報關行干活的父親、在香煙廠干活的老姑、在食品廠干活的花姐，不都是無產者嗎？他們的老板不都是資產者嗎？《共產黨宣言》說，無產者要聯合起來，用革命手段奪取資產者的機器、工廠、土地、房屋，建立起一個讓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我同意並相信這些說法，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打倒國民黨，因為那時國民黨很專制、很腐敗，我很厭惡國民黨了。《共產黨宣言》提出要沒收資產階級所擁有的土地、工廠、鐵路，要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然後按計劃組織生產，還提出具體的十條措施。我反復閱讀這些措施之後，全部都擁護，特別擁護“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這一條。這本書我大致能看懂，有些內容卻不很明白，比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公開的公妻制”、“英國憲章派”、“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等，其中一些問題是直到解放後才慢慢弄懂的。

我從一位在海關工作的老鄉那里得知，在上海霞飛路影院的后面，有一家中蘇友協開辦的進步書店。我找到那家書店，只見書架上擺滿了各種各樣的蘇聯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書。書店的職員對人和藹，對我這個窮學生，也彬彬有禮。後來我就成為那里的常客。在那里，可以像在圖書館一樣地看書，只要願意，看一整天也可以，不買書也不要緊。有時（星期日）我就看一整天，中午喝點茶水，啃個羅宋面包，直到書店關門時才回家。我看得最多的是中文版《時

代日報》，上面有解放戰爭的戰報，世界和中國局勢的分析，我也常常坐在一個角落里如饑似渴地搬起磚頭般的大書翻看。久而久之，書架上的《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聯共黨史》、《斯大林衛國戰爭言論集》等，我都有不同程度的閱讀，不過馬克思的《資本論》我還看不大懂。總起來說，那個書店給了我許多解放區的消息和初步的馬列主義知識，至少我看懂了許多革命新名詞，什么“勞動”呀、“價值”呀、“剝削”呀、“帝國主義”呀……我都看懂了。最意外的收獲是，一位年紀比我大一點的中學生偷偷給了我一本香港出版的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還神秘地告訴我書店里有時有國民黨特務混入，叫我注意尾巴。但我在那書店里陸續看了好長時間的書，也沒發現有人盯我，大概那時我人小，不被特務注意。

我永遠忘不了那本《論聯合政府》的小冊子和當時看了小冊子的感覺。當時抗日戰爭雖已勝利，但國民黨又把祖國拖入內戰之中，沉淪了一百多年的中華古國怎樣才能振興呢？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等，我都看了，都沒有也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想不到遠在陝北山溝里的毛澤東，卻早在兩年多前就給我們寫了這麼好的一本解決中國問題的小冊子，特別是它所闡述的“我們的一般綱領”和“我們的具體綱領”，為正在迷茫而困擾地尋求祖國發展道路的青年人，指出了解放中國、建設中國的道路。小冊子把一切都講得那樣的合理、那樣的實在。我在看到這個小冊子以前，志向是將來做個科學家，用科學來改變祖國的貧窮落后。這以後，我才知道，要實現這個目的，必須先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把祖國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我覺得，毛澤東能救中國，我服膺了，從此認定，我要在今后跟著毛澤東。這本小冊子後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讀過它的人成百上千萬了，但誰能難想象我當時讀這本小冊子時的激動心情呢？

我把我的感受同好友顧志剛講了。不久后，顧志剛又給我借來一本吳黎平翻譯的《反杜林論》，要我好好看。這本書很厚，分三編：

第一編：哲學；第二編：政治經濟學；第三編：社會主義。第三編是講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的，很打動人，介紹了三位著名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法）、傅立葉（法）、歐文（英）；他們都眼光遠大，對“充滿罪惡和災難”的資本主義深惡痛絕，主張建立新型的、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我為他們的偉大精神感動，最叫我心動的是身為英國一個大紡織工廠廠主的歐文。他先是領導一個 500 多人的工廠，後來，又領導了一個大棉紗廠，發展到 2500 多人，別的工廠廠主逼迫工人每天勞動十三、十四小時，他卻只讓工人勞動十小時半；他發明並實際為工人的子女創辦了幼兒園，讓兒童生活得愉快；當經濟危機爆發使工廠停工時，他仍給工人發工資；在別的廠區，工人大批墮落，在他的廠區卻沒有墮落分子，警察、刑事法庭都不需要了，連貧困救濟和慈善事業也絕跡了。即使這樣，他仍然認為自己沒有給工人“合乎人的尊嚴”，他說：“這些人都是我的奴隸”。他問，這 2500 多人中從事勞動的那些工人所創造的財富，在半世紀前需要六十萬人才能達到，這兩者之間的巨大財富差額到哪里去了？他的答案是，都歸企業主了。他認為，那巨大財富的果實，本應當歸于工人自己；這種少數人發財而使群眾受奴役的現實是最不合理的；大眾創造出的財富不應歸個人而應為大眾的共同利益服務。本著這樣的構想，他想用自己的財富進行創設共產主義新村的試驗，想為資本主義社會創造新天地。但是，他不懂得階級鬥爭與革命，不懂得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是永遠不會放棄自己的財富去創造他的共產主義新村的。所以他最後被逐出了上層社會，變得一貧如洗，他的共產主義新村也以他喪失了全部財產而失敗告終。

我不是一個輕易就被感動的青年人，但歐文的那些話，特別是“這些人都是我的奴隸”的話，我當時讀到時，曾淚流滿面。這淚使我的思想完成了革命的轉變，我完全接受了恩格斯在書中所描述的階級與階級鬥爭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那是在 1948 年 1 月的一個天氣很冷的夜晚，地點是上海市蓬萊路六十七號我家的閣樓上，一盞十五瓦的小燈泡，陪伴我讀完這本共產主義歷史的巨著。在閣

樓旁那間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熟睡著我的父母和妹妹；在底層我母親簡陋的小店里，三塊木板搭成的一張小床上，蜷曲著我在香煙廠打工的遠方老姑。那天因為打夜班，她回不了家，臨時睡在我家的小店里。她是個寡婦，四十多歲了，為了供養未成年的子女，每天要去香煙廠做工。那廠子我也去過，在復興路的一個弄堂里，車間破爛透風，滿屋飛塵，煙料的辛辣味和工人身上的酸臭味混在一起，連呼吸都很困難。她的老板有時連工錢都拖著不發。試問，這樣的老板能同意歐文的共產主義新村的思想嗎？能和歐文一同去建設共產主義的新村嗎？工人要解放，不斗争行嗎？那時工人為什麼那麼擁護共產黨？那時共產黨就一百多萬軍隊，國民黨有五百多萬軍隊，力量對比很懸殊，人民為什麼還是義無返顧支持共產黨？因為共產黨告訴他們，為了自己的解放要起來革命，自己救自己！現在為什麼有那么多人反對共產黨？因為許多共產黨組織自己和當年逼得人民起來革命的國民黨一樣貪污腐敗了。史鏡熠熠，“事有不得者，返求諸己”。今天的共產黨應該反省自己啊！

地下黨員顧志剛看到我思想進步很大，就來動員我并和我商量，怎么把小兄弟們團結在一起，先領著大家看革命書，再慢慢形成一個進步組織。不久，我們十幾個人在淮海路白俊義同學家里開了個會，建立了一個進步組織，起名叫“野火社”，取白居易“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意思，表示不怕國民黨的一次次鎮壓。由於顧志剛他們是地下黨，野火社實際上就是共產黨在浦東中學的一個外圍組織，後來的進步活動都實際是按顧志剛的暗中接洽，在上海市學聯指導下進行。

浦東中學那時實行學生自治，每個班級都設立班委會，由學生自己管理自己。我因為以前就與班級的幾個同學辦過一個文藝性學生刊物，就當選了班委會的文藝委員。這正是顧志剛想要的，他希望我負責辦壁報（現在一般叫牆報，其實就是大字報），宣傳革命思想。我請班級語文老師為班級壁報取名，他取名為“警鐘”，意思是警鐘長鳴，自強不息。大家同意。我又請美術老師繪制板頭，動員大家寫稿。很快《警鐘》就辦起來了，半月左右一刊，第一期是 1948

年三月出版的。我按照顧志剛的建議，讓《警鐘》的第一期採取了中間立場，不談共產黨的事，除了同學們的好作文之外，就只有我和地下黨員何世和編的《海涅詩選》，以及從進步報刊抄來的一些時評。想不到《海涅詩選》受到愛好文藝同學的喜歡，有人一面看一面抄。我們登載的海涅詩，其實是個精粹摘錄，不是全文。同學們也都沒想到海涅竟然是一位革命詩人，同情工人，在詩中詛咒資本主義剝削。如今壁報的許多文章，都找不到了。我翻查解放前的筆記本，

只找到當時抄錄的海涅詩的幾張小紙條，上面的詩是：

我們織！

我們在織布機前，
織呀，織！
憤怒的眼睛里，
早沒有了淚水。
我們咬牙切齒地恨你呀！
德意志帝國！
我們在為你織裏戶布呀！
織呀，織！
我們一面織，
一面詛咒！
詛咒你的上帝，
我們在饑寒交迫時，
曾滿懷希望，
向他祈求……
到頭得來的
只是欺騙！
織呀，織！
我們一面織，

一面詛咒！

我們詛咒帝國的統治著，

你對我們的苦難，

毫不關心，

你只知道剝削壓迫！

榨干了我們最後的一根筋骨，

還把我們打死在地，

織呀，織！

我還會雷鳴！

因為我的閃電是那樣的明亮，

它光芒四射，

剎那間，

就劃破了蒼穹。

所以

你們就以為我不會雷鳴。

親愛的人們，

你們錯了！

除了閃電，

我還會雷鳴！

不信嗎？

一旦革命的日子到來，

我雷霆萬鈞，

五雷轟頂。

那時，

官僚特權的宮殿將被轟塌，

貴族階級的統治將被摧毀。

富豪的莊園、別墅，也將同大地一起震蕩！

貪污、腐敗、娼妓、賭博、流氓、毒梟，

一切污穢的東西，
都會被我的閃電雷鳴轟掉！

我是火，我是劍！

我是火，
在黑暗里。
用我的生命
指引著革命的道路。
我是劍，
在戰鬥時，
用我的身體
沖鋒陷陣，
一往無前！

1948 年內戰局勢發生逆轉，國軍不行了，解放軍形勢大好，先有西北、東北戰場解放軍的大捷；接著是 3 月間在華中戰場陳賡、謝富治所部攻克洛陽；緊隨其后是 3 月 30 日我的家鄉威海獲得解放；再接著是 4 月 22 日革命圣地延安又回到人民手中。毛主席在收復延安后，東渡黃河，進入華北解放區，繼續指揮全國解放戰爭。這些消息，我們通過壁報和野火社積極分子與同學們的談心，告訴了大家。5 月全國的“反美扶日運動”爆發，我們的野火社也積極參加活動。美國在 1948 年 2 月宣告日本天皇無罪，允許日本懸掛太陽旗，5 月扶植日本成立“海上保安廳”作為武裝日本的初步。這等於是中國人剛剛從日本法西斯的鐵蹄下掙扎出來，還沒來得及擦干身上的血污，美帝又把日本軍國主義扶植起來了。美國的行徑激怒了飽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國人，全國的“反美扶日運動”由此爆發。北平、天津的學生首先舉行游行示威，上海地下黨也敏銳地抓住了這個問題，在群眾中進行反美扶日的宣傳。5 月 4 日晚上，野火社成員和許多積極分子到交通大學參加紀念“五四運動”

的營火會，這個大會的一個內容就是反對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孟憲章做專題報告。由此開始，“反美扶日運動”就成為 1948 年上海學生運動的最重要題目。

野火社當期壁報，按照顧志剛的要求，不但要擴大篇幅，還要貼到學校的大門口。為了組織好這期壁報，我們不分晝夜地編寫，我們在學校倉庫的舊報刊中，找到日本人轟炸上海、殘害老百姓的舊報紙、舊雜誌資料，把它們剪下來，還按顧志剛的主意，把剪報邊燒一燒，造成一種實物證據的樣子，讓讀者能想起當時日本人用炸彈炸我們上海的慘痛情景。我又找到了“八·一三抗戰”和南京大屠殺的照片報道，在旁邊用大字寫上“日本軍國主義瘋狂屠殺中國人，現在美國又把日本扶植起來，我們能答應嗎？”。

這期壁報在校大門口貼出後，顧志剛還叫上別的中學學生來看，造成較大影響。但也馬上引起學校里的訓導員、軍統特務黃星的注意，他嗅到這個大概是共產黨搞的。壁報貼出來的第三天，他就叫學校里跟他跑的學生把壁報揭了下來，交給校辦，并對背后的情況進行追查。壁報有一篇最激烈的文章，不說“美國”，而說“美帝國主義”。黃星就從這篇文章查起，他認為作者是共產黨，就把我這個主編找來問話。我知道文章是何世和寫的，但不能出賣何世和。黃星這個軍統特務就用查筆跡的辦法查到是何世和寫的，然后又把我找來問話：“何世和是不是共產黨？”我答：“他是共產黨？你簡直好笑。”我當時這樣說也是真話，一則我那時確實不知道何世和、顧志剛他們是地下黨員，二則我以為共產黨雖然不是三頭六臂，也該是些高高大大、虎背熊腰的人，何世和還沒我長得高大，能是共產黨？！我接著又說：“他比我還小，他什么共產黨呀！”黃星不管，仍叫級任老師去把何世和找來追問。何世和說自己的祖父是青幫“同”字輩大佬，與黃金榮關係非常好，父親在跑馬廳管事。黃星一聽，馬上就不再問何世和“美帝國主義”的事了，叫他走，何時和一邊說“好”一邊要拉我一起走，黃星不干，說：“戚本玉不能走，你走吧。”何世和裝著很講義氣的樣子說：“他是我的朋友哩！你以為他是共產黨？笑話，他長得挺大，其實年紀比

我還小呢，懂什么共產黨，你這年紀才夠共產黨哩！”黃星哭笑不得，但還是不放我走，他不信我年紀小小的，能弄出來這個東西，還威脅我說：“誰指導你的？誰教你？你今天不說出來就別想走，因為你是主編，不說就把你送特刑庭。”

顧志剛很了不起，他一看到黃星又找我問話，就知道情況不好，就立即派同學通知了我母親來學校；看到黃星放了何世和，卻不放我，就鼓動起同學圍住校辦。正在雙方僵持不下時，我母親趕到學校來了，在同學簇擁下闖進校辦，先把黃星奚落一番，叫他“有本事打共產黨去，抓我孩子干啥？”然后拉著我就走。教務主任趕過來告訴我母親：“你來了也好，學校決定開除你兒子學籍。你把兒子領回去，今后不要來上學了。”他沒說完，我母親就把我拉出校辦，頭也不回地走了。

這天是 1948 年 5 月 19 日。這是我很難忘記的一天，我在浦東中學的學習生活在這一天結束了。第二天，學校出了布告，開除我的學籍。

在我被開除后不久，全國的反美扶日運動像滾雪球一樣，聲勢越來越大，參加的人越來越多。六月中的一天，上海地下黨又組織全市學生，在外灘舉行游行示威。顧志剛出于我的安全考慮，怕我萬一被國民黨抓了，放不出來了，就讓人來向我交代，不要參加游行，只可旁觀。

這之后的一天，顧志剛來跟我談話，要發展我入黨。我已看過許多革命書籍，對共產黨也有了認識，雖然有參加黨的願望，但是我沒想到，甚至也不相信顧志剛是共產黨。在我的想象中，地下黨一個個高高大大的，威風凜凜，年紀也很大的，比我大幾倍，顧志剛與和我年紀差不多，與我想象中的地下黨實在相差太遠。而且，每次在運動中，他在后頭出主意，我是沖在前頭，講得比他還多，表現比他還勇敢，我被學校開除過，他也沒有被開除。還有，我那時自己組裝並聽短波收音機，經常給他講我聽來的東西，他知道的東西也不如我多。所以，我就說，你開什么玩笑，你看過《共產黨宣言》嗎？你自己搞的共產黨吧？共產黨不是隨便什么人就可以組

織的，它是有綱領、有組織、有紀律的。他笑了，說：“是的，我們就是有綱領、有組織、有紀律的”。我說，共產黨要有槍的，你有槍嗎？沒槍。沒槍你怎么是共產黨？我還想有個槍呢。我看了毛主席的書，槍很重要。你沒有槍，我不相信你是共產黨。顧志剛第一天沒有說服我，第二天還跟我談。我跟他說，你知道孟什維克、布爾什維克、馬爾托夫嗎？你知道列寧批判馬爾托夫隨便組黨嗎？共產黨有綱領、有組織、有紀律，像馬爾托夫那樣胡亂組織共產黨是不行的。顧志剛那時還不知道馬爾托夫，就被我說得沒有話說了。他實在沒有辦法了，就實話告訴我說，我們就是有綱領、有組織、有紀律的共產黨，我是學校共產黨小組的組長，入黨一年多了，“野火社”是黨的外圍組織，黨看你有了覺悟，而且在反美扶日鬥爭中經受了考驗，才發展你的，你入了組織就會知道黨多了不起的。我還是半信半疑，我要求見他的領導人。他說，那要入了組織才行，你的好朋友何世和也是共產黨員，我只能告訴你這么多，不能再多了。後來何世和來跟我談話，跟我講共產黨是怎么回事，怎么一個發展歷史。還說，共產黨有白區，有蘇區，白區的黨組織後來被破壞了，毛主席又叫恢復。顧志剛不是一個人，他上面是有組織的，他不好跟你講。何世和在理論上比顧志剛高，是他給我看的《共產黨宣言》，壁報上的“美帝國主義”就是他寫的，他又同我一起和黃星面對面地鬥爭，我很相信他。我問他：“你真是共產黨啊？”他說：“真是的。”我那時認定，凡是共產黨都有槍，就說：“那你能不能證明啊？有槍沒有啊？”他說：“我們能有槍嗎？我們不能帶槍的。毛主席講的，我們不能隨便發動暴動，在白區一般情況下要利用和平手段，講合法鬥爭。他還說劉少奇有論黨，那里講了在白區要進行合法鬥爭。我聽何世和講的都在理，想了半天，覺得他這個共產黨應該是真的。何世和知道我信了他，就說，你應該相信顧志剛，他是組長，是你的發展人。我問他：“為什麼你知道的比顧志剛多，而你當組員他當組長呢？”他說：“我犯過錯誤，受過處分，我向一個女同志泄露過黨的機密。你入黨後不能隨便說話，泄露黨的機密要受處分”。

我同意入黨了，顧志剛很高興，就要我用米湯寫一個入黨報告，把我的姓名、經歷什么的匯報上去。他後來領著我一句一句輕聲地說，“我志愿參加共產黨，服從黨的領導，永不叛黨”等等。都說完了，他說，“這就是宣誓。”就這樣，我入了黨。我要求見領導人，他說要等上面批准我接關系后才能見。那時我離開浦東中學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不能在浦東中學過組織生活，只能等我下學期開學的時候再接關系。我的關系實際是 1948 年 10 月在中華理科接上的，黨齡是以接上關系開始計算，所以我入黨時間較早，接關系較晚，我的黨齡是從 1948 年 10 月算起。

我入黨后還沒接上關系，顧志剛就要我到浦東中學去發展一個思想進步的同學入黨。他叫錢寶瑾，與我關系好，我待他像自己的弟弟。我是被浦東中學開除的，名氣比顧志剛的大，浦東中學一些進步同學認我，以為我是共產黨。錢寶瑾接受了我的發展，在 8 月入黨，并馬上在浦東中學接上了關系。錢寶瑾解放后當過上海公安局局長黃赤波的秘書，後來在公安局政保處。文革中，徐景賢準備讓他進入公安局領導班子。1968 年初我出了問題，他因為是我發展入黨的，就也遭受審查。一審查，他是八月份入黨的，比我這個入黨介紹人入黨時間還早兩個月，他怎么也說不清楚，後來就被派到區里當民警去了。我 1986 年從監獄中出來后回到上海，與他再次見面，現在他也還來看我。

1948 年 8 月在我發展錢寶謹入黨后，顧志剛告訴我，組織上決定讓我報考上海中華理科高級中學（簡稱中理，這個學校原址在今徐匯區安福路上），到那里去開辟工作。他說，中理雖然規模小，但學風好，在上海頗有聲望，校長曹鳳梧是民族資本家，在上海很有點名氣，他主張實業救國、科技救國，一邊開辦紡織廠，一邊創立了這個學校。學校只有一個地下黨員，現在派你和另一個地下黨員瞿云寶一塊進校，那里沒有國民黨特務的干擾，工作比較安全，你們三個人爭取用兩個學期，把它建成像上海儲能中學那樣的紅色堡壘。我說我是被開除的，沒肄業證明，怎么報考呀？他說那個好辦，過幾天何世和會給你安排好。

過了幾天，何世和果然就來同我談辦證書的問題。他說，地下黨正在想辦法給我開一張中學肄業證明書，要我改個名字。這個我懂，因為上海中學生都要往市教育局報名單，一查檔案，戚本玉是浦東中學開除了的，我要再在上海上學不改名字不行。那時候我正看魯迅的小說《理水》，它是寫大禹治水的，說大禹帶了一群人，穿得破破爛爛，像乞丐一樣，但一心一意為老百姓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這個大禹使我很受感動，我就跟何世和說：“把戚本玉改為戚本禹吧”。何世和希望兩個字都改了，我告訴他戚家是山東的大家族，本字輩必得用本，叫戚本什么的很多，改一個字就行了。

又過了幾天，何世和給我拿來一張寫有戚本禹名字的黃色土紙做的肄業證書，學習時間為一九四六年，是國立九中的，上面有國立九中的圖章和校長的印章。我從來沒聽說過上海有個國立九中，就提出一堆疑問，何世和都給我做了解答，還說“四川的地下黨跟我們說了，國立九中從重慶向南京遷移時，船破了，檔案都丟了，查也查不到了。這個證書不是隨便開的，是按照一個認識的國立九中的學生的證書復制的，圖章也是照它的樣子刻出來的，沒問題。”我那時候很執著于真假，還不大懂搞革命工作，有時對敵人也要做點假。所以，心里總是覺得不對勁。可是，沒有這個證書，我又進不了學校，就只好將就了！何世和還叫我抓緊時間找些舊報刊，看看重慶的情況，以防萬一有人問起來，可以接上幾句，但他告誡我盡量少談重慶，免得說漏了嘴叫人起疑。

我拿著複制的國立九中的證書進了中理，戚本禹的名字就這樣沿用下來了。我那時認為，中國最理想的領導人就是大禹這樣的人，因為他是真為人民著想，為人民辦事的。後來我才知道，毛主席對大禹的評價更高，說大禹是比孔子還偉大的聖人。看來，我當時的選擇是符合魯迅和毛澤東的思想的。

1948年9月底，顧志剛通知我，第二天課后到跟我同去中理的地下黨員瞿云寶家開接關係會。記得那是個周末，我下了課即與瞿云寶一起去他家。來接關係的人是徐龍區青委委員張效浚。張效浚的領導人是張本，一個很能干的女同志。張本上面就是市委書記劉

曉、潘漢年等。文革中張本在國家科委擔任副職，造反時我支持過她。我出事后，她和張效浚都受我連累，長期被審查。

我和瞿云寶都進中理后，中理就有了三個地下黨員，黨小組長是由上學期就在中理的劉伯瑞。這個時期地下黨工作就比較好做了，許多學生願意聽有關共產黨的各種消息，并接受共產黨新民主主義政策。1948年11月東北解放之后，國民黨的敗象畢露，地下黨工作就更好做了。我們組織的讀書會、同學聯誼會都有很多人參加，我們在會上講共產黨的綱領政策、講栗裕擊斃張靈甫、講林彪解放東北的故事等等，同學們都愛聽，都希望共產黨打勝仗。不到半年，我們就壯大了隊伍，發展了施克儉、張惠康等同志入黨，在學期末使學校地下黨員增加到六名，讀書會的外圍成員十幾個。

校長曹鳳梧見我們經常組織同學讀進步書籍，組織各種進步活動，怕我們影響學校教學，便進行干預。他聽說我是領頭人，有一天便找我到校長室，很客氣地邀請我下課后到他家吃午后茶點。校長請我去他家吃午后茶點，這是很高級的禮遇。我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也想利用這個機會把他拉過來，就接受了他的邀請。

下課后我帶了一個地下黨員同去他家。他見到我就開門見山地說：我知道你不是國立九中的。我剛要解釋，他就說，不必說了，你是個好青年，聰明能干，有理想，一定是由於參加學生運動，丟了學籍。我女兒也同你一樣，在南模女中鬧學潮，學校不要她了，看我的面子，才保留她學籍，調到男中去旁聽。其實你們將來都是國家的棟梁，只是國家怎樣是我們大人的事，你們現在就是好好讀書。我也知道國家當前的情況讓人痛心疾首。怎么救國呢？唯有科學一條路，希望你好好學數理化，將來搞工業。我的理科中學就是培養工業家、工程師的。我還知道你的家庭條件不太好，只要你願意好好學習，我可以免除你的學費，將來保送你上大學，我在外國還有些關係，大學念完了，還可以送你到外國念大學，畢業回來到我的工廠當工程師。將來這個工廠就歸你們管。你給國家發展工業，好不好？

我聽了校長這些話，更覺得他是一個好人，更想爭取他。但是，

我沒有成功。我記得我們談到後來我低聲跟他說過，難道你沒看見國民黨的軍隊用水龍頭沖學生，沒看見國民黨的特務用釘了鐵釘的板子打學生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國家不好，我們能好好讀書嗎？我還提議跟他達成一個協議，等推翻了反動政府，我們都幫他去發展工業，現在他不要反對我們的進步活動，但遭到他一口回絕：“那不行的，我的學校都給你搞亂了，學生一天到晚都聽你們宣傳。”

這位校長兼實業家，解放後接受了毛主席、共產黨的教育，當了市政協委員，對共產黨的事業一直很積極的，在文革中也沒有受到很大衝擊。他的另一個女兒曹子方是解放後南模學生自治會主席，1951年曾作為新解放區學生代表，來北京參加全國教育會議，給我帶來過他父親的問好。對這樣一位堅持科學救國，後來又和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有過長期合作的進步人士，我一直懷著深深的敬意。但我始終認為，曹老先生和眾多和他一樣堅守科學救國理想的人，雖然都很值得尊敬，卻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問題。在經歷了上個世紀巨大的變故之後，我更清楚地認識到，科學能夠推動生產力發展，卻不能解決國家的政治腐敗和社會的進步問題。在社會發展問題上，革命比科學更重要。

第三章 迎接解放：從上海人民的保安隊員，到中央團校的青年學員

1949年初，上級黨組織提出，由於南洋模範中學是上海的名校，社會影響很大，必須要調一些地下黨骨幹成員進去加強黨的力量，讓我和瞿雲寶報考插班生，進入南模。同時，由於郊區真如鎮市立中學那是解放軍從鐵路線進入上海的必經之地，讓我們的組長劉伯瑞去真如中學開辟工作。這樣，我們原來在中理的三人小組就不存在了，我因此只在中理實際學習工作了一學期。我們雖然還沒有完全把中理建成紅色堡壘，但已為地下黨在中理的扎根打好了基礎，新黨員張惠康等人接手中理地下黨工作後，在第二學期就有很大的發展。新的中理黨小組為迎接解放盡了自己的責任。解放後中理收歸公有，改名黎明中學，成為上海的重點中學。現任上海第一書記韓正就是黎明中學畢業的。劉伯瑞進入真如中學後，把我初中時的進步同學郁文杰發展入黨，很快就在那裡打開了局面。真如中學黨小組為配合解放軍進軍上海，做了很多事情，勞苦功高。

在南洋模範中學，我們的領導仍是徐龍區青委委員張效浚。區青委的領導是錢其琛，即後來出任外交部長的那位。那時南模已設立了黨支部，男中有六個黨小組，女中有一個黨小組，都歸張效浚領導，黨支部書記是高三級的地下黨員王純亨，組織委員是我，宣傳委員張曄（女）、杭天禹。另外還有一個黨團小組，是做學校社團、校方領導工作的，由張效浚直接領導。這時，我受命於張效浚，負責南模兩個黨小組的聯繫，並暫時聯繫中華理科和真如中學的黨小組，不再做直接的群眾工作，在政治上也完全以中立面目出現。當時，上海地下黨的力量很強，組織示威游行都很容易，但上海地下黨接到中央指示，不再發動大規模的游行示威，主要搞隱蔽鬥爭，保證進步力量的安全，因為上海很快要解放了，解放以後需要大量人才，不能讓我們的人才都給國民黨抓了、殺了。

1949 年春節後，淮海戰役結束了。下一步是渡江問題。領導講，跟國民黨談判，肯定成功不了，我們已經把部隊準備好了，隨時準備渡江。果然，國民黨不肯在和平協定上簽字——蔣介石不讓簽字，李宗仁也不肯簽字。剛廣播了不簽字，第二天，解放軍就渡江了。那邊渡江，這邊我地下黨就組織人民保安隊，準備迎接解放。人民保安隊的徽章、袖章發下來了。支部書記和黨團小組長任大隊長和副大隊長。我是學校保安大隊中隊長之一，負責我們學校和周邊地區的安全、秩序，責任區從天平路到宋慶齡的故居一帶。我們要防止特務活動，還要防止搶劫、破壞和流氓活動。上海地下黨給黃金榮下了命令，不準他們青幫小兄弟在解放軍進城時鬧事。所以我們那里沒有發生搶劫、破壞這類事情。張效浚還布置我們派人去徐龍區南面調查國民黨軍隊設置的碉堡數量、配置，要我們秘密畫地圖。我們不懂軍事測繪，但還是去做了調查，也畫了些圖，并調查了國民黨、三青團等機關單位的名稱地址，都送上了去了，後來派上用處沒有就知道了。

1949 年 5 月，瀕臨滅亡的國民黨，垂死掙扎，幾次大規模搜捕進步人士。地下黨事前均能得到消息，預先防備。消息來源之一，就是高中三的地下黨員顧慰慶。顧慰慶的父親顧毓琇是國民黨中央要員，在國民黨里很有點權威，當時是上海市的教育局局長，家是住在一個高級公寓里。他不知道我們把他的兒子發展為地下黨員了。顧慰慶在家里聽到國民黨要大逮捕的消息，就報告地下黨。另一個消息來源是陳立夫的侄子。陳立夫的侄子也是地下黨員，經常跟地下黨報告情況，都很有用。按國民黨宣傳，陳立夫是比較艱苦樸素的，但是他的公館也是相當豪華。他侄子就住在公館里。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顧毓琇的兒子，陳立夫的侄子，家里都是有錢有權有勢的，可他們寧願跟共產黨走。現在呢，有些共產黨的子女竟希望變成豪門貴族！這真是叫人不勝唏噓！

每次大逮捕時，我們就通知學校的地下黨員晚上不能睡在家里，一些地下黨員就躲在顧慰慶家里，顧毓琇是國民黨要員，沒人敢來搜查；還有些地下黨員躲在陳立夫、陳果夫的公館里（現在復興西路的玫瑰公寓），和陳立夫的侄子呆在一起。其他學校來不及躲避的地下黨

員有的人被逮捕了，不經審訊，就被捆在麻袋里，扔進黃浦江。遇難者中有與我們打過交道的交通大學的地下黨員穆漢祥等人。國民黨當時開著坦克沖進學校，叫學生排好隊，拿著檔案，對著照片，一個一個搜查辨識。那是我第一次親身看到，反動派可以開著坦克來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當時許多市民也都親自目睹過這一場景。

臨解放那天晚上，解放軍已經打進南郊了，我們怕國民黨臨時來抓捕，住在天平路一個弄堂里面。5月25日凌晨，聽到外面有零零落落的槍聲，有人說，是不是解放軍打進來了？我說打進來會槍聲更大。但我判斷錯了。解放軍一進來，剛打幾槍，國民黨的軍隊掉頭就跑，鳥獸散了，哪會有什么很大的槍聲！後來有個黨員悄悄出去看了一下，回來說，是解放軍打進來了，他們穿著灰色軍裝，戴著帽子，胸上有個牌子寫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我問他看清楚了沒有，他說看清楚了。我就說，那我們趕緊出去。我們出去，部隊還在那兒前進呢，真都是解放軍！我們給他們打招呼，歡呼。他們也跟我們打招呼，擺擺手，繼續前進。

我們跑著回了學校，那時天麻麻亮，我們通過電話集合人民保安隊的同學。很快，來了幾十人，張效浚也馬上到學校了，他布置任務：維持治安，宣傳共產黨的城市政策和入城紀律，解放軍經過時向解放軍歡呼，喊解放軍萬歲。我和地下黨員按原來的組織體系，組織起保安隊，出去歡迎解放軍。同學可積極了，拿著個小旗，帶著袖章就去了。錢其琛是我們區青委的領導，不久就來對各學校保安隊的工作進行視察。後來他說：你們南洋模範搞得不錯，有個女孩，看見解放軍就歡迎，同時向從家里出來圍觀解放軍的市民進行宣傳，宣傳共產黨的城市政策，解答群眾的疑問，把問題講得清清楚楚。錢其琛說的這個女孩就是女中黨員張暉的部下姜保年。

由于解放后很多事情要依靠學生黨員去做，上面從解放區派來一個叫李昌的同志辦學習班，對學生黨員進行短期訓練。我參加了這次短期訓練，時間一個禮拜，收穫很大。李昌是“一二·九運動”的青年領袖，當時是上海團市委書記。他跟我們做報告，講青年運動，講城市工作，并給我們布置工作任務。

那時我們每天工作都很忙，大大小小的事很多。南市是個最復雜的地區，地下黨的力量小，接管警察局的軍代表要我們派個家住南市的黨員學生去幫忙解決一些群眾糾紛。我家住南市區，組織上就叫我去。軍代表派了一部吉普車來接我。我去了就配合解放軍處理一些群眾打架之類的事。鬧事的人聽不懂解放軍的話，我當翻譯並幫助調解，告訴他們要聽解放軍的話。問題都一個個解決了。

1949年7月，毛主席《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就在學習這篇文章的時候，上面來指示，說建國需要大批干部，中央要上海各學校調人去北京學習（北平正式改回北京是在兩個月后的 1949年9月），南洋模範要去三個人。上海各個大學也要去人。徐龍區青委張效浚等負責人決定，南洋模範派我、秦亢宗（原地下黨黨團小組成員）、姜保年（女中部黨員）三個人去（秦亢宗后來是杭州大學教授，姜保年後來是上海民進大學校長）。

那時候我們還未脫產，沒檔案，南洋模範黨支部從區里拿來三張表格，一人一張。我們填了表，帶上區里開的信，到市里換信，再到華東局（當時的華東局在現在的福州路江西路交叉口）開了到北京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總部的介紹信。第二天我們三人在華東局匯合其他學校的同學，一共十幾個人同行。我被指定為領隊，帶領大家一起去火車站找軍管會安排車次去北京。上海剛解放的時候，國民黨飛機還經常來，有時候扔幾枚炸彈炸鐵路。我們坐的車開到南京，遇到國民黨飛機又來炸鐵路了，就開到支線一個隱蔽地方停在那兒。列車員來告訴大家火車要等到晚上才能開，想玩的可以去玩玩，記住車停的地方，天黑以前一定要回來。我們分別去了夫子廟、玄武湖，玩了大概不到半天，天還沒黑，怕誤了車，就一起回來了。天黑后，車就開了，後來再沒有碰到飛機轟炸。

清晨火車開到了淮海戰場。淮海戰役正在進行時，我們每天聽新華社的短波，盼望著解放軍打勝仗。我知道在這次大決戰中，死難的烈士不少。火車開過明光時，我看到了被炮火破壞的房屋、橋梁，還看到在綠色的田野中有許多新土堆，我想那大概是打掃戰場的人為死難烈士堆的墳墓了。過去國民黨統治時，敵人橫行霸道，我們東躲西

藏，現在解放了，自由了，它是千萬烈士用生命換來的啊。看到眼前快速略過的座座新墳，我心情不能平靜，就在本子上寫下了一首《淮海戰場巡禮》的稚拙小詩，來紀念那些為共和國的建立捐軀的烈士。

你們是一團滾動的火，
在大雪飄飛的寒風中，
從北向南，
為祖國的自由，
拓展著疆土。
你們用鮮血和生命，
與敵人搏斗。
你們戰勝了敵人，
自己也倒在解放的土地上。
把自己的軀干，
化為鮮花、五谷。
沒有留下姓名，
沒有留下遺囑，
卻留下了永恒的生命之光，
為後人，
指引著前進的路！

第三天早上九點多，火車開到北京前門車站。下車後，我們就去了當時在御河橋的團中央。團中央的接待干部告訴我們，勞大即中央團校，在河北良鄉（現屬北京），並安排車把我們連人帶行李送到招待所休息，第二天又派車送我們去火車站赴良鄉。第二天我們坐火車到了良鄉，與在那裡接站的中央團校的幹部韓彬會面了。我被分配在中央團校第十七班，這是為上海、杭州的學生專設的班級。北京、天津的學生分在十五班，著名作家王蒙就出在這個班。其他省市亦有自己的班。

中央團校的學習期不到一年，課程是三門：哲學、經濟學、黨史。

另外還學習建國方針、城市政策、農村政策、工青婦運動史等。教員很多，名家亦不少，著名的有艾思奇（哲學、社會發展史）、孫定國（黨史、哲學）、田家英（黨史、毛澤東思想）、薛暮橋（經濟）、狄超白（經濟）、陳家康（國際形勢）等。講課的方式多是講大課，一千多人坐在地上，教員站在臺上講，中間休息十幾分鐘。彭真、王明、毛岸英、鄧穎超等也來過。毛岸英替蘇聯客人做翻譯，還應大家要求講了他的簡單經歷。後來我進了中南海，去瀛臺散步時，又見過他幾次，聽他講在蘇聯的見聞和土改的情況。他對人挺謙和，大家都喜歡他。

1949年9月30日，團校學員從良鄉坐火車進京參加第二天的開國大典。大典當天，全校師生由儀仗隊率領，按班次進入廣場排到手持鮮花的少先隊后面，等待大典開始。我因身材高大，被選為儀仗隊員，每兩名儀仗隊員共執一面大旗，輪流休息。古代名將韓信參加農民起義軍時，初職“執戟郎”，我這大概可叫“執旗郎”吧。在大典當天的中午時分，伴隨著東方紅的樂曲，我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那天天安門廣場少說也有幾十萬人，很多人和我一樣，雖然在遠處並不能看清毛主席的面容，但還是既高興又激動，又喊又叫，又踮腳向上跳，想看得清楚一些。我當時只是個十八歲的青年，能參加這樣的盛典，毫無疑問感到是一生的幸福。大典正式開始後，先是鳴禮炮，升國旗，接著是毛主席講話。這時全場突然沉靜下來了，誰也不喊叫了，生怕聽漏了毛主席的話，而當毛主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靜謐的廣場突然又如雷霆般爆裂！高興呀，喊叫呀，歡呼呀，許多人激動得流下了熱淚，有的女同學還哭出了聲來。在閱兵游行的時候，大家喊萬歲，喉嚨都喊啞了。毛主席也喊“萬歲”，他喊的是“人民萬歲”。人民原來也可以萬歲呀！這真是曠古奇聲！馬克思說，革命是群眾的盛大節日。1949年10月1日是中國人民最盛大的節日。

1950年，中央團校不得不提前結束學習，因為隨著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和解放軍向全國進軍，新生共和國各方面都急需人才，不能等待學員們按部就班完成學業。畢業前夕，我們紛紛提出要見毛主席。團校校長向中央反映了我們的請求，中央竟答應了！這說明黨中央和毛主席對年輕人有什麼殷切的希望啊！四月的一天，我們列隊赴中南

戚本禹回憶錄

海懷仁堂，在政協委員們開會的地方坐下來等待。突然聚光燈一齊打開，毛主席從主席臺旁走出來，紅光滿面，笑著向大家招手。我想，那一刻，在場的每個學員都和我一樣，為這樣近距離見到億萬人民的領袖感到無尚光榮。我們班級的女黨員曹炎等人，代表團校師生向毛主席獻上用紅紙寫的致敬信。毛主席同他們一一握手，我們其他人是又高興又羨慕。

畢業典禮完畢不久，大家唱著“年輕人，火熱的心，跟著毛澤東前進”的歌曲，告別了中央團校，奔赴自己的戰鬥崗位！我和幾個學員奉命去中南海報到。

第二部分

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

第一章 初進中南海，任政秘室見習秘書

1、錄取與報到

在中央勞動大學（後來的中央團校）學習時，我是十七班三組的黨小組長，列席班支委會。韓彬和陳伯鴻是兩位班副主任，分別兼任班支部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畢業前夕，中央勞動大學應中央要求決定選送幾個人到中南海毛主席身邊工作，韓彬和陳伯鴻兩人推薦了我。

有人推薦還不夠，還要看學習成績和政治審查情況。畢業考試是學校教育科科長馮銘主持的，考了幾個關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題目，分書面考試和口頭考試兩種，我都考得不錯，得到了班里的表揚。我當時 19 歲，歷史簡單，在上海參加的地下黨，經受過考驗；父親是一般城市職員，算是工人階級。成績和政審我都沒有問題，勞動大學決定選送我了。同時被選送的還有沈棟年和張冠儔兩人，沈棟年是上海育英中學的地下黨，張冠儔是上海暨南大學的地下黨（實際在育才中學就是地下黨）。當時中央來挑人的是彭達彰，他是山東威海人，是四野的師級老干部。他把我們三個都要了還覺得不夠，還希望學校再多給他幾個人。但學校實在給不出了，因為當時來要人的中央單位很多，像中央機關、中央軍委、人民政府機關，都來要人了，而學員數量有限。

1950 年 5 月 4 日，我和沈棟年、張冠儔一同到中南海報到¹。

¹ 張冠儔在上海地下党的時候，其父有一個朋友是國民黨軍統，此人要張冠儔參加軍統，他不同意，但怕引起那個軍統的懷疑，就介紹了一個朋友參加了軍統。這事他當時並沒有向組織匯報。在 50 年代審干的時候，這事被揭

中央勞動大學讓我帶著他們倆和我們三個人的檔案，連人帶檔案一起交給中南海。按照正常途徑，檔案要通過黨內渠道轉到中南海，但當時中南海要人要得急，中央勞動大學就做了特例處理，將我們的檔案密封好，蓋上騎縫章，交給我們自帶。那時我們還不知道中南海有個西門，就來到中南海南門（新華門）。由於我們沒有中南海的出入證，又不認識守衛戰士，就被擋在門外。我們報了名字和來由，警衛戰士打電話向里面的田家英交涉一番之後，就有一個警衛領著我們往里走。新華門是走首長汽車的，一般不讓人進出，但田家英還是讓我們從新華門進去了。我們跟在那個警衛后面走了一陣之後，警衛就指著河邊一條馬路說：你們就沿著河邊走，走到房子那兒就有人接你們了。當時，8341部隊的不少戰士正在清理中南海的淤泥（後來據說在清理過程中挖出了一些小型的手榴彈、槍支之類的武器和爆炸物，不過沒什麼大家伙），路面上也到處是泥水，很難走，我們繞了一個大圈，終於走到勤政殿，田家英的警衛員出來等在那里接我們。

在河邊走的時候，我看到河里膝蓋深的水里有很多魚在翻騰，戰士都只顧挖泥，不管那魚。我家里窮，又是在海邊長大的，知道魚是個好東西，邊走就邊動了心。那天和我們同來報到的還有從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挑選出的一批大學生。我們安頓下來後，我就招呼他們跟我一起用臉盆去抓魚，結果每個人都抓了滿滿的一臉盆回來。他們問怎麼吃啊？我就教他們把魚開膛破肚，清理干淨，又叫人從宿舍對面的一個小鋪子里買來醬油、醋，用磚頭壘起個灶臺，把臉盆洗干淨，放上水，撿來掉在地上的樹葉做柴火。那煮出來的魚可真好吃啊！剛建國，供應緊張，我們一連幾天吃魚，大家都很

露了出来。当时中南海审干工作是何载负责，何载亲自去向那个被抓的军统作了调查，证实有这事。张冠侍说他这是为了做策反工作。后来何载和我把他送回上海继续审查，但没审出什么问题，就安排他在一个区的房管局作了个一般干部。我1968年接受审查后，张冠侍四处说是我迫害了他。文化大革命之后，何载当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李锐一起），张冠侍找到何载要求改变对他的处理，可何载还是坚持原来的处理意见，因为这本来就是何载处理的，而且也确有其事的，就没给他平反。

高興。中南海後來專門養了好多魚，用來改善伙食。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毛主席肉也不肯吃，出現營養不良的癥狀，周總理就讓人把中南海戰士養的魚燒好搗碎，伴著蔬菜給主席吃。主席先是不吃，直到聽總理說那魚是戰士們自力更生在中南海養的之後才同意吃。教同來的大學生用臉盆煮魚吃，現在說來是趣事兒，卻是我在中南海生活的真實起點。那些大學生比我的年紀大，但生活經驗不如我。那年我 19 歲，我以為自己是大人了，現在看來還完全是個小孩。

我們住在中南海的西八所，那是集體宿舍，原來是宮女住的地方。剛開始我和逢先知、余永年、張學厚、于學軍一個房間。不久，從全國總工會來的一個部長和我們住一起，就變六個人一個房間了。房間二十來平方米，沒有上下鋪，很擁擠。我是擠在門口，由於沒有簾子，每天被外面的風吹，不久就得了一次重感冒，病了一個禮拜。之前我從來沒病那麼長時間過。在西八所住了兩年，後來搬到現在拆了的西樓，因為已經提到科長位置，就兩個人住一間了。

我對逢先知的最初印象不好。我們開始工作不久就是夏天了，那時中南海夏天蚊子很多，雖然打了滴滴涕，但晚上人進出一開門，蚊子還是馬上就飛進來了。那時蚊帳很貴，一般人都買不起。逢先知家里是開藥店的，比較有錢，我們六個人就他一個人有頂蚊帳。逢先知當時是管生活的，我就對他說，你是管生活的，你要麼給我們都爭取一頂蚊帳來，要麼就和我們一樣，也不用蚊帳，不然就有點不夠意思了。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見，晚上睡覺前就在宿舍七嘴八舌地說他。有一天田家英一個電話把我找去，批評我說，你怎麼搞的，要在中南海搞群眾運動？我一下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田家英說，你發動群眾，要逢先知向領導施加壓力，要領導給你們發蚊帳。原來是逢先知把我告了，他知道我是搞地下黨的，點子多，又會發動群眾，不好對付，不敢和我正面衝突，就偷偷給田家英打小報告，說我發動群眾整他，對他造反，逼他向領導反映給我們發蚊帳。我向田家英解釋說，實際不是這麼個情況，不過是大家打趣逗樂而已。田家英聽了也諒解我了。但我從此對逢先知這個人就開始小心了。逢經常主動給田打小報告，把我們的情況一五一十的報告給田及

後來當了田的秘書。

2、中央辦公廳當時的機構和人事隸屬關係

1950 年中央辦公廳下面有三大主要機構：第一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簡稱政秘室，主任是師哲；第二是中共中央機要室，是葉子龍掌管的；第三是后樓研究室，歸中辦主任楊尚昆直接領導，因在中南海后樓（在居仁堂那里）辦公而得名，沒有正式名稱。

當時的政秘室和機要室與它們的行政上級單位中央辦公廳關係比較微妙，政秘室與機要室直接向毛主席匯報工作、接受毛主席的任務，中央辦公廳是管中央機關后勤行政方面事物的，包括為政秘室和機要室提供后勤保障。這種關係有很重要的歷史沿革方面的因素。

政秘室大約是 1949 年 8 月成立的，它的前身是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是任弼時領導的。機要室前身是中共中央機要科，是書記處辦公室下面的，是葉子龍負責。他倆都歸主席直接領導。中央辦公廳是 1949 年 10 月建國後設立的，但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那時，中央辦公廳已經成型，主任是李富春。李富春能力雖然不是特別強，但很能團結人，和幾乎所有人的關係都很好，和主席關係則是特別好，他和他的夫人蔡暢總是擁護毛主席的²。

1945 年 10 月李富春從延安去東北任職后，楊尚昆接任中央辦公廳主任。1947 年胡宗南進攻延安，中央機關一分為三：毛主席、周恩來和任弼時率領中央前委，留守陝北；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率中央工委轉移太行地區；葉劍英、楊尚昆等領導中央后委暫留晉西北。中央后委是為毛主席領導的中央前委提供情報和后勤服務的，

² 李富春一向待人平等。他剛認識我，就叫我老戚，我說不能這麼叫，我一個小青年，怎麼能叫老戚。他說你長得高大，不能叫你小戚，只好叫你老戚嚟。毛主席 1964 年批評李富春主管的計委是獨立王國，並不是指李富春，而是另有所指。文革中參與“二月逆流”的人常在李富春家里開會，所以主席批評“二月逆流”時，把李富春一起批評了。但我心裡很清楚，主席知道李富春不會反對他。所以我告訴社會科學部的人，不能反對李富春。

也為劉少奇領導的中央工委提供必要的配合，楊尚昆當時是中央后委副主任。

1948年5月毛主席率中央前委到達西柏坡，與較早已經落腳在那里的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會合，中央機關三部分人馬又合而為一了。這時楊尚昆領導的中央辦公廳是劉少奇領導的中央工委下面的，而機要室和政秘室與中央辦公廳是平行的。1949年中央機關進北京城以后，楊尚昆領導中央機要處和中央秘書處，這是不同于機要室和政秘室的兩個單位，其中中央秘書處不能進中南海辦公。機要室和政秘室都緊隨毛主席進駐中南海，還是都歸中央書記處領導，由任弼時掌管，任弼時和葉子龍都還是直接對毛主席負責。任弼時1949年11月去蘇聯治病，1950年1月機要室和秘書室歸楊尚昆管，但中央沒有明文規定機要室、政秘室隸屬於中央辦公廳，而毛主席規定，機要室和秘書室按歷史慣例直接向他匯報工作、接受他的任務，中央辦公廳配合它們的工作并提供后勤保障。

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政秘室和機要室名義上歸中央辦公廳管，而在實際運行中卻與中央辦公廳平起平坐的微妙局面。當時中央辦公廳也無權過問羅瑞卿負責的中央警衛局。這和後來權限擴大了的中央辦公廳是有本質不同的。中央辦公廳有自己的秘書處（曾三任主任），還有自己的機要局（由長征干部李質忠領導）。這個機要局是個純技術性機構，專門負責收發電報，它收到的電報要交給葉子龍負責的機要室送主席，主席批完了，再由機要室交回機要局發報出去。單從這一工作流程就可以看到，機要室的地位比中央辦公廳的機要局地位高出很多。

機要室里都是老革命，他們參加革命早，資格都很老。四大機要秘書：葉子龍（主席機要秘書）、康一民（總理機要秘書）、胡振英（劉少奇機要秘書）、潘開文（朱德機要秘書），都在機要室。葉子龍是主任。所以，機要室是三大機構中實際上的老大，根本不把中央辦公廳放在眼里，葉子龍不把楊尚昆當回事。楊尚昆也因此對

葉子龍恨得咬牙切齒³。

政秘室的成員主要由三部分人組成：一是老紅軍、老八路，他們文化水平低，但政治忠誠度高；二是 1949、1950 年新畢業的大學生，他們文化水平高，但政治忠誠度不如老紅軍、老八路；三是像我這樣的一批青年，參加過地下黨工作，經受過艱苦革命鬥爭的考驗，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算得上是有紅又專。當時有傳說，秘書室成立時，胡喬木覺得老紅軍、老八路文化水平低，建議毛主席找大學教授來任職，遭到毛主席的拒絕。這個傳說如果是真的，那回頭看歷史，毛主席的考慮就是周密的。搞社會主義，必須既要有老紅軍、老八路們的忠誠，又要有一定的知識和文化。主席在相當長一個時期，也確實是很注意培養像我這樣的年輕人。他在文革大革命前后關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系統論述（核心是“又紅又專”）都反映出了他對無產階級事業的深謀遠慮。

政秘室的工作以處理毛主席的公務為主（毛主席因此稱它為“我的秘書室”，下稱秘書室）。劉少奇的事，是由劉辦的王光美專門處理，他們兩人是上下級關係、工作關係，但也是夫妻關係，有些事情王光美不方便處理的，就會拿到秘書室這里來處理。朱德的事情很少，秘書室捎帶著就處理了，何況朱德的兩個政治秘書陳友群、何均都在秘書室。國務院（當時還是政務院）是獨立的，總理的事不歸秘書室管。

秘書室和機要室是毛主席身邊的兩大重要機構，掌握著中共中央最核心機密，主席始終要求這兩個機構保持獨立性。這一點非常重要。主席應該是有他特別的考慮，他要直接了解人民群眾的真實生活和社會的實際狀況，不要中間的過濾。按毛主席的要求，這兩大部門有個分工：所有黨內給主席的密碼電報、軍委和各軍區給主席的電報，都通過葉子龍的機要室機呈送給主席，秘書室都不能看；

³ 叶子龙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在 1962 年终于找到报复叶子龙的机会。当时，叶子龙因为犯了错误要被调离机要室，他去找已经权倾一时的杨尚昆，想当北京市书记处书记或者中央哪个部的部长，杨尚昆当面说“听组织分配吧”，背地里却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最后给他安排了一个北京市轻工业局的副局长位置。

所有群眾給主席的信件、明碼電報則都通過秘書室送呈主席，哪怕這些信件有的是很重要、很機密的，如一些省、市、地領導給主席的信，甚至一些外國領導人給主席的信。有一次，我拿到一封奇怪的信，是一張白紙條上寫著一組數字：大炮多少、機槍多少、坦克多少，再無其他內容，簽字用的是外文，我也看不懂是誰。我心里納悶，這東西怎麼送去給主席看呢？還好我靈機一動，去問了收發室：這信是哪里送來的？答曰：是中聯部送來的。我一下就明白了，這是國外共產黨的領導寫給主席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馬上請報主席，不然就可能釀成大錯。

各省市給中央的報告本來也都歸秘書室處理的，中央辦公廳認為，這些報告都由秘書室直送主席了，辦公廳就什麼都不知道了，應該另設立一個專門機構，在辦公廳領導下處理這些報告。這樣就有了后樓研究室。它主要是搞各地報告壓縮、選編，有點像現在的政策研究室，搞黨內情況調查，研究黨內動態。雖然是楊尚昆直接領導，但毛主席的幾個重要秘書如陳伯達、田家英都可以過問。

師哲當秘書室第一任主任與任弼時有很大關係。師哲 1939 年在蘇聯當過任弼時的秘書（當時任弼時是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并于 1940 年和任弼時、周恩來一道回國。在黨內始終存在著一個強大的“莫斯科派”，也叫“國際派”，以王明為首，團結在斯大林周圍。劉少奇、總理其實都是“國際派”的，任弼時也不例外。還有一個“國際派”蔡和森，他和毛主席親如兄弟，可惜去世得早。關向應也是“國際派”。不過，在現實的艱苦鬥爭中，關向應認準了毛主席，較早從“國際派”里反出來了。紅軍被迫撤出井岡山時，關向應、賀龍和任弼時一起率領紅 2、6 軍團長征。關向應 1946 年在延安病故，臨死前告誡任弼時、賀龍要跟毛主席走，千萬不能反毛主席⁴。在關向應的影響下，任弼時也從“國

⁴ 關向應對於毛主席的支持是非常堅定的，也影響了任弼時等人從“國際派”中反出來，堅決站到毛主席這一邊。毛主席對關向應在 1946 年的早逝是很傷心的，以至于 20 年後在文革中的一次會議上，我還親耳聽到毛主席說：“如果關向應還在，賀龍就不會過去（指倒向劉少奇）”。

際派”里反出來了，真心地轉向了毛主席。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時，毛主席要留在陝北作戰，任弼時堅決反對，他要毛主席過黃河去安全的地方，因為毛主席是全黨的領袖，萬一有個閃失，黨的利益損失太大。他還提出自己和總理留在陝北。他和主席爭論很激烈，最後主席發火說：要過河，你過吧。任弼時實在沒有辦法，說：不，你留在陝北，我也留在陝北。我是三支隊的司令，負責中央機關的工作，主席什麼時候離開，我就什麼時候離開。任弼時在原則問題上是堅決擁護毛主席的，成為毛主席最得力的戰友和助手，毛主席對任弼時也是毫無保留地信任的⁵。當時江青也隨毛主席轉戰陝北，還是中央機關三支隊政治指導員。但江青和任弼時的關係不好，任弼時是江青的領導，江青卻不大聽他的。江青曾說我眼睛長在額頭上，她自己也是。政秘室成立時，任弼時曾短時間以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主任，不久就是在莫斯科做過任弼時的秘書的師哲，而不是和任弼時一起轉戰陝北的江青，成為秘書室正式的第一位主任。

師哲當秘書室第一任主任，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他個人的才能得到了主席的重視。1949年底 1950年初毛主席訪問蘇聯，陳伯達、師哲都是陪同出訪。陳伯達就知道跟在蘇聯人屁股後面說蘇聯人的好話，讓主席很是反感。陳伯達就是這麼一個人，哪邊強勢就往那邊倒。主席本來有個文件要陳伯達起草的，看到他這個樣子也不讓他起草了。師哲的表現和陳伯達完全不一樣，師哲在留蘇的時候，經中央同意加入過蘇聯的克格勃（當時當克格勃是很光榮的），這次陪主席出訪，他通過蘇聯克格勃的渠道了解到很多情況並及時報告給毛主席，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剛建國，一切都要學習和借鑒列寧創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毛主席要看很多關於蘇聯的材料，需要大量翻譯俄文文件。當時搞英文翻譯的人才不少，而俄文人才稀缺。白俄倒是又懂俄文，又懂中文，但白俄是個很復雜的群體，基本是認錢不認人，一個白俄可能跟美國、英國、日本、國民黨都有關係，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誰的人，政治上不可靠。所以，師哲就堪當重任

⁵ 文革中有人揭發任弼時反毛主席，實際那只是非原則問題上任弼時和主席有意見分歧，與反對主席不是一回事。

了，主席從蘇聯訪問回來不久，就把他派到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現中央編譯局前身）當局長去了。師哲還兼任了俄文專修學校（現北京外國語大學前身之一部分）的校長，為新中國培養自己的俄文人才立下了功勞。當時秘書室要選拔優秀的人才去學俄語，彭達彰動員我去，我不願意去，放棄了這次機會。

秘書室領導除了師哲之外⁶，還有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彭達彰。師哲經常組織我們開會。江青當時因為身體不太好，秘書室的事情不怎麼管，主要是負責毛主席的私人生活。田家英雖然排名在江青之後，卻實際主要負責秘書室日常工作。江青如果不在，田家英也代管主席的私人事務。

我正式上班任秘書室見習秘書，直接領導是田家英和彭達彰。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為毛主席讀報、摘報，不久又處理群眾來信。這些工作是由副主任彭達彰分管，但重大的事田家英也會過問。田家英當時主要是負責處理主席直接交辦的事情，如管理毛主席的圖書和編輯《毛澤東選集》。

⁶ 1957年山东的书记李 X出了问题，师哲调山东当省委书记。这是对他的提级重用。我感觉师哲这个人做事是认真负责的，就是他那个杀孩子的事，实在叫人反感。他调去山东后，和一个保姆搞出了一个小孩来，他把孩子扔进“血滴子”（硝镪水）里，连骨头都没有了。这可能是他从克格勃那里学来的。据说事情是那个与他发生关系的保姆揭发的。作为母亲，那个保姆实在觉得师哲的做法太没有人性了。材料当时送到中央秘书室来，我亲自看到过。案子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师哲被逮捕判刑。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冤案的。后来说什么平反，哪有什么反可平的呢？这件事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当然也就不讲了。

第 2 章 為毛主席讀報、摘報、管理圖書

1、為毛主席讀報、摘報

建國之初，百業待興。全國各地的報紙和群眾來信都是毛主席了解和掌握全國形勢的重要途徑。毛主席日理萬機，全國的報紙、全國各地的群眾來信都送到中央來，他沒時間、也沒有必要都親自看，就讓田家英、彭達彰他們看了摘出重要的東西再給他看。他們二人忙得不可開交，報紙一多，也看不過來。我們新生力量一來，他們就分配給我們來看，我們看了摘編好內容，再由他們送給主席。所以，我進秘書室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為毛主席讀報、摘報）。

給毛主席看的報章內容摘要，原則上是要選重要的。可是，什么是重要的呢？當時也沒個標準，我去請教從老區來的老同志，他們也都是憑個人感覺。他們很多人都認為頭版頭條最重要、省委書記的講話和報告最重要。所以他們給主席送的往往是報紙的第一版的內容。我在上海呆過，連蔣介石文告都看得多了，知道什么叫官樣文章。我剛進中南海，當然還沒有覺得地方領導的報告都是官樣文章，只是覺得那些報告都另有正式文件，主席都看過的，再摘了去也是多余。所以，我就摘其他的東西呈送。

1950 年夏天，淮河流域發生水災，災情百年不見，淮河也潰堤了，淮北地區陷入汪洋大海，安徽、河南兩省有上千萬人遭災。歷史上的淮河流域曾經河湖交錯、沃野千里、富饒美麗，宋代詩人秦觀在登泗州城后曾寫下這樣的詩句：“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艤人語夕陽間。林梢一抹香如畫，知是淮流轉處山。” 1194 年，黃河南堤在河南原陽縣決口，黃河水侵入淮河。自此開始，淮河就失去了原

有的風貌。明、清淮河水患頻仍，封建政權治理也不見有實際的效果，到了民國，還多次發生重大水患，上千萬人遭難。沒想到新中國剛剛成立，淮河就又發生大水災了。當時，我特別關注有關報道和群眾來信來電，就把讀到的各種相關情況做了摘要交給領導，由他們向毛主席報告。

毛主席在得知了有災區的人民為避洪水爬到樹上去、結果被毒蛇咬死時，難過得流下了眼淚，并在 1950 年 7 月 20 日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須考慮根治辦法，現在開始準備，秋起即組織大規模導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導淮，免去明年水患。”1950 年 10 月，周總理主持的政務院，響應毛主席的根治淮河水患的號召，開始具體組織實施淮河治理。1951 年 5 月毛主席又專門為治淮工程題詞“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我從上學開始直到進中南海工作，一直都愛看新書，閱讀面比較寬，容易接受新思想，加上出身貧寒，自小對農村的事也略有所知。所以就對農村搞合作化的事情特別有興趣，認定搞小農經濟是沒有出路的。我在上海時還看過蘇聯合作化、集體農莊的事，雖然不全明白，但也知道了蘇聯在革命成功以後合作化就成了個全國全局性的事情。我想蘇聯是那樣，我們中國也會是一樣的。因此，各地報紙上只要是關於搞合作化的事情，我都認為是重要的東西，應該摘錄一些給主席看。當時，我主要負責閱讀、摘錄華北地區的報紙，如“石家莊日報”、“河北日報”、“山西日報”等。一些老區搞合作化比較早，1950 年就已經開始了，當我看到《山西日報》上一篇關於山西省農民合作化的報道後，就把它送給主席了。它說的是山西省老區土改後發生了兩極分化，李順達搞了變工隊，以後又搞互助組，現在又搞互助組走向合作化。這篇報道主席劃得滿篇都黑了，從中可以看出主席對革命成功的農村多關心，對合作化、對集體化多么重視。這份報紙應該不會銷毀的，主席雖然沒批話，但滿篇有劃道，有畫圈，要能找出來，那就是一份很重要、很珍貴的歷史文件。李順達就是在 50 年代的合作化運動中，成為全國勞動模範后聞名全國的。還有河北申紀蘭搞合作化的事跡，也是我報告

上去之后，引起主席重視的。其他地區的報章，由秘書室其他人負責，但我有時也瀏覽，凡看到農村出現新富農、出現新的兩極分化的情況，我立即把有關報道報告上去了，這類報告主席都會畫圈。

秘書室當時一共大概三十多個人，開始都是見習秘書，像我這樣的中學生就幾個，大多是燕京大學、清華大學來的高才生。他們都很有學問，如有個韓瑞定，個子不高，燕京大學畢業，精通德、英、法、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某東歐國家等五、六種外國文字，在我心裏就像神一樣，非常了不起，我叫他小天才。這些大學生喜歡選摘“文學”、“小說”、“音樂家的故事”之類的東西報告上去，在他們眼里，那些都是重要的東西。但是，主席對那類東西絲毫不感興趣，如這個姓韓的大學生，他摘選波蘭大音樂家肖邦的戀愛故事和一些經濟學家的奇聞軼事給主席，主席看也不看就原樣退回。

我這個中學生搞的報告，主席劃圈最多，有的還批示轉發下去，而名牌大學的高才生搞出的東西主席看也不看。這個情形引起了副主任彭達彰的注意。一次彭達彰給我們開會，對大學生們說，你們要向戚本禹學習，他送上去的報告總能引起主席的注意，而你們的東西總給退了回來，這多浪費啊。彭達彰還要我給他們大學生傳授經驗，我年紀比他們還小，實在也講不出什么經驗來。田家英開始重視我也是從這時開始的，因為我搞的東西，主席退回來都經他手的，他看到了主席都劃圈，而且還條條道道的。一次他對我說：“你送的東西主席都看過，都劃過。”而且，更讓他們奇怪的是，不光是這類重要事我送上去主席就劃圈，而且別人送上去的一些名人軼事主席不看，而我送上去的一些趣聞、軼事，主席卻又喜歡看。比如，有個過去的名人，現在是我們的統戰對象，他寫了一篇文章，有點俏皮，我看到後覺得這個名人的意見、想法有內容，主席會關心，就送上了去，結果主席還真看，看了就劃圈。田家英也奇怪，說我運氣怎麼這麼好啊。他真沒搞明白其中的道理，干脆我送的東西都不壓，立即送主席。有的人當然就不服氣，說：“你送的主席都看，我們送的都挺重要的，主席怎麼不看呢？”

其實這裏面沒有啥復雜的。我這個人就愛琢磨，從小見到無線

電，覺得很神奇，上初中就自己鼓搗出一個短波收音機，收聽很多同學都聽不到的無線電節目，同學們奇怪，戚本禹（那時我還不叫戚本禹）怎么知道那么多？現在，為毛主席搞報章摘要，我也開始琢磨，一開始，看到主席對我們的批復各不相同，我更開始琢磨，一琢磨就感覺到毛主席雖然也是大學問家，博古通今，還常常賦詩作詞，但建國不久最關心的還是如何讓國家大定，他重視的東西一定都與全國大局有關，比如當時的土改、剿匪、鎮壓反革命；或者是怎樣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比如互助組、合作化；或者是他正在研究的問題，比如我送的名人軼事、趣聞，那些趣聞、軼事里是帶著意見和思想的，不是光逗樂的。所以，主席都劃了圈，有的還點點劃劃一大片。時間久了，我摸到的脈絡更清晰了，送什么主席都看，都劃圈就一點不奇怪了。而那種無關國家大定、無關普通人民群眾生活的東西，或者官樣文章，當然引不起毛主席的注意。現在我還想，如果那時候每個同志都把肖邦的戀愛故事之類的東西當做大事，或者像今天某些領導的秘書那樣，心中只有領導，沒有群眾，不能把全國各地群眾生活的真實狀

況和群眾中出現的積極的進步的社會變革思想，及時報告給主席，那當年治理淮河水患就不會有了，合作化在全國的推廣也不會發生了，建國之初短短幾年翻天覆地的社會進步、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就更不可能發生了。不妥！

新華社知道了主席經常要看報摘，就說他們掌握的情況更多、更全面，應該由他們來為主席搞報摘。彭達彰一聽就說，那好啊，你們能弄那最好了。我們人手不夠，你們弄了，我們給你們送主席。這之后就誕生了新華社的《內部參考》，秘書室讀報的工作就停下來了。新華社前身是 1931 年在瑞金成立的紅色新華通訊社，在成立的當日創辦了《參考消息》油印小報，專門摘編國民黨中央社電訊和一些國外的消息，給中央最高領導參考。進城后《參考消息》更加兵強馬壯，林克是主席的英文秘書，也是《參考消息》編輯組的組

長⁷。《內部參考》那時一直僅限黨政軍高級領導參閱，而且是比《參考消息》密級還高的一個中央最高層參考讀物，後經過完善就搞得跟一本雜志厚薄差不多，每期大約 100 頁，到 1955 年前后更成為一個很定型的內部讀物。《內部參考》一誕生，就不再是像之前我們秘書室搞的那些報摘是專門給主席一個人看的。在文革中，主席對紅衛兵的油印小報很感興趣，曾專門叫“一組”的人給他收集各種小報。這個事情是很值得歷史關注的。

2、為毛主席管理圖書

我搞的那些報摘主席都看，田家英開始重視我。有一天，田家英找我談話，他說，你理論問題好像比其他人懂得多點，你來管理毛主席的圖書吧！就是給毛主席做書童，主席要看什麼書就給他拿去，主席看過的書退回來要整理好、上架，要借書就到圖書館去借……。田家英是領導，他發話了，我也不能不服從。管理毛主席的圖書本來是很重要、很了不起的事兒。但我當時沒當回事兒，還覺得受了輕視似的。心想，給毛主席管書，就跟過去管御書房似的，也還行吧。這個工作，我的前任是史敬棠，史敬棠之前是蔡沫。蔡沫在五六十年代是馬列學院的秘書長，院長陳伯達一般都不去，蔡沫實際管的是院長的事兒⁸。從這就能看出，不是什麼人都能去管毛

⁷有人說毛澤東不懂國際，沒出過國，土包子。林克跟我說過，主席對外國的瞭解，不僅超過他，而且超過了他們新華社《參考消息》的部主任。林克說：“這個《參考消息》我都不仔細看，送到主席那兒，主席是一個題目一個題目地翻，他不是都看，但是重要的都看。”他說國內除了專業部門的，沒有一個人像毛主席這樣讀《參考消息》。那個《參考消息》是大本的，林克說：“你不信，可以到我那兒看，主席看的《參考消息》都在我那兒，上面圈過劃過多少。”。他對哪怕一個拉丁美洲國家，像委內瑞拉、古巴，都十分瞭解。古巴，幾百萬人口，和美國打了幾次；委內瑞拉多少人口，土地多大。他張口就能說出來，講得都很清楚。中央委員裏面，可能除了王稼祥比他知道得多一點，其他沒有一個人比他更瞭解外國。

⁸文革中，蔡沫被陳伯達逼死了，因為蔡沫經常跑田家英那兒，不大聽陳伯達的，群眾鬥他，自殺了。毛主席知道後說：“嗚呼哀哉，怎麼死了呢？”廬山會議的時候毛主席批評陳伯達：“你把蔡沫逼死了，還要開除人家黨

主席的圖書的，而我開始還瞧不上這這工作。實際上，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工作重要，什么工作不重要。

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圖書都是從延安開始慢慢積攢下來的，最早只有幾個箱子，到五十年代初也只有五個小書柜，擺起來不足一面牆，一些重要的書一般要鎖在箱子里。我對所有書都很有興趣，每本書都翻，幾乎把主席看過的那些書看了個遍，第一次真正知道毛主席是黨內讀書最多、也最會讀書的人。黨內沒有一個其他領袖是像毛主席那樣認真讀書的。毛主席讀過的《資本論》第一卷，從第一章開始就都是密密麻麻的批語。有的是資本論的重點，復述一下；有的是主席自己的看法，比如對商品該怎麼認識；有的是他做出的評論。不僅主席看了《資本論》，而且江青也跟著看了。江青在上面也有批字，江青的字和主席的字有點像，但我能分辨。主席的批語已經是密密麻麻的，江青再一批字，就把那個書都批滿了，空白都沒有了。這也可以見證主席跟江青的關係是很好的。第二卷、第三卷主席批得比較少。應該說《資本論》第一卷，毛主席精讀的，第二卷、第三卷是略讀的。

不僅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恩格斯談科學社會主義的《反杜林論》，斯大林的《論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等書，也是批得密密麻麻的。這些已經發表過的。特別是政治經濟學，蘇聯的兩本政治經濟學，主席不僅看，而且找鄧力群、陳伯達、田家英他們一起來討論。討論以後，主席有很多批示。這些批示現在由鄧力群整理出來了，五大本。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批示，能形成一本著作。現在有人說他沒有讀過經濟學，那是胡說八道。他不讀經濟學，能搞得出來那么多東西嗎？批評他的人，讀過經濟學嗎？寫過一本社會主義經濟學嗎？中央文獻出版社應該把毛主席批示《資本論》的全部影印出來，駁斥那些說主席沒看過《資本論》的人。還有《左派幼稚病》這本書，彭德懷自述里說，主席都翻爛了，然後送給彭德懷看。這本書後來哪去了？康生也看過這本書，他說：“這書大概

籍，你不比別人好，也是很左的。”

給彭德懷吃了，找不到了。 ”

有誣蔑毛主席的人說毛主席不看科學的書，不懂自然科學。實際上，中央委員里，除了幾個像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以外，沒有一個人像毛主席讀那么多自然科學方面的書。（在文革中）陳伯達經常一講完話就喊一個口號：“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就批評他說：“誰叫你們一天到晚老歌頌我呀？你這句話就不通”，“按照愛因斯坦的理論，世界上沒有什麼光焰無際的東西，這個宇宙本來就是無際的，你怎么還能超過宇宙呢？無際的，沒有邊際的，我們地球上一個小小的人，講一句話，講個思想，怎么能無際呢？怎么能超過宇宙呢？”“光也是有際的，不是無際的，按照愛因斯坦的理論，光是曲線運動。而且光也會彎曲，會彎曲就不能無際。連光都不能無際，我毛主席思想多少年以後，就被別的更好的理論代替了，怎么能無際呢？沒有一個東西可以永放光芒，太陽最後都要毀滅，多少億年以後就沒有了，怎么能永放光芒呢？”我後來看了，愛因斯坦真是這麼講的，光真是曲線運動，毛主席用很通俗的方法跟我們講了愛因斯坦的理論，讓我們知道了光不是無際的。還有，氫彈爆炸後，毛主席給我們解釋愛因斯坦那個質能互變公式，講愛因斯坦的理論，很通俗的，那麼多人講那個理論，沒有一個人像毛主席講的那麼通俗易懂。講質量與運動互變，質量重了運動就慢，質量輕了運動就快。毛主席跟我們講那個公式時，總理還在，總理也懂，還能做些補充。所以我說中央委員，包括劉少奇，讀書都讀不到毛主席這個程度。我就沒聽劉少奇講過自然科學。當然，總理是很懂自然科學，至少比我懂。

毛主席讀書範圍十分廣泛，就是中國家喻戶曉的四大古典名著《紅樓夢》、《水滸傳》、《三國》、《西游記》，他也閱讀非常精到，光是對它們的批注，現在出版了，就能當一本古典文學評論讀。他那時的藏書裡面還有一些外國文學，像別林斯基著作的評論集、高爾基的小說集、霍桑的小說集都有。他看沒看托爾斯泰，看沒看過《復活》，我不了解，但他肯定看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為什麼》。還看過英國作家勃朗特的《簡·愛》、阿拉伯民間故事《一千零一夜》、《希

臘神話》和《伊索寓言》，因為他給女兒寫信講過這些書里的故事，要沒看，怎麼講呢？有人挑剔說毛主席不讀外國文學。這些不是外國文學是什么？他不是搞外國文學專業的，他要指揮打仗，要領導建設，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那時已經看這么多西洋文學和俄國文學，已經很不容易了。

有人說毛主席沒有讀馬列，盡讀二十四史，盡讀古代的書。這是胡說八道，單憑他那時讀過的書就能證明。他總歸是比批評他的人看的東西多得多。這是毫無疑問的。比如，你搞西洋文學的，你看過馬列嗎？你像他那樣研究過中國的四大古典名著嗎？你看過愛因斯坦嗎？毛主席也只是一個方面，只能搞一方面，他能閱讀這麼廣泛，就算全才了，共產黨領袖里還有第二個嗎？沒有！而且毛主席看書，不是為了看書而看書，而是為了解決問題去看書。他把看書與革命和建設結合起來，從看書里吸收理論養分，在實踐中形成思想，再創造出理論，去解決中國的具體問題。譬如說新民主主義革命論，是講怎樣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搞民主革命。這是馬列沒講過的。蘇聯革命是城市暴動，那農村暴動怎麼搞？在工人階級力量缺乏的地方革命怎麼搞？毛主席把這些問題解決了。到現在為止，拉丁美洲的委內瑞拉還覺得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論適合他們的情況哩！我覺得，光憑這個革命理論，毛主席就把人類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有一次我問林克：“主席哪有那么多時間看書？”林克說：“主席除了開會、寫東西、和中央委員商談問題之外，整天就是看書。吃飯很簡單，幾分鐘就吃完了；平時講話很少，除非是跟群眾在一起；跟我們說話不多，有時候休息才跟我們說說話；跟服務員很友好，但也不多說話；跟江青說話都很少。”林克還說：“主席每次上廁所時間都很長，他是邊如廁邊看書。”

我那時做了一件事，不太合規矩，但現在也不後悔。我把毛主席看過的書、做的批示，抄了很多下來。我先去買同樣的書，比如毛主席看李白的集子，線裝的，我就去買來；有的書，主席看的那個版本我實在找不到，就找類似的版本。然後，都按照毛主席的讀

法去讀，毛主席劃一個圈，我也跟著劃一個圈。我這樣抄寫過的書有厚厚的一摞。有一本《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是蘇聯人寫的，毛主席批了很多，我找了好幾個舊書店才淘到同樣一本，拿回來就照毛主席的書抄他的批語。一本李達的《哲學大綱》，一本好像是艾思奇的《哲學選集》，主席都批了很多，我也都下功夫邊看邊抄下來了。另外，像《聊齋》、《西游記》、龔定庵《筆記》，上面也有毛主席的批語，我也照抄下來了。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毛主席批語說那是空想。我沒有買到一樣的版本，就找來類似的版本，一頁一頁地抄下主席的批語。這些書我 1968 年出事後都被抄走了，我 1986 年從監獄出來後，有些退了回來，有些沒退回，沒有退回的，估計也是讀書人拿走了，像《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就沒有了，而《聊齋》、《西游記》、《鄉村建設理論》就還在。

毛主席還喜歡買書，他要買的書，有的是江青的警衛給買的，有的是書店送來的，有的是田家英或其他人吩咐我買的。凡是叫我去買的，我都要買兩本，一本是我自己花錢給自己看並用來抄寫主席批語的。

給毛主席管書是一個大學問。那不僅僅是保持書的干淨、整潔就行了，而是還要進行分類、修補、修復。這些我那時都不懂。有一套解放前上海出版的斯諾著的《西行漫記》，圖文並茂，毛主席看過好多遍，江青、田家英也看過。主席曾經說過：“我的書，警衛戰士們都可以看的。”所以警衛戰士來借書，我也都給辦理，登記個名字，就借出去了。但是警衛戰士一般不懂愛惜書，看掉頁了，能給塞回去不丟就不錯了。《西行漫記》看的人本來就多，警衛戰士和他們的家屬也看，愛惜卻不周，就破散了、掉頁了。我想，這書既然看的人多，就必須用結實的東西釘牢它。訂書釘又釘不透，想到有的書是鐵絲裝訂的（沒想人家那是用機器釘的），我也想用細鐵絲去釘牢它。我到外面買了老太太納鞋底子用的錐子和鐵絲，錐兩個洞，用鐵絲給釘上了。釘了以後沒檢查，不知道把里面的字也給釘了，就在外面用牛皮紙信封上拆下的牛皮紙貼上，寫上“西行漫記”四個字，雖然那字不太雅觀，但我還挺得意。不料田家英回

來一翻，大吃一驚，說：“你怎么能這樣搞呢？”我說：“這書破了。”他說：“破了也不能這樣釘呀！鐵絲釘，一有潮氣，幾天就鏽了；紙張被這種鐵絲摩擦，就更容易碎了，那不是更容易掉頁嗎？怎么能這樣搞呢？而且你這‘西行漫記’四個字也寫得不好，你得找個書法家，字寫得好的，寫得規規矩矩的。你看這書現在又是鐵絲釘，又是漿糊粘，翻還翻不開，字也壓上了，這樣還怎么看呢？”我再看看自己弄的，實在是個劣等品，臉當即就紅了，連忙說：“做壞了，對不起。”田家英說：“你不懂，先來問問我呀！這是毛主席的書，咱們都得愛護！”隨後他就去找來一個姓洪的、會針線活兒的大姐來，吩咐她先去買來絲線，再把我用錐子戳出的洞撫平，然後把厚書拆薄，用針扎一部分再扎一部分，用絲線在邊上綾一個很小的扣，完了再涂上一層膠……。都完了，他又找來書法家陳秉忱，在書面上和書脊上都規規矩矩寫上“西行漫記”四個字，才放到書架上去。

我管理毛主席的圖書的時候，正是抗美援朝前夕。有一次，毛主席的警衛過來，要田家英馬上送朝鮮的地圖過去。可就在這個當口，田家英出去玩了，不知在哪個地方喝酒。我和他一個辦公室，我也是他很信任的人了，平時他出去喝酒，有什么事我就幫他擋著。我那時知識太少，還不知道毛主席要的是指揮打仗用的軍用地圖，就把辦公室的朝鮮地圖和一張有南北朝鮮分界線和美軍的分布位置的小地圖，一起送過去了。後一張圖是我從一本美國分析朝鮮時局的書里搞下來的。主席拿到地圖，說不是要這種地圖，要軍事地圖。一問，知道田家英不在，是田家英底下的人找的，就把那張小地圖留下了，讓警衛把大地圖退回來了。警衛回來說，主席要的是軍事地圖，不是這個地圖。我知道軍事地圖就在軍委總參里面，但軍事地圖是機密，我級別太低，誰也不認識我，打電話過去不管用。那時沒有手機，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想到應該有老干部知道田家英的去處，就馬上去找老干部。果然他們打電話找到了田家英。我跟田家英說：“毛主席要朝鮮的軍事地圖，我找不著，我送了一個地圖去挨了批評了。怎麼辦？你趕緊回來！”他說：“哎呦，

我回去也來不及了。我現在就給軍委打電話，馬上叫他們送來。送來后，你馬上送主席。”當時軍委在地安門，半個多小時，地圖就送到了，是騎摩托車送來的。我一拿到就趕緊交給毛主席的警衛。過了一會，估計警衛已經送到了，我不放心，就打電話問：“這次對了嗎？不對，我再去換！”警衛說：“對了，主席正在看呢。”田家英回來后，又打電話問軍委的人有沒有比例更小的地圖，特別是丹東的地圖，要有就也送來。田家英真是聰明。果然，主席那里又來人要更詳細的朝鮮地圖和我國丹東的地圖了，要那種連小村莊都詳細標出的。田家英馬上送去，這下主席就高興了。當時那樣的軍事地圖都是日本人當初測繪的。這件事，促使秘書室立即加強了毛主席的圖書管理，調進了一大批地圖，近有日本的，遠有太平洋地區的，其他的很多也都調來了。

我用鐵絲釘書這件事，讓田家英看出來，我雖然愛看書，卻可能不是個能管好書的人。我送軍用地圖出錯這個事兒，也讓田家英感到不太好。不久，他就把管理毛主席圖書的工作，交給了逄先知。逄先知是從青島華東革命大學來的。他接任后，知道自己看書是次要的，把書整理好、管好才是主要的，就吸取我的教訓，主動跟洪大姐交了朋友，主動把凡有破損的書都請洪大姐修補好。逄先知做這件事是稱職的，他能向懂的人學習怎樣管理和保護圖書，把毛主席的圖書管得井井有條。毛主席出差要帶的書，他也都能準備得很好。而這些事我都沒能做得足夠好。不過，逄先知的歷史知識有限，為了彌補他的這個不足，田家英就干脆把軍委辦公廳的老秘書、書法家陳秉忱聘請過來，幫助他補習歷史知識和關於古典書籍的知識。陳秉忱是山東著名學者陳介祺的后人，學識廣博，主席很多好書都是經他的手置辦的，包括蘇聯出版的一些重要的理論書籍。那時候出版社不多，一有重要的新書出版就馬上要買來，後來出版社多了，各出版社出版重要的理論書籍都會主動送過來，到 1957-1958 中南海“八司馬事件”的時候，就有了兩屋子書，再后來就發展到幾屋子了。

現在有人說，是田家英創建了毛主席的藏書室。不能這麼說，

因為那不是田家英有計劃做的，而是在毛主席喜歡讀書這個推動力之下的一個自然積累的過程，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結果。就購書數量而言，逄先知具體購置的最多。當然，田家英作為當時的負責人貢獻還是很大的，這個不能否定。在逄先知之後，有一個姓徐的也做過主席圖書管理工作。這是個有心人，後來寫了一本《毛主席讀書》的書。

我雖丟掉了管理毛主席的圖書這樣一個光榮的工作，但人還在秘書室。常言說“近水樓臺先得月”，我就還能從田家英、陳秉忱、逄先知等人那里知道毛主席讀書的大致情況，繼續偷師學藝，繼續沿著毛主席的讀書軌跡感悟毛主席的精神世界、哲學思考、人民情懷和對未來國家發展方向的深謀遠慮，這對我以後的人生起了莫大的作用。所以，我一直為自己有這一段管理毛主席的圖書的經歷感到自豪，還常因為這段經歷以“毛主席的書童”自命。

第 3 章 為《毛澤東選集》當校對和收發

1、關於編輯《毛澤東選集》的立項

我丟掉管理毛主席的圖書這個工作不久，田家英就叫我參加編輯《毛澤東選集》，具體是做校對和收發。

毛主席在 1949 年 12 月底到 1950 年 2 月第一次訪問蘇聯期間，就和斯大林商量過出版自己的選集的事，回國後不久就打算讓秘書室開始整理編輯《毛澤東選集》，後來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毛主席無暇顧及，這項工作就暫時擱淺了，因為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本人不參加編輯是不行的。抗美援朝進行到第三次戰役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被志愿軍趕到“三八線”以南，戰局對我們比較有利了，毛主席也有時間做別的事情了。1951 年 2 月底、3 月初，毛主席決定正式啟動《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

我當時弄不懂，編輯《毛澤東選集》不是我們自己的事么，為什麼還要斯大林同意？田家英告訴我說：“這可是個了不得的大事。編輯《毛澤東選集》這個事，不僅牽涉到我們一個中國，還牽涉到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出選集的，只有導師級的人物才能出選集。誰出選集，要是沒有斯大林的同意，那會有很多問題的。”他跟我大致講了一下中國和蘇聯之間、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之間，實際存在過的矛盾和分歧。他還說，這次編輯《毛澤東選集》，不但是斯大林同意的，而且是斯大林主動提出的。當時毛主席說：“我們因為長期處在戰爭中，對理論缺少研究，特別是我的幾篇哲學著作，當時是寫了提綱，作為講義和大家講的，沒有在理論上嚴格推敲，希望得到斯大林同志的

幫助。我們缺少理論干部，你們是不是派個理論干部來幫助我們？”斯大林欣然同意了，還派了尤金來北京幫助出版《毛澤東選集》。

尤金是個理論家，主編過蘇聯的《簡明哲學詞典》。他曾專門把《實踐論》翻譯成俄文送呈斯大林。斯大林很欣賞毛主席的這篇哲學論文，指示在 1950 年 12 月的《布爾什維克》雜志發表，《真理報》同月發表評論文章《論毛澤東的著作實踐論》。自那時起，一般的蘇聯人民都知道了毛主席是一個馬列主義水平很高的理論家。在實際編輯《毛澤東選集》的時候，一般文章尤金不看，但像《實踐論》、《矛盾論》這些哲學著作，牽扯到整個馬列主義的哲學體系，就都要經過尤金審查。他來后我聽過一次他的報告，感到這個人的確水平很高。他說，他原以為中國沒有馬列主義，看了毛主席的著作，就大吃一驚，毛主席的哲學水平那么高，能把馬列主義的哲學問題講得那么清楚，是他沒有想到的。他認為，毛主席的思想都符合馬列主義，都是馬列主義。但他不認為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有創造性發展，他強調毛主席只是符合馬克思主義。

2、《毛澤東選集》的具體編輯過程

編輯工作正式啟動后，由劉少奇任“編輯委員會”主任，但中央並沒有設立《毛澤東選集》編輯出版工作的專門機構，當時的“編輯委員會”既沒有中央正式任命的委員，也沒有正式的辦公地點，所有參加這項工作的人，都是兼職的，凡是給“編輯委員會”的有關文件、信函，都是送到田家英的住所。它在頤年堂和靜谷連接處的轉角上，十幾平米的平房，分里、外兩間，外間的桌子就是“毛選出版委員會”的辦公地點。

陳伯達、胡喬木、江青、田家英、葉子龍合稱主席的五大秘書。陳伯達、胡喬木雖說是主席的秘書，但都擔任著中宣部的副部長職務，陳伯達還是馬克思列寧學院的院長，胡喬木還是新聞總署署長。所以這兩個人平時一般是不來秘書室的。《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啟

動后，這五大秘書中，葉子龍因為是負責機要工作的，沒有參加這項工作；行政秘書江青，因為解放戰爭中隨毛主席轉戰陝北，后又在西柏坡照顧毛主席生活、協助毛主席工作，非常勞累，身體一直很差，雖然 1949 年第一次去蘇聯療養 7 個月，但并未完全恢復健康，1952 年經中央批准再度去蘇聯療養了，所以也沒有參加《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剩下的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三人都參加了。

田家英負責具體事物工作最多，整天趴在里面孜孜不倦的是田家英，他所付出的勞動遠大于陳伯達、胡喬木。排名是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其實貢獻是倒過來的：田家英貢獻最大，陳伯達貢獻最小。一般的政治性的文章、抗戰的口號等等，是叫田家英看。胡喬木改的東西要重要一些，改的也比陳伯達改的多。不過，陳伯達在《矛盾論》、《實踐論》這兩篇文章上面花的功夫是胡喬木、田家英所不能及的。陳伯達修改的地方、提出疑問的地方，比胡喬木和田家英都要多。我記得，《實踐論》上有一行字，主席原來引證的馬列著作是舊的譯文，陳伯達把舊的去掉了，換上了新版的譯文。毛主席自己改過的稿子，別的先送給胡喬木、田家英去印，而《實踐論》是專送陳伯達看，陳伯達看了再交給田家英印。所以陳伯達在理論上算是毛主席的一個助手。

我現在還保留下來一個《毛澤東選集》一到四卷的最初編目，它與後來的實際編目差別很大。當時各解放區都分別編印了各種版本的毛主席講話和文章的小冊子。“編輯委員會”經過比較，發現東北局編印的最為完整，就採用了東北局的版本為基礎。後來的《毛澤東選集》排版的方法和東北版本都差不多，連字體大小都差不多。這說明《毛澤東選集》沒有完全擺脫東北版本的影響。鄧拓主編過一個晉冀魯豫版的《毛澤東選集》（張春橋當年參加過這個版本的編輯）。東北版的《毛澤東選集》很多是採用了晉冀魯豫版的。所以，鄧拓對《毛澤東選集》是有大貢獻的。

編排目錄出來後，就送給主席和其他幾位主要中央領導人如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他們看，也送給幾位中央書記處書記看，其中包括任弼時，讓大家提出增加和刪減意見。任弼時開始還看送過去

的編目，後來因為病得很重，對送過去的文件，就基本不給回應了，所以任弼時可以說實際上沒有參加這項工作。編目上畫圈的重點文章都還要送尤金看。

根據目錄入選的每篇文章都先由人民出版社作校對后出清樣。田家英跟我說，清樣雖然是印出來了，但它不是原件，我們還要去檔案館，和保存在那里的原件作校對。像《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都是發表在 20 年代的《向導》雜志上的，中央檔案館保存有《向導》，就要到那里去校對。田家英還特別交代，這些東西年代久了，紙張都很脆了，翻的時候一定要小心，別弄破了。我按照田家英的指示，到中央檔案館去找到相關文章對照原始文件校對。我發現，東北局的版本和《向導》上的基本一致，有些改動的字和標點還是東北局的改得對，原稿上是錯的。可見當年編輯東北局版本的同志還是用了大功夫的。主席的手稿很少了，像《井岡山的鬥爭》，原件就是手刻油印出來的，很可能就是當時上海的中央印的；像《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沒有手稿，只是當時的記錄，主席在記錄稿上作了修改。有很多軍事電報是主席親自寫的，我去找文件的時候，看到過一些這類手稿。

清樣出來后，一份給主席，其它分送康生、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校閱。胡喬木、田家英對清樣看得非常認真，他們兩人負責了對清樣文字的技術性處理。從技術處理的結果來看，胡喬木的知識結構和文字能力，比田家英要高出許多。一般情況下，胡喬木、田家英校閱好的清樣，送毛主席審改后即為定稿。但有時主席改后仍要再排、再看、再改。最后入選文章的題解和注釋，胡喬木、田家英寫了一些。但是，凡專業性的注釋則由黨史工作者繆楚黃和歷史研究所所長范文瀾等專家撰寫。有些題解，主席看了不滿意，就會自己重寫，對注釋部分，主席也改動得很多。

陳伯達對清樣並不都看，看也看得不認真，他好像只對某些特別的東西有興趣。例如毛主席改過的清樣，他看得很仔細，甚至在主席改過的清樣上，再做些技術性的修改，或寫上幾個可有可無的字。毛主席改過的清樣，是文檔的珍品，陳伯達改上幾個字就弄得

很不協調，大家對他的這一做法都看不慣。此外，第一卷有個《本書的出版說明》，原是田家英起草好了的，陳伯達改了一些字，讓人重新打印，再送主席，給主席的印象好像全是他寫的。這類小動作胡喬木、田家英他們就不搞。田家英以前叫陳伯達老師，後來就有點看不起陳伯達了，背地里叫他“老夫子”，帶有諷刺的意味。

那個時期，我每天進到辦公室，先分發清樣給田家英、陳伯達和胡喬木他們【當時他們也在秘書室，還是在中宣部？】，然后就和田家英一起坐到小屋子開始校對。小屋子大小跟過去那個太監用的小屋子差不多，只有現在一般辦公室的 $1/4$ 大，里面放一張小桌子，就沒有多少空間了。一般情況是我念，他對，有時反過來，他念，我對。田家英抽煙，氣味就在狹小的屋子裡飄蕩，我不抽煙但必須接受他的煙熏。所以，單是一個上午下來，我就覺得很疲勞，腦子也變得很遲鈍，有時明明錯的地方也看不出來了。我出錯后，田家英就對我進行教育，說這個校對，古代人就叫它是校讎，就是要把錯的地方當作仇敵一樣，把它逮出來。《毛選》是我們領袖的選集，哪怕一個字，一個標點符號都不能錯。

為了標點符號不出錯誤，田家英叫我看朱自清的文章和由胡喬木編寫的當時還沒有正式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標點符號的規定”的文件，熟悉標點符號的用法。這一熟悉就不得了了，我成了“戚標點”。當時完成的《毛澤東選集》一、二、三卷的標點符號，最后都是由我校對的。這也是文字基本功之一。六十年代初康生叫我進他們的寫作班子，去跟他們搞“九評”，他們在校對文章，念到標點符號時，我甚至一聽就能指出哪個標點符號用錯了。為此他們封我一個“標點符號專家”稱號，叫我“戚標點”。

清樣送給主席，主席有任何改動那就要整篇再校，不像現在這樣，只校改了的部分。這個再校很重要，第一次，第二次念校沒有發現的問題，再校往往會發現。主席改了的文章要全篇再校，直到回來的東西，沒有改動了，才給大家傳閱。所以，一篇主席的文章，就拿《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例，念了校，校了念，校念一次十幾遍，少的七、八遍，五、六遍，一校、二校、三校，合起來，

往往就是三十幾遍。這樣下來，最後定稿的《毛澤東選集》里就沒有什麼錯別字，沒有什麼錯誤標點符號，不像現在的書，隨便都可以見到錯別字、錯誤的標點符號。

既然如此精益求精，編輯《毛澤東選集》過程中自然要產生大量的作廢的清樣。這些廢稿怎麼處理？除了有毛主席親筆改過的清樣必須要封存外，其他人改動過的一般都不保存。那時，紙張很緊張，往往一張稿紙我

們要翻來覆去地用；《毛澤東選集》清樣的紙張好，所以，里面只要沒有毛主席的親筆字，無論誰（包括陳伯達、康生、田家英）改過的，一旦不要了，都分給大家當草稿紙用。

《毛澤東選集》編輯進度是很快的，1951年2、3月正式啟動項目，同年10月第一卷就出版發行了；1952年4月第二卷也上了書店的書架；1953年4月第三卷也與讀者見面了。我從頭到尾參加了這三卷的編輯。（第四卷是1960年10月出版發行的，我沒有參加這一卷的具體編輯工作）。

3、關於《矛盾論》的修改

《矛盾論》是主席在一、二、三卷中用功夫最多的一篇，改動也最多，它原來是毛主席1937年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講課的提綱，後來是把這個講課記錄稿印出來給全黨學習。毛主席在準備這個講課提綱的時候，經常和艾思奇一起討論。這次編輯《毛澤東選集》收錄此文，主席先是對照原來的講課記錄稿口述修改和補充，當時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都在場。田家英回來跟我說過，他記都記不下來，聽也聽不懂。主席修改后的《矛盾論》，由師哲他們翻譯成俄文後交蘇聯人尤金去看。我對照過《矛盾論》原文和修改后的《矛盾論》，一大段增加，一大段刪減，里面引述的黑格爾、馬克思、列寧的一些話，是陳伯達整理的。陳伯達對《毛澤東選集》的主要貢獻就是在這個哲學思想方面。

在《矛盾論》的“五、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一節中，論述同一性和鬥爭性的關係的時候，有一句“而鬥爭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沒有鬥爭性就沒有同一性”。毛主席原稿寫的是“沒有同一性就沒有鬥爭性”，是陳伯達把它改成了“沒有鬥爭性就沒有同一性”。當時，政治氣氛是強調鬥爭，他們三人在討論的時候，陳伯達懷疑主席是筆誤，田家英就在底稿原話下面劃了一道，并將其倒過來了，胡喬木也同意倒過來。這樣，在正式出版的《毛澤東選集》里，就是“沒有鬥爭性就沒有同一性”。我當時水平低，沒有資格參加這樣的討論，陳伯達這個修改對不對，我也說不上。現在如能查閱保存在中央檔案館的原件，就能看到主席原稿上面的那一道就是田家英聽了陳伯達的意見后劃的。

值得順便一提的是，矛盾的同一性和鬥爭性的關係問題牽涉到“一分為二”這個哲學問題。在文革進行到 1967 年時，一些群眾在討論矛盾的同一性和鬥爭性關係問題的時候，就討論到“一分為二”的問題，進而討論起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可以一分為二。一些說可以一分為二的人給抓起來了，說他們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理論依據就是《矛盾論》中的“沒有鬥爭性就沒有同一性”。後來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我去問陳伯達，他不表態；我又去問張春橋，他說理論問題說不清，這個也不好問主席。我覺得，這個問題，牽扯到很大一批人，說人家是反毛澤東思想，不解決也不行，要是成為一個錯誤潮流也不好，我就去問了主席，關鋒也說應該去問主席。我向主席請教說，外面說毛主席的思想是個普遍性的東西，絕對性的東西，不能一分為二，那些說可以一分為二的人，很多都挨了批評。主席聽了說：“我的思想怎么就不能一分為二？當然可以一分為二。所有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謝富治知道這個情況和毛主席的態度後，就展開調查，責令可教育但不能抓人，抓了的都放了。文革中類似的事情不少，毛主席都不知道。有的是下面的人不能準確領會毛主席的思想和戰略部署，亂來，結果把事情搞出很多偏差；有的是一些人故意錯誤領會和錯誤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干擾文革。文革後，有人就把所有這些偏差都算賬到主席的頭上，就好像都是

主席叫搞的。主席也是真冤。

主席說他自己的思想可以一分為二，我想，那不只是自謙，而是反映了他一貫遵循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和辯證歷史唯物主義原則。

“事物都是可以一分為二的”和“沒有鬥爭性就沒有同一性”這兩個命題是否存在內在的邏輯一致性？或者說，主席原稿到底有沒有筆誤？陳伯達的修改到底正確不正確？關於這些問題，仁者還可以見仁，智者還可以見智。

4、《論持久戰》手稿背后的感人故事

毛主席《論持久戰》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檔案館，誰去調都調不出來，連總理都調不出來，我們要核對其中的一些文字，就必須親自跑去檔案館。手稿是主席用毛筆寫的，有的地方則是江青用鋼筆贍寫完了，主席再在上面改一改。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後來去問過江青，江青跟我說，那是因為當年主席原來寫的地方比較亂了，她就在邊上重新贍寫一遍，主席再在她贍寫的地方用毛筆做修改。江青說：“那是主席多年研究的心血結晶，主席在文章里預測的東西後來都被證實了”。從江青那里，我還知道，主席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很容易發脾氣，不允許有任何干擾，誰要影響到他，他就把誰罵出去。那時，主席吃飯也是食不知味，有時剛吃了一口，想起什麼來，就馬上放下先去寫。所以，主席一餐飯常常是冷了再熱，熱了又冷。江青還把小米粥熬得很薄可以喝，還把一些菜和豆子都搗碎，弄得很細很細，送給主席吃，但主席看也不看就囫圇吞下去了。那個時候，一有人來找主席，江青就擋在門口，一些很大的人物來了她也不讓見主席；人家還以為主席生病了，她就告訴他們主席在寫東西，不讓任何人打擾，有事找誰找誰去。有時，主席可能是寫的過程中碰到特別解不開的困難了，會顯得很煩躁，那時天氣本來就悶熱，主席一煩躁全身更熱得不行，江青就拿冷毛巾給他擦頭；主席手上也熱得不行，江青就找來些涼的石頭，讓他握著用來

降溫。江青在邊上也不敢說話，看到主席寫好一段，就趕緊過去幫他謄抄好，因為只有江青能認出主席的字來，別人都抄寫不下來。

文革中有一次江青對我、王力、關鋒、文元和穆欣幾個人，談過她的早年歷史，穆欣當時作過筆記的。她說，她從小就受到壓迫和侮辱，形成了本能的反抗性格。她十五、六歲去學京戲，那些名角，那些教戲的，都想侮辱她，她都本能地進行了反抗。那些有錢有勢的人，對她那樣一個漂亮的姑娘，有著非分之想，卻沒有一個人去捧紅她，就是因為她用毫不猶豫的反抗，摧毀了所有那些人的非分之想。黃敬（俞啟威）是她在青島時候認識的，是她的入黨介紹人，也是她的初戀情人，她對他的感情很深。1933年黃敬被捕後，她只身逃到上海找黨組織。可是，周揚有個弟弟見了她，赤裸裸地提出要跟她發生關係，還跟她說，我哥哥就是周揚。她把周揚弟弟怒罵了一頓。沒想到，周揚因此就不給她接組織關係，還挑她毛病說她怎麼怎麼不好。那個廖沫沙，也不是個好東西，也想欺負她。那時她不到二十歲，他們原都以為只要稍微一逼，她就會就范的，沒想到她是在不斷的反抗中長大起來的，性格倔強，根本不就范。只有唐納，性格比較軟弱，她覺得還合得來，就和他好了。後來她發現和唐納還是合不來，就在抗戰爆發後自己一個人離開了上海，投奔延安，幾經周折終於在1938年到了延安。

她剛到延安時，有人贊她是“延安十大美女之首”，立即也是很多人，包括很多高級干部都想追求她。可是，她除了毛主席誰也看不上，她就崇拜毛主席。那些大人物借口找她談話，談到很晚還不讓她回去，她就直接提出了責問。那時，毛主席在黨內有一定地位，但不是最高的。王明到延安後，王明才是延安婦女界的偶像人物，她們一哄而起，對王明的崇拜遠超過了對毛主席的崇拜。第二次王明路線連總理也是跟王明走的，可見王明當時在黨內、在整個延安地位和人望之高。即使這樣，江青還是看不上王明，還是心里只有毛主席才是真正的英雄。毛主席為人寬容、大度。她說她是有幸嫁給了毛主席，換成別的人，恐怕都搞不好。

她和主席的婚姻，本來名正言順，光明正大，卻也招來很多大

姐們的不滿。葉子龍跟我說過，在延安時，黨內的那些老大姐，包括康克清，都不喜歡江青，都孤立江青，說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賀子珍拆散了，都同情賀子珍。賀子珍這個人人緣好，是永新一枝花，再加上都是一起打出來的，大家都認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可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他們兩個的關係呢？葉子龍說，賀子珍和主席吵架，舉起板凳就往主席頭上砸，如果不是警衛員攔住，不知道會出什么后果。其實江青沒有搶賀子珍的丈夫，她是在主席和賀子珍離婚以後，才和主席結婚的，可那些大姐們都認為，主席離婚，那只是說說而已的，不能當真。更惡劣的是，包括康克清大姐在內的不少人還罵她是婊子（宋慶齡後來也這麼罵過）。文革中更有人不斷拿這些人的惡語和謾罵做文章，當做證據來抬高別人，貶低和污損江青。

江青還說，在延安康生對她這樣一個小輩是很尊重的，所以她後來一直是叫康生“康老”。總理當年對她也很照顧，不反對她和主席結婚。此外，當時賀龍也是支持江青和主席結婚的。還有一個李富春，他是很聽毛主席的話的。他也是保護江青的，他把江青入黨的事都給搞清楚了，支持她和主席結婚。後來江青有什么困難，都找李富春。當時有人造謠說江青和黨校一個什么人好，江青聽到后就到李富春那兒去哭訴說根本沒有那回事。李富春聽江青訴苦后，馬上找人了解情況。實際情況是黨校一個人暗戀江青，江青根本不知道，也沒有和人家來往過。李富春又找到那個人，把他訓斥了一頓，叫他“不要瞎說，再小廣播，自由主義，就要處分。沒有的事，別造謠，再造謠的話，要負擔黨的責任”（李富春的原話）。李富春代表中央組織部這麼一講，下面就不敢亂講了。

一個從小就遭受壓迫和欺辱的女子，在主席最困難的時候來到主席身邊照顧主席，而且照顧得那么好，這里面反映出的她和主席的深厚感情和革命者的志同道合，后人恐怕是很難體會的。正如江青所說，毛主席《論持久戰》所預測的東西都發生了，八年抗戰，日本人被趕回去了。可是不久內戰又爆發了。1947年3月胡宗南領20萬國民黨精銳大軍進軍延安，主席率領中央前委轉戰陝北，江

青毅然留在中央機關 3 支隊與毛主席同生共死。當時，任弼時是 3 支隊司令，陸定一是政委，江青是政治指導員。江青要負責主席的生活，管理主席的警衛、機要。可是，那些主席身邊的人，像葉子龍、李銀橋等等，都不把江青當回事，不聽她的話。據江青說，她批評李銀橋，李銀橋不服氣，向主席告狀，主席只能是調和一下，要李銀橋尊重江青，因為她是領導。那時，汪東興有支小分隊，是專門在軍事上保護主席的安全的。只有汪東興對江青畢恭畢敬，惟命是從。但後來她為這樣的唯命是從復出了慘重的代價：1976 年就是汪東興參與華國鋒、葉劍英他們的政變，抓捕了江青等人。

在文革中，江青把我抓起來了，我是很氣憤。如果從個人恩怨來說，我完全可以像金敬邁一樣把江青大罵一通。但我不能這樣做，不說其他，就憑她當年在中國革命最困難的時候投身革命，在主席最困難的時候，把主席照顧得那樣好，我也不能埋怨她什么。

5、參加編輯《毛澤東選集》的編輯校對工作對我一生有特別的影響

為《毛澤東選集》做校對我後來的成長和全部人生的影響都非常大。從工作關係上來講，我和田家英加深了相互之間的感情，與陳伯達也建立起了相互之間的了解。但這些還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和關鍵的是，這個時期對我來說是一個學習文化、學習寫作的時期，甚至比上幾年大學還有用。人是學而知之。毛主席寫的那些個句子，不用懂句法，就會喜歡，喜歡就容易學會。誰要把那時的《毛澤東選集》三卷都念個三遍，五遍，十遍，看他會不會寫文章，保證他會寫文章。所以，把《毛澤東選集》一、二、三卷校對完後，我原來不會寫的字會了，不會的文法也會了。自那以後我寫起文章來，就輕松多了。後來我能寫出一些有點氣勢的文章，可以說就是得益于這個時期校對《毛澤東選集》。

更重要的和更關鍵的還在於，在這個過程中，我知道了毛主席對什麼事情是什么觀點，對工農什么看法、什么態度，對知識分子

什么看法、什麼態度。一個人，要是老念杜甫的詩，他就可能變成杜甫的思想了，老念李白的詩，就可能變成李白的浪漫主義了。毛主席對杜甫評價很高，我也喜歡杜甫的詩，我又是老念毛主席的東西，而且用心到位了，所以就對毛主席的主要著作了然于心，毛主席的思想就變成我的血液了。毛主席喜歡田家英，一個重要的原因也是田家英對主席的東西用過心，整理出來的主席文稿有主席自己的風格。例如，“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就不是主席的原話，是田家英根據主席講出的意思，模仿主席的語言整理出來的，是爐火純青的主席風格。校對完《毛澤東選集》1至3卷三卷，我對毛主席的思想的領悟有飛躍性的提高，寫起文章來就會自覺地、自然地融會進去一些毛主席的思想，帶着一點毛主席的風格。我那時的報告送上去，他看了喜歡，喜歡就批注，恐怕就有這樣的道理在其中。

我以前就是愛看主席的書，還沒有加入地下黨，第一次讀到毛主席的《論聯合政府》，就服膺了毛主席，決心跟著他干革命，歷史垂青于我，幾年之後就讓我做了《毛澤東選集》的校對。是田家英讓我參加到這個工作中來的，所以，我一直視田家英為我的恩師。

第 4 章 為毛主席處理群眾來信來訪

群眾來信也是主席掌握全國民情、政情和社會整體狀況的途徑之一。剛進北京城的時候，還沒有群眾來信，但不久就有了，只是不多，秘書室安排一兩個人專門處理就行了。隨後是激烈增加，原來一兩個人能處理的，變成十幾個人都處理不過來了。於是，田家英、彭達彰他們就開始把來信按性質分出反映類、求助類、控訴類、建議類、外事類、文化類、舊誼類等幾個類別，讓大家處理。就在《毛澤東選集》搞得差不多了的時候，田家英找我談話，說群眾來信已經成堆，來信組人手不夠，調你去來信組當組長，你把手上工作移交給逄先知，送審、校對工作都由逄先知來代替。我服從組織安排，沒得條件可講。

1、毛主席解決建國初的失業問題 ——兩個人的飯三個人吃

剛解放不久，城市就業成為最大的問題。江南地區的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蘇州等，有大量的一般城市職員和工人失業，造成他們的生活非常困難，上海最嚴重，工人還有上吊自殺的。這是因為解放前這些地區相對比較發達，工廠多、商業繁榮，解放後資本家逃跑的很多，工廠關閉、商店關門的現象很普遍。而且國民黨殘余勢力還在到處破壞搗亂，美國和多個西方國家，對我們又是禁運又是封鎖，使那些城市的進出口貿易也萎縮了，讓失業問題雪上加霜。老解放區一般沒有這個問題，那里的青壯年都參軍去前線了，勞力還不夠用。北京也還好，和平解放比較早，工業不多、工人數量也不大。

不少失業的市民、工人走投無路，就給毛主席寫信反映失業造成他們生活疾苦，有的還直接要求給他們找工作。上海有位女工，姓周，來信說解放了她怎麼怎麼高興，但是工廠關閉了，她失業了，沒有錢買米，小孩子沒有吃的，她只好去賣身。她什麼都寫，她說她實在不願意，可又沒有辦法。我看到這封信心里很難受，馬上轉呈給了主席。主席批了信，還在“賣淫”等讓人看了很難受的字眼下面劃了道道。看到那些道道，我都能感受到主席也是心情很沉重。主席批示要上海市委解決這個婦女的困難，并要上海市委研究解決失業問題。可說實在的，當時的上海市委也拿不出什么好辦法來，因為這種事情太多了。

農民的問題當時主要是征糧問題。還在打仗，大軍向前，糧食就得跟上，各地征收軍糧任務很重。我國南方歷來是主產糧區，單產也高，一畝地多征收一點，就能解決很多部隊的吃飯問題。所以，當時這個問題主要發生在南方，北方沒有這一問題。上海青浦有個農民來信反映，征購太重，他自己沒吃的了。我把信轉送上了，主席看了批示說，這樣做是不行的，責立即查證是否屬實。我辦的信，我就要去查證，我打電話給華東局一位書記，他接電立即去核實，兩天不到，就回電給我說情況屬實，他們正在解決。主席聽了秘書室的匯報後，說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指示華東局斟辦解決。後來這個問題解決了，黃炎培給主席寫信還說了這事。這些民主人士也有很多親戚朋友是在農村的，問題解決前后的形他們都知道。

有一天，我拿到一封奇怪的信，是一張白紙條上寫著一組數字：大炮多少、機槍多少、坦克多少，再無其他內容，簽字用的是外文，我也看不懂是誰，心里納悶，這東西怎麼送去給主席看呢？還好我靈機一動，去問了收發室：這信是哪里送來的？答曰：是中聯部送來的。我一下就明白了，這是國外共產黨的領導寫給主席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馬上請報主席，不然就可能釀成大錯。當時，按照機要室和秘書室的分工，像胡志明這樣的兄弟黨領袖給主席的來信，凡不是密碼電報的，都是由秘書室而不是由機要室轉呈主席。

我當時對群眾來信反映的失業、生活疾苦等問題感觸最深，因為我的父親當時在上海的報關行工作，他的老板逃跑了，報關行關閉了，他也失業了，我家里陷入了水深火熱，三天只吃兩頓飯，妹妹餓得哇哇叫。那時，組織規定我們的任何來信，包括家書，都要先經田家英看。他看了我父母給我的來信，知道我家的困難後，就從他自己的工資里拿出五十塊錢（相當於現在的三百元，大約是我那時三個月的津貼。當時我們是供給制），讓我寄回家去。我不要，他堅持要給。他怕我忘了，還要我把寄出的時間都要告訴他。家里收到錢非常高興，我也一直都對田家英心存感念（文革初批斗田家英，我不積極，我心里同情他，結果被指斥犯了“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錯誤。這是后話）。

那時大家都相信毛主席、共產黨有辦法，什麼問題都能解決。所以我們越是加班加點，處理的信件越多，解決的問題越多，群眾來信就越多，我們處理的速度總是趕不上來信增加的速度。那信就像小山一樣堆起來了。這不是壞事，說明群眾對毛主席、對共產黨越來越信任了——對你失望了，人家就不給你寫信了。我琢磨，這樣一件件送不行，一件件解決也不行，應該給主席一個報告，講清楚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各地來了多少信？都反映什麼問題？最主要的問題是什么？反映某一個問題的信不是一件，而是很多件，而且各地都沒解決的辦法！這些都要讓主席知道。于是，我就把失業工人的信拿來、把農民的信拿來、把其他什麼人的信都拿來，綜合在一起，把主要問題擺出，把統計數字搞準，寫了一個關於市民和工人失業的專題報告。田家英看了說，寫得不錯，我們送上去，這一封信頂幾百封信，主席就不用看幾百封信了。田家英沒改幾個字就送上了，用的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報告”的名目。用這個名目給主席寫報告，一般是年終報告，不是專題報告。我起草的這份關於失業問題的專題報告，恐怕是建國以來中辦開先河的一次。

報告送上去以後，我就分分秒秒期望著主席能看到這個報告，晚上做夢都在期待。果不其然，第二天主席就批下來了。送上去是下午，我估計主席是晚上看了批的。報告是用大字寫的，主席把批

語寫在報告上，密密麻麻，大意是：

周總理，失業問題如此嚴重，要認真解決，不是個別解決，馬上把這個信印發給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立即開會討論解決這個問題，目前失業工人沒飯吃的要當即給予救濟。我們勝利了，不能讓人民群眾遭受痛苦。

其實，總理當時掌握的情況比誰都多，比主席也多，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一直沒給主席匯報。主席批了以後，總理馬上就通知全國，起草文件，找人調查，全國開會。各地一看中央要重視了，都實話實說反映情況了。由於給主席的報告是我起草的，總理要我去參加會議，到各個小組去旁聽。在小組里，我聽到的會上反映的情況，比群眾來信上寫的還嚴重。但那時國家沒多少錢，救濟金也不多，工廠好多也不生產，解決起來很難。會議提出幾個辦法來，其中一個辦法是說，不論怎樣，我們要把這些工人安排到工廠去，不論私營工廠、公家企業，安插進去，不讓他們在外面，確保安定，哪怕一個人的工作兩個人來做。這個討論方案周總理匯報給主席後，主席很贊成、很欣賞。主席說出來的話是：

兩個人的飯三個人吃，讓每一個工人都有一份工資。工人還是要按時上班，沒有工作就學習，今天你工作我學習，明天我工作你學習；或者上午工作，或者下午學習，輪流。在工廠，沒文化的學文化，沒技術的學技術，讓老工人教技術，讓有文化的職員教工人識字。

有人對這個辦法提出疑問，說兩個人的飯三個人吃，工資怎麼開？毛主席說，工人該拿多少工資就給多少，做半天工作也給他工資，不能把現有工人的工資拿出來分給失業工人，而是減少國家開支，厲行節約，把國家的辦公用費減一半，有的工程沒辦法先停下來，有些要做的事情慢慢做，想盡一切辦法，把能節省的節省下來。軍費也得節省，軍費開支很大，大量裁減軍費，例行節約。

主席號令，全國照做。節約到什麼程度呢？我們秘書室能走路去辦的事就走路去，本來有個吉普車，也不常開了，節省油費，田家英有時候都得坐公共汽車去辦事，我們更沒有車子坐了；辦公，

一張紙要用好幾遍，先用鉛筆寫，再用毛筆寫，正面用了用反面，用得不能再用了才作廢。中共中央辦公廳用的信封是用報紙疊的，報紙看完以後，兩層折疊成一個信

封，把作廢的辦公用紙，半邊還能用的，撕下來，貼在信封上，下面蓋一個圖章。別看信封、辦公用紙不起眼，全國一起行動，也節省不少錢，其他大額開銷一緊縮，節省下來的數字就不得了。軍隊也一樣，節約了多少錢，軍委報告給主席，主席還表揚他們呢。全國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機關到解放軍，都來支援失業工人。會議開過兩個月後，方案都落實了，問題也迎刃而解，許多失業的人重新有了工作。我父親也在一家藥廠找到工作了（當然，後來經濟形勢好轉後，再“兩個人的飯三個人吃”，就造成一定程度的人浮于事。這是另一個問題，要根據新的形勢用新的辦法去解決）。

通過這件事，我親身體會到了什么叫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英明不是像一些人說的是吹出來的。這個問題就擺在那裡，那麼多中央委員，包括總理、劉少奇、朱總司令，都同情工人，怎麼沒有一個人主動去想法解決？最後還是我們這些小秘書把情況反映到主席這裡來了，主席批示了才重視起來，才去想法子解決？還果然就解決了？！而且主席當時還特別指示，連國民黨的留用人員也都要給飯吃，不能餓死一個（三年困難時期主席再一次地提出了這個口號。所以當時好多地方的群眾就拿這個口號當武器，來和當地的官僚主義作鬥爭，反對浮夸後不知改錯的干部）。2008年全球發生經濟危機，德國也是通過減少在職人口的工作時間，通過“二個人的飯三個人吃”的辦法，最早在西方國家從危機中走出來了。德國人是不是把毛主席當年的發明學去了呢？

2、毛主席關心群眾疾苦， 反對用官僚主義態度對待群眾來信

1951年，江蘇、江西好些地方有農民來信反映血吸蟲問題，說我們分到了土地、翻了身，可血吸蟲還是要我們的命。有的信還附

著大肚子的照片。主席看到我們呈送的信，馬上作出批示，要求收集詳細情況，考慮一并解決。各地方政府接到主席批示後，馬上把當地的情況匯報上來，那些材料比群眾來信反映的要具體和全面，那時地方政府不隱瞞這事，因為他們自己解決不了，希望中央幫助解決。主席看了匯報就指示衛生部組織最好的專家下去調查研究，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案，還敦促我們經常打電話給衛生部詢問進展。

血吸蟲危害農民健康盡人皆知，可從來沒有人重視並解決過，毛主席調動人民群眾和衛生專家，群策群力，苦戰幾年，終於把它解決了。我聽林克說，1958年毛主席在得知這個消息後，高興得像個小孩，手舞足蹈，一夜無眠。當時，他就在主席身邊。主席就是那天寫了那首著名的“送瘟神”的詩：

送瘟神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其一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其二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毛主席加的附注說：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余江縣消滅了

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曉，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這和林克跟我說的情形是一致的。我後來還聽總理說過，主席讓給下鄉的醫生專家都發了獎金，感謝他們為農村人民群眾做的好事。

1951年4月底，秘書室把當年頭三個月各種群眾來信的情況匯總，給毛主席打了一個關於處理群眾來信的報告。主席很快就對報告做出批示。這個批示現在在黨史新聞網和毛主席文稿中都能查到，茲錄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轉分局，省委，區黨委，市委，地委，縣委；各大行政區，各省市區，各專區，各縣人民政府的黨組，並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的黨組：

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繫的一種方法，不要採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如果人民來信很多，本人處理困難，應設立適當人數的專門機關或專門的人，處理這些信件。如果來信不多，本人或秘書能夠處理，則不要另設專人。下面是專門處理人民給我來信的秘書室關於處理今年頭三個月信件工作的報告，發給你們參考，我認為這個報告的觀點是正確的。

這封批示是1951年5月16日作出的，15年后的5月16日，標誌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的《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著名的《516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這份批示和《516通知》之間存在著邏輯聯繫，它與群眾路線和黨的干部腐敗變質問題有關。這是后話。

毛主席對黨的干部，無論級別如何，無論遠近如何，都總是嚴格要求的，對他最信任的人也不例外。就在以上批示作出后僅三個多月，田家英就因為處理群眾來信不及時，受到主席一次嚴厲的批評。1951年8月北京石景山發電廠的一個書記，反映工人工資比較低，工資沒調整，物價又上漲，所以工人生活很困難。那信開始

是我接手處理的，我整理后給了田家英，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沒交到主席那里，可能是因為當時這樣的信太多，他見怪不怪了，所以不大重視。恰巧不久林老去石景山，看到了工人的實際困難，還聽工人們說他們給毛主席寫過信反映情況。林老回來后就到主席那里說起這信的事來，主席聽說工人有信給他就查問，一查果然有。田家英趕緊拿了送去。主席看到有信來卻不給他就很生氣，批評田家英說，你的工作就是向我反映工人、農民的情況，這麼重要的反映工人生活困難的信，你壓了那么久不送給我看，這是個對工人的感情問題，是立場的問題。工人的疾苦，就是黨的最大的問題，我們黨是干什么的，就是給老百姓解決問題的，怎么能掉以輕心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了你就打報告，我再找人……。主席的這個批評應該說是很嚴厲的，田家英當時就吃不住了。我沒有在場，田家英也沒跟我們全講，我聽他跟別人講了幾句，知道主席批評得很厲害。彭達彰安慰他說，信是我管，我沒盡到責任。田家英后來喝悶酒發牢騷，抱怨說，我事情這么多，這么忙，主席也不體諒我，這么一件小事，就這麼批評我？！那時候，田家英對我很信任，他在酒中不知道自己發過什么牢騷，酒醒后就問我。我安慰他說，干嘛發牢騷呢？主席批評你，那是愛護你，這件事我們也都有責任，你把主席的批評趕緊跟大家傳達一下，讓大家也警惕不要犯同樣的錯誤。他說，對，對，對！田家英才氣過人，酒醒后說出的大道理，比我們都好。后来他也向主席寫了檢討，說了“主席的批評是對我們工作很大的推動”之類的一番話。后来毛主席給那個支部書記寫了信，表揚他關心工人，告訴他中央馬上想辦法解題，而且是整個北京市的工人，全國的工人問題，都要解決。后来彭真他們一起，把石景山鋼鐵廠工人的工資提高了，我們再下去聽反映，無論是支部書記還是工人，都非常滿意。

3、毛主席從群眾來信洞悉干部腐化變質并保持高度警惕

城市工人失業、對農民征購太重，都是影響全國穩定的大問題，都在毛主席的親自指示下解決了。但群眾來信反映的問題遠不止這些，而是五花八門，什麼都有。有群眾來信揭發他們那里有什么干部貪污腐化、大吃大喝、欺壓群眾，還有群眾來信反映說，有干部讓群眾給他蓋房子卻不給工錢，還有的干部強占群眾的土地。此外，還有軍內高級領導干部的家屬來信甚至來訪，反映她們的遭遇。

有一次，八九個部隊高級將領的夫人，也不知道她們是怎樣串聯到一起的，要求見主席，告她們的丈夫進城後生活腐化變質，看不慣她們了，想找年輕美貌的姑娘另結新歡，變成“陳世美”、“牛金星”、“劉宗敏”了；還有哪個首長離了，娶了新娘子；哪個首長暗中有好幾個小老婆；哪個高級干部嫌自己評到的級別低了，不滿意，不學習，不求上進，整天喝酒，罵罵咧咧，還摔盆子打碗；還有哪個高級干部怎麼樣要部下弄錢、享受，占好房子、大房子。諸如此類。甚至也有反映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員情況的。總之，很多黨和軍隊的高級首長，早已忘掉了主席的“兩個務必”、“進城趕考”、“不當李自成”、“不做劉宗敏”的警告了。

這些夫人都是老革命、老資格，我叫她們老大姐，其實她們當時的年齡也就四、五十歲，不是真的老了。她們都告到主席這里來了，說明各家情況是相當的厲害了。她們事先擬好了一份名單，我請她們交給我，她們不同意，非要親自見毛主席！我向楊尚昆報告，請他見見這些老大姐。楊尚昆圓滑老練，知道那些老大姐他一個也不敢得罪，得罪了就等於得罪她們的丈夫了。出來就要聽，聽了就要回報，不匯報就是欺騙主席。匯報了，主席批評了那些將軍、首長，就等於還是得罪了那些將軍、首長，也還是得罪這些老大姐。反正里外得罪人，他干脆不見。老大姐們原以為我是收發室傳達，我細心耐心、苦口婆心跟她們講清楚，我就是專門負責接訪的，有什么事跟我說是可以的，我去匯報。我進進出出好多次，不斷進去報告，她們卻還是不斷見不到中辦領導，更不用說指望毛主席知道她們來了。終於她們明白過來了，說我們來了見不到主席，也不能白來一趟，總這樣跑來跑去也不是辦法。我們也不想為難你，見不

到毛主席的話，你拿筆來，好好幫我們記下來。我說，好，好！她們原本不想跟我說的事，這時也都慢慢跟我說了。我就一個字一個字，很認真地記錄下來。完了，

她們千叮嚀萬囑咐：“小同志，這事不能給別人說，信也不能給別人看，我們相信你，你一定要向毛主席匯報啊！我們看你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啊。”我說：“好，好，我去整理整理，打成文件，一定及時跟主席匯報。”我真是認真去整理了。我給主席的報告不能寫得太具體，都是概括性的東西，但是人名都寫上了。主席很認真地看了我的報告，一個名字劃一杠，一個名字劃一杠，然后批示了很長一段話，最後說請劉、周幾個人閱，請羅榮桓同志處理，處理完了將結果報告給他。羅榮桓怎樣處理的，我不知道，因為這個處理不經過我們秘書室，是羅榮桓直接跟主席報告的。但因為是我寫的報告，我很關心這事，我注意到，從報紙上面再也看不到一些人的名字了，出席國慶招待會時，也看不到這些人了。估計羅榮桓處理得很嚴肅，羅榮桓是個很正派的人。這是進城後不久的事。1954年高崗事發，後來說高崗怎樣腐敗，我就聯想到這些老大姐告狀的事。黨內不只一個高崗啊，“高崗”太多了，情況都跟高崗差不多。

這類問題即使有的看上去沒有什麼大不了，其實都是很嚴重的，因為它們直接關係到人民群眾的生活、干部的變質和黨的形象。這類問題，凡涉及到高級干部的，我們都不寫進綜合報告里，要作專題報告。主席則對這類報告特別重視，有的批示叫大區的書記去查，有的就讓中央有關部門直接查，像老大姐們反映的軍隊高級干部的問題，就是叫羅榮桓開專門會議解決的。還有的甚至叫董老（董必武）親自過問。我從主席這些批示中能感到，主席從那時開始就非常防范干部特殊化問題了。由於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問題出得很多了，1951年底，毛主席決定發起一場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在運動中，主席想要殺掉劉青山、張子善兩個人。對毛主席的這個決定很多人當時是意見很大的，我記得華北局里面就有人說，這兩個干部功勞很大，不要殺吧，要殺也頂多殺一個；

有的說，他們的錢也都沒用，還在那兒，拿回來就算了；還有的說，革命革了一輩子，翻雪山過草地，長征都沒死，革命成功了，倒讓自己人給槍斃了，殺了他們會讓老干部心寒；連黃敬和其他一些很大的干部都給這兩人說好話了，說毛主席自己在延安整風時說過一個都不殺的，希望毛主席刀下留人。好像只有劉瀾濤、薄一波等少數人是主殺派，支持主席。我聽李銀橋說，毛主席一晚上都沒睡好覺，翻來覆去想，殺還是不殺，最後下決心要殺，毛主席還說過這麼一句話：“唉！他們也算是為革命最後做個貢獻吧！”主席這樣做，有點像三國時曹操向監糧官王垕借其項上人頭一樣，迫不得已。當然，曹操是殺了無辜的王垕，而毛主席殺劉青山、張子善是因為他們貪污腐化證據確鑿。二者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凡是當時涉及到高級干部的專題報告文件，現在也應該都沒有丟，它們是主席批過的，誰敢丟？除非故意銷毀！如果能把這些報告和主席的批

語都公開，那是能讓人民更多了解建國以後黨內干部，尤其高級干部腐化變質的過程和嚴重程度的，也能使更多的人對後來毛主席為什麼要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多一份了解和理解。但是，現在出版的主席建國以來文稿就完全沒有主席的有關批示，更不用說原始報告附件。

4、毛主席重視民主人士的來信和友情

有一類知名民主人士的來信，從廣義上講，也屬於群眾來信，但又不是一般群眾來信，那些來信遠不如一般群眾來信多，但是處理的難度很大。我剛一開始辦信就遇到了這類信件。哲學家、佛學家熊十力，給毛主席送來一封信和一本他自己寫的《新唯識論》。田家英交代我，把信和書的要點摘出來呈送給主席。《新唯識論》是講佛學的。可我 1950 年才 19 歲，馬列看了不少，佛學不知其所云，也不懂佛教，更不知道佛學和佛教是不同的，只知道阿彌陀佛，到

廟里逛逛，看看四大天王、如來佛的像，別的都不懂，佛經也沒念過。佛經有很多術語、專有名詞，比如，如是我聞，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心經》我背了半天還是不知道說啥，想找個出家和尚問問，附近也沒什么廟。《新唯識論》，看不懂也不知道怎么摘要。由于有保密條例的限制，我還不能叫別人去弄，就只好硬著頭皮去弄、去鉛研。我一頭扎進中南海機關圖書室，找詞典，但查了半天，不解決問題，因為詞典主要是解決一個個詞，要想看懂，就得系統研究；找哲學書籍參考，但忙來忙去好一陣子，還是許多問題一頭霧水。在中南海機關圖書室里，沒有找到可參考的佛學書籍，我就跑到中南海北門外的北京圖書館去找，終於找到一套普及佛教知識的書，跟白話文一樣。《心經》的白話淺釋，《大悲經》的白話淺釋，《華嚴經》的白話淺釋，我就從這個入手。後來還查到了熊十力自己關於“唯識論”的通俗講演稿，又反復苦讀。前前后后足足用了兩個禮拜，總算勉強對老先生的信和書的要點知之一二了，遠不是完全領會，就是知道哪句話、哪些字是他的中心意思、扼要意思就是了。

隨後我寫了一份幾百字的摘要交給田家英，他再送給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後，在上面劃了一些道，又翻了翻熊十力的書，在重要的地方做了些記號，然後給熊十力復了信。為完成這個看似簡單的任務，我整整兩個星期加班加點，主席靠我搞出的摘要，給老學究回了信。知道這些之後，我就很有成就感，心里很滋潤。

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像章士釗、柳亞子、符定一、黃炎培、陳叔通、黎錦熙、金息侯等人的來信，古雅的文字里常夾著生僻的典故，我都要弄懂了才能摘要。主席詩詞文章、歷史、哲學功力都是莫測高深。所以，這些民主人士雖然一個個滿腹經綸，但給主席寫信，都不敢信手寫來，多是苦心孤詣，盡顯文章風騷。這好是好，卻為難了我們這些個晚生之輩。不過，對我而言，是個學習的機會，我很珍惜，慢慢我就形成夜讀的習慣，常去中南海機關圖書室和北京圖書館夜讀。北京圖書館的書多，環境好，晚飯後沒事，我先去那里，那里閉館後，再回中南海，到機關圖書館繼續夜讀。黃炎培這個人我在上海讀書時就知道，他辦了許多學校，還常免除窮孩子

學費。因此，我對他的印象很好，一看到他給主席的信，就馬上送上去。可是，在處理章士釗的來信時，我犯了個想當然的錯誤。

我在上海念書的時候，看過很多魯迅的文章和書，《魯迅全集》也看過幾集，知道魯迅和章士釗“打過官司”，把章士釗罵得很厲害。例如，在《從胡須說都牙齒》中，魯迅就寫道：“又是章士釗，我之遇到這個姓名而搖頭，實在由來已久……”。北洋軍閥鎮壓學生運動，制造“三一八慘案”，那時章士釗是教育總長。開槍的事他決定不了，但學生請願好幾天了，他怎么不管？所以我認為他是有責任的。魯迅的名望、革命性、戰斗性是眾所周知的，毛主席對於魯迅的贊揚和肯定，我也是早就知道的。那時候，我已經讀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知道毛主席是把魯迅的方向，確立為新民族文化的方向。我不喜歡章士釗，對他和毛主席的關係也不了解，魯迅又罵他那麼厲害。我相信魯迅，相信他不會瞎說。想當然認為章士釗是個反動派，沒資格給毛主席寫信。而且他不過是對時局發表一點看法，對什麼改造發表一點看法，卻用古文寫，字句拗口，那些問候的客氣話，用詞十分古怪，我看不太懂，就知道大意，讓人煩，就把他的信扣壓下來了。這一扣壓不要緊，章士釗見給主席的信，主席不回，就到總理那里要說道。總理追就問田家英。本來，所有的來信中，北京的最重要，因為北京地區民主人士多、名人多，他們的信不能怠慢，田家英選我來管，就是因為他覺得我讀了不少書，不會出錯。哪知道，我要不讀書就往上送了，偏偏讀了一點書，又偏偏讀過魯迅，看到魯迅和這個寫信的章士釗還有那個過節兒，反而把他的信給扣了。田家英來問我，是不是有章士釗的來信？我理直氣壯告訴他：“是有，我壓下了。他是個反動派。”田家英一聽，說：“好家伙，章士釗的信你怎么能壓呢？”田家英嚴肅地批評了我，還和彭達彰一起，召集幾個人開會，說章士釗不是像你一個小人物，他是毛主席的一個長輩、長者，給毛主席寫信，毛主席一點聲音都沒有，不理睬人家，這牽涉到毛主席的威信問題。田家英還說要給我處分。那是我到中南海後第一次挨批評。過了一段時間，處分沒有下來，我就去問田家英。他笑了笑說，批評是批

評，你這個事兒，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然后悄悄告訴我，他也犯過這個錯誤，也扣押過，挨主席批評了。不知者不為罪，算了，下次注意，有什么不懂的，先問我們，不要自作主張。這事就這樣過去了。

事后我才知道，毛主席和章士釗的公交、私交都很篤實，非同一般，其淵源落在上世紀 20 年代前后。那時毛主席還只是個熱血青年，章士釗初次讀到毛主席的文章，被其文采、抱負、氣勢和論事道世鞭辟入理、雄辯無比所震驚，說過“不得了啦，湖南要出帝王了”，還親自接見了毛主席和蔡和森——這是周總理告訴我的。章士釗是個民主派，是堅決反對封建帝制的，他這話不是說毛主席要做皇帝，不過是個借喻而已，用以贊嘆毛主席有雄才大略，中國的革命，要在毛主席手里出個非凡的新氣象。后来，章士釗給毛主席好幾萬塊錢，毛主席把這些錢一部分用于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一部分用于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毛主席贊揚章士釗真心為民主是很堅決的。由于兩個人有這層關係，他們就一直有來往。章士釗給毛主席寫信，毛主席都有回信的。我把他的信扣壓下來，自然是“惹下大禍”了。

說到他們兩人的交情，有件關於主席給章士釗送雞的事就不得不說。那是 1955 年的一天，晚飯后毛主席讓警衛買兩只雞給章士釗送去。那時候雞很緊俏，天黑了，商店已關門、攤販也收攤，警衛只好去找人幫忙才買到雞，等把雞送到章士釗家中，已是半夜了。章士釗收到雞，連聲稱謝。這事很稀奇，大家傳來傳去，卻都不知道個中緣故。有人問田家英，他也搞不懂，僅說主席給老人送點禮是常有的事。1967 年，我向康生問及此事，他給了我一個出人意料的解答。康生沒有正面回答我，只叫我去翻翻《三國志》，看曹操和喬玄的故事。我按圖索驥，找到這個典故。原來，曹操二十多歲時尚不得志，默默無聞，一次去拜見喬玄，喬玄卻很賞識他，說：“如今天下將要戰亂，能夠安定天下的人除了你還有誰？”在喬玄眼里，曹操是“命世之才”。從此，曹操引喬玄為知己，與他成了忘年交。喬玄臨死時請曹操照顧自己的家庭，還要求曹操以后路過他家鄉的

時候，要拿一只雞來墳前祭奠他，否則“車過三步”就會肚子痛的。曹操果然照辦。毛主席初識章士釗的時候，也是二十多歲的青年，能得到章士釗的欣賞，大概是有曹操遇喬玄的感懷吧。他給章士釗送雞，我推測似乎是在表明他們之間有類似曹操與喬玄之間那樣的彼此相知和彼此不負。兩只雞就把相隔近兩千年的兩段佳話傳之于后人了，毛主席的玩笑與幽默，也是大風大雅。

主席不光對章士釗另眼相看，對其他很多民主人士和名流也是相敬如賓的。毛主席過生日是不讓人祝壽的，有些名人像齊白石、葉公綽、張伯駒、陳半丁這些人，就會作一幅畫，例如畫個長壽鹿什么的，贈送毛主席。毛主席知道：畫是要錢的，他們給我畫畫，雖然不是為了要錢，但我也得給人家一點東西。那時，主席還沒有稿費，他就想拿他的津貼買些禮品。楊尚昆知道了，就說人家給主席畫畫，實際是給共產黨畫的，這個錢由辦公廳從辦公費里報銷，不要用主席的津貼，主席的津貼也不夠。買什么禮品呢？主席很講實惠，說不要買什么花花草草的，就買火腿，一個人送一條火腿，另買些糖果，糖果要買軟糖，他們年紀大的，硬的不一定咬得動，再買些買好的糕點，東西買好了誰去送呢？田家英說，大學生都還是小孩，代表毛主席去送禮不大合適。當時，來信組年紀最大的叫俞永廉，三十多歲，胖胖的，長得比較老成一點，可他脖子上長癬，不太好看。剩下的那些人，小的小，瘦的瘦，不太上相。我給田家英提建議，讓俞永廉穿件新衣裳，把衣領往上提一提，把脖子遮一遮，就蠻好的。可田家英看了半天，還是決定讓我去。因為我當時雖然年紀也才剛 20 出頭，但臉比較黑，看上去快三十歲的樣子，算是比較老成了。後來，彭達彰給我們要了兩部車（那時只有主任、副主任才有資格要車）。我就照著名單，挨家挨戶代主席把禮物都送到了。時至今日，還總有那么多人，說什么主席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時受了胡適的冷遇，就開始仇恨知識分子，說得有鼻子有眼，還說主席建國后從來就不重視知識分子。那么，主席與這些大知識分子和名流們之間如此篤實的交情又說明了什么呢？

5、我自己在為毛主席處理群眾來信中的一些感悟

上面列舉的都是我自己在為毛主席處理群眾來信中所直接經歷的部分重要事情，實際上其他同志都有各自不同的重要經歷，要都匯總起來，說不定就是一本專著。即使我自己經歷的，以上也只是便于歸類的一些事情而已，還有很多是沒歸入的。比如，慶賀電報寬泛地說，也算是一種群眾來信。建國初，群眾熱情高漲，一碰到什么事情或者節日，就給中央和毛主席發來祝賀與致敬的電報，熱情洋溢卻沒有什麼實質內容。那些電報數量巨大，有時堆滿整個房間，讓秘書室領導們不勝煩擾。剛開國，中央機關的紙張很緊張，我們辦公都要利用用過的廢紙甚至舊報紙的空白處，這些電報紙紙質不同，不能再利用。所以，我們也都很頭疼。而且那時拍電報的費用很昂貴，這么多電報需要多少錢啊！秘書室把這個情況反映到毛主席之後，毛主席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定是當地的領導讓群眾或者以群眾的名義發來的。然後，他就讓中央辦公廳發文，禁止了這種做法。這不是打擊群眾的熱情，而是因地制宜，體諒群眾，愛護群眾，也是關心我們秘書室同志的工作，不要我們耗費時間在無謂的事情上。

還有一種來信也比較特別，看似很普通，卻不是通過秘書室，而是通過機要室直接呈送主席的，任何人都不能看的。當時，有些主席批下來的信到了我這里，我一看這信不是由我們秘書室送上去的，就知道主席另外還有通訊渠道。後來我知道，主席為了更全面掌握情況，到各地視察，常會就地找一些人直接給他寫信。他們中有農民、小學教員、知識分子，演藝界人士，各行各業都有。反映的情況也十分廣泛，都涉及群眾生活和群眾迫切關心的問題。有個紅線女，是個越劇演員，她就可以直接給主席寫信。一次她到外地演出，了解到那里的物價高，煙酒都跟著漲價了，就把情況寫信告訴了主席。主席後來在一次中央會議上問，為什麼煙酒漲價？參會的人都被主席的問話搞得不知所措，也都不知道主席是怎么知道的。

這樣的信是寄到北京 XX 信箱，寫上 “XX 收”。毛主席後來有交代，我們一見到這樣的信，誰也不能拆，必須交給徐業夫，由徐業夫交毛主席本人拆看。葉子龍管機要室，經過機要室給主席的信，密級就是最高的了。這樣的信密級卻還要高。寫這樣信的人就是後來大家知道的主席的“通信秘書”，李銳就是其中之一。主席是看李銳在長江三峽水利建設上有些好的意見，才讓他擔任自己的通訊秘書的。主席用了一批這樣的通信秘書，但他們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主席秘書。

1950、1951、1953 這幾年秘書室的年度報告都是我寫的。這是因為田家英看到我處理群眾來信的具體成績比較優秀，寫起來言之有物、下筆有情，而且我那時也還協助他搞《毛澤東選集》編輯，他對我了解最多，非常信任我（我還因為經常給中央反映重大情況當選了 XXXX 年中直機關勞動模範）。但到了 1954 年，情況變了。有一次，楊尚昆的秘書孟繁述在吃飯的時候跟我說，秘書室的報告應該是寫給辦公廳，由辦公廳再轉給主席。我把這話向田家英做了匯報，田家英說，這個就困難了，主席說這個報告是要直接給他的。但是，田家英又怕得罪楊尚昆，就跟我說，那以後就不寫書面報告了，用口頭報告給主席吧。

秘書室這個時期為毛主席處理來信來訪的實踐和經驗，以及毛主席對於群眾來信來訪的重視和相關批示，成為了後來黨和國家規範化的信訪制度的基礎。

在為主席處理群眾來信期間，我讀到了一些列寧關於重視群眾來信來訪的教導。在列寧看來，無產階級政黨和國家機關，要保持與人民群眾密切聯系，就要搞好群眾的來信來訪工作。他要求共產黨員應該把群眾的來信來訪反映問題，當作“勞動者無報酬地履行國家義務”來對待。列寧自己還曾親自接待過很多來訪者，他的接待室被稱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毛主席和列寧一樣地重視群眾來信來訪，早在中央蘇區時期，毛主席就寫出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提出要實現黨的中心任務，就必須堅持群眾路線，關心群眾疾苦，注意工作方法。我有了為毛主席處理群眾來信的許

多經歷之后，對列寧對待群眾來信來訪的事跡就更加體會深刻了，為了紀念列寧誕生八十五周年，我在 1955 年 4 月寫了《列寧怎樣對待群眾來信來訪工作》的署名文章，向《人民日報》投稿，《人民日報》居然在 4 月 22 日（列寧的誕生日）的第 3 版登出了。這在當時中南海的工作人員中，是絕無僅有的，大家知道后都比較驚訝。

從為毛主席處理群眾來信這個時期開始，我就覺得，我跟主席是心連心的。我不知道有沒有心靈感應這回事，我原來始終相信唯物主義。現在想，心也是有能量的，也許會有感應吧。鄧小平重新掌權之后，我在秦城監獄，忽然一天感到我母親病得厲害，我是和母親相依為命長大的，對母親的感情很深，我預感到母親可能病重了，要離開人世了，就向中央打報告，請黨中央開恩，批准我跟母親見一面。他們沒有開恩，晚上我就夢見我母親死了，第二天我嚎啕大哭。我打小就不為什麼難事哭，在監獄也從來不哭的，那天卻突然就哭起來了。1986 年我出獄后，看我母親死時的照片，跟我夢見的好像一模一樣。我無語了。我一個 17 歲就加入地下黨出生入死干革命的人，一點小小的人道主義要求都被拒絕了！自那以后，我就有點相信心靈感應了。我想它可能是像磁場一樣的一種波動，波浪會散發出去，而這種波浪就跟電視機一樣，有各自的頻道，當兩個頻道頻率一樣就能彼此接收到。

我的總的體會是，毛澤東對各界來信都很看重，又特別重視工人、農民反映情況和要求解決困難的來信。我是實實在在感受到，毛主席是真心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普通老百姓的疾苦！我之所以一生崇拜毛主席，在秦城被關了 18 年也不改，到老了還是不改！就是因為毛主席是真關心為老百姓的。周總理也關心，但我感到他總不如毛主席那樣關心。當年的政務院比我們秘書室知道的東西多，可是毛主席知情并解決這些問題，都是先有秘書室把群眾反映的問題匯報上去才發生的。領導的秘書，尤其黨和國家領袖的秘書，其實是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不是領袖或領導的私仆，而是領袖或領導與人民群眾之間的紐帶與橋梁。主席日理萬機，根本沒有時間、也根本沒有必要，親自一件件詳細閱讀群眾來信。惟其如此，秘書

室的作用和價值才顯得重要，呈送到主席那里的材料，才要格外及時準確地反映人民群眾的真實疾苦和表達出人民群眾的真實心聲。

第 5 章 第一次感觸黨內、軍內 驚心動魄的高層鬥爭

1、關於 “高、饒反黨集團” 案

毛主席的治國思想里有一條是很堅定的，那就是中央集權制。他贊成秦始皇的郡縣制，不贊成分封制。新中國中央政府已經建立了，如果再長期在各地有中央的代表機構，那就等於是有一個大中央，幾個小中央了。1951年毛主席順應農民搞合作化的要求，提倡農村合作化，有的中央分局就公開發文件反對合作化。這樣的文件不需要中央批準，只要向中央備案就行了。這些文件在下面看來，就等於是中央文件，都要執行的。這一情形，我知道主席是很反感的。另據我觀察，毛主席對當時中央政府的一些領導，包括劉少奇和周恩來的一些做法，都不很滿意。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主要是以1948年在石家莊建立的華北人民政府為班底組成的。建國初搞計劃，沒有經驗，計劃不周，問題出得不少，經常鬧出矛盾來。在這樣一個多重復雜情形交織在一起的大背景下，毛主席採取了一個新的戰略步驟，就是在1952年把東北局的高崗、華東局的饒漱石、中南局的鄧子恢、西南局的鄧小平和西北局的習仲勛這五個中央分局的書記調來北京，調整和增設中央和國家機關部分機構，加強中央統一領導。這就是後來一般所說的“五馬進京”。

高崗是個有能力的人，他主政下的東北，在1949年、1950年是支持了全國的，後來又支持了抗美援朝。高崗把東北的經濟搞得挺好，因為距離蘇聯近，向蘇聯學了不少，搞計劃搞得也好。所以，五馬進京，主席調高崗到中央管計劃，後來就有人說，“五馬進京，一馬當先”。高崗與劉少奇有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怎麼產生的？這是個值得研究者發掘的歷史點），主席調高崗進京，確實還有一個

用意，就是讓高崗在政治上平衡劉少奇。

那時主席對於劉少奇搞專權感到不滿實已很久了，我在文革中聽江青說，其起源在於延安分兵留下的後遺症。1947年胡宗南依仗強大兵力進攻延安，主席想：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他用這個道理說服中央機關撤離延安，同時主張分兵，堅守陝北，打通西安。本來該是劉少奇堅守陝北的，可劉少奇不會打仗，主席就自己堅守陝北，讓劉少奇代表中央，讓朱德指揮軍隊，率領中央工委到比較安全的華北，因為華北有粟裕和彭德懷為其各擋一面。用康老（康生）的話說，毛主席這是“有劉邦的苦衷”⁹。主席率領中央前委轉戰陝北，以區區人馬對抗胡宗南20萬大軍，忙得不可開交，又因為發電報，容易被敵人跟蹤到信號，暴露自己的方位，就叫劉少奇一般事情就不要匯報，特別重大的事情才請示。劉少奇離開主席後，獨立指揮中央，形成習慣，以為自己就是中央了。在同年的華北土改期間，劉少奇向全國發指示，搞村村點火，處處冒煙，搬石頭，整干部，打倒一大片。這些東西過左了，搞得雞飛狗跳、天怒人怨。當時，連康老都受到影響，聽劉少奇的，跟著劉少奇的指揮棒在晉綏搞過左的東西。1948年主席進入山西之後，發現了問題，就想糾正，但是劉少奇已經形成了不請示主席、自己做決定、自己發文件的習慣了，主席回來了，他也不希望主席再干預了。當時是在戰爭中，為了黨內團結，為了全國的勝利，主席也不便批評劉少奇過多，只是暗示性批評過緊跟劉少奇的楊尚昆，期望楊尚昆提醒劉少奇注意一下。楊尚昆確實提醒過劉少奇，劉少奇點點頭，文件卻還是照發。到後來情形更加嚴重，黨內的重大事情，組織上提拔一個人，劉少奇都自己決定，讓楊尚昆向全國發文。這一情形一直延續到解放後。就是說，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主席一直沒有真正拿回中央的組織人事權。這樣主席和劉少奇就在工作上

⁹刘邦的苦衷：漢高祖11年，淮南王英布叛亂，刘邦正在生病，想讓太子劉盈帶兵平叛，呂后一聽啼哭不止，因為劉盈根本不會打仗。无奈之下，刘邦只好帶病出征。劉少奇不會打仗，所以康老說毛主席自己留在陝北，讓劉少奇過黃河是有刘邦的苦衷。

有矛盾了，而且已經出現了路線色彩，例如土改問題，合作化問題，就是帶有路線性質的。在這類路線問題上，高崗是支持毛主席的，而高崗當時在黨內的地位也很高，所以毛主席調他進京平衡劉少奇。

總理也有不匯報不請示的問題，例如上一章說過的，建國初很多地方工人、農民生活疾苦，情況很嚴重，總理比誰都知情，卻沒有把問題及時向主席匯報，請示主席怎麼解決，而是在秘書室把情況反映給主席之後，在主席的敦促下，才開中央會議討論解決方案。在一些事情上主席也批評過總理，但主席對總理的不滿意，性質上有別於對劉少奇的不滿意。例如，總理主管財經方面的工作，財經方面的問題出了很多，物價漲了，票子發多了，等等。總理說，不是不請示主席，是請示主席就不能幹事了，一個問題就要匯報半天，什麼事情都匯報，那整天都只有匯報了，別的事情就不能做了，只能當機立斷。總理對我們這樣說，是想得到我們的理解甚至同情。他說了很多，我理解總理，因為經濟問題非常具體，不好說清楚，說起來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說完，要講前因后果的。比如要進口什麼東西，就很復雜，從哪裏進呀，用匯呀，等等。這就好比一個公司，什麼事情都要先匯報，等匯報完了，事情也耽誤了。當然，有些問題，總理也是拿不準主席的意見，就回避。例如搞新稅制，搞財金減稅，資本家減稅，國營企業卻要加稅。這一條在主席就行不通，主席認為至少同等，兩免三減半。主席批評總理抓小事，這樣的大事卻抓不好。外交部和軍隊里很多人都替總理說話，說不是總理的責任。後來就追到薄一波，就發生了薄一波錯誤。

高崗好像不很尊重總理的。我進中南海的時候，當時中南海有兩個舞會，一個是主席那里，另一個是總理在紫光閣單獨有個舞會。高崗一來，就在他自己家里也開了舞會，變成了中央有三個舞會。那些舞會跳正統的、規範的交際舞。我當時年輕，也常去參加的。我聽高崗秘書說，高崗叫總理去他那兒參加舞會，就像是指揮部下一樣指揮總理。當然這只是一點跡象，或許不能說明什麼問題。關於高崗和總理的關係，高崗夫人李力群有個回憶，其中有些內容是可作參考的。李力群說，高崗從來就沒有反總理，倒是在毛主席面

前給總理說過不少好話。李力群既然這樣說，就說明當時高崗和總理之間的關係，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有不協調的因素的。高崗主持的經委和總理主持的政務院是平行的，高崗當時還是第一副主席，宋慶齡、李濟深這些民主人士副主席，是擺樣子的，不能定事情的，按工作程序總理也要向高崗匯報的。高崗出問題了，在七屆四中全會受到中央批評，之后立即就有一個“高崗問題座談會”（這兩個會議主席都沒有參加）。這個座談會是周總理主持的，會上陳云他們一大批人揭發高崗這個那個，高崗反駁，周總理不讓他反駁。這也可以反過去證明，高崗之前和總理的關係應該是不融洽。

高崗對於主席調他進京的用意有明顯的判斷錯誤。他當東北王當慣了，到中央以為是主席喜歡他，其實主席是倚重他而已，不是像喜歡林彪、粟裕那樣的喜歡他¹⁰。他在工作上是很有能力，但在物質生活和道德生活上是腐爛的，在東北亂七八糟的事情太多，還搞了一個北歐女人，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細，是不是什麼國家的間諜。主席對腐敗問題一向是深惡痛絕的，他的那些事情主席不會一點不知道，知道了就不會喜歡他。劉少奇不願意搞合作化，要搞一段新民主主義，“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還有亂發文件，這些主席的確也是不滿意的。1953年年底，主席帶人到南方搞憲法，讓大家想一想，提提建議，看中央日常工作怎麼安排。這個時候，高崗誤解了主席的意思，他跟陳云、鄧小平他們私下商量，多設幾個副主席，輪流值班，你一個，我一個。這就等於真理過一步就是謬誤。拉幫結伙，搞宗派在當時是比劉少奇反對搞合作化還要嚴重的錯誤，主席當然也不能放任自流。無論誰，一旦卷入宗派之中，主席打擊起來都是毫不手軟的。這就難免給一些人以利用的機會。劉少奇搞

¹⁰我自己把主席對身邊和黨內、軍內高層的人的態度分成三類：敬重的，喜歡的和倚重的。主席敬重的人可以列出很多，如宋慶齡（主席叫她大姐，慶齡先生），如董必武（主席叫董老），像章士釗、楊度、周穀城，都是主席的舊友，也都可以說是主席敬重的人，但程度有所不同。主席喜歡的人不多，在高層是林彪、鄧小平和粟裕，還有一個羅榮桓。主席喜歡的人一定都倚重，但反過來，倚重的人不一定就喜歡，像周總理、高崗、葉劍英，還有那個許世友，都是主席倚重卻並不喜歡的。

掉高崗，明顯是利用了主席的毫不手軟打擊宗派主義。陳云、鄧小平到主席那里告狀，劉少奇就有了機會，就借機搞名堂，說高崗是分裂黨，還里通外國。這樣，主席也只好把高崗拿下¹¹。高崗當時自殺了，如果不自殺，也許很多事情很快就可以弄清楚，比如“你一個，我一個”這個話，到底是什么一個情況下說出來的？到底是誰說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問題要弄清楚了，也許就沒多大個事了。

劉少奇的人特別喜歡在底下四處散布關於高崗生活上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把高崗講得像魔鬼一樣。高崗的那些事是有，不能說是無中生有。但劉少奇那些人在散播中是夸张過分的。我們秘書室是何載去參加中央會議旁聽的，何載回來后就跟我們大講特講高崗的生活作風問題。後來劉少奇叫何載寫關於高崗問題的社論，何載肚子里東西不多，寫不來社論，就叫我幫他弄，我那時也不知道高層鬥爭那麼復雜，就幫他弄，我弄了好幾個晚上沒有睡覺，弄出個題目來叫“保持黨的團結”。我念初中時就看過斯大林寫的《列寧主義問題》等書，所以很多地方我就根據上面的語言稍作改變就寫到社論里去了。何載為了動員我幫他寫社論，又跟我講了很多高崗的事。

高崗事件確有蘇聯因素。高崗是經常給蘇聯提供情報的，關鍵時刻，蘇聯出賣了高崗，踩了他一腳，把他的材料給了主席。這好像是給主席送禮。高崗說要建立聯邦共和國，美國要打過來，那就如何如何。那其實是底下說說。有人說他給蘇聯提了，跟蘇聯提了那就問題大了。我覺得，說高崗“里通外國”，從黨的原則上來說，也是可以講得通的，因為他是通了外國的。只不過這個外國不是帝

¹¹ “你一個我一個”，現在都說是陳雲自己說的，推給了高崗。這是真是假，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時陳雲說這是高崗拉他下水的時候說的。主席當時也只能根據黨內大多數人揭發的材料來確定高崗案的性質。如果要追究事後的責任，也該是追究陳雲和那些不讓高崗申辯的人的責任，不能只簡單追究主席的判斷錯誤。主席要是黨內正式工作會議上的集體意見都不接受，那他還怎麼工作？即使在文革中，毛主席也沒有像後來其他人污蔑的那樣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任何重大的決定都是經過中央會議通過的，如“516通知”，“文革16條”等都是這樣的。

國主義國家，而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又還要作歷史分析。共產國際剛剛解散，一些習慣的做法是不可能一下子改變的。而且高崗較長時間主政東北，與蘇聯為鄰，為搞好與蘇聯的關係，獲取支援，向蘇聯通報一些情況是在所難免的。但是，說高崗賣國就不能成立，他賣國是不可能的，并且在毛主席提出批評之后，他馬上就不再繼續向蘇聯通報情況了。

劉少奇、王明那時都是親蘇聯的。蘇聯踩高崗一腳是不是劉少奇一派搞的陰謀，讓蘇聯支持劉少奇？這就不好說了。但“莫斯科派”（“國際派”）發揮了作用是無疑問的。戰爭年代，王明是“莫斯科派”的領袖，唯斯大林馬首是瞻。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這些人其實都是“莫斯科派”的。王明搞左傾路線的時候，周恩來、張聞天就是王明的堅決支持者。雖然延安整風后，王明路線不吃香了，王明和他的“莫斯科派”遭到分化，劉少奇成為了毛主席的支持者，周恩來遭受了批評，關向應、任弼時這些人已經轉向了毛主席。但周恩來與王明有那麼深的歷史淵源，怎么可能完全分手呢？解放后他們實際上還是關係很好，而解放后王明在黨內還是很有力量的，“二十八個半”中的人，還在黨內的，好些都還是王明的支持者。王明那時支持劉少奇，周恩來跟王明。這就好像“莫斯科派”又重新集結起來了，只是當年的王明為核心變成了現在的劉少奇為核心了。高崗如果真像事發后傳出的那樣和總理過不去，要打倒總理，而蘇聯又出賣高崗，狠踩他一腳，那主席就是想保他，也是保不住的。降職使用，讓他去當個地委書記，恐怕就是主席當時最大的能力了。高崗要是不自殺，就是去當個地委書記，也還可以東山再起，可是他自殺了，說什么也沒用了。所以，主席對他的自殺是很惋惜、很氣憤的。但主席對他的遺孀李力群和她的孩子都關照不錯。相反，周總理對李力群和她的孩子是有點刻薄的。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主席和總理在對待犯了錯誤的同志方面還是很不同的。

饒漱石的問題和高崗還不一樣，饒漱石案子是完全的冤案。連高崗都說，把饒漱石搞進去，是大冤案。饒漱石調來中央是當組織

部長。組織部原來的部長是李富春，李富春調到政務院後，主持組織部工作的是副部長安子文。主席為什麼不讓安子文直接接任組織部長呢？剛才說過，劉少奇、楊尚昆他們以中央名義發文的問題，並沒有因為毛主席的委婉批評而收斂，違反組織原則一直違反到解放後。後來因為一個重要文件主席發火了，說以後重要文件不經過我的同意，不能以中共中央名義發。我是黨的主席，你們卻發文不經過我的同意。話說到這個程度，就說明主席是忍無可忍了。這個事情華國鋒 1977 年把它公布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里了，其中的《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說的就是這個事，全文如下：

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

一

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

二

(一) 請負責檢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過檢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軍委名義發出的電報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經我看過的（我出巡及患病請假時間內者不算在內）以其結果告我；

(二) 過去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¹²。

安子文也是劉少奇的老部下、心腹大將，他在以副部長身份主持組織部工作期間，行為和楊尚昆如出一轍，在劉少奇的授意之下，

¹²文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80 頁，“一”下的“否則無效”四字加了着重號。編者在這份文件下加了一個注釋：“這是毛澤東同志對劉少奇、楊尚昆的兩次書面批評”。這份文件在近年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沒有了。這是在消滅歷史，同時也是在偽造歷史。

有好多重大的事情都不請示主席，甚至任命省一級的干部都不請示毛主席。安子文當時還犯了很多其他錯誤，例如提倡剝削，公開支持黨員雇工，說黨員不帶頭雇工，群眾就不敢雇工，生產就不能發展；還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占三分之二，我們的黨應該是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的黨……。所以組織部長的位置，主席沒有讓他接，是調來饒漱石接。

饒漱石這個人很不簡單，是很有能力的。他原來是留學蘇聯的，見過斯大林，是“莫斯科派”“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里面的，後來從王明陣營里反出來了。饒漱石上任組織部長後，就了解到安子文私自擬定八大的政治局委員名單——這事很可能是劉少奇授意的，沒有劉少奇的授意，安子文怎麼敢？實際上，劉少奇一直是想插手軍隊的，但軍隊沒有人聽他的，他插不進去，就通過安子文控制下的組織部，在黨內安排自己的人。當時就有傳言，說黨、政、財權都不在主席手里：黨權是在安子文，政權是在彭真，財權是在薄一波。這些都是劉少奇的人。所以組織部那個時候是劉少奇的重要力量。私擬政治局委員名單可是個大事，屬於黨內的小組織（宗派）活動。饒漱石就追查這個事件，追查下去當然要追到劉少奇那里，但是劉少奇不承認，安子文就待他受過，一個人挨批了。劉少奇和饒漱石在新四軍時期就有矛盾，這個事情一出來，兩人的矛盾可能就更加深了。而饒漱石和高崗解放前就沒有工作關係，解放後即使都進京了，也沒有什麼工作上的交叉。劉少奇把饒漱石和高崗綁在一起，實際上不過是因為饒漱石揭露了安子文私定政治局名單，讓安子文替劉少奇受過遭受批判。安子文既然是劉少奇的人，那反安子文，就等於是反劉少奇了。高崗反劉少奇是分裂黨，那饒漱石反安子文也成了分裂黨。就是這麼個邏輯，它暴露了劉少奇的宗派思想。所以，劉少奇對高崗、對饒漱石，都是一點情面都不留的。

饒漱石沒有倒，批判安子文還好，等到饒漱石倒了，說批安子文批錯了，安子文就穩坐了組織部，從副部長變成部長了，權威更高了。換句話說，劉少奇在黨內的力量因為饒漱石的倒臺又加強了。高、繞的案子，在我看來，就是劉少奇搞的名堂。高崗再不好，但

在合作化的問題上，在怎樣對待富農的問題上，都是正確的。劉少奇先就反對辦農業合作社，後來又認為搞合作化向社會主義過渡搞早了，主張搞一段資本主義，主張富農可以入黨，可以雇工，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在這些問題上，高崗和劉少奇有明顯的分歧，而主席是支持高崗，反對劉少奇的。主席在 1953 年 6 月政治局會議上公開但不點名批評過劉少奇，說他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想法，是阻礙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提法不妥，“走向”就是老在走，而沒有達到，或者不想達到（這些批評在 1977 年出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里也有，見“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一文，但後來出的毛主席建國以來文稿就刪除了）。在這種一種情況下，毛主席又是那麼支持高崗，劉少奇不把高崗搞掉，是坐不穩權力的。毛主席對劉少奇右傾思想的批評還進一步反映在高崗事情之後毛主席親自主編的“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之中。該書實際就是批評劉少奇的。主席還在一次中央的會上說，對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辦合作社，這不僅是個方向，而且是當前的任務。這其實也是針對包括劉少奇本人在內的一批人的。而且 1955 年主席說的“小腳女人”表面上是說鄧子恢，實際是批評劉少奇。

主席信了劉少奇他們的，以為高崗、饒漱石真是一起的，就做了一次“黨的鐘馗”，讓劉少奇借了去打高崗、饒漱石。黨內當時是有很多人不信饒漱石和高崗是一起的。所以，毛主席在 1955 年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還在報告里親自出面說服黨代表接受饒漱石是和高崗一起反黨的說法。高崗、饒漱石都是劉少奇搞掉的，他很善于搞這些，不要以為他是傻瓜。主席調鄧小平進京，原意也是用他分劉少奇的權，但鄧小平和劉少奇搞到一起去了，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回頭看歷史，劉少奇、鄧小平都是高饒事件的直接得益者，而毛主席則是最大的受害者。

2、關於彭德懷等批判粟裕

1955 年，彭德懷在中南海的西樓開會鬥爭粟裕，罵粟裕罵的都是很下流的粗話。那是夏天，辦公室的窗戶都開著。我的辦公室離西樓會場的距離是兩部汽車並行的路寬加上人行道，合起來是十幾米，聲音斜傳過來還要再加幾十米，這麼樣的一個距離，彭德懷罵的下流話，我都可以聽到。我打聽了一下，知道是軍委在開會，就在休息的時候有意路過那里看了看，發現主席不在，幾個老帥在，鄧小平也參加了。老帥資格老，坐在前面靠著桌子，彭德懷在那里拍桌子。後來知道，那次是批劉伯承的軍事教條主義，劉伯承是軍事學院的院長，粟裕在這個學院有兼職，受到牽連。彭德懷批粟裕的理由是說粟裕下命令，調動了幾個部隊為解放馬祖作準備。其實，這事粟裕和毛主席講過，毛主席也同意，只是沒有形成文件。彭德懷他們就抓住這一點，說沒有毛主席的簽字，也不給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報告，就下達調動部隊的命令，是有野心，是極端個人主義，是想奪權。

粟裕這個人是很了不起的。黃橋戰役是粟裕指揮的，後來“七戰七捷”，那是不得了的。國民黨五大主力有三個都在那裡對付粟裕，粟裕照樣打勝仗。那時幾乎所有人都打得不好，聶榮臻丟了張家口，李先念打成中原突圍，林彪在東北四平打敗仗。唯獨就是粟裕打勝仗，還是在人家國民黨家門口打勝仗。陳毅也指揮過一個戰役，漣水戰役，結果打了敗仗，後來陳毅就不指揮了。那個張靈甫可是國民黨的第一英雄啊，那時我在上海，國民黨的報紙每天都宣傳他。他打敗陳毅後，向蔣介石吹牛，說共產黨算啥，我這個部隊就能把他們都消滅了。這“第一英雄”也還不是讓粟裕給收拾了！他那個部隊清一色的美式裝備，部隊訓練也好，都不怕死的。所以，打國民黨七十四師，解放軍也死了很多人的。林彪後來說過，那個仗他不敢打。建國後，論戰功，粟裕是應該評為元帥的，可粟裕卻從不爭功。江青對誰都看不上眼，但就是佩服粟裕。《南征北戰》這部

電影是贊美粟裕的，就是江青親自去作指導的。毛主席也是偏愛粟裕的，見了粟裕一天都高興，聽到粟裕來，馬上出來迎接。李銀橋告訴我，淮海戰役後粟裕回中央，主席急急忙忙跑出來接。那是他們自井岡山後第一次見面，主席高興得流淚！

毛主席抉擇抗美援朝的時候，最早是想叫粟裕去朝鮮的。因為指揮過用現代化武器進行大規模戰役的就是粟裕和林彪兩個人，別的人都沒有經驗，彭德懷沒有這個經驗，他那是小米加步槍，劉伯承也沒經驗。在解放戰爭中，繳獲美式現代化武器最多，并把它們用于作戰的，就是林彪的四野和粟裕的三野。他們兩人懂得怎麼運用那些遠程武器來打仗，而且兩人都組織過幾十萬人規模以上的大兵團作戰。粟裕腦袋上留有三塊彈片，時常會頭痛的，當時在住院。盡管如此，粟裕還是願意去朝鮮，但底下人反映他不能去，說他犯病時經常是不省人事的，無法指揮這麼重要的戰爭。最後主席親自給粟裕寫信，讓他安心養病。林彪不願去朝鮮跟美國打仗，就推稱有病，因為那是個苦差事，弄不好一世英名就沒有了。這方面彭德懷是夠英雄的，他就敢去，但回來以後就驕傲了。

彭德懷斗粟裕的時候，聶榮臻、徐向前也都很積極。當時說粟裕是得罪了三個半老帥，那半個是葉劍英。粟裕是只聽毛主席的，其他人怎麼說，他都不管的。所以，彭德懷罵他，說他什麼他都承認，還自我檢討，這樣他們就斗不下去了。不管彭德懷他們怎麼整他，主席還是信任他。毛主席說過：“粟裕是打不倒的，打起仗來我還是用粟裕”。

彭德懷整劉伯承、整粟裕，在政治上是犯了大錯。劉伯承、粟裕底下有多少人啊！他們對彭德懷滿意嗎？事實上當時不但是這些人對彭德懷不滿，而且是黨內普遍對彭德懷有怨氣。1957年，彭德懷又批判粟裕，說粟裕私自發布命令，調志愿軍回國。當時，調志愿軍回國是軍委決定了的，但總參不能發布命令，只有軍委才能發布命令。粟裕是總參謀長，總參發布命令，涉嫌越權。彭德懷是常務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就抓住粟裕這個事情不放，小題大做。粟裕承認越權。其實那只是一個程序問題，不是實質問題，如果不是

軍委已經做了決定，那就是實質問題了。粟裕有了不起的戰功，又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人，毛主席都說粟裕是“大樹將軍”¹³，對這樣一個人搞殘酷鬥爭，彭德懷的做法顯然是不妥的，甚至是犯了眾怒。這也為他後來在廬山會議上“牆倒眾人推”埋下了一個伏筆。

3、兩次高層鬥爭對我思想的觸動

我參加地下黨後，作為基層黨員，看到的黨內同志關係是很好的。那時，我們同國民黨的鬥爭是很激烈、很堅決的。但自己同志之間都是親密無間的，大家像是一家人，像兄弟一樣，誰有什么缺點和錯誤，只要不是原則問題，不傷害黨組織，一般都不太當回事。開生活會，有批評，也有自我批評，沒有什麼你害我，我害你，對哪怕最不好管理的黨員也不會搞什麼揭發鬥爭。黨員之間扯開臉皮，你罵我，我罵你，根本就聞所未聞。錯誤和缺點，領導會批評幾句，在當時的條件下，領導一般也不可能講得很多，只是對要害的問題點到為止。領導一講，我們就懂了，就會注意改正。因此，我那時對黨內鬥爭的激烈程度是沒有什麼體會的。

高崗的事情暴露出來，給我的震驚是非常大的。第一個震驚是我沒有想到黨內高層鬥爭會是會是那樣一種方式，那樣一種驚心動魄。那些平時很受尊敬的領導，相互鬥爭起來是不得了啊。我親眼見到劉少奇和高崗相互斗罵，王光美哭起來了。黨內鬥爭似乎是一個傳統，當它是為了正確的路線，就像延安整風那樣，是公開的，是光明正大的，即使表現很激烈，也不是壞事；當它是為了個人權力和小組織利益，變成搞宗派活動、搞陰謀詭計，那就損害到黨的

¹³ “大樹將軍”典出東漢馮異。東漢劉秀得了江山，論功勞，馮異功勞最大，但他“謙讓不伐”，從不爭功，諸將爭功，劍拔弩張，馮異不參與，總是“獨屏樹下”，軍士們佩服他，都願歸屬他，稱他“大樹將軍”。毛主席1966年發動文革，也是想重用粟裕的，粟裕是唯一一個主席親自指定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的。1967年春，毛主席還在一次會議上表揚粟裕，說“粟裕是我們的大樹將軍”。這無疑是肯定了粟裕的歷史功勞和他對於新中國的無人可以替代的貢獻。

肌體和黨的團結，而且有的時候損害是非常大的。高、饒事件無疑是一次對黨的肌體、對黨的團結的巨大的損害。這一事件的受益者，剛才說過，主要是劉少奇、鄧小平他們這些人。而毛主席其實是受害人，不僅當時就直接損失了自己路線的強有力黨內支持者，而且現在還在蒙受污蔑，還在代劉少奇、鄧小平、陳云這些人受過。

第二個震驚還不是高崗的分裂黨或者里通外國的問題，而是他的腐敗問題。那時我對於他的分裂黨、里通外國的事情，并不是完全能理解和接受，但對於他的腐敗卻是非常反感的。1949年的時候，黨內腐敗問題還像是太陽黑子那樣不明顯，1950年我來秘書室不久為毛主席處理群眾來信來訪，也聽聞到不少黨的干部腐化變質的事情，包括那些軍隊高級將領的夫人來中南海反映的、他們的將軍丈夫和其他一些軍隊高級干部腐化變質的事情；高崗事情一出來，我就聯想到了這些事情，但他們也都沒有高崗那麼嚴重，就是殺了的劉青山、張子善也沒有那麼嚴重。高崗的腐敗一傳下來，我就對黨的看法都有了變化：怎麼會這樣呢？現在有人呼呼給高崗平反，平反不平反，我是不在意的。因為高崗在物質講究上比劉少奇還嚴重，拉幫結派和劉少奇類似，生活作風又嚴重不檢點，憑這幾點要在文革中也是走資派。不過，我希望饒漱石要平反，他是一個貢獻很大的黨的高級干部，黨性強、組織性強、廉潔、光明正大。他是一個真的大冤案啊！不平反對於恢復黨的威信是不好的。

至于彭德懷他們批斗粟裕，它一發生，我就更對黨內一些人和一些事感到失望了。彭德懷戰功赫赫，是元帥，我一向也是很敬佩的。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後，和他在一個院子里面，他去小灶食堂吃飯，我們去吃大灶，經常會在路上遇到他。那條路很窄，只有一個多人寬，兩個人相遇要側身才能過去。我們在路上碰到他的時候，他總是停下來，側身在一邊等著，讓我們先過去。我說，你是大元帥，你先走。他說，不行，你們走，你們走。所以我對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但沒有想到，他對粟裕罵那麼下流的話。戰士都不罵的，一個我們敬佩的首長怎么能罵呢？他可能是口頭語，可是我們聽到就不舒服。

我在搞地下黨的時候，整天被人抓，整天東躲西藏的。突然有一天解放了，誰解放的？粟裕解放的。我的家鄉威海也是他解放的。我可以說是抱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本書，心中裝著保爾·柯察金參加革命的。所以，我這個人有點英雄崇拜情節，粟裕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大英雄。我曾仿司馬遷“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的句子，刻章一枚，上寫“粟裕門下牛馬走”，以表示對他由衷的敬佩。看到彭德懷大罵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我心里是很不滿的。我很驚奇，也很不解，就問何載。何載說，嗨，這個老干部都是這樣的，你不懂，你是個小資產階級。但我和毛主席接觸了十八年，毛主席從來沒有動粗罵人，最難聽的恐怕就是“放屁”，而且居然還能把它寫進詩詞里面去，真可謂化腐朽為神奇。我也沒有聽到周總理罵什么粗野的話。不過，有一次我跟康生說起周總理不說粗野的話時，康生說，嘿，你不知道。康生對周總理更了解，但周總理在和我們的接觸中的確沒有說過粗話。

高饒事件和粟裕蒙難這兩個事情一發生，我就更加有點理解毛主席進城前說的那些話了：“兩個務必”、“進城趕考”、“萬里長征剛走完第一步”、“我們不等做李自成”、“不能當劉宗敏”等等。

1955年我自己還處理過一個高級干部變質案。新疆農墾文工團的一個唱京劇的有名的花旦，一個小姑娘，來告一位很高級別的將軍，說他和她生下孩子后又不管她們母子了。她去找他，他就告訴下面的人說他不認識她，不見。這事情是我和王文兩個人直接處理的，但知情者還有楊尚昆和他的秘書孟繁述。當時，我是科長，王文是我科里的，是支部書記。凡控告這一類的信件，我讓王文具體負責。他把小姑娘告狀的事告訴我之后，我覺得我們兩人級別不夠，聽多了不合適。我就去找楊尚昆的第一大秘書孟繁述匯報，說有人來告某某，我們不好談，你看是不是請楊主任出來見一見？孟繁述也覺得這是大事就立即請示了。可楊尚昆說，你們去談，不要說我，不要答應說領導要見，我也不能見。你們談了以后，寫出來按程序往上報，寫出報告后我再報告主席。但是，我們談了把情況都匯報

給他了，他還是一點動靜沒有，也不給主席匯報。這位姑娘告狀的時候就住在崇文門外花市上三條，見不到中央領導，得不到答復，她就天天到中南海來，比我們上班還來得早。我知道這事兒那位將軍不對，可是我不能處理他。那姑娘又挺可憐的，而楊尚昆到了也沒跟主席說這事，我就自己給新疆打了個電話，找了那里的領導人，叫他們來把小姑娘接走，還叮囑千萬不要報復她，否則再出了什麼問題，比如她想不開了自殺了，那責任追究起來就都要受處分了。後來新疆派來一個副書記接人，問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就對他講，不要多問，她要跟你講，你們也不準擴散，擴散了你們自己恐怕也會有麻煩的。我又勸這個女孩子，調一個單位，找個人結婚，不要再提這個事兒，忘掉，就當做了一場惡夢。她說，我對××（職務）還有感情，不願嫁人。她又問我她能不能回老家。我說，回老家，人家問你孩子哪兒來的，你怎么回答？給你調個地方吧。後來這個女孩沒有再來，可能新疆那邊處理好了。

楊尚比回避，我和王文就只好商量著處理。這件事那位將軍不承認。可人家小姑娘講得有根有據的，將軍身上有什么疤痕，她都講了，不會是捏造的。這事我都不願意再提，真覺得將軍給黨丟臉，他做的還不如一個普通男人，一點兒不負責任，更不如托爾斯泰《復活》里的聶赫留朵夫！

人家最後還知道懺悔呢，將軍卻不知道懺悔。毛主席當時是黨中央的最高領導，群眾來訪他不可能都出來接見。這個級別的人物的事，我不能自己上報主席。而楊尚昆該匯報的卻不匯報。所以，毛主席是不知道的。在我看來，就腐化變質而言，黨內的“高崗”，決不是一個。

高崗事情、粟裕蒙難和這位很高級別的將軍的不齒行徑，以及建國初那些老大姐們反映的高級將軍們的腐化變質和墮落行為，都加在一起，我就開始贊成和擁護毛主席的純潔黨的思想了。所以不久之後，即 1957 年黨內整風運動開始後，我就積極參加整風運動，給秘書室和中辦的一些領導提意見，成為了中南海“八司馬事件”的主要發起人之一。再後來，我也是滿懷熱情和真誠積極投身于毛

主席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造反派也造了那位高級將軍的反，但毛主席不知道他在新疆的那些事還要保他，而且是讓我去保他。我真是不情不願。主席要保我也不敢不保，就出來為他說好話。我對造反派們說：“將軍當年打仗非常英勇，全國的解放，他是有功勞的，他是你們的解放者，也是我的解放者。”將軍為此給我寫過感謝信，用毛筆寫的，寫得很誠懇：“很感謝你在這麼困難的時候幫助我，你講的話非常好，我會永遠記住……”我 1968 年出事后，這封信也被抄走了，估計他們燒了。鄧小平上臺后，這位將軍，當了很大的官。後來去世葬禮很隆重，給他的評價很高。

毛主席發動文革，也是想重用粟裕的。粟裕是唯一由主席親自指定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可是，大概是那三塊彈片的原因，粟裕身體不行，他有幾次打電話給我說，我頭痛的不行，不能來開會，你千萬給我說說，我好了就來參加。

無產階級政黨如何在取得政權之后防范黨的干部腐化變質、黨自身的腐敗變質、不正常的黨內鬥爭和軍內山頭主義等等，對黨的肌體和黨的團結的損害，是無產階級政黨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解決的問題。毛主席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種積極的探索。但最后還是沒有完全解決這些問題。未來的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有勇氣和智慧，找到合適的辦法解決好這些問題，否則即使建立起來了無產階級的政權，也難免遭受黨內腐敗分子和新生的資產階級的顛覆。

第 6 章 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 號召全國人民幫助黨整風

新中國開頭幾年，因為毛主席沒有離開第一線，走得是很踏實的：土改、合作化、三大改造，一步一個腳印，到 1956 年初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大業初見曙光。

不料，1956 年初國際風雲突變，2 月 24 日，赫魯曉夫在蘇共 20 大閉幕之前，作了一個關於斯大林錯誤問題的秘密報告。這個報告雖然沒有向蘇共全黨傳達，但僅過了半個月，美國《紐約時報》就全文刊出。隨後國際上就掀起一個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風暴。1956 年秋季，在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也先後出現了“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其中“匈牙利事件”是比較嚴重的社會動蕩。

新中國不是世外桃源，國際上的風吹草動都會很快在國內引起反響。當時，我國的社會主義基礎還很不牢固。所以，波匈事件一發生，國內一些地方就有跟風的。1957 年初，我國個別地方也出現了“小匈牙利事件”，即一些學生上街游行、奪取電臺、高喊“打倒法西斯”、“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等口號……。這些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須實事求是地承認，解放才剛幾年，一些黨的干部就開始腐化變質，甚至一些高級干部也不例外，高崗和更早的張子善、劉青山是暴露出來並遭受處理的，沒有暴露出來也沒有遭受處理的不知道還有多少，而且一些黨的干部身上官僚主義作風、主觀主義作風也已經相當嚴重，群眾意見很大，社會由此積累了各種各樣的矛盾，為一些人反共、反社會主義提供了口實。

毛主席從來不怕問題、不回避問題，面對這樣一個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政治局面，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大無畏精神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高瞻遠矚，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和 3 月 1 日分兩次，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一個非常開明的內部講話，就正確認識和解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社會矛盾的問題，提出了系統的、精辟的論斷。

這個講話本意就是給群眾民主權，讓群眾講話，支持群眾給黨和黨員干部提意見，也鼓勵民主黨派站出來，幫助共產黨克服官僚主義作風，避免在我國也出現類似“匈牙利事件”那樣的事態。講話出來後，社會反響很好，群眾和民主黨派中的友好人士，都積極響應號召，以各種形式，包括寫大字報，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

反右派運動開始了，為了提供反右派運動的理論指導，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報》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題，發表出來了毛主席的這篇講話。但是，它不是原始講話，它是由胡喬木、田家英和陳伯達等人根據毛主席的原始講話文件修改而來的，與原始講話有很大的不同。

我是現場聆聽過全部講話並做過記錄的，知道原始講話和發表出來的文章之間很大的不同到底是在哪裏。當時聽完講話，講話文件都要交回去，我也沒有保留下原始講話文件。不過，我用自己在上海搞地下黨時自創的“戚氏速記法”，較為完整記錄下了這個講話。平時開會我都是用正常文字記錄，但這次不同，一開始我就被主席的講話吸引，覺得不能漏得太多，就破例啟用自己的速記法。我是很贊成這個講話的，我自己的記錄又不是文件，我就沒有交出這個記錄。後來，我看到過毛主席親筆擬寫的講話提綱的手跡，就抄錄了一份。以下有一個附文，它就是我根據我自己抄錄的毛主席的講話提綱手跡和我的現場速記記錄整理出來的部分內容，可以用來與實際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文章進行對比。對比了就知道，哪些是主席的東西，哪些是他們後來加進去的，哪些是真正的主席的思想，哪些是黨內其他高層領導的意見。

主席當時提的是應該在全國搞民主，沒有什麼反右派，沒有什麼六條，沒有什麼釣魚，都沒有。反右派是後來根據整風運動中右派的乘機進攻的情況加上去的，是主席在這個問題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見補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誠地希望大家幫助黨整風。主席說了，人們總是會有些不同的意見，就是有些不對的，也不要緊，不用怕。發表出來的文章把帶棱角的話都去掉了，這不是主席個人的意見，

而是代表全黨的意見。主席講話後，社會上出來那么多言論，其中很多是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也許主席就覺得自己講話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種上報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動，但改了的東西不如原先的好。胡喬木改的較多，以至于後來胡績偉就揭發說，胡喬木亂改主席講話。但據我所知，胡喬木改稿是根據主席綜合了黨內其他同志的意見后提出的修改意見進行的，不是他自己亂改的。

毛主席的這個開明講話，雖然已過去半個多世紀了，但是對我這個當年在現場的聆聽者來說，卻是言猶在耳。毛主席講話激情洋溢，風趣幽默，各種典故，信手拈來，隨便什麼問題，他借典故一點就通徹透亮。整個講話氣勢非凡，高屋建瓴，振奮人心。大家都全神貫注，生怕少聽了一個字。這個講話，在我看來，不但在當時具有強烈的現實指導作用，就是在今天和將來的相當長的時間里，還是具有偉大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

著名作家、翻譯家傅雷當年也在現場聽了主席的原始講話，他也對主席的講話佩服得五體投地，後來還在一封家信中說到當時激動的心情。他說毛主席“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毛主席胸襟博大，思想自由，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會貫通的人”。逢先知、金沖及他們主編的《毛澤東傳 1949-1976》在頁 641 還引用了傅雷這封家書的部分內容。傅雷看到正式發表的文章就大失所望了。這個翻譯家很是可惜，他真心愛人民，真心擁護毛主席，但他不知道中央上層有那麼復雜的情況。社會上確有右派進攻，主席受到他上下左右人的影響，要平衡各種力量和意見，包括他的那些老戰友、老部下和他們的意見，所以才同意修改他的原始講話，違心放棄一些本來合理的主張。傅雷若是了解和理解了這些情況，或許就不會自殺了。

附文：毛主席 1957 年 2 月底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原始內容（根據戚本禹個人記錄整理）

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發言

毛澤東

同志們：

我今天報告的題目是如何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因為現在我們所碰到的問題，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這個問題占去我們的時間很多。

問題很多

一、兩類矛盾

有兩類問題，兩類矛盾：一類是敵我之間的矛盾，一類是人民之間的矛盾。事實有兩個問題，不單是一個問題。今天重點在人民內部矛盾，談時兩個問題都要談。

兩類問題性質不同，解決方法不同。過去有兩個口號：要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敵我：多少年來，我們講的主要是分清敵我，什么是敵人，什么是我自己。分清是非是將人民內部矛盾，即人民內部的是是非非問題，不是敵我問題。當然敵我問題也是是非問題，這是性質不同的一類是非問題。如我們與蔣美也有是非問題，誰是誰非。是是非非，但性質不同。普通習慣的說法一般說是敵我問題。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是非對抗性矛盾。

?人民日報?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這時，毛主席轉向攝影記者插話說：“你干你的，我干我的。”)這篇文章講了兩種矛盾，但文章主要是說國際方面的問題，講敵我矛盾，很少說人民內部問題。對人民內部問題如何解決，未作分析，只作原則說明。文章說了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的優缺點，講了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的區別。專政管什么？專政管對付與解決敵我之間的矛盾。壓服敵人，不完全是鎮壓。比如不給選舉權、不讓他們自由宣傳、不準自由出版報紙，不讓美帝——他們的主子在我們這里出報紙等等。剝奪他們的言論自由，不給選舉權，這都屬專政範圍的

問題。這是階級對階級的專政，捉、殺、管都要經過人民。人民內部要講民主，不專制，不殺頭。專政不適應人民內部，人民內部的問題不屬於專政範圍。人民不能自己專自己的政。只要不是敵人就是人民，就不適應專政。人民有言論、出版、示威、游行的自由。所以憲法寫了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有領導的民主，不是無政府主義的民主，無政府主義不是人民的要求。

民主有大民主和小民主。波蘭、匈牙利有人主張搞大民主！幾十萬人在街上鬧！專政有少數人對人民的專政，有人民對敵對階級的專政。在歷史上，真正的大民主或民主運動都是對敵對階級的。有些同志，黨內的，有些朋友，黨外的，搞不清這件事。另一些人則是有敵對情緒。比如有人希望用大民主搞跨政府，學匈牙利，整共產黨才開心。有的大學生發表聲明：要殺共產黨，殺幾千，幾萬，甚至幾十萬。說共產黨太厲害，大家活不下去啦！他們想讓我們混不下去，知道其厲害。其實是過甚其辭，真叫他殺，殺不了这么多。叫喊殺共產黨，不過是表示其心理狀態。有人認為我們的民主不如西方。他們思想幼稚，不了解實際，認為西方民主，議會民主好。人民代表大會比議會差。說民主要有兩個黨，一個在臺上，一個在臺下，兩黨互唱對臺戲。有人提出早日取消專政，有人說民主是目的。不同意我們說的民主是手段，或者既是目的又是手段。馬列主義的經驗告訴我們，民主是政治屬於上層建築範疇，為經濟基礎服務。提高人民生活才是目的。政治、文化、思想，所有上層建築都為這個經濟目的服務。有的人一聽說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就不舒服，只有說民主是目的才高興。有人說外國自由很多，我們的自由很少。我說外國的自由并不多。議會自由不過是擺個樣子給人看。世界上沒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階級的自由、具體的自由。保守黨有保守黨的自由，工黨有工黨的自由。保守黨打埃及，工黨不要。就像艾登打埃及的自由，艾登是有自由的，但這是資產階級的自由，是少數人、個別人的自由。抽象一般的自由，世界上沒有這個東西。艾登有艾登的自由，納賽爾有納賽爾自由，要看什么階級什么集團。所以世界上只有階級和集團的自由，沒有抽象的自由。

思想問題是人民內部問題，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來解決。用粗方法來解決思想問題，來處理人民內部問題是錯誤的。以行政命令和武斷壓制的方法解決這些問題是沒有效力和有害的。宗教也是思想範圍的問題。也不能以行政命令方法解決。唯心主義不能強制人家不信。思想問題應採取討論、辯論、批評、教育、說服的辦法，使人們相信你。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應該放在哪一類矛盾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中沒有談到。民族資產階級問題不應放在第一類敵我矛盾里。民族資產階級問題應放在第二類人民內部矛盾里，因為它不是敵我矛盾一類。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擁護憲法。接受社會主義，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這時，毛主席對服務員說。“茶水沒喝完，別倒掉，要節約。”）民族資產階級與地主、官僚帝國主義不同。民族資產階級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是對抗性的兩個階級，但對抗性處理恰當，可以轉化為非對抗性。由第一類對抗矛盾轉化為第二類非對抗矛盾。非對抗性，如果處理失當，如果不採取團結改造的方法。則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勢必走向對抗，成為第一類矛盾。由第一類變成第二類矛盾的辦法，是要按實際情況辦事。在中國，資產階級有反對帝國主義的特點，所以是民族資產階級。

現在講人民內部矛盾如何處理的問題。這是個新問題，歷史上沒有突出過，所以馬克思恩格斯講得很少。列寧也是簡單說到過，他說到社會主義時，對抗消滅，矛盾存在。即人民內部還有矛盾。列寧雖然說社會主義還有矛盾，但他沒來得及全面分析這個問題。例如人民內部矛盾有否可能轉化成對抗性矛盾？應該是有可能的，但列寧卻沒有能詳細考察這個問題。這是因為時間來不及。十月革命後不久，列寧就死了，時間太短。斯大林在很長時期內，把敵我和人民內部這兩類矛盾混淆起來了。分明是人民內部矛盾，如人民不滿意政府，批評共產黨，這是人民內部的批評，應與敵人的攻擊有分別，斯大林卻在很長時期內對兩者的情況不加分別。這是蘇聯同志說的。他們說，那個時候，只能說好，不能說壞，只能歌功頌德，不能提出批評，誰批評了黨和政府就是敵人，就有坐班房和殺頭的

危險。兩類矛盾容易混淆。把兩類矛盾混淆，我們也干過。在肅反中我們有些地方把好人看成壞人，把本來不是反革命的人當反革命來斗争。有沒有，有。從前有，現在也還有這類問題。但我們有一條：有錯必糾，斗錯了要平反。並且從延安時就有內部規定，機關、學校、部隊、團體對反革命不管真假大小都一個不殺。現在這一條雖然法律上不規定（因為極少數還要殺），實際上大多數是不殺的。這一條好，錯了有挽回余地。兩類矛盾容易混淆。在這個問題上容易產生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右傾。即認敵為我，不分敵我。現在還有。廣大人民看是敵人，他們是朋友。我這裡有一個材料，有人提議釋放國民黨大特務康澤。這人是襄陽市的人民代表，原來在襄陽工作過，過去與康澤是朋友，他在康澤問題上思想感情就與廣大人民不相同。還有人老替帝國主義說好話。簡直是美國月亮都比中國好。其實美國月亮和中國月亮都一樣，我贊成它是一個月亮。美國月亮比中國好我不相信，不贊成。為什麼會好呢？在這個問題上的另一種傾向是左傾，帶括號的左。這些人過分強調敵我矛盾，強調敵我矛盾過份。斯大林就是這樣，我們也有人這樣。過分強調敵我矛盾就把人民內部矛盾當成敵我矛盾。在肅反中常會出現這種“左”的傾向。這是括號中之左。

怎樣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呢？1942年延安整風時，我們提出過“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這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方針。

我們提出的這個公式，詳細地說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和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了新的團結。當時提出這個公式是為了解決黨內教條主義與廣大同志的矛盾、教條主義與馬列主義的矛盾。教條主義是從西天取回來的經。西天就是斯大林那里，即是從斯大林那里傳來的，他們處理內部矛盾的方針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與我們是不同的。我們處理內部矛盾不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是以牙還牙。我們用的方針是團結方針，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達到團結的目的，這是1942年整風運動中提出來的，經過三年。到1945年達到了全黨團結的目的。

為什麼要有第一個團結愿望呢？因為沒有這第一個團結愿望，批

評鬥爭就斗亂了。然后就不可收拾，那還不是無情鬥爭，嚴厲打擊！沒有團結的主觀愿望和思想準備不行。因此這個公式必定要把團結的愿望放在第一。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後來推廣到黨外。到北京我聽說民主黨派處理內部問題也採取這個方針，不是要么是你，要么是我，你死我活。以后，對工商業界用這種辦法也靈。1955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第一次工商會議，他們團結批評了一個月，結果很好，未傷感情，把問題解決了。所以對資本家也可以採取這個方法，對剝削階級也可以採取這方法。不過我看對臺灣采用這個方法有困難，現在臺灣蔣介石與胡適斗法，對他們這樣的剝削者不適用。因為工商業者與他們是兩類剝削者，對前者可以用，對他們不適用，道不同，不和謀。對他們從團結到團結不可能。對民族資產階級從團結到團結有可能。對犯錯誤的人，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宗教界、唯心主義者都可以用這個方法，推廣這個方法。整個人民內部、學校、工廠、商店、機關都可用這個方法，還可以推廣到對解除武裝的敵人即俘虜，對他們也可以用這個方法。沒解除武裝的不行，對沒有解除武裝的，還必須兵對兵，將對將，你死我活。對已解除武裝，可以用這個方法。對勞改犯，對解除武器的特務也可以用這個方法改造他。改造就是從團結愿望出發，你還要他活，不消滅他。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國務會上講了十余條，十條中二條，一條是敵我關係，一條是非關係，講的就是兩類矛盾。所謂是非關係就是人民內部矛盾，是內部的相互矛盾關係。半個鐘頭講了一個問題，這是開場。

二、肅反問題

這是第一類矛盾，敵我矛盾問題。比較起來，我們國家的肅反工作做得怎樣呢？是很好還是很壞呢，我看我們比起蘇聯、匈牙利做得好。蘇聯太左，我們不是比別人特別聰明，而是自己左過。我們過去在南方根據地學蘇聯的辦法，吃過虧，後來取得了經驗，糾正了。因為有了經驗，所以比別的國家做得好一些。在延安時我們就規定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到北京又有許多進步，雖然有缺點錯誤，但我們和蘇聯是兩條路線。斯大林時期蘇聯的肅反路線不好。但也

有兩面。一面肅清了反革命，這是對的。一面抓錯了，殺錯了許多人，其中還有很多重要人物，這不好。聯共十七大，50%的中央委員，8%的大會代表受牽連。我們有基于此，沒干這些事。過去殺錯的也有，1950~1952年也有殺錯的，殺五類反革命也有殺錯的，但根本沒有錯。肅反總共殺了70萬，前年殺了7萬。去年殺得少。

人們說我們反復無常，“早知今日，何必當初”。1950~1952年我們大約殺了70萬人，香港報紙說殺了2000萬，多了1930萬，“紂之不善。不如斯之甚也”。也不必對帳了。哪里有幾千萬，70萬則有之。

殺一些反革命是解放生產力，不殺他們人民出不了頭。他們都是些霸王、南霸天、西霸天之類的。殺了他們解放了生產力。這是人民要殺的。現在有的朋友要翻這個案，翻不得！翻了農民要拿扁擔、工人要拿鐵條打我們，這是吃不消的。

匈牙利對反革命是根本未肅清，對革命同志倒錯殺了幾個，像伊拉克。反革命殺得少所以出了今天的反革命事件。外國人也覺得是如此。匈牙利事件後，我們國家穩固。外國人也說我們穩固。我們自己也覺得穩固。匈牙利事件後，中國有沒有風波？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小波浪，春風吹微波，引起大波浪沒有？沒有。為什麼？很多原因，肅了反，反革命沒剩下幾個。還有幾個，但很少，這是原因之一。

匈牙利事件沒有在中國引起大波浪，第一條是我們的黨是經過幾十年革命鬥爭鍛煉出來的。我們的軍隊和干部隊伍也都經過了革命鬥爭和鍛煉。黨在人民中生根，軍隊有戰鬥力。政權是從根據地發展起來的，不是突然解放的。民主人士經過鬥爭和鍛煉，他們長期與黨共患難。中國學生經過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的鍛煉。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傳統。總之，人民經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長期鬥爭的鍛煉，包括知識分子都在進行教育、改造。再有反革命肅清得差不多了，這些條件匈牙利都沒有。當然還有別的因素，比如經濟措施，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改造，團結民主黨派，正確的少數民族政策等。

現在我們的大學生 80%左右是地主、富農、資本家的子女。匈牙利大學生 60%是工農子女。但他們大游行反對政府，我們的地主、富農、資本家子女擁護我們。我們沒有裴多菲俱樂部，除了少數人講怪話，絕大多數是愛國主義者，贊成社會主義，都有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理想，都想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比較起來我們的肅反方針沒有蘇聯的左，也沒有匈牙利的右。我們的方針是“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有沒有過火，有沒有漏掉？有。但因為我們採取的是依靠群眾的肅反路線。雖然有毛病，但比較好，比蘇聯公安部單槍匹馬的好。群眾經過鬥爭得了經驗。搞錯了，有犯錯誤的經驗；搞對了，也有搞對了的經驗。這些都可以拿來教育自己。

我們希望肅反工作所有的毛病都能加以糾正。中央已發指示糾正肅反中的錯誤。中央決定分步驟地在今明年搞個肅反工作大檢查。我們建議這次要全面檢查一次，從中總結經驗。此項檢查，中央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和全國政協主持，地方由地方人大常委和地方政協主持。個別檢查收效不大。有人已寫信向我們反映過。

我們的目的，這次全面檢查的要求：(1)不要潑冷水，要幫助他們，幫助那些參加肅反工作的干部。潑冷水不好。不要使干部抬不起頭來。(2)有錯必糾。包括公安、檢察、保衛、勞改部門的工作；都有許多毛病，有毛病就要糾正。這次檢查由人大、政協領導主持。人民代表、政協委員都參加，把肅反工作全面檢查一次。這對法制工作很有幫助，省、市、地方人民代表、政協委員凡身體好的都參加。

總的情況是還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這兩句話表明了兩個意思。

第一句話是“還有反革命”。有人說沒有反革命了，可以把枕頭整得高高地睡大覺了，天下太平。這不對。地球上的中國北京清華大學，有個黨支部副書記。(叫什么，應該給他揚揚名)哦，叫馬國風，秘密寫了很多標語，到處張貼，反對蘇聯干涉匈牙利。事實上是這個共產黨員贊成匈牙利反革命暴動，贊成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支

持匈牙利的反革命。所以肯定有反革命，這就是個漏網的。當然，查下來這人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只是有反動思想，反動行為，不一定是反革命，不一定是蔣美派來又留下來讀書的。北京學校里的反動標語不少，沒有反革命了的思想不對。第二句話是“但不多了”。不多就是很少了，這兩句話都應該肯定，不肯定第二句話的結果會搞亂。反革命很少，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的反革命。總之不多。

是否大赦？很多朋友對此問題大有興趣，很好。但我是消極分子，對大赦我不積極，沒興趣。這就不免和有的朋友有點小摩擦。大赦可赦不得。有人說，“憲法有規定國家主席有權大赦，可你毛主席又不赦”。是，我有權利，但我不主張大赦。我們可以多做些赦免文章，但不要這大赦名義。大赦就是全部赦放。如果大赦了，康澤等人放出來，老百姓反對，犯人也要講話，大的犯人赦了，小的犯人也要赦。公安部、人民法庭都可以不要了。有人說臺灣的蔣介石都可以赦，為什麼康澤不能赦？誰說蔣介石可以赦，人大未作決議，我也沒發布命令。我們是建議：臺灣起義，祖國統一。向傅作義將軍學習，取得赦免權。最近我不稱蔣介石匪了，可是蔣介石依稱我們匪。他們對民主人士也不客氣，稱張治中為張逆治中。大赦不得，是否就一個不放了？不，放，今天放一個，明天放一個。陰放一個，陽放一個，只是不發報。不宣場。

溥儀怎樣處理？人家是皇帝，是我的頂頭上司，上 45 歲的人都是他統治下的臣民，但是他得罪了人民。將來要放，現在不能放。現在放了，人民不諒解，無益，對他沒好處。那麼請他參觀參觀，看看報，研究研究問題。請他參觀天安門、工廠、大橋，也可以在人民監督下做點工作。改悔較好的犯人逐步放一些，但不要登報，這些都要取得人民的同意。人民要是反對我們就不得了啦，他們拿起扁擔、鐵條，打我們，我們是受不了的。我們這些人都是手無縛雞之力。

三、社會主義改造

農業合作化。去年下半年，在高潮熱情過去以後，人們冷靜地想一想又發生了問題。上半年優越性很大，下半年優越性就沒有了。

來了一陣風，不是臺風，是小風，春風吹微波，說合作化不行。今天文件中有一個王國藩合作社，這是個團結起來艱苦奮斗的好典型。合作社一定要在艱苦奮鬥中成長，什麼事情都有困難，新事物的成長發展都要經歷曲折和困難的道路。人民不習慣集體生活，特別是富裕中農，最不習慣。擁護合作化的是貧農、下中農。對合作化不滿的，除了地主、富農就是富裕中農。很不滿的占全體農民的1-5%。因為合作化頭幾年干得比他們單干時要差，不能雇工，生產、生活又不合他們的意。合作社要多少時間方能鞏固？大概要五年時間。全國大多數合作社歷史才一年多，一年多時間要那麼好不行，要五年時間才能逐步鞏固，減掉去年一年，還要四年。王國藩的合作社在熱河遵化縣，靠近長城，他們的合作社辦了五年才鞏固。農民生活有沒有改善？有改善。解放以來，農村共增產1千4百億斤糧食，1949年糧食產量有2千2百億斤，增產1千4百億斤，就達到3千6百幾十億斤。因此農民生活有相當大的改善。說農民生活沒改善並不是事實。但一部分農民還沒改善，還有缺糧戶。缺糧戶大約占農戶的5~10%，還要三四年，缺糧戶才能消滅。那時才能只統購不統銷。幾年內只增產不增購。現有的糧食大部分是統購來的，公糧只是小部分，兩項加在一起共有812億斤糧食，在農村銷了390~400億斤，400多億斤作為供應城市和出口預備糧。這樣農民手中還有不少糧食，說農民生活沒改善不是事實。現在下面一片叫苦聲，有的干部也這樣講，他們實際是代表富裕中農立場。干部家屬回家後變了富裕中農，影響很厲害。民主人士也受其影響，民主人士也有富裕中農親戚。說合作化沒有優越性。我看合作化還是有優越性。你們看王國藩的合作社就有優越性。

為什麼波蘭、匈牙利搞起來的合作社今年一陣風吹去了大部分？哥穆爾卡演說前波蘭有1萬幾千個合作社，現在一萬多個吹沒了，只剩下1000多個，削去了90%，匈牙利也一樣。

我們所以能搞起合作社，而且這樣快，有這幾個原因：

- (1)中國地少人多，窮得要命，合起來比較好。
- (2)我們黨對合作社採取了分幾步的方針，逐步走。

我們國家與蘇聯不同，蘇聯合作社後幾年不增產，我多年增產，去年增產 200 億斤。

地主、富農、富裕中農叫苦，影響黨內外一些人跟著他們叫。還有一部分缺糧戶也叫，他們是真正生活苦。

再就是城鄉比較，工人與農民生活懸殊的說法。

現在農民平均年收入 60 元，有高於 60 元的，有低於 60 元的。低於 60 元的有 40~50 元的，有低於 30 元的。30 元的很困難。我還聽說有一家四口 58 元過一年的，這是最困難的了。也有一家年收入 100 多元、200 多元的。甚至有 1000 元的，有一家 4 口人，年收入 4000 元。這樣發展下去。幾年后你們看工人比農民苦，農民比工人富。

工人中的粗工工資不適當，一個人一月 30 元。工資不適當，刺激了農民。農民與工人，城市與鄉村生活不同，農民一家六口，平均每人年收入 60 元，可以過生活了。如果人均年收入 240 元，那生活就相當好了。鄉村里很多東西不用花錢買，城市里樣樣都要錢，把兩種情況混起來不適當。

四、關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改造

對這問題我沒有研究，但鼻子也聞到了一點氣味。這方面也有小風波，也是春風吹綠波。比如說資產階級不需要改造了，說資產階級跟工人、農民差不多了，不需要改造。少數人還問工人為什麼可以不改造？誰說工人可以不改造！“階級鬥爭改造整個社會，也改造了工人自己。”這是恩格斯說的話，工人為什麼也要改造呢？這是因為“無產階級不解放全人類，就不能解放自己。”這是我們的戰略方針。工人階級不解放六億人，自己也不能解放。我們在座的人每年都有進步，就是改造來的。

我自己從前是知識分子，信過佛教（毛主席指著在座的趙樸初說，“就是你們的教，我信過”。）拜過菩薩，跟著母親到南岳還願，也信過無政府主義，那時我想無政府主義多好啊。還信過康德的唯心論。我這個人多復雜啊。後來馬列主義把我的腦子改變了一下。幾十年了，主要在階級鬥爭中改造自己啊。難道資產階級就不需要

改造了？資產階級就那麼高明？我都需要改造，你不要改造！有人說，“資產階級沒有兩面性，只有一面性”這是形而上學的觀點。事物總有兩面性，有優點，有缺點。只有一面不能反映事物的全面。而且現在資產階級還沒摘帽子，即使摘了帽子，還要思想改造。大家都需要學習。全體工作人員也要學習，學習是大多數工商業者的願望。不學習，不合乎多數人的願望。有人參加了四十天學習，感到自己學習以後思想面貌一新，與大家有了共同語言，不像過去互相間貌合神離，同床異夢。

有人害怕改造。美國把我們的改造叫洗腦筋。其實美國才是真正洗腦筋，我們還文明點。照資產階級不需要改造的理論，連憲法都要修改。因為資產階級和工人一樣了，那麼憲法上的工人階級領導也要取消，都一樣了，還領導什麼？要聲明一下，這種不需要改造的說法不是大多數人的意見。

五、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問題

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同全國六億人民一樣都有很大進步。工人、農民有很大進步，商業者有很大進步，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也有很大進步。但也有些學生有不正確思想。他們討厭馬克思主義，刮歪風，發怪議論。他們只顧鑽研業務，念書只為了將來多掙薪水、吃飯、討老婆、生孩子。什麼政治理論、國家前途、人類理想都不需要，馬列主義也不頂事了。好像從去年下半年起，這些都不時興了。對他們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知識分子，青年學生要進一步改造自己，不要逃避改造。過去的改造方式有些粗糙，傷了人。這要改進，每個人都要努力學習。除了專業知識外，思想政治也要有所進步。學一點政治，學一點馬列主義理論很必要。沒有政治思想，就等於沒有靈魂，認為只靠專業知識，就行了，就一輩子吃不完，這是不對的。最近是政治工作減弱，高教部應管政治工作，青年團也應管政治。過去講三育（德育、智育、體育）現在有些人只要二育（智育、體育），不要德育，這不對。所謂德育，指學習馬列主義，學政治。重視政治工作，德育、智育、體育三者都要。高教部不管政治工作不對，應該管。黨和青年團也要管，要有德育。

六、增產節約，反對鋪張浪費

“反對鋪張浪費又來了。共產黨就這一套，過幾月就沒事了。”是不是這樣？反對鋪張浪費真的只有一次。僅僅在三反運動時整了一次，以後沒有再反。1955年提倡節約主要是為了解決非生產性基礎建設的浪費問題，目的是降低生產成本。這一次節約搞得對。全國共節約了20個億。但也有節約不當的，影響了工程質量。但許多工程成本降低了，總的說來成績還是很大的。這一次節約別的部門沒搞。現在是在全國範圍內搞增產節約，這不，剛一開始，沙發地氈、桌椅就沒人要了。這次要徹底，今年搞不完明年再來。就像洗臉一樣，各位洗臉一年洗一次嗎？據我所知，每人一天至少洗一次，還有洗兩次的。為什麼？為了尊容漂亮起見，每人天天都要洗臉。反對鋪張浪費，倒不能經常進行呢？反對鋪張浪費和洗臉一樣要經常進行。不是一年一次，一星期一次，而是要經常進行。人不是別的動物，而是高級動物，每天要洗臉。全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各黨派人士，總之全國六億人民都要像每天洗臉一樣，來一個增產節約，反對鋪張浪費。去年評級出了毛病，有些人升官發財思想大發展，無非是爭名奪利，爭名于朝，爭利于市。這些人也要洗臉。

七、統籌兼顧、合理安排

這是一個戰略方針。我們做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六億人口出發。這一點是全世界各國沒有的。要提倡節育，有計劃地生育。我看人類對自己最不會管理。生產棉花、布匹都有計劃。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計劃。人對什麼都有計劃，就是對生孩子沒計劃。無政府主義、無領導、無組織、無紀律。這樣下去人類要趨于滅亡，提前否定自己、消滅自己。如果中國六億人增加個十倍，到60億，那時，小孩多，人口多，加以衛生條件好，有防疫針打，大家都年高德劭，又都是大學專科畢業的專家，文化上也比我們高明，豈不很好。可是人多吃得多了，60億人到時候沒東西吃可不得了！李德全部長也很注意這個問題。我建議政府設立一個部門，叫生育計劃部好不好？設個委員會也行，叫節育委員會。也可以組織一個人民團體管這件事。還要撥一筆經費，作為加強宣傳和解決節育的技術問題的費

用，這些就不多講了。（少奇同志插話：生育要有計劃，一對夫妻生三個孩子就是錯誤，生四個嚴重錯誤。）

我講戰略方針。要認真救災。全國有很多災，每年有災，要撥糧，給他們救濟糧。要搞好統銷，統銷蘇聯沒做過，我們在全國有計劃地統銷糧食。還有安排就業，統戰方針，所有這些都是統籌兼顧、合理安排。去年就安排 300 萬人就業，按計劃，只能安排 80 萬人，多了 220 萬人，因此麻煩很大。工資出去了，發了 1800 萬人的工資，增加了 300 萬人。失業只能逐步消滅，還不能完全消滅。廣州、上海失業的人很多，要想辦法。有人提出三個人飯五個人吃，可以考慮。人口多薪金低，我們高級人員是十年不增薪，死不了人。以不死人為原則。連年高德劭的也不增薪，這是因為今年計劃中那點錢，只能辦這點事，所以年高德劭的也不增薪。我提出這個意見有些犯眾，但死不了人。要增，給下面的同志增一點。

學生問題怎麼辦？40% 的學齡兒童，到了學齡上不了學，人民政府不是萬能政府，人民政府不能一步登天。另外，今年還有 400 萬高中畢業生升不了中學。沒地方、沒經費。有 80 萬初中生升不了高中，9 萬高中生升不了大學（這些統計數字不一致，早晚市價不同），大學生升不了科學院。就業也成了問題，80 萬人等待就業！這麼許多人等待安排。就象排隊買豬肉一樣。等在那裡。這是相當大的問題，大家討論討論。今年國家的錢就這么多，只能安排這些，怎麼辦？

八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對人民內部矛盾，列寧說過，對抗消滅，矛盾存在。斯大林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小冊子里說沒有矛盾。列寧那時不能全面考察問題。斯大林長期不承認社會主義有矛盾。但他在 1952 年寫了一本？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書中承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有矛盾，處理好可以不對抗，不發生衝突，處理不好會發生衝突。他已看出了這一點。

蘇聯建國 40 年，我們落后于蘇聯許多年。我們 1927 年開始在一些地方建立根基地，也有了 30 年的經驗。根據蘇聯和我們的經驗，應該肯定社會主義矛盾的存在。基本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

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這都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集體、個人之間矛盾。社會主義沒有剝削，都是公有制，不過分全民、集體兩種罷了。斯大林不承認矛盾的提法缺乏辯證法，嚴重違反了辯證唯物主義。我們在《人民日報》的文章中說他犯了局部錯誤。就是指這一點。在他影響下《簡明哲學字典》（尤金主編的）同一性這一條引用形式邏輯的同一來分析哲學上的同一性，沒有弄清形式邏輯的同一和辯證邏輯同一性的區別。說什么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戰爭與和平、生與死等等矛盾都沒有同一性。恩格斯講述沒有對立就沒有統一，實際上對立的東西不能沒有統一，只有鬥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戰爭與和平、生與死都有同一性，否則就是錯誤的。斯大林死后蘇聯哲學界在這些問題的看法上有所改變。斯大林時代蘇聯哲學界有相當嚴重的形而上學觀點。資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就無產階級。資產者、無產者不變化，戰爭與和平、生與死不能變化。我們的說法不同。我們認為資產者可以轉化為無產者，無產者可以轉化為資產者，戰爭可以轉化為和平，和平可以轉化為戰爭，生可以轉化為死，死可以轉化為生。盡管斯大林在哲學上形而上學，否認對立的變化，但後來他在《論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書上說社會主義有矛盾，處理不好矛盾會轉化為對抗。這就對了。實際上斯大林是差差答答地承認了辯證法，吞吞吐吐地承認了辯證法。

應該說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矛盾都是存在的。政治、法律、哲學、意識形態都應當為經濟基礎服務，要符合經濟基礎發展的要求，不符合就要發生衝突。

承認社會主義有矛盾，就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毒草也可能放出來；百家爭鳴，唯心主義也可以爭鳴。只要不破壞團結，不秘密組織團體，開放一點可以。我們國家面積大，有 960 多萬平方公里，開放那麼一點不要緊。

香花和毒草。百花中本來就有野草閑花，還有毒草。只要糧食大米，不要野草不行。每年農民都要除草，年年這樣。禁止一切野

草生長不行，下命令不準一切野草生長也不行。事實上有野草就會有毒草。只許香花生長不許野草生長是教條主義。教條主義本身就不是香花，不是馬列主義，它是小資產階級的東西，方法上是形而上學，對社會、對事物不作具體分析。形而上學老早即有，特別在資本主義時代大發展，中國也有。

香花與毒草難分別。新生事物在生長過程中都要遭受打擊，都要經歷這種困難的道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直到現在還被人認為是野草和毒草。同盟會、孫中山在清末也被認為是毒草。共產黨長期來被稱為匪、土匪。對我們這裡開會的人，香港、臺灣仍稱之為匪，即毒草。孔夫子老先生一生不得志，當時他也是一顆野草。耶穌當時也為社會所不容。釋迦牟尼，佛教的開創人，開始時社會上對他亦不歡迎。馬丁·路德的新教開頭也不為社會所承認，被看作是毒草。？西游記里的孫行者為何被封個弼馬溫，就是玉皇大帝們認為他是毒草，但他對自己的監定是齊天大聖。封建社會有出戲，大英雄薛仁貴封了個虎頭軍，那是他的對頭張士貴對他的監定。歐洲天文學家哥白尼的天文學著作，生前都不能出版，死后才被承認。伽利略也一樣。達爾文的進化論開始人家也不承認。我看過一本科學家的傳記，安眠藥的發明歷史就很曲折。在法國先有了名，中國第一個吃的是李烈鈞。吃後，說是好東西，李烈鈞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死了。後來美國舞蹈家鄧肯生第二個孩子時吃了安眠藥，減輕了痛苦，這才推廣。這一切說明世界上一切科學發明、一切新事物的成長，都會有困難。司馬遷寫的史記？，開始也不被承認。只好藏之名山，後來才傳諸後人。新生力量被社會承認，要經過艱苦奮鬥，一帆風順是不可能的，越困難越堅強，越順利越脆弱。我們的社會是新社會，但新事物也會碰到頑固保守力量的壓制，還是有困難。死官僚、頑固勢力是新生力量的對頭。應該說在新社會里新事物的成長比舊社會條件要好。但新生事物被社會承認，也要經過艱苦奮鬥。沒有艱苦奮鬥，沒有與困難打擊的鬥爭，新生力量永遠成長不了。這是歷史規律。

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也有很多問題。斯大林本來是香花，

赫魯曉夫一棒子打下去變成了毒草。現在又香了一點了。

最近，有些批評有問題。鐘惦棐用假名字寫文章：?電影的鑼鼓？否定一切，影響很大，臺灣很欣賞，全文轉載。陳沂及其部下陳其通四人一月十七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懷疑百花齊放，說百花齊放也沒見大作品。這樣的結論過早。陸定一百花齊放的文章去年七月才發表，離陳沂同志一月的文章時間才五個月，百花齊放的大作品怎麼寫得贏？對這種意見，在全國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我表示不贊成。?人民日報？至今沒有發表文章反批評。是什么意思，不贊成我嗎？或者有困難？有困難應請示中央呀，這里有沒有？人民日報？的問題？

鐘惦棐是右派，這幾個同志是左派，為黨為國忠心耿耿。他們怕百花齊放後文藝界會出問題，他們對形勢估計錯了。那文章，我不敢領教。現在四個人作了檢討，陳沂在?文藝報？第四期上也表了態。他們的過去還是好的。?文藝報？不登陸定一的文章，登了陳沂的文章。臺灣喜歡鐘惦棐的文章。發出來了。在外國，羅馬尼亞發了陸定一的文章，?真理報？不登。陳沂的文章？其理報？喜歡，登出來了。這也好。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各人喜歡各人的東西，教條主義喜歡教條主義，機會主義喜歡機會主義。這種現象恐怕值得評論一下吧。有個青年作家叫王蒙，大概是王明的兄弟吧，原來是工廠的團支部書記，寫了一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小說），也發生了問題，有贊成的，有反對的。黨員與黨員打架。有人說這篇東西一無是處。其中有馬寒冰。還有人批評說北京是中央所在地，沒官僚主義，典型環境選得不當，那麼說是地點選得不好，如果選上海就較妥當。馬列主義我看得少，沒有中央所在地不出官僚主義的說法。中央還是會有官僚主義。過去中央就出了陳獨秀、李立三、王明、高饒等。這樣的批評不對。馬列主義要從實際情況出發，馬列主義還要發展，不是說過就完了，還要繼續發展，按具體情況有所發展。教條主義不是馬列主義。

中國六億人口，是個小資產階級的大王國，農民五億，手工業者二千多萬。小商販五千萬。資產階級五十萬人。小資產階級五億

七千萬人，這是客觀存在，這些人一點意見不讓發表，那怎麼行？

嘴有兩個作用，一個吃飯。一個講話（發表意見），只準吃飯不準講話，怎麼辦得到！中國是個小資產的大國，從存在出發，小資產階級意識一定要反映。他們千方百計要頑強地表現自己，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要長期地耐心地進行教育，不能用壓制的辦法讓他們不表現，只能在表現時與之辯論。寫文章批評，不能形而上學。要有充分的說服力。要有辯證法。

老干部能不能批評？在馬克思主義書上從來沒說批評有新老干部之分。或者只能批評新的干部，不能批評老的干部。憲法規定，人民在法律上平等。黨員與非共產黨員在犯錯誤的問題上也應該平等。老干部因為老了就獲得了不受批評的權力，我看不行。活時不批評，死了也要批評。孔夫子死了幾千年還受批評。五四運動就提出“打倒孔家店”。現在孔夫子好了點。斯大林死了也被批評，批評是不能分官職大小、老幼長短的，死活都可批評，錯了即挨批。

靠老資格吃板。老資格可以吃板。就是因為老，活了老大年紀沒有死，即有一種資格，可以吃飯。老資格有種作用，跑龍套，搖旗吶喊，能起這個作用。（鼓掌）80 歲也能起這種作用。在座的梅蘭芳，（毛主席插問：來了沒有？）80 多歲還可以跑龍套。《西廂記》我唱紅娘不行，唱老太太行。我唱主角不行，主角是周總理。都是你唱，也不行，大家要趕你走。老者只可以唱一回。但老資格不管怎麼老，辦事要正確。活到 99 歲都正難，到 100 歲犯了錯誤，做了個大混蛋也不行。拉科西就是如此。一個人不能因老資格辦錯了事不受批評。

新干部有一樣，青年的缺點也應該批評教育。比較起來對青年人應同情。列寧說青年人因為年輕，上帝會原諒他們。在《左派幼稚病》的書里說的。上帝所以會原諒他們，就是因為他們年輕。對老年人應該嚴格一點。對青年也要嚴格，但要幫助，要長期耐心的教育。否則，只對青年嚴，老太爺就太舒服了，不好。

許多人不贊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同意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高級干部中十個人中九個不贊成。或半贊成，對這個方針思想不通。真正思想通了的同志是少數。對唯心論應該給

以批評，對文藝中小資產階級傾向的東西也應批評。但批評要適當，要有說服力。不能用形而上學的方法。教條主義的批評解決不了問題，不但不解決問題還會助長不好的東西。我們的批評是人民內部的批評。這是一個人民內部自己教育自己、團結自己、發展自己事業的方針。

正確東西都是在與錯誤的東西鬥爭中才能發展出來。新東西都是在與舊東西的鬥爭中才能發生。中國的馬列主義即是在與中國土地上生長出的不好東西作鬥爭中成長的。

出點問題沒有什麼可怕。野草閑花長起來也沒有什麼可怕。年年都要長野草閑花。你為什麼不準。而且野草閑花中就可能有好草好花，不準生長不對。野草閑花生長了幾十萬年，不是這幾年才生長的。如果我們規定什麼花都不準開，很可能這不準開的花中就有香花。就是馬列主義的香花也要在批評鬥爭中才能成長發展。舊東西也不一定就是毒草，只是有些是毒草。有些打著馬克思主義招牌的東西，也不一定都是馬克思主義。

對長期共存、共同監督的方針，有人也不贊成。這也是形而上學。這個問題我也講了許多次了。我們反對教條主義。主張百家爭鳴，長期共存，對犯錯誤的要治病救人。但一到寫文章就忘了。不治病救人了，而是一棍子打死。我希望大家注意這方面的問題，要提倡種牛痘，我種過牛痘。培養與疾病作鬥爭的能力，人才能強壯。沒害過病的人沒有與疾病作鬥爭的能力，很危險。經常害點病是好事，能產生抵抗疾病的能力，培養免疫力。

九、如何處理罷工、罷課、游行示威、請願的問題

現在還缺乏全面反映學生鬧事的材料。去年大致有 20 幾個學校 7000 多個學生鬧事。昆明航空學校主張用馬克思主義辦法辦學校，不贊成官僚主義。他們反映學生鬧事的材料，分析得相當好。他們說學生的鬧事原因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與青年學生的幼稚無知、不懂事。學生不知道艱苦奮斗，領導不懂得關心教育。而且對學生的實際困難又沒能及時解決。他們不能與學生共甘同苦，反而采用各種辦法欺騙學生。

工人罷工去年有五十幾起。小的十人、二十人，大一點的有一千人的罷工。人民內部矛盾怎樣處理？看來人民內部矛盾經常發生。罷工、罷課、拿扁擔，去年有，今年還會有。這不能都歸咎于匈牙利、波蘭的影響。只是匈波事件以來。事情不好辦。

工人、學生罷工、罷課，示威游行怎辦？我看有四條辦法：

(一)努力克服官僚主義。恰當處理矛盾。

(二)官僚主義未克服時，讓鬧不讓鬧？兩個方針：一是不讓，凡鬧者即是造反。我看不妥當。鬧事者有反革命，但不能說引起鬧事的，主要是反革命。主要是我們的領導有問題，工作有缺點，甚至是官僚主義，不懂教育，不會當領導，沒做好工作。二是讓鬧。我看讓鬧，要罷課即罷課，要罷工即罷工。應該解決問題嘛，是你沒解決問題嘛！（這時毛澤東對施復亮說：施復亮你是鬧事的吧？）

(三)鬧起來後草率收兵好不好？剛鬧了兩三天還沒過上癮，怎麼行？鬧得不夠。讓他鬧夠。鬧了兩三天還沒鬧夠，沒鬧過癮的，當局即要收兵。不對。要鬧，讓他鬧個夠。我也是鬧過事的。鬧得不夠，難以解決問題。鬧得不夠再鬧，一星期不夠兩星期，兩星期不夠三星期，三星期不夠四星期，讓他鬧個夠，夠了即不鬧。把這過程當做一個克服官僚主義、改進工作、教育工人學生的過程。領導要積極對工人學生進行教育工作，補足政治課，把罷工、罷課、打扁擔的過程，看做是克服官僚主義和改進工作、教育工人學生的過程。

(四)對罷工、罷課的領袖人物要不要開除？

除個別的外。如拿刀殺人的要坐班房外，不打、不關、不開除，開除罷工、罷課領袖是資產階級的辦法。對罷工、罷課領袖人物還是留下來好。正確的、錯誤的都留下來。錯誤的留下來當教員，即使是特務也留下來（只要他不殺人）。一個單位留下個把特務有什么不好。不要一定搞得干干淨淨才舒服。清華大學鬧罷課的領袖也要留下，即使是教員也留下，有名的更好。這是難得請到的人。

不要開除罷工罷課的領袖人物，開除是國民黨的辦法。我們要一反國民黨其道而行之。

鬧事還會有。中國的問題特別多。人心不齊，想法不一。許多

人和我們的想法不同。我們的工作人員、負責人來自五湖四海，許多人文化不夠，容易犯錯誤，文化多的知識分子也不見得不犯錯誤，有時犯起錯誤來更大。我們黨在歷史上左傾、右傾錯誤都犯過。犯錯誤的人如陳獨秀、李立三都是知識分子。錯誤會有，矛盾衝突不斷。我們要把鬧事和正確處理鬧事，當做調節矛盾的一個方法。

十、鬧事出亂子是壞事還是好事

罷工、罷課、游行、示威我說是又好又不好。商品有兩重性，這事也有兩重性。和匈牙利、波蘭事件一樣有兩重性。匈牙利事件不好，又好，又不好。匈牙利鬧事不好，但鬧事也幫了我們很大的忙。首先是，匈牙利局勢穩定下來了，現在匈牙利的局面要比過去好。再者是社會主義陣營得到了很大的教訓。全世界出現了反蘇、反共的高潮。這件事，第一當然不好，但第二好。因為帝國主義陣營的反蘇反共，鍛煉了各國共產黨。法國共產黨的機關被打亂，瑞士共產黨領袖躲到山上，找我大使館。大批共產黨員離開黨。英國、荷蘭、比利時的知識分子黨員紛紛脫黨。他們脫黨是好事，純潔了黨。主要方面是好的。

批評斯大林也有兩重性，兩面性。一方面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好。好的是揭了個人迷信的蓋子，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但因揭的方法不對，一棒子打死，引起了世界大半年幾次大風潮。引起波蘭、匈牙利事件和其他困難。這個問題在蘇共二十大時我們向蘇共同志當面講了，只是在公開文件中沒講。對斯大林問題的處理不當，也反映了蘇共的大國主義。

美國不承認我們也有兩重性、兩面性的。不承認我們不好，聯合國我們進不去，好像我們不存在，但又有極大的好處。我們可以舒舒服服地過日子。這個看法我和朋友們講了，就是沒能說服他們。最好再過六年承認我們，再過十五年也行。讓他們看看沒有他們我們也能建設。等我們建設好了，他們悔之晚矣。我是美國不承認即高興；他要承認我們，我就擔心。英中有外交關係，也是這樣，他承不承認，我們都不放棄臺灣。他不承認我們，我們就有話可說。有文章可做。

出了幾篇有錯誤的文章，也是好事。對上面講過的錯誤文章我們感謝他們。因為他們給了我們反批評的根據，使我們有了反批評的對象，這樣反批評才有可能。?電影的鑼鼓?文章說沒有大作品，沒有好影片，怎. 么辦?大作品是會產生的，是好是壞，那是另外問題。物極必反，壞事多了，好事即來。這是辯證法。辯護法不是馬克思發明的，我們的老祖宗“老子天下第一”的那位老子，就有壞事會變成好事，好事會變成壞事的觀點。“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古代甚至有人家燒了房子，客人反而去賀喜的。因為燒房子的壞事對這家人會變成好事。

日本人打進中國，中國失敗了。但在中國的失敗里包含著勝利的因素。這樣，中國的失敗會轉化為勝利，日本的勝利會轉化為失敗。蘇德戰爭也是如此。戰爭開始時蘇聯大片國土喪失，希特勒兵臨城下，但希特勒的勝利包括著失敗，蘇聯的失敗包括著勝利。日本代表團來中國向我們說抱歉，我說你們的侵略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好事，幫助中國團結起來。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

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果起來，也有好、壞兩方面。

中國是一窮二白，一窮是生活水平不高，二白是文化水平不高。這都有兩重性。我們的革命就是靠這兩條，一條窮，一條白。如果像西方國家那樣生活富裕、文化水平又高就難以革命了。要革命還是要依靠窮苦的、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的群眾。我不是提倡文盲。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打起來怎麼辦?馬上打怎麼辦?散了會就打怎麼辦?我看，要打就打，要鬧就鬧。你們要有準備，準備開完會就發生世界大戰，人類被消滅了一半?或者統統消滅干淨?我就不相信會這樣。我和印度、巴基斯坦總理爭論過。總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第一條，不歡迎；第二條，不怕。

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果爆發，卷入大戰的不是幾億人，而是十五億、二十億。最後是帝國主義消滅，社會主義勝利。

戰爭有兩面性，有不好的一面、也有使人民覺悟起來、緊張起來鬧革命，造成革命大爆發的一面。總之是兩面性，有破壞的一面，有調動人民積極性、提高人民革命覺悟的一面。

真打起來，不要怕。小米加步槍都能打，何況我們還有新武器。不要聽見世界大戰就愁眉苦臉，那連蔣介石都不如了。對戰爭，蔣介石並沒有哭喪臉。蒙哥馬利說全世界只有兩個大國消滅不了。這就是蘇聯和中國消滅不了。蘇聯靠北冰洋，我們靠昆侖山，都消滅不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對我們也有好處。我前面說過，日本代表團訪問中國向我們承認錯誤，對我說對不起我們，我說朋友，從某種意義上說你們做了件好事，你們教育了中國人民團結抗日，教育了中國人民反對你們。

世界上的事物，對立雙方互相滲透，互相影響。國際上對立雙方也是互相滲透，互相影響。就像一個曲子中講的，“我儂兩個，忒煞情多，好比一對泥人兒，將來一起都打破，再捏再塑再調合，我中有你，你中也有我。”世界也是兩個泥菩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資本主義世界有我們的人，社會主義世界有他們的人。匈牙利有人喜歡聽美國之音。有個人聽了美國之音，買了食品躲在屋子里等世界大戰。蘇聯也有人喜歡聽美國之音，我們中國同樣有人喜歡聽。

總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們的態度是：

第一，準備打。打起來就準備奪取最後勝利。而且是加一倍的勝利，現在是九億人口赤化。那時變成十八億。

第二，一個長時期打不起來，我看可能有十年、二十年。也可能更長。

打，就建設停止，專門打仗。但現在看打不起來。帝國主義現在在搞什麼？互相滲透。顛覆波蘭、匈牙利。現在世界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爭奪殖民地，美國正在爭奪英國的殖民地，爭奪亞洲、非洲。這是世界主要矛盾。現在世界上有三種力量：

1、社會主義力量。主張和平，反帝。

2、民族獨立力重。他們在和平與反帝問題上，可以程度不同地與我們合作。

3、帝國主義力量。打仗對他們好處不大。不打仗美國就要同英國、法國爭奪殖民地，爭奪亞洲、非洲，他們的方針與我們的估計

不約而同，好像是我們叫他們這樣做。

主要的衝突地區有：一、印度、巴基斯坦，二、敘利亞、摩洛哥，③、中東的廣大地區。洛克菲勒的文章對此作了分析，很值得一看。主要目標是爭奪殖民地。

十一、少數民族與大漢族主義

中國有幾千萬少數民族，他們占有全國 60%的土地。十大關係中有一條講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一定要搞好。主要要解決大漢族主義問題。這個問題一直沒解決好。中共中央準備開中央全會來討論解決統一戰線和少數民族問題，一定要改變作風，改變不尊重少數民族的作風。

西藏有一派人要搞獨立王國，要去找印度支持，達賴喇嘛動搖了。印度邀請來了，我們做了工作，不聽，就讓他們去了。英國在印度多倫堡搞了個情報中心，專門破壞我們同西藏的團結。尼赫魯與周總理說過多倫堡是個間諜中心。我們對走的人說，你們要走也可以，但是對你們不見得好。

我們與西藏有個十七條。西藏的制度一定要改革，但改革要征得你們的同意，你們不同意改就不改。第二五年計劃期間可以不改。第三五年計劃期間改不改，也得看你們的意見，要改即改，不改即不改，為什麼要那樣著急。

十二、建設和人民生活

中國可能在三個五年計劃之後初步改變面貌，對工業化，蘇聯有一個路線，我們也有個路線。我們與蘇聯做法上有一些不同，在？十大關係？講話中，我講過這個問題。主要是重輕農的投資比例適當，蘇聯重輕農的比例是 9: 1，重工業是九，輕農是一，對農民有竭澤而漁的味道。當然這是為了國家建設。但農民積極性不高，市場不夠興旺。重工業市場在哪里？在輕工業和農業那里。中國有五億農民。像第一個五年計劃重輕農的比例是 8: 1，實行結果是 7: 1，我看第二個五年計劃搞成 6: 1 比較好。是否可行，請國務院同志研究一下。我沒有專門研究。

輕工業和農業是一個東西。沒有農業也沒有輕工業。沒有輕工

業就沒有重工業。原材料沒有，市場沒有，怎麼搞重工業！

重工業應當為優先發展，6:1還是優先發展。仍然是符合生產力發展規律，但是走了一點新的道路，表面上看起來重工業投資比例比蘇聯小，速度要比蘇聯慢一些，但實際上可能反而要快一些。我們的希望寄托在這裡，我們有比蘇聯發展速度快一點的可能。蘇聯在舊俄時代的1913年，是400萬噸鋼，1921年恢復到400萬噸鋼，1941年增到1800萬噸，比舊俄增加1400萬噸。即21年增加了1400萬噸，我們的老底是90萬噸鋼。1950年統計的，主要是日本人在東北搞的。從1950年起如果能有21年的和平環境，像蘇聯那樣，那麼1950年到1971年，即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我可以斷定，我們的鋼不止1千8百萬噸，可能達到2千萬噸。當然如果帝國主義不給我們和平機會，天下大亂了，我也只好打了以後再建設。一開打，就是赤化全世界了。更大的可能是打不起來。

所以在建設方針上走一點迂回的道路可能更好。要讓農民吃飽，讓市場情況好一點。要多做工作，使農民有購買力。只有農民能生產出更多的糧食，輕工業才有原料。農業發展了，輕工業才有市場，化肥才有市場，鋼鐵才有市場，電力才有市場。也就是說，重工業才有市場，才更能發展。重工業有了市場又會反過來促使農業、輕工業的潛力發揮出來。

我們對革命有較多的經驗，犯過錯誤，翻過跟斗，有把握。對經濟建設沒有經驗，我們希望不翻大跟斗，不犯大錯誤。不用像民主革命時，把蘇區90%的地方都丟了，最後來個二萬五千里長征。錯誤是難免的，但不應弄得全國根據地丟了，只剩下陝北等幾個小地方。經濟建設可以少犯一些錯課，犯錯誤也不用犯那麼大的錯誤，花的代價不那麼多，這就是我的要求。現在我們還缺少經驗，不知道事情應當怎樣做才恰當。許多事還要積累經驗。

蘇聯究竟好不好？還要繼續學。蘇聯是好的，還要繼續學。

蘇聯還是個好國家。他們幫我們辦了這麼多的工廠，包括軍事工廠。英、法、美幫了我們沒有？沒有。沒有一個國家像蘇聯那樣幫我們設計這麼多工廠，建設起這麼多工廠。沒有一個國家能像這樣

幫我們，能這樣幫我們的還是蘇聯——社會主義的蘇聯。蘇聯的缺點是另外一回事，我們和他們是一類國家。我們仍要以學習蘇聯為主。我們要向一切國家學習，美國、德國、法國、日本、英國都要學。各國外語也都要學，單學俄語不夠。但主要以學蘇聯為主。只有他們肯教會我們設計，只有他們肯給我們裝備。只有他們能給我們援助。真正幫助我們的是蘇聯。所以學習蘇聯是我們的重點。

學習有幾種態度。教條主義態度也是學習，好壞一起學。另一種態度是學先進經驗。教條主義的學習態度不對，我們要學先進經驗。我們的報刊上並沒有提出學落后經驗，但有時實際上把落后的東西當先進的經驗學來了。這種情況要避免。

要同一切社會主義國家團結。同亞非被侵略的國家團結，但首先要同蘇聯團結。蘇聯可靠。帝國主義國家沒良心，不可靠。杜勒斯有什么良心？他很成問題，天天罵我們，把臺灣侵占著不放。

好了。幾點鐘了？七點。三、四、五、六、七講了四個多鐘頭了。
不講了。（鼓掌）

（戚本禹記錄、整理）

第 7 章 反右派運動的起因、擴大化和後來的平反

1、反右派運動的起因

1956 年秋在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出現的“匈牙利事件”和“波蘭事件”，對我們這邊的影響不可小視。不能否定，解放才幾年，一些黨的干部身上滋生了很嚴重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作風，群眾意見不少也不小，社會矛盾積累了很多也很大。群眾意見和社會矛盾不能坐視不管，否則一有風吹草動就可能釀成類似匈牙利那樣的大事件。毛主席未雨綢繆，為了掌握主動，就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和 3 月 1 日分兩次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一個內部講話，決心給那些有意見的群眾一個說話的機會，主動化解社會矛盾。

這個講話的精神一出來，群眾就動起來了，紛紛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給共產黨提意見，而且暢所欲言，社會上一些地方還出現了大字報。這個局面實際上是主席期望的，給了毛主席本人和黨內部分干部很大的信心。所以，在毛主席的內部講話之後約兩個月，即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央就正式發出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這個指示在社會上的反響非常強烈，群眾動作更大了，抓住機會給官僚作風嚴重的領導貼大字報，把心里的不滿都爆發出來了。很多民主黨派友好人士也動起來了，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幫助共產黨整風。因此，大字報不再是局部現象，而是全社會的普遍現象，真成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一個講話，造成這樣一個寬松的氣候，出現這樣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面，這本是好事。可是，黨內高層一些人本來就怕這怕那，這個時候都在底下說毛主席不好。據我當時在辦公室聽到的情況，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他們就說，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沒有經

過討論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黨內後黨外，毛主席這次是先黨外後黨內了，一樣的內容，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然后才在黨內宣傳工作上講。他們攻擊毛主席違反程序，把黨弄得岌岌可危，把國家也搞亂了。黨內有相當一部分人跟著他們這樣看、這樣說，埋怨主席不該放開，不該讓什么人都出來提意見。有人甚至說，主席剛剛講完“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自己就不謙虛了。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變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的那個方針。

在毛主席的講話之前，國際上就有反共的浪潮，在毛主席的講話之后，國內很多民主黨派的人又都起來興風作浪。報紙上也說，右派猖狂進攻了，要殺共產黨人了，天下大亂了。事情是被夸張得不得了。葛佩琦是個老共產黨人，據他講，他只是向黨委提了批評意見，說黨委應該密切聯系群眾，黨員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要努力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絕沒有說要殺共產黨人之類的話。這種意見有什么不對呢？那時，鄧小平主持黨的工作，大量材料，包括一些不正常的情況，很快就從黨內渠道報送到主席這里來了。主席一時也弄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這就造成一種局面，使毛主席相信，事情可能在起變化，主席也不願意右派翻天，就在5月15日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通過黨內渠道表明態度，也是提醒右派要謹慎從事。可是事與願違，像章伯鈞、羅隆基那樣的右派，認為春天來了，都驚蟄了，都出來了，都打著響應主席最高國務會議號召的名義，要求資產階級的民主。他們有很多言論，還有很多行動，發動對黨的進攻，把矛頭直接對準社會主義制度。在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座談會上，章伯鈞提出要搞“政治設計院”，這個政治設計院還要有權，像美國的參議院一樣。這實際就是要求共產黨下臺。當然，這個要共產黨下臺，不是說要把共產黨人都抓起來，而是說要像美國那樣搞多黨派的“輪流坐莊”。羅隆基提出建國初的“三反、五反”運動搞過了，要搞“平反委員會”給被鎮壓的人平反；儲安平則在光明日報開會罵共產黨搞“黨天下”。當時就有人說，大部分民主黨派的人都聽他們的，民主黨派里的左派是少數。史良和雷潔瓊還不錯，史良把

他們的一些內部活動告訴了主席和總理。與此同時，在北大出現了“5.19 民主運動”，林希翎 5 月 23 號又在北大作演講，歌頌和散布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類似的大小事情全國還有很多。黨內一致意見是堅決打擊右派分子的進攻。

以上這種黨內外的情況簡而言之就是，黨外有股很大的勢力認為主席的講話還不夠開明，要求輪流執政；黨內則是一股很大的勢力在批評毛主席亂講話。毛主席受到黨內外夾擊。

1957 年夏天，中央召開青島會議，江青陪同毛主席去的。青島風光好，主席有江青陪同，江青請主席到她故鄉游玩，主席一路本該是高興的。可是，江青後來對我說過：“主席這一個夏天都是悶悶不樂，我給他講青島的事，他都沒有心情聽”。我問，因為什么事？她說，還不是因為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結果弄得黨外進攻，黨內不滿意。我在現場聽過主席的那次講話，也看到了那之後黨內和社會上發生的種種事情，非常理解主席為什麼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為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話，讓大家暢所欲言，才出現一個全國性的大鳴大放的寬松的政治氣氛。等這個氣氛出來了，黨又要把它消滅，還要毛主席用自己的原始報告來做成槍炮把它消滅。這不等於是讓毛主席自食其言嗎？何況黨內的官僚主義作風還沒有解決！另一方面，他那個時候也派人下去看了一些事情，也了解到在自己的講話出來後，社會上的確是出來各種言論，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裴多菲俱樂部”中國的確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來的民主氣氛壓制下去。這是一種黨內外夾擊的復雜局面。群眾意見、民主黨派友好人士的意見以及右派的攻擊，其實還是好處理的，難的是黨內高層的批評意見不好處理。那時，劉少奇是黨內已經認可的接班人，鄧小平是毛主席自己親自點將到北京後不兩年就擔任黨的總書記的，彭真雖然在延安時期就是很左的，但對於黨在延安時期的撥亂反正貢獻是很大的，自那時以來黨內地位也很高。還有大批

同志跟在他們后面，也一樣對毛主席的講話有這樣那樣的埋怨。這些能都不管嗎？這樣一來，主席自然就沒有心思只顧游覽青島的風光了。

黨外是右派發動進攻，反社會主義的東西紛紛出籠，黨內是一致要求反擊右派的進攻。毛主席在黨內外夾擊這樣一種情形下，同意發起反右派運動。《人民日報》先在 1957 年 6 月 8 日發表社論，後又連續發了幾個社論，反右派運動就這麼在黨的集體意志下，在 1957 年 6 月中旬發動起來了。

2、反右派運動的發展及其擴大化

反右派總要一個指導文件吧？解鈴還須系鈴人，黨中央就用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來做文章。毛主席是尊重黨內其他同志意見的，也是遵守黨內一貫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的。他也許是看到自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出來後，社會上出現那麼多的言論，又受到周圍各種材料和上下左右的人的影響，就把他原來的講話，交由胡喬木、田家英和陳伯達他們，吸收黨內高層其他人意見進行修改。這個改了的東西就是 6 月 19 日《人民日報》發表出來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文章。它成了反右派的一個綱領性文件，因為它提出了劃右派的六條標準。這個文章不如主席自己原來的那個好。我聽了主席的原始講話，正式發表出來的文章與原始的講話有很大的不同，劃右派的六條標準，也是主席原始講話里沒有的（詳見上一章）。

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原始講話，是主席自己的意見，是他的真實思想，而發表出來的文章《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中央集體的意見。這一點即使是最正規的說法也是不否定的。逄先知、金沖及他們搞的《毛澤東傳 1949-1976》就在第 702 頁承認發表出來的文章是“在廣泛征求意见的基礎上，經過反復修改。是毛澤東的精心力作，也是黨內集思廣益的結晶”。這就是說

反右派不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了黨的意見。因此，後來說毛主席他一個人搞“引蛇出洞”，是沒有道理的。這怎麼是“引蛇出洞”呢？

右派是有的，辯論一下也是可以的，但用不著搞那麼大的反右派運動，搞了幾十萬人。這個責任，毛主席有，他應該負領導責任，但反右派主要是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掌握的，彭真也很積極。彭真那時候左得不得了，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又那麼右？是他們提出要求按比例打右派，主席說百分之一、二、三，他們說百分之五都不夠，有百分之十。鄧小平在中央黨校講話，提出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打右派。後來不是每個單位都按百分之十的指標打右派嗎？依據就在這裡，這個是當時有文件的。現在有些人把反右擴大化的錯誤都歸到主席身上，這是不對的。就是反右派，主席也沒有想那麼大規模，按指標打右派不是毛主席說的。

所謂擴大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整風運動在前，反右派運動在後，整風運動中的大鳴大放，沒有一個具體的發言標準，等人家把話已經說了，再以反右派運動開始後劃右派的六條標準去對號入座，那人家很多話就是說過頭了，很多人就成右派了。後來有人說毛主席搞“引蛇出洞”，依據就是這個。這種說法是違背基本事實的，是沒有對上面說的各種實際情況進行具體分析的主觀看法。毛主席並不是有意先不設立標準，有意誘使人家胡亂鳴放，等人家鳴放之後再故意找托詞設立標準收拾人家，而是先就誠心誠意希望大家提意見，發現有的意見走得太遠之後，就希望吸收黨內其他同志的意見，設立幾個標準來規範鳴放行為，並糾正先前的鳴放方向，把整風運動引導到合理的軌道上去。

這裏面還有一個具體的執行操作問題。用後來劃定的標準去衡量已經過線的一些鳴放，就已經難免出現一個擴大化的問題了，而有些具體操作的人還犯官僚主義作風，還借機打擊報復正當給黨組織和個別黨的領導提合理意見的人，就像中南海有人打擊報復我們“八司馬”那樣（參見後一章）。這就把擴大化的問題搞得更加嚴重了。剛才提到的老共產黨人葛佩琦就是這樣被打成右派的，他根

本就不該被打成右派。可以說，要是根據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原始講話精神去衡量鳴放的言論，那麼就沒有擴大化的問題了。而要是具體操作者不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的錯誤，都像主席那樣沒有私心，那就更沒有擴大化問題了。主席講過李慎之等一些人不能打成右派，可是鄧小平還是把他們打成右派了。毛主席說的話都不管用了。所以，擴大化不能把責任都推給主席。毛主席當時說過，全國不過4、5千個右派。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見搞，右派最多也就是這個數字。

綜合以上情況就是，標準出來晚了，其他具體執行人又搞打擊報復，又搞官僚主義，又搞高指標按比例打……。最後就搞成擴大化了。

江青還曾告訴過我，說主席在青島的時候對她還說過這樣的一番話：“別人說我引蛇出洞。我沒有引蛇出洞，我搞的是陽謀。毒草出來了不要緊，大鳴大放，百花齊放，總會有些問題，不要緊。我都說了，農民種地也有毒草的嘛。花點藥，除了就是了。我不是陰謀，我是陽謀。”主席這個意思是批判人家強加給他的，實際上是莫須有的“引蛇出洞”。可後來寫歷史的人，就說主席是自己都承認搞“引蛇出洞”、“搞陽謀”。實際上，主席是真要群眾民主的。在同期的中南海的“八司馬事件”中，有人要把我們打成反革命，主席就不同意。這也是他要群眾講話，要實行民主的一個證明。群眾講話了才能穩定，才能避免出現“匈牙利事件”，當時要不是主席的講話出來，讓群眾的情緒有一個發出的地方，那群眾就可能因為對官僚主義的不滿上街去，真出現“匈牙利事件”也是難說的。哪知主席講話，是在蘇聯20大以後，他一講，群眾動了，右派也動了，黨內還就是利用這些事說主席把國家搞亂了。主席真是好心，劉少奇卻不像話，不檢討，還把屎盆子扣給主席頭上。“我是執行者，我是第一線的，負主要責任”，這話劉少奇該說卻不說。主席都說了要負責任，他劉少奇就不說一聲負責任的話，何況主席不同意打成右派的，他們也打了很多。

3、關於反右擴大化后的平反問題

在右派平反問題上，毛主席主張，調查事實，有錯必糾。這里我先說兩件具體的事。

第一件是關於我們秘書室三科的女秘書崔英的。一次中南海舉辦周末舞會，崔英和毛主席跳舞，主席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我叫崔英。”主席說：“那你是崔鶯鶯了，你的張生在那裡呢？”崔英知道主席是把她那個“英”字聽誤了或者是故意說成“鶯”字，就說：“我的張生，響應號召下鄉鍛煉，碰到安徽水災，救災時犧牲了。”主席聽了安慰她說，他是為人民犧牲的，你不要傷心。還說，你是烈士家屬，組織上會關照的。主席就這樣記住了崔英，後來在舞會上再見到崔英就會說：“你過來，咱們一起跳個舞。”主席這其實是在表示對烈士家屬的關心。

崔英在秘書室是處理群眾來信的，大約是 61、62 年的時候，她接觸到大量被錯打成右派者的申訴，就在又一次陪主席跳舞的時候告訴主席：一些錯劃右派的案例反映出，反右派運動中錯劃的情況看來是相當嚴重的。有很多群眾來信，反映他們單位劃右派劃錯了，把給單位的領導提了意見的人，都打成了右派。主席大吃一驚，說：有那么多錯誤，有那么多右派？為什麼把提意見的人劃為右派，那怎麼行呢？主席還說：“崔英，你去把這個情況弄一個報告給我看。我們共產黨從來實事求是，有錯誤就要改正。如果把人錯劃右派了，也要改正。”很顯然，主席這是要給錯劃右派平反。

主席要崔英弄個材料，崔英很高興。但寫報告上送是有規矩的，都要經過秘書室領導同意。而且她只是個科員，沒有權力調度全部群眾來信。反右派運動結束後，各地錯劃右派的申訴信，像雪片一樣寄到秘書室，各個科都有很多。這個事即使叫我做，我也得經室主任同意才可以到其他科調信。崔英這個人挺高傲的，看得起的人不多，跟她那個科的科長小馬（馬芷蓀）工作關係也不是很好，就來跟我商量。我問：“你經過科長同意了嗎？”“科長？！她左得

很，不會同意的。”崔英說。

崔英的科長小馬是田家英的小相好，我也不願意得罪她。再說，她科里的事情我插手也不合規則。不過，那是在“八司馬事件”之後，我對錯劃右派特別有體會，不願意有人像我們“八司馬”那樣受到冤枉。所以，我是發自內心支持崔英的，當我看到她實在不願去和小馬商量，就說，你去找陳秉忱，他是副主任，他批准了，也算是給領導講過了，你再去找各科要信就可以了。我不叫他直接找田家英是因為馬芷蓀和田家英關係好，去找他，他肯定支持馬芷蓀，問題還是解決不了。

崔英聽我的意見去找陳秉忱，這個人是從軍隊來的干部，組織觀念強，人不錯，就是一點也不圓通，他去跟田家英匯報了。田家英很敏感，這是主席要的東西，就覺得事情很大，他知道反右派是鄧小平主持的，而楊尚昆和鄧小平關係很密切，這事弄不好主席一批就會牽扯很多人，於是他就去跟楊尚昆匯報了。這一匯報不要緊，情況急轉直下。楊尚昆說，這那行啊！這是捅天的事。怎麼你們秘書室一個小干部可以隨便捅天？要是這樣，今天這個捅，明天那個捅，大家都隨便找毛主席，我們還能工作嗎？楊尚昆問田家英：“這人是從哪兒來的？”田家英答：“從宣傳部調來的。”楊尚昆說：“趕緊把他調走，不能要了。”而且是“限三天之內，要在禮拜六舞會之前把她弄走”。

田家英馬上找到小馬科長，小馬本來就不滿意崔英（其實這兩個人都是有才能的女子），田家英傳達“三天內調走”，小馬卻說“明天就得走”，只給崔英一天的準備時間。崔英覺得，工作交代了，調新單位總得給個鑒定吧。於是科里匆忙開會，講了幾條意見，算是做了鑒定。要她走，也沒說什麼理由，就說是工作需要。其實崔英也猜著了：一定是自己給主席反映右派申訴這件事，引起有關人的不滿。崔英走前問過我，我也說不清楚，我怎麼說啊！我說：“我真不知道這事。你跟我不是一個科。他們調走你。不用經過我，他們跟楊尚昆匯報，也不用跟我商量的。”當時在秘書室不贊成崔英調走的還有“八司馬”的李公綽和朱固等。崔英在實際調出後，中宣

部也不接了。這件事給崔英打擊太大，聽說此后幾年她犯了精神憂郁癥。另據說，崔英走后，周六舞會上主席問起崔英怎么沒來，秘書室女同志說她調走了，主席聽了沒有說什么。這個時候，毛主席正忙于指揮炮擊金門的戰役，之后可能就把要崔英寫材料這件事給忘了。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給小馬貼大字報，說小馬打擊報復崔英。小馬解釋說：“不是我叫崔英走的，是楊尚昆要調崔英走的，是田家英告訴我楊尚昆叫調走她的。”造反派到楊尚昆的秘書孟繁述那里去核實，這整個過程才清楚。改革開放后，崔英在廣州的《

同舟共進》雜志發表了一篇《我和毛主席跳舞》，把整個過程說得很詳細。崔英現在還在北京，住在西單教育部街。

第二件事是關於華東《新聞報》的一個資深編輯的。我看到一封群眾來信說，這個人在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事情公開后寫了一個稿子，涉及斯大林，說斯大林沒有好好聽聽群眾的意見。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和蘇聯決裂，《新聞報》就認為他“反蘇聯”、“攻擊共產國際”，按“不利于國際團結”這一條，把他劃為右派了。我認為這是錯劃，就把信轉到《新聞報》，請他們重新考慮，《新聞報》回復說，大家的意見都是把他劃為右派。在文革的時候，這個人又要求平反。中央文革接到來信，我就按正常程序，把情況反映到主席那里去了，還去問總理給不給人家平反。總理說：“右派平反的事最好以后處理，不要現在就搞”。主席看到我們的匯報材料后，就問這個事，問到底有沒有這個人。我叫華東的張春橋去查，張春橋是很好的，他說，主席問這個事，我們有責任去查清楚。他一查，真有這麼個人，這個人真沒有反黨，真是擁護毛主席。他“反蘇”，是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兩邊都反的。我覺得，這樣的一個人是應該平反的，就去給總理匯報：“總理，你看調查的情況是這樣……”我把張春橋調查到的情況都說了。總理聽了后說：“這樣的情況還不止一個哩。還是由運動后期統一處理吧。”總理說了統一處理，那就統一處理吧，我也沒有辦法，我起碼是把事情報告給主席了，也給總理匯報了調查到的情況。記得總理當時還強調說：“這個事單獨處理的話，那就

要連鎖反應了，雪片一樣，處理一個又來一個，那就衝擊文化大革命，變成平反運動了。還是後期統一處理。”文化大革命後期我進了秦城，這個人的平反事情處理了沒有，我就不知道了。總理是不是跟主席商量過這事，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有這麼個事。這個人是當時華東《新聞報》的，我估計現在還活著，可以查到的。

以上兩件事說明，不願意給錯劃右派平反的阻力不在主席這裏。主席是實事求是，從來不離開這個方針的。右派錯劃了，就該平反。我們秘書室是一直給主席送信，反映錯劃右派要求改正的事。主席看到了就叫我們調查處理，但是我們當時沒有看到中央給錯劃右派改正的文件。文革中才知道，統戰部收到我們轉去的一些申訴信以後，原準備搞一個給右派平反的文件提交中央，但鄧小平告訴統戰部的部長：右派一律不能平反。有什么問題以後再說，現在不宜平反。鄧小平這個右派不能平反的指示違背了中共中央 1962 年 8 月對於搞錯右派應予改正的指示，也違背了毛主席的認真處理右派申訴的意見。當時中央還沒有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兩條路線”，還是“一條路線”的分歧問題。現在有人說，鄧小平這個違反中央指示的意見是來源于毛主席 1962 年 9 月《關於檢查右派分子甄別試點問題的批語》。現查文件，毛主席確實在這個批語中批評了國家機關黨委要求在中央機關內對“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要試點，以取得經驗，加以推廣”（主席批語）的錯誤作法。但毛主席在這個批語和此前的所有批語中，均沒有不給錯劃右派改正的指示。相反，他總是主張，調查事實，有錯必糾，該摘帽的摘帽，該平反的平反。他和崔英在舞會上的談話就證明了這一點。所以，現在有人為鄧小平開脫，拿毛主席的這個批語為鄧小平做擋箭牌，把不給錯劃右派改正的責任推給毛主席，是違反事實的、是沒有說服力的。這個批語的意思是說，“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要試點”，給人家平反，還要作為經驗推廣，是沒有必要的。這絲毫沒有對錯劃右派不搞甄別，不做改正的意思。

鄧小平當時不同意平反，後來卻和胡耀邦一伙又把不平反的屎盆子、罪名往主席頭上蓋。要么是亂批、亂斗，按主觀臆想的比例

亂劃右派，制造大批冤案；要么是統統一風吹，全國除了保留幾個象征性的右派，其他右派全部平反，把大量瘋狂攻擊社會主義的、堅決不改的鐵桿右派也當成好人，給以甄別翻案，甚至奉為上賓（如茅于軾之流的）；忽左忽右、實用主義、機會主義。這與毛主席一貫的實事求是精神真是相距十萬八千里。

總起來看，在反右派及其擴大化問題上，主席缺點錯誤是有，但不能跟劉少奇、鄧小平他們的錯誤比。他們的錯誤多了。而且主席並沒有品質性的錯誤，他們是品質性的錯誤。

附錄：反右派運動前后的歷史事實表明

舊知識分子沒有歷史擔當

反右派運動前后的歷史留下的是是非太多，其中很多是爛帳，是屎盆子，如今都扣在毛主席頭上。其中一個最大的屎盆子是說毛主席一貫仇恨知識分子，發起反右派運動就是要打擊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脊梁是在反右派運動中讓毛主席打折了。然而，在我看來，事實恰恰相反，是從舊制度過來的知識分子（姑且稱呼舊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在反右派運動前后根本沒有一致的獨立人格，也沒有什麼脊梁骨來承擔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歷史重擔。所以，扣在毛主席頭上的屎盆子應該而且必須端掉。

實際上毛主席是一貫重視知識和知識分子的。他在延安就說過，共產黨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拿槍的軍隊，一支是文化的軍隊。文化的軍隊就是知識分子組成的。可見毛主席把知識看得何等重要，竟然是把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等同于武裝力量的。毛主席還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昧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他不但重視文化的軍隊，還特別重視對拿槍的軍隊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設。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他也確實言行一致，重視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重視調動知識分子的革命熱情和革命積極性。他 1957 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做的講話，是有同樣的用意的；在嗣后的黨內整風運動中對知識分子的態度，與以往是一致的。

在反右派運動中毛主席與某些舊知識分子是有分歧甚至衝突，

之后毛主席對待從舊制度過來的知識分子的態度發生了改變。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責任到底在誰？毛主席思想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他為什麼不再整體性信任舊知識分子這個集體，而要對這個集體進行改造，并要發起教育革命乃至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去培養新知識分子，即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要回答這些問題恐怕就要從社會主義制度的創立和維護這樣一個角度去分析、去審察。這裡不妨拿林希翎及其言行來做個管中窺豹。

林希翎當時是人大法律系學生，年輕，漂亮，很活躍，又很有政治活動能力，在整風運動開始後不久，就到中南海找中央反映情況，秘書室是王文接待她的。她就這樣偶然地成為了中南海“八司馬事件”中的一個局外角色（參見下一章）。王文和她談了幾次話，林希翎在北大發表演講，王文是參加了的。所以，對她的情況，我還是比較熟悉。

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內部講話是很開明的，緊接著的整風運動也是要和其他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同創造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治氣氛。而且，主席不久又非常明確指出了，斯大林的錯誤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只是斯大林個人主觀上的思想原因造成的。斯大林也不能全盤否定，他功績是第一的，主要的，錯誤是第二的，次要的，他的錯誤是共產主義者在工作中的錯誤。

但是，林希翎5月23日在北大的演講，目標就是對準社會主義制度。她說：“我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我管這個社會叫做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奮鬥”，“讓每一個人過真正的人一樣的生活”，“不要以為共產黨用整風的方法，採取改良主義的辦法，向人民讓步就夠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沒有白流。我們今天爭取到的一點點民主，是和他們分不開的。”林希翎這樣講，就是沒有通過提意見表達民主的誠意了。不管她怎麼樣打著人民的旗號，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要搞真正社會主義”，還要“讓人民過上人的生活”，其實都是不能掩蓋她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真實意思的。

她說“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就沒有站得住腳的依據。當時二戰結束後不久，個人崇拜是全世界普遍的現象，大家都希望有強有力的人出來整頓社會秩序，恢復社會正常生活，無論在資本主義還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當時都有個人崇拜的現象。

至于她說的“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這當然是符合實際的。中國是從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社會，直接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進入社會主義的，這個社會主義當然是“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新制度總是帶著舊制度的臍帶來到這個世界上的。事物發展總是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量變到足夠了，就會發生飛躍，完成事物的徹底革新，形成新的事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社會主義制度建設也要遵循這個歷史觀。搞社會主義，不是心臟移植外科手術，把舊的封建基礎的心臟，一刀切除，再換上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的心臟，就萬事大吉了。即使是這樣的移植手術，整個軀體也還是要借助原來的那個軀體，使其慢慢適應新的心臟。這一點共產黨自己知道，毛主席更知道，所以毛主席要共產黨通過民主黨派和群眾幫助整風，打掉黨內的封建官僚主義作風，開展真正的社會主義事業。林希翎卻在當時搞社會主義是大方向的時候，把攻擊的目標指向社會主義制度，動不動就把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也說成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這當然就與毛主席的內部講話精神、與中央精神、與整風運動的本來精神都是相違背的。

林希翎當時不過就是一個沖在前頭的愛出風頭的大學生，對社會主義制度尚且是這樣的一個真實態度，那麼像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他們對毛主席搞社會主義到底是什么真實的態度，就不難知道了。

毛主席對秦始皇有過很多與眾不同的評論，在反右派運動後他就多次談到過秦始皇，其中一次是在1958年5月的八屆二次會議上，結合知識分子對於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批評，說過這樣的一段話：

范文瀾同志最近就寫了一篇《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興。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實證明厚今薄古是我國的傳統。敢于站起來說話了，這才像個樣子。文章引用了司馬遷、

司馬光 ……可惜沒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張 “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個厚今薄古的專家。（這時有人插話說：“秦始皇焚書坑儒。”）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不是殺掉了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獨裁者，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的不對，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在中國歷史上，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有幾個能與秦始皇比？

秦始皇的偉大和歷史進步作用到底在哪里呢？結合毛主席後來進一步評價秦始皇就知道了。他 1973 年針對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否定秦始皇的觀點，寫了七律詩，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秦始皇的關鍵的歷史進步作用就在於制度建設上：

勸君少罵秦始皇， 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身死秦猶在， 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 莫從子厚返文王。

這裡 “祖龍身死秦猶在” 里的 “秦猶在”，指的就是秦始皇建立的郡縣制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制在秦始皇死后歷經二千多年而不死；“百代都行秦政法” 說的是秦始皇之後，各個王朝不過是這樣那樣改良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以適應新的時代需要。但秦始皇中央集權制的根本的東西沒有丟，也丟不掉，丟不起。所以，陳寅恪不是也有 “兩千年來皆行秦政” 一說嗎？秦之後，一般人看到秦始皇死后，秦朝很快就滅亡了，就以為是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錯了，所以漢代劉邦迫于功臣和封建文人謀臣們的壓力和形勢所迫，就恢復分封制，分封了異姓王和同姓王若干個，結果是連年戰亂，漢王朝也最終滅亡了。西晉又一次恢復諸侯分封，結果也搞出了 “八王之亂”，西晉王朝照樣滅亡了。可見問題不在于中央集權制本身。顧炎武就說過： “漢以后之人，莫不認為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王，

封建亡，不封建亦亡”。柳宗元則說：“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所以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論》里反對裂土分封。

毛主席要求知識分子（當時主要都是舊知識分子）和黨內同志要熟讀柳宗元的《封建論》，不要以為秦始皇的錯是在中央集權制。毛主席這是從一個社會的根本制度出發，看待社會和歷史發展的問題。毛主席對於一個根本制度的創立和維護是特別在意的。所以，像林希翎那樣，像章伯鈞等人那樣，把攻擊的目標指向主席正在創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毛主席顯然是不能接受的。

奴隸制取代氏族原始公社，是必然、是進步；封建制取代奴隸制，是必然、是進步；中央集權制，取代分封制是必然、是進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也是必然、是進步。不管多么艱難，歷史多么長久，這個進步一定要發生，一定要有人去促成它發生。所以，離開了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建設和鞏固，就不能理解毛主席為什麼也是不願意右派翻天的，也是主張反右派進攻的；就不能理解為何後來他在八屆二次會議上還要那樣直率地講上面的一番話。秦始皇的“坑”是肉體消滅，毛主席的“坑”是思想改造。這是有天壤之別的，體現了毛主席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封建帝王，而是人民的領袖。

毛主席和柳宗元一樣看到了“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在他看來，社會主義要“失”的話，也會是“失在政”，而不是“失在制”。所以，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初步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後，他就想堅持維護和鞏固這個制度，并把重點放在“政”上，不失于政。所以，在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出臺和波蘭、匈牙利事件發生後，毛主席採取了在“政”上主動出擊，用整風運動來克服共產黨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以改進共產黨的行政能力，不失于政。

恰恰是在這個政和制的關係問題上，許多舊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人士沒有以社會主義事業的大局為重，打著民主、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為人民謀求“人的生活”的旗號，實際上以

個人的私心和小集團的利益為重，名義上談“政”，實際上把鳴放炮火沖著“制”。在毛主席已經明確指出了斯大林“個人崇拜”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產物，而是斯大林個人主觀主義思想的產物之後，還是借著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把批判的目標直接對準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這樣毛主席就不能不懷疑舊知識分子是不是願意搞社會主義了。

在這裡，舊知識分子自己需要檢討，不要太過自我膨脹，覺得什麼都是自己對；也不要把什麼責任都往外推，都往毛主席身上推。從後來舊知識分子（這時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稱呼會更合適一些）一個個都崇拜資本主義，倡導資本主義，就可以肯定，舊知識分子當時就是不願意搞社會主義的。但他們不僅不敢承認這一點，還要說自己被打成右派是冤枉的。在當時的條件下，不願意搞社會主義，還要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被打成右派，冤枉嗎？我看不冤枉。說毛主席不是完人，這樣的舊知識分子更不是完人，不但不是完人，而且連前后一致的人格都沒有，更毫無脊梁骨來擔當歷史責任。老是責怪、指責、污蔑和詆毀毛主席，那就是連封建文人的基本的做人的舊道德都沒有了，更不用說有社會主義的新道德了。

再回到林希翎身上，看看毛主席對於舊知識分子是怎麼的恨鐵不成鋼卻又不得不愛護有加。反右派運動開始後，林希翎的演講內容通過黨內渠道反映到劉少奇那里，劉少奇就批示：“請公安部門注意”。後來是羅瑞卿親自抓的她。按照當時的標準，林希翎打成右派，沒有什麼冤屈（但是，實事求是講，鄧小平掌權後走林希翎要的“特色社會主義”，卻不給林希翎平反，那就的確是冤屈了她。一碼是一碼，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林希翎後來也得不到平反這個事實，正好也能說明反右派不是主席一個人的意思，不給右派平反阻力也的確不是來自毛主席。）我從秦城出來後，讀到有文章說，1973年毛主席問吳德林希翎在那裡工作，一聽說是被公安局關起來了，就馬上要求“立即釋放，安排工作”。毛主席一貫主張治病救人，不

管什么人犯了錯誤，都要給予出路的。我想，這個事該是真的。這就說明，即使在對待按照當時的標準確定的毫無疑問的大右派林希翎的問題上，毛主席都比其他中央領袖人開明，那麼，毛主席又怎么可能去仇恨其他知識分子，去“引蛇出洞”，還去搞反右派擴大化，打折舊知識分子的脊梁骨呢？明明是舊知識分子本來就沒有脊梁骨嘛！扣在主席頭上的屎盆子難道不該端掉嗎？必須將知識分子做新與舊的劃分，否則就是混淆視聽。舊知識分子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新知識分子是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現在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還不多，但總有一天會多起來的。毛主席本來是連舊知識分子都信任的，他和不少舊知識分子之間有很多的佳話流傳，例如和黃炎培的窯洞對，文革中列出受保護的大知識分子名單叫周總理執行保護，還有本書談到的給熊十力回信，給章士釗夜半送雞等等。這些為什麼不能作為毛主席重視和愛護知識分子，而且還主要是重視和愛護舊知識分子的證據呢？

總之，毛主席在整風運動之前和整風運動之中，都是一如既往信任“知識分子”的，并在整風運動中寄托很大希望于“知識分子”。但是“知識分子”在整風運動中的實際表現是辜負了毛主席的期待的。經過這一輪對“知識分子”的觀察，再經過其后的許多事情上反反復復對“知識分子”的觀察，毛主席最終發現，從舊制度下過來的這些“知識分子”（舊知識分子）總體而言是不願意搞社會主義的，因此就不在像以前那樣信任他們了。整風運動中舊知識分子的整體表現，是導致毛主席改變對舊知識分子態度的一個關鍵事件，是也導致毛主席後來發起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通過改革教育制度來培養無產階級新知識分子的一個關鍵事件。

第 8 章 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的 中南海 “八司馬事件”

1、序言

中南海的“八司馬事件”始發于 1957 年春的整風運動期間，延續到嗣后的反右派運動中，直到 1958 年 5 月才告結束。這個發生在毛主席身邊，而毛澤東直到最後階段才知情并加以解決的政治事件，具有非同小可的政治含義。它決不只是“八司馬”遭受何載他們的打擊報復這麼簡單，而是反映出了當年黨內整風運動的艱難曲折和反右派運動被一些人扭曲的復雜歷史過程，更折射出了一些人在中央中樞機構搞小動作，在毛主席身邊搞小動作，企圖滲透毛主席直接領導的秘書室，把自己的人安插到毛主席身邊。

秘書室在田家英主要負責群眾來信來訪的時候，設有三個科處理主席的信件并接待群眾來訪：一科管東北、西北、華北（三北地區）外加北京；二科負責中南、西南；三科分管華東各省加上海。何載當權后，成立了接見科，增設了內勤與總務科，并把京、津、滬三個直轄市拿出來單獨成立一個五科。這樣總共就有六個科，各科具體負責分別是：

一科：分管東北、西北、華北；科長戚本禹。

二科：分管中南、西南；科長朱固，副科長沈棟年。¹⁴

三科：分管華東（這個科的信最多）；科長馬芷蓀。¹⁵

¹⁴ 有一次，我和沈棟年一起去主席家乡韶山，幸有張伯駒的夫人潘素同路。她是个画家，是去韶山画画的。張伯駒是个大收藏家，知道主席喜欢李白，就把他收藏的李白的一件手书真迹送给了主席。后来主席把这帧李白真迹送给故宫博物馆收藏了。大家都只知道李白是个大诗人，可李白还是个大书法家。我们都很尊敬張伯駒先生，对潘素也很尊敬。

四科：負責總務、內勤、收發信件；科長王象乾。

五科：分管京、津、滬；科長李公綽。

接見科：專管群眾來訪；科長呂澄。

所謂“八司馬”是指八個科級干部，即以上七人另加毛主席的英文秘書林克，以林克為首，林克是牽頭人。

林克，江蘇常州人，1946年在北京燕京大學參加地下黨，1949年北京解放後進入新華社工作，1954年秋開始擔任毛主席英文秘書。

李公綽，遼寧沈陽人，比我早八九個月進秘書室，原是東北大學的學生，精通日、英兩種外語，建國初為主席翻譯過大量的日文信件。這個人很聰明，字寫得很清秀。當時毛岸青每星期來兩次教我們俄文，要求很嚴格，我是學不進，但他學得很認真，不久就能借助字典翻譯俄文了。那個懂六國語言的韓瑞定調到中聯部去之後，他接替韓瑞定的工作。原是三科科長，後調五科科長，監管國外來信。

朱固，江蘇沛縣人，也是地下黨。他原在俄文專修學校幫師哲管干部組織工作，因對俄文沒有興趣，而古文功底很好，處理主席信件摘要精確、復信得當，就調來出任二科科長（我1966年代田家英職務後，曾調他到我的辦公室幫助工作）。

馬芷蓀，上海人，到秘書室也比我早，她是清華大學畢業的高材生，1946年在上海即參加了地下黨，後來轉到北京，領導是後來的北京市共青團書記汪家鏗。¹⁵

呂澄，山東泰安人，長的高大，北師大學教育的，文字水平好，口才也好。所以，接見科成立時，調他任科長。在“八司馬事件”中立場堅定，不與何載、王剛妥協，被王剛稱為頑固的反黨分子。

王象乾，山東青島人，解放後進華北革命大學學習，1950年初

¹⁵ 馬芷蓀是田家英的相好，後來跟田家英秘書逢先知結婚。田家英出事後逢先知遭到隔離，他寫了一大摞揭發田家英的材料，還說：“我和田家英是有奪妻之恨的。”可文革後，他又肉麻地說田家英是最有才华的人，是他的良師益友。

調入秘書室。工作認真、細致，收發信件工作做的很好，曾當選中直機關模範工作者。

沈棟年，上海人，上海育才中學的地下黨，和我一起從中央團校分配進秘書室。這個人黨性強，工作積極，字也寫得好，特別是小楷寫得工整。所以田家英喜歡他，把主席的故舊、親友等的私人來往信件都交給他管。這些信統稱舊誼，與各界名人來信一樣的重要。

在“八司馬事件”中，楊尚昆、劉華峰主要是想把林克拿掉。主席信任林克，而林克除了工作以外又不和主席以外的領導人交往，連總理他都不交往，也不給楊尚昆匯報工作。江青對他很滿意，說他在中南海不結交大人物，很懂規矩。毛主席也稱贊他“不結交諸侯”。他的組織關係在秘書室里，常來參加支部生活會，對人坦誠。

引發“八司馬事件”的關鍵人物是何載。何載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干部，高中文化。高中畢業生在他當時工作的西北局已經很難得很了不起了。所以，他一直是給領導當秘書，提升很快。他跟劉少奇常有來往，很受劉少奇欣賞，1949年就曾作為西北局的代表，陪同劉少奇率領的中央組織工作代表團訪問過蘇聯。他是1950年下半年調來秘書室工作的。一來，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專門去看望過他。他初來時也是一般秘書，歸彭達彰領導，協助彭達彰工作。由於他是老干部，在他熟悉一段時間之後，彭達彰就分了一部分領導工作給他。後來，就也當了副主任，還取代彭達彰當了秘書室的支部書記。

何載掌權後不久，就調來了很多老干部。為首的叫閻草，是個地委級的干部，到秘書室管黨支部。其余是：張殿科、程芝到一科；劉運到二科；袁林、馬之江到三科；叢滋榮到四科；武允勝、方世郁、張一平到五科；王明寬、張道靜到接見科。何載實際是要用這批人來取代原來的科長、副科長。這些人後來確實都是何載的依靠力量，在整風、反右派中，也都是批判鬥爭我們“八司馬”的骨干分子。

何載從西北局調來秘書室之前，就是大官了，他在西北局怎么

對待下屬和群眾，我不了解。但他來秘書室，尤其當了秘書室的副主任之後，怎麼對待下屬和群眾，我很了解。這個人很驕傲，很自以為是，待人態度非常傲慢，動輒訓下級、罵群眾，會上會下，不分場合，誰要有一點小錯，他開口就罵。他不是罵臟話，而是專門挑字眼罵，侮辱人家人格。秘書室有位女同志被他罵得差點自殺。我也領教過一次。我把一個報告送給田家英（那類報告以前一直是給田家英的），何載覺得該先給他，就對我罵開了：“你長著腦袋干什么吃的？不會干就別干。你的報告不經過我，就給田家英，你是不是看人家大腿粗想抱粗腿啊？”老實說，我自參加地下黨干革命，還沒有違反過組織原則，還從沒被人這麼罵過。我也沒有遇到過他這樣攬權，還蠻橫無理的領導。真正的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我對他的確有意見，這決不僅僅是他侮辱了我，而是因為他整個的工作作風、他對待下屬和群眾的根本態度。實際上，秘書室對他有意見的是一批人，不是我一個。所以，1957年3月在毛主席發表了最高國務會議講話，號召群眾幫助黨改進工作作風之後，我們就醞釀給他提意見，由此爆發了中南海的“八司馬事件”。

2、從毛主席最高國務會議講話之后至整風運動之前

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內部講話后不久，一些地方就有群眾響應主席內部講話精神，貼出大字報，給所在單位的黨的領導提意見。當時，我在北京市委黨校接受輪訓，由於我是中辦秘書室的，秘書室我經手的事情，別人搞不清楚，無法代我處理，我就要隨時請假回秘書室處理事情。因此，秘書室同志們對於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是什么態度，我就很清楚。我們一些人受到主席的講話鼓舞，也受到社會上大字報的啟發，就在一起議論給領導提意見的事，主要針對的是何載。議論的結果，就是給何載寫小字報，後來寫出的小字報（不是大字報）就貼在秘書室的會議室。

3、從整風運動開始后到反右派運動之前

1957年4月27日，也就是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第一次講話之后剛好兩個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這個指示在社會上的反響非常強烈，大字報不再只是像三月份那樣是局部現象了，而是一些工廠、機關、學校，都紛紛貼出了大字報，對各自單位或者機關的部分領導干部的官僚主義作風提出批評。中南海內也響應中央的號召，開展整風運動。我們秘書室進行一人一票的群眾選舉，選出整風領導小組成員。我得票最高，但因為不是領導，只擔任了副組長。得票比我低的何載擔任了組長。

秘書室當時有田家英、彭達彰、何載三個領導，大家對何載的意見最多。3月份，我們是在小會議室給何載貼小字報，這時我就帶頭給他貼出了大字報。由於秘書室很多人被何載罵過和粗暴對待過，都對他很不滿，我的大字報一貼，跟著貼的人就多得很。越貼越多，就把秘書室的小會議室貼滿了；繼續貼，就貼到走廊上和大門外的牆上去了，還吸引了包括一些中央領導人在內的很多人來看。那時，秘書室在中南海丙樓的一樓辦公，同一院區的甲樓住著劉少奇，乙樓住著朱德。

我主要反映了何載兩個問題：一個是官僚主義作風嚴重，不平等對人；另一個就是對群眾沒有一點熱情，對群眾來信來訪反映和提出的問題不認真處理，能推就推，甚至干脆理都不理。有其他人的大字報說，何載到處吹捧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說赫魯曉夫是發展了馬列主義等等。諸如此類。我反映的問題是實事求是的。他動不動就訓人、罵人都是事實，盡人皆知；我批評他那是欺負群眾，是不平等對人，也沒給他扣帽子，是讓他自己去思考（“八司馬事件”之後我們在批判何載的時候，他也承認我說的是事實，只堅持認為其他幾個人的大字報是造謠）。

大字報開始都只批評何載，後來就不點名提到“辦公廳領導”。主要原因是，有些辦公廳領導，如楊尚昆，的確是和何載一樣脫離

群眾，有嚴重的官僚作風。例如，剛解放不久，有個陝北的勞動模範老楊來訪，辦公廳就沒有領導出來接待。這個老楊，在黨中央還在陝北的時候，住得離毛主席、楊尚昆都不遠的，毛主席和他很熟，楊尚昆還常去他家里吃飯。可是這個老楊來了，楊尚昆都不出面接待一下。我把老楊來的事反映給主席，主席很快就出來見了他，還和他一起合了影。可是，主席都見了，楊尚昆或者其他辦公廳領導還是不見；再如，有不少高級干部的家屬來中南海，反映一些高級干部進城后的變質行為，說一些高級干部嫌自己評到的級別低了，不滿意，不學習，不求上進，整天喝酒，罵罵咧咧，還摔盆子打碗，更有人看不慣原來的老婆了，要找年輕美貌的姑娘另有新歡了等等。那些老大姐都是從艱苦的革命年代過來的，資格都很老，級別也很高，還都見多識廣，能說會道，反映的問題又是很嚴重的，直接關係到人民群眾的生活、干部的變質和黨的形象。但辦公廳沒有一個領導出來接待她們。後來我寫了報告交給毛主席，毛主席看到這麼多問題，很生氣，叫羅榮桓去調查、召開會議拿出處理意見。主席有了指示，楊尚昆他們就起勁了，說：“下次再來，你報告上來。”可這也是說說而已的，下次來了，他們還是一個都不出來。所以，在給何載寫大字報的時候，我就把這些情況也有分寸地帶出來了，而且沒有點楊尚昆的名。

4、在 6 月中開始的反右派運動期間

反右派運動開始后，那些我們給他們提過意見的人，實際就是何載及其背后的楊尚昆，開始追查貼大字報的事情，矛頭對準的就是八個積極分子：林克、李公綽、呂澄、朱固、沈棟年、馬芷蓀、王象乾和我，認為我們寫大字報給何載和中央辦公廳個別領導提意見，是向黨發動的猖狂進攻，是反黨，要把我們打成右派。秘書室主任田家英（主任還是代主任？戚老說過田家英一直是一副主任主持工作的）和副主任彭達彰，在觀點上是支持我們的，因而遭受牽

連，而且彭達彰已被決定調離秘書室。具體布置追查的是楊尚昆，他當時是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書記。何載則讓他親自調入秘書室的那批人貼出大字報，說我們反辦公廳的領導，是想把中南海搞亂。楊尚昆、何載他們這個搞法和當時社會上搞擴大化的情形是一樣的。當時，社會各界許多單位、機關和學校，在反擊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時候，把一大批在春季的整風運動中，通過大鳴大放大字報向本單位的黨組織和個別領導提出意見的人（有些意見無疑是正確的），當作是資產階級右派來進行打擊。

我們當然不服，因為我們大字報提的都是一些具體的工作上的事情，跟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完全風馬牛不相及。我們就反抗，堅持認為我們是根據毛主席的報告（指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報告）向領導提意見，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怎麼是反黨呢？這樣，就開始了雙方的大字報辯論。我們抓住他們支持右派分子林希翎來進行反擊，堅持說真正的右派不是我們，而是何載他們。右派分子林希翎在北大做反黨演講，何載還專門派人參加。何載自己支持林希翎的一些觀點，倒可能是反黨的。

林希翎當時是人大法律系學生，滿口新名詞，還懂法國文學，又很有政治活動能力，在整風運動開始后不久，就到中南海找中央反映情況。秘書室是王文接待她的，王文和她談了幾次話之后，就聽她的了。王文把談的情況報告給何載，何載就說她“大膽、勇敢、有才華”。王文後來就根據這個精神，去北京大學參加林希翎演講會，林希翎還在會上指著王文說：“今天，中央辦公廳特派了王文同志來參加我的演講會”，讓人感到中央是支持她的。

到底誰是右派？我們下面大字報這麼爭論也不能解決，直到1957年秋季，全國反右派高潮已接近尾聲了，我們中南海這個事情卻還是懸而未決。這就要提交給上級黨委，即中直機關黨委來解決了。

5、工作組進入階段

1958年初，中央辦公廳派王剛來秘書室接替何載的工作。同時，經由楊尚昆同意，以中直機關黨委的名義，向秘書室派出劉華峰（中直黨委副書記）、曉嵐（中直機關人事處長）為正、副組長的工作組，正是這個工作組，要把我們打成反革命集團。據何載後來講，上面的領導在派曉嵐他們來的時候，已經有了一個意見，是何載自己提出的：何載是老干部，只是有些錯誤，但不是反黨。我們八個人是反黨。這個工作組在中直機關黨委的支持下，從1958年3月到4月的兩個月的時間，發動群眾批判我們，在大會、小會上鬥爭我們（是言論的，不是肉體的。我們後來批判他們，也是言論的，沒有肉體的。雙方都是文明的）。我這個名義上的秘書室整風領導小組副組長，也沒有了發言權。

他們說我們不要黨支部、不要黨總支領導、不要中直黨委、不要辦公廳的領導，名義上是促進派，實質上是取消派，是馬爾托夫。他們還從個人歷史上做文章，說李公綽歷史上參加過國民黨，1948年國民黨平津大搜捕，許多黨員被捕，林克卻安然無恙（言下之意，林克是叛徒），把我們八個人打成以林、李為首的“反黨小集團”。其實，我當時貼的大字報是最多的，但因為我在群眾中威信比較高，大家認為我這個人說話實在，不說假話，歷史又過硬（何載也承認我的大字報說的是事實，只是不承認別的幾個人寫的，說那是造謠）。所以，他們把我排在第三位。

我知道這次批判的來頭很大。在中南海貼大字報這個事情，是從來沒有過的。在我們批判何載支持林希翎的大字報貼出期間，劉少奇還來看過大字報，我已經聽說了劉少奇表態說這樣搞不好。劉少奇妻子兼秘書王光美退送相關文件，以前一直是退送給我的，現在都不退送給我了。我的預感在何載自己後來的說法里得到證實，他說中南海的高級領導提出，在中南海寫大字報給領導提意見，這里面有問題，為什麼要在中南海這麼搞？這高級領導人何載沒說是

誰。但是從他的前言后語來看，是比辦公廳的領導楊尚昆還要高的，那不是劉少奇，就是鄧小平了。

關於李公綽參加國民黨，那是他在東北大學讀書時，在抗戰勝利的時候集體加入的，後來他看到國民黨的腐敗，就加入了共產黨。他這個歷史是清白的，在當時也算不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1953年審干的時候，我是審干委員會的委員，了解他的情況（在文革中，又有人要查他這個問題，害得他想自殺，是我出來為他講了話，他才沒有出事）。林克則是地下黨的老黨員，燕京大學畢業，英語水平很高，是主席的英文秘書和正規的英文老師。他是專門搞“參考消息”的，經常和主席一起討論國外的事情，知道許多核心東西。主席是非常信任他的。工作組把林克找回來斗不說，還把他隔離起來。

工作組甚至布置人跟蹤、盯梢我們。有一天，我去彭達彰的家，出來時一個人從暗處跳出來，把我一把揪住，帶到工作組。這個人叫方世郁，原來是青島公安局的。這就是說，他們為了監視我們，甚至從外地的公安部門調來了人手，我當時就提出了抗議，說這是搞非法監視，但曉嵐不敢承認是她安排的。到了四月下旬，他們宣布我們為“反黨小集團”的結論都已經寫好了，還跟新疆的王震都已經說好了，叫王震準備接受我們去新疆勞動改造。我們心里也都很清楚這些，都做好了離開中南海去新疆勞改的準備。

6、毛主席知情并親自解決問題

就在我們已經做好準備去新疆勞改的時候，整個事情突然發生了轉折。毛主席當時在廣州要找他的英文秘書林克，找來找去找不到，再找，就有人說這個人犯了錯誤，是“反黨小集團”分子，正在接受隔離審查。主席大吃一驚。他信任的英文秘書成了“反黨小集團”分子，在受審查，還隔離了，連他都不知道，他能不吃驚嗎？主席一直和林克談得很多很好，對林克很了解，說林克反黨，

主席當然不能相信。主席叫人把林克找到廣州去。這樣林克就在隔離中被放出來，趕到廣州。林克見到主席后嚎啕大哭，把中南海發生的事情，自己被打成“反黨小集團”分子，要下放新疆勞改的事情都給主席說了。毛主席熟通歷史。我們受到工作組打擊的人正好是八個科級干部，田家英和彭達彰兩個人級別比我們高得多，在觀點上又是支持我們的。所以，毛主席在聽了林克的申訴后就聯想到唐朝的“二王八司馬事件”，還說：“現在我們這個中南海又出現了新的‘二王八司馬事件’，我不允許這種歷史上的反動事件在我身邊重演”。這是林克後來跟我說的。“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馬事件”也因此得名。

主席在通過林克的匯報了解到秘書室存在兩派的爭論和我們這些人遭到鬥爭的具體情況之后，就讓秘書徐業夫、高智，去把兩派的大字報抄寫來看看，凡是說林克他們是反黨的和林克他們申辯的都抄來。徐業夫、高智連夜就來抄了，抄的很認真。主席身邊的秘書來抄大字報了，這是一個特別的信號。工作組本來已經準備要宣布我們為反黨集團了，還給在新疆的王震打好了招呼，讓他準備接收我們去新疆勞動改造，一看主席過問這件事起來了，就馬上停下來看風向，連開會鬥爭也暫時不搞了，都等著毛主席那里的消息。

毛主席5月3日回到北京。他在回來之前，就已經看了所有抄去的材料了，回來后也不馬上表態，而是親自作調查，當晚就在他居住的菊香書屋親自召開了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直機關黨委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副書記曾三、劉華峰，中直機關人事處處長曉嵐；秘書室領導田家英、彭達彰；林克、李公綽等涉事的八個科長；還有鄧力群（中央辦公廳政治研究室主任）和李東治（中南海黨總支書記）、王剛、閻草等人。

那是我第一次以會議成員的身份參加主席親自召開的會議，加上知道已被工作組定為是“反黨小集團”的成員，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很緊張。正式開會之前，毛主席對事件中一些不熟的人問一下情況。他先問李公綽是哪里來的？什么學校畢業？李公綽說他是東北大學畢業的。然后就問我。我有點不好意思，回答說：“我沒

上過大學，是個中學生”。不料，主席竟高興地說：“我和你一樣，也是中學生。師範畢業，還當過小學教員呢！”聽了主席的話，我原本七上八下的心一下子就平穩下來了，就覺得事情可能沒有那麼嚴重了。因為主席不會跟一個反黨集團的人這麼說話的。

主席讓工作組的人先講，王剛不吭聲，曉嵐就出來說話，她講述了我們如何進行非組織活動，如何揪住老干部不放，如何寫大字報攻擊黨的領導等等。她講完了，主席接下來就叫我們講。我知道他們在抓李公綽歷史上的把柄，李公綽講話可能底氣不硬，田家英、彭達璋又不便講，林克已經都跟主席講過了，不用再講了，剩下只有我講了。我就站起來說，我們是響應主席的號召，主席的二月講話（指毛主席 1957 年 2 月底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是怎么講的。毛主席一邊聽一邊點頭說：“我是這麼講的”。這樣一來，我就更有勇氣申辯了。我說，我們是響應黨的號召才給領導提意見的，目的是幫助領導改進作風，搞好工作。秘書室和中央辦公廳的一些領導高高在上，不肯接見群眾，就是官僚主義，肯接見群眾的是彭達璋，田家英那麼忙，可也接見過群眾（這時，田家英接過話頭，說自己也是有官僚主義的）。我們給他們提意見，他們就把我們說成是右派，是反黨，而真正的右派，像林希翎，他們倒不反對，還說她是“大膽、勇敢、有才華”，支持她。林希翎在北大作演講，他們還派了王文去參加。林希翎當場就講，中央辦公廳今天派了人來聽我的報告。這不是長右派志氣，滅左派威風么（主席聽了頻頻點頭）。所以說，右派他們不反對，反右派的人他們倒說是右派，是反黨小集團。

主席聽了我講的這些，就問他們：“那麼，他們（指我們這些人）還有什麼反黨的事嗎？”楊尚昆、王剛他們都沒有說什麼。這時，曉嵐又講話了：“他們攻擊中直黨委，他們的大字報就是對著楊尚昆同志的，反對中央辦公廳楊尚昆主任。這還不是反黨嗎？”主席一聽，就說：“噢，反對楊尚昆就是反黨？”楊尚昆連忙說：“不對，不能這麼說，我是在主席領導下的，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才叫反黨”。

主席接著說：“你們是兩派，代表對立的兩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紅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邊，是支持左派，反對右派的，主張拔黑旗，插紅旗”。毛主席又問：“誰是王剛？”王剛站起來，主席看了看他說“久仰大名”，緊接著就毫不客氣批評說：“你是一派的領袖，包庇右派，打擊左派，干盡了壞事。上邊還有人支持你，總支、中直黨委都支持你嘛！不然你也興不起那么大的風浪。你們的錯誤，不是一般性錯誤，而是方針路線的錯誤。你們繼續執行了何載的路線，按照何載的《建議書》辦事。你們插的是什么旗？是紅旗、灰旗還是黑旗？我看不是紅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道道地地的黑旗。我的意見，今天立即召開秘書室全體工作人員大會，把我的意見傳達下去，展開討論，揭蓋子。”——“八司馬事件”又叫做“黑旗事件”，就是根據主席這一番講話來的。主席這里所說的何載建議書，是指前面交代過的何載曾向王剛、曉嵐工作組建議，說他自己是有錯誤，但不是反黨，而我們這些人則是反黨。我們這些人是利用他的認識上的錯誤來企圖打倒老干部，反對黨的領導。所以建議王剛、曉嵐對我們開展斗争。

主席還問楊尚昆知不知情。楊尚昆這個人相當有經驗，一看到這個架勢，知道氣候不對，就說“這個事情，我一直忙于工作，沒有時間，所以也沒抓，沒有很好了解”。彭達璋把方世郁盯梢的事說了，主席聽了勃然大怒，說：“把對付敵人的手段拿來對付人民群眾，在中南海搞法西斯、貝利亞，決不允許。”說完他拿眼睛看著楊尚昆，楊尚昆低頭不語。

看到局面有些僵，鄧力群就出來打圓場。他先說了把青年積極分子打成反黨集團是不對的，接著又說青年人容易偏激，貼大字報，有點類似延安時代的輕騎隊。他認為兩方面都有缺點，兩方面應該團結起來搞好整風和反右派。主席聽了后說：“哦，各打五十大板。青年人給領導提意見有什么錯？如果給領導提意見就要挨板子，那么這樣，他們都還年輕，我老了，那就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為是我號召開展整風的”。聽主席這麼講，鄧力群就馬上起來作檢討（后

來我調到《紅旗》雜志社時，已在《紅旗》雜志社擔任副總編的他還熱情地對我說：“當年‘八司馬事件’，我說應該各打五十大板，挨了主席的批評，那是我錯了。青年人響應黨的號召參加整風，何錯之有！”）。

當晚八時多，秘書室召開全體人員大會，楊尚昆這次還是很實事求是，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把毛主席的講話向全體人員作了傳達。許多人聽了以後熱淚盈眶，有的甚至痛哭失聲，直至午夜仍不肯離去。這情形和文革初期的一幕是很相似的。文革初期，劉少奇、鄧小平他們在北京搞了“50多天的白色恐怖”，很多群眾和學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毛主席得知後，就返回北京主抓了給群眾和學生的平反。在全國各地平反會上，很多人也是在獲得平反後痛哭流淚，齊唱“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久久不離開會場。

7、尾聲

因為毛主席的及時介入，我們“八司馬”獲得平反，最終沒有被打成“右派”和“反黨小集團”。“八司馬事件”就此告終。在5月3號晚上的會議之後，中南海又召開了有中央辦公廳各部門的干部參加旁聽的揭批大會，會議一連開了七、八天。這些會議是在春藕齋開的，雖是由“八司馬事件”引出，但從性質上講是肅清“八司馬事件”的不良影響，已經不屬於“八司馬事件”本身的內容了。當然，我們八個人都參加了這些會議，而且我們得到平反後，是處在批判者的位置了，原來整我們的人成了批判、鬥爭的對象。批判、鬥爭，都不是肉體的，而是辯論觀點，跟何載他們起初批判我們是一樣性質的。他們當時批判我們很文明，我們這時候批判他們也很文明。

在“八司馬事件”中犯錯誤的人是包括楊尚昆在內的一批人。在這一系列會議結束後，大部分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理，何載、

王文等四人被定為右派分子（四人中有一個是支持“八司馬”的，叫XXX，他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是在那里因為其他事情被定為右派的——這是最早材料，我一直保留著。這個人是誰？），開除黨籍，降級下放。王剛、曾三、劉華峰、李東治等八人也受到了黨紀處分。

在“八司馬事件”之後，他們大部分人都一度下放到十三陵水庫參加勞動。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他們都對毛主席都有些不滿，都同情彭德懷。北京市委就把這些情況報告了上來，又把他們調回來整風，傳達廬山會議的精神。1960年北京市把關於他們的情況報告給了毛主席。毛主席就說：“你們看，讓犯錯誤的人自己下去勞動，也沒有照顧和關心他們，他們當然會有情緒。他們以前做的事是錯誤的，你們那些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應該帶著他們下去勞動，一起勞動鍛煉，一起改造思想，并以身作則，做他們的榜樣，讓他們慢慢認識自己的錯誤，把思想轉變過來，轉變為黨的好干部。”田家英傳達了主席這個指示之後，我就主動報名去長辛店二七機車廠，從徒工做起，一邊勞動，一邊了解工業，并帶上他們十來個犯了錯誤的人一起去（閔草請病假沒去）（詳見第12章）。我們在一起勞動了一年多，回來後我就向毛主席打報告撤銷對他們的處分，都安排了合適的工作。有的去了外地，有的就在北京，留在北京的還有繼續留在秘書室的。

何載是老革命，他脫離群眾，官僚主義作風嚴重，是確實的。但把他打成右派也是不對的，因為打成右派就是敵我矛盾了，那時候也還沒有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兩條路線”。楊尚昆將何載的問題定性為“內部矛盾”後，何載也下放到十三陵水庫勞動。

王文原來是北京地下黨搞學生運動的一個支部領導，拋開政治見解，路線問題不談，我覺得這個人還是不錯的。他是從北京市委辦公廳副主任任上，調來中南海的，起初是在我的科里當我的副手。這個人工作很勤懇，就是在整風運動時有點迷里迷糊，大概是受了林希翎的影響，被她說服了，又受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影響，認為斯大林搞法西斯專政，殺了那么多人。在當時來講，王文這個錯

誤就很大了。

王剛只是秉承了上面的意見，執行的是楊尚昆路線。毛主席說了那是“拔紅旗插黑旗”，那總要找幾個責任人，既然王剛是接替何載的，那就要找王剛了，給了他一個留黨察看的處分。同樣，拋開政治見解，路線問題不談，我覺得這個人也是不錯的。跟我一起到二七機車廠的人就包括王剛。從二七機車廠回來後，我給主席打報告，撤銷了對他的處分。

曉嵐其實是一個值得敬佩的人，她是紡織廠出身的黨員，對黨有深厚感情，後來當了紡織廠廠長，再後來調到中直機關當人事處處長。在“八司馬事件”中，她是中直黨委派來的工作組的副組長，可以說是奉命來整我們的。她堅決站在楊尚昆那邊，她的概念很樸素，就是誰反對中央辦公廳的領導，誰就是反黨。所以，她犯錯誤只是認識問題。5月3號她“頂撞”了毛主席，中直機關黨委就準備拿她當替罪羊，說她犯了大錯誤，準備把她劃成犯了右傾路線錯誤的人。我不同意這樣處理她，站出來為她說話。我說：“曉嵐處長只是執行了中直黨委的意見，不了解更多的情況。她就跟主席講了那么一句話，不能算反毛主席。她的這種認識，一般人都能理解。她只是工作方法上有錯誤，不是一個拔紅旗插黑旗的人”。曉嵐和王剛一樣是執行楊尚昆路線的，楊尚昆這個中直黨委書記沒事，倒要搞底下的人，這個理不順啊。還有其他同志和我一樣，也認為曉嵐只是在毛主席調查的時候講了自己的觀點，算不得頂撞主席。主席不同意她的觀點，也沒有批評她。所以，我們不建議給曉嵐處分。但中直黨委最後還是把她處分了。1960年我帶他們犯錯誤的人去二七機車廠，考慮到曉嵐對黨有感情，犯錯誤只是認識問題，而且對待錯誤的態度也好，又是一個女同志，與我們十幾個男的一起勞動不方便，我就去跟她的領導鄧典桃講了我的意見，希望她就不要再去勞動了。曉嵐原來是鄧典桃的秘書，鄧典桃當時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長征干部，他聽了我的意見很高興，就把她繼續留在人事處工作。文革中，曉嵐變成造反派了，因為她對在“八司馬事件”中的經歷有深刻的教訓和體會，就告訴其他人，說毛主席對待

給領導提意見是有區別的，給黨的領導提意見是可以的，只要提得對，還是好同志，就是提錯了，也不能劃成右派。這樣群眾就很擁護她，她在單位就成了造反派的領袖了。後來我聽說，1968年我被打成反黨進了秦城之後，在江青、總理批判我的時候，曉嵐站出來說：“據我了解，戚本禹是個好同志，不是反黨，可能這里有誤會。”這事我是很佩服她的。又聽說因為這個事有人要整她，但沒有整倒。曉嵐年紀比我大好多，不知道如今是否還活著。

李東治是老干部，在“八司馬事件”之前就是部級，后下放當了個縣委書記那樣的官，那是困難時期，他雖然沒有怎么勞動，但也沒有餓飯。1961年我給主席打報告，請求給和我一起下放二七廠的人取消處分、分配工作，毛主席批示同意。楊尚昆順著主席的指示，把中央機關整過我們“八司馬”的人，包括劉國峰、李東治的處分，也都取消了處分，還給李東治恢復了部級，讓他當了遼寧省委書記，再后來當了冶金部長。毛主席記憶好，一次在一個報告上看到他的名字，說這不是那個搞黑旗事件的人嗎？怎麼升這麼大官了？我說不給處分不是要升官啊，犯了錯誤怎麼還升官呢？主席這麼一說，楊尚昆又把李東治擋下去了。其實說他升官也談不上，他原來就是省部級的。他的那些人也跟著下去了，他們就埋怨我，說你這個戚本禹報復起來也太厲害了。跟你勞動的人，都取消處分，分配工作了。我們也下放好幾年了，我們也不歸你管，你怎么跟主席報告，又把我們的職務撤銷了呢？我跟楊尚昆的秘書孟繁述挺好，我跟他說，我真冤枉，那哪是我報告給主席的呀！

劉華峰原是中直黨委書記，在“八司馬事件”之后，調到陝西省當了書記。

那個跟蹤監視過我的方世郁，是被劃了右派的。他當時態度很不好，亂講話，群眾意見很大，劃他右派時，全室的群眾百分之百的贊成。但現在看，他也只是亂講話，並不是右派。

我們“八司馬”在這個事件之后的人生際遇和沉浮也是不一樣的。1966年田家英出事后，我們“八司馬”因為與田家英關係較好，有人就借機整肅我們，說我們是田家英的余黨，但沒有成功。

再後來汪東興插手秘書室（當時秘書室已改組為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秘書處了），也把“八司馬”中的六個人（其中有朱固）打成田家英的“余黨”，送進了學習班。林克擔任毛主席的英文秘書一直到1966年夏，1970年后在新華社和社會科學院等單位做研究工作，1996年去世。

毛主席生前曾多次拿這個“八司馬事件”來教育黨內干部，不要壓制群眾意見，要讓群眾說話。事件剛一結束，毛主席就把它作為一個冤案批給了中央領導人和中央機關各部委的領導人，但未得到響應。在1958年5月中的八大二次會議前夕，毛主席還讓林克和我準備個發言稿，就這個“八司馬事件”到八大二次會議上去做個發言。可后來鄧小平以會議議程安排太緊為由，取消了這個發言。如果我們能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發言，或可能對當時阻止反右派進一步擴大化起到一定作用，至少是有好處，或者對錯劃右派的甄別摘帽會有很多幫助。可是鄧小平耍了手腕，把這事給壓下去了。此后，毛主席又在其他多種場合提到了“八司馬事件”，在一次給華東局的批示中，提到“八司馬事件”時，還用了“看了催人淚下”的詞句。1976年，毛主席逝世。又過了三年，即1979年，“八司馬事件”就被翻了過來，說“八司馬”是在毛主席支持下製造了何載、王文、曉嵐等人的冤案，中央對於當年“強加”在這些人身上的“一切不實之詞”予以撤銷，恢復他們的名譽。

附錄①：

戚本禹《容全堂的“歷史真相”在哪里？》

何載的兒子容全堂2007年在《炎黃春秋》雜志發表了《文革預演和試驗：中南海“黑旗事件”的歷史真相》一文。該文是根據1979年“平反”“八司馬事件”的調子寫出的，人場很好，很多地方都有它的全文轉載或者部分內容的引用。

容全堂為自己的父親樹碑立傳，可以理解，但是用最近30多年來一貫流行的“稀釋事實，扭曲事實，改裝事實，傾瀉個人主觀觀點以迎合否定毛主席的現實政治需要，有意挪動骨幹事情的實際發

生時間以建立某些事實之間本不存在的邏輯關聯或者顛倒它們的邏輯關聯”等手法，將猜測、臆想、以訛傳訛、直接的捏造、欲加之罪和完全的現實政治觀念雜糅起來，就把一個真相本來清清楚楚的事件，寫得毫無真相可言。例如，容全堂在文章里說：

“何載以負責人的身份對好的給予表揚，對不合時宜的提出批評，難免有時方式方法比較簡單，有時顯得急躁一些，尤其是對幾位年輕干部要求嚴，批評多了點，個別同志由此結下了思想疙瘩”，“趁著整風運動的勢頭，戚本禹等人貼出大字報，羅列了何載子虛烏有的三個問題”，“除此之外，還把一些同志在會議上的發言，向組織的思想匯報……採取無中生有、斷章取義，隨意上綱上線、亂扣帽子的方式，以片面和不實之詞張貼大字報”，“除大字報外，還多次召開對何載、王文的批斗會，會上居然出現過推搡、打人等現象。更為嚴重的是還發生了幾起查抄事件”。“1957年整風期間，社會上有人因寫大字報進行大鳴大放，在反右鬥爭中被定為‘右派’分子。而在中秘室，則是戚本禹、林克等人寫大字報開展大鳴大放，把其他同志定為‘右派’分子”，“受一面之詞和片面匯報的影響，最高領導人一邊倒的態度，被戚本禹、林克等人加以利用，在中秘室實施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僅有70多人的中秘室，王文、何載等4人被打成右派，曾三、劉華峰、李東冶、王剛（已故）等18位同志做了‘反黨錯誤’的結論和處分”，“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始作俑者戚本禹，帶著在中南海‘黑旗事件’預演所取得的經驗，8年后榮升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在容全堂寫出的“歷史真相”里，何載的官僚主義、脫離群眾、不尊重下屬、不平等待人，變成了既表揚人，也批評人，只是批評人“顯得急躁一些”，“多了一些”；我們給何載提出的“三條意見”，都變成了“子虛烏有”的誣陷；何載他們在反右派運動中，借故對我們搞斷章取義、上綱上線、扣上罪名，變成了我們對他們斷章取義，上綱上線，扣他們帽子；1957年我們被何載他們打成右派，變成了何載被我們打成右派，而我們在繼1957年被何載他們打成右派之后，又在1958年，被何載的支持者楊尚昆操縱的工

作組打成“反黨小集團”，變成了根本不存在的事；“最高領導人”派人把爭論雙方的大字報都抄去看、抄去分析，并和爭論雙方和相關領導人聚集在一起，做現場調查，自由聽取雙方的陳述，最後根據雙方實際所為做判定、做結論，變成了最高領導人“受一面之詞和片面匯報的影響……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毛主席也是我們這些小科長們就可以“加以利用”的么？實際上，毛主席總是把水端平的，他在現場調查中得知有人對我們搞跟蹤、盯梢，就批評“是用對待敵人的辦法對待革命群眾”。在八年后發生的文革中，毛主席同樣堅持這個原則，知道早先遭到王光美迫害打擊的清華學生“智擒”王光美之後，也嚴厲批評學生不能用對待敵人的地下工作的手段對待黨內同志，而且在周恩來、林彪簽字的王光美專案文件上，毛主席批示了“保留活證據”，使得王光美免遭了更大的打擊。這都說明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胸懷和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這樣一個革命領袖、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會“受（幾個小科長）一面之詞和片面匯報的影響，對黨內同志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容全堂還完全不負責任地說我們在批判何載的時候對何載“推搡、打人”，進而發展到“幾起查抄”。事實是，何載他們起初批判我們，上午，下午，有時晚上，都是文明的，沒有推搡、打人的事。後來事件翻過來，大家發言，指出他們的錯誤，也是很和平的，根本沒有什麼“推搡、打人”，更沒有進而發展到“幾起查抄”。就是說，在整個事件前后，無論哪一方占了主動權，都沒有向對方搞肉體批判。在春藕齋開會辯論，他們都是坐著的，從來沒叫他們站起來過。當時是曾三作的記錄，記到後來，他就寫條子給我，那條子現在都還在。上面寫：“主席（當時我是會議主席），現在我頭痛的厲害，支持不住了，是不是可以讓我出去休息一下”。我同意了，他就出去了。不管是容全堂也好，還是其他什么人也好，凡是說有“推搡、打人”，或者說“抓臉、揪頭發”之類，都是瞎說。那個時候，就是社會上的辯論也沒有推搡、打人的，遑論中南海裏面？說“推搡、打人、查抄”的人，是在利用很多後來人對當時

歷史不了解，移花接木，捏造證據，搞有罪推定。

容全堂還暗示“戚本禹進入中央文革，就是因為在這起事件中獲得了污蔑陷害別人的經驗，被毛澤東看中了，8年后被毛澤東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我戚本禹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即使是“帶著這個事件的經驗”，也和這個事件本身一點關係都沒有，要是有的話，那其他也有這個“經驗”的人怎麼就沒有“榮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呢？我進中央文革是因為我此后八年的綜合政治表現和學術成就，而不是什麼在“黑旗事件”中所取得的經驗，具體說是我對於社會主義道路的毫不動搖的堅持和我繼1963年寫出《評李秀成》一文之後，又寫出了多篇重要的理論文章，符合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設想和建社社會主義新文化的現實要求。

引用到這裡的這些一目了然的不尊重歷史事實，還只是容全堂“歷史真相”里的部分內容。他的整篇文字表達的東西，簡直就是在講天方夜譚的故事，而不是在寫歷史。

例如，容全堂不但說“毛澤東主席余怒未消，1958年5月8日—23日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3次以秘書室整風為話題，引申出要‘插紅旗、標新立異’，他要求各個山頭，村落，各個機關、部隊、工廠、合作社，都要插紅旗、拔白旗”，而且還牽強附會、張冠李戴、移花接木，把60年代的文化界、史學界的爭鳴與這次的“黑旗事件”直接掛起鉤來，以便按照他自己所理解的“黑旗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建立二者之間的聯繫，完成他的“黑旗事件”就是“文革預演和試驗”的立論。“八司馬事件”，表現形式上的確就像是一場“小文革”，但它不是“文革預演和試驗”。因為當時毛主席和黨內其他同志，都沒有後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八司馬事件”之前也是根本沒有的，因此不可能在那時搞“文革預演和試驗”。若硬要把它看做“文革預演和試驗”，那麼，不同的政治觀點和階級立場的人，就會像看待和理解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樣，從不同的政治角度和階級立場去看待和理解這場“預演和試驗”，得到的政治和階級含義是完全不同的。

再例如，在容全堂那里，林希翎來秘書室不是在整風運動之中，而是在反右派運動中被打成了右派之后，而且是來請求平反的；王文似乎也沒有在整風運動中接待過她，更沒有到北大去聽去支持她那些導致她被打成右派的演講——林希翎是因為她在整風運動時期在北大發表講話，散布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和公開的直接的反社會主義言論，而在反右派運動開始后被劉少奇親自確定為右派的。這是眾所周知的。容全堂不是不知道事實，而是故意錯置時間順序，罔顧事實。

再再例如，容全堂的父親何載在“八司馬事件”中，就沒有被打成“右派”，容全堂說他被打成了右派，還說他是第一個被加上“黨內”二字的“右派”。不知道他的依據是什么？何載、王文等四人在“八司馬事件”之后被打成右派，有的是因為在“八司馬事件”中的表現和做法違背了黨內民主原則，混淆了敵我矛盾等錯誤，有的是其他原因，都不是“八司馬事件”本身的內容。我們“八司馬”是何載的下級，都是沒有權力給他們帶上“右派”的帽子的，甚至“二王”（田家英、彭達彭），也沒有這樣的權力。可是，容全堂為了掩蓋何載他們在反右派運動中打擊迫害我們的歷史真相，同時制造一個何載他們被我們打擊迫害的“歷史真相”，就說中南海的反右派運動比社會上的反右派運動“慢了半拍”——社會上反右派運動結束了，中南海的反右派運動才開始。可是，無論容全堂怎麼制造“真相”，中南海的整風運動、反右派運動都是和當時全社會的運動完全合拍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是無法否定的。正是在這個基本事實下，是何載作為秘書室的領導，要把我們這些給他提意見的下級打成右派，而不是我們這些下級要把他這個上級打成右派。請問容全堂，黨內生活中，下級可以給上級做組織處理的結論嗎？容全堂連這樣的常識都不能面對，就只好制造一個毛主席被我們小科長“利用”了的“真相”出來。

夠了，不必再“例如”了！……

容全堂不但對“八司馬”的對立面盡情頌揚，對毛主席和我本人公開地用“春秋筆法”進行“筆則筆，削則削”，而且還對

另一位當事人林克堅守自己的觀點表現出很不尊重，他寫道：

林克在香港回歸前的 1997 年 3 月 1 日在香港出版的《毛澤東人間相》一書的說明中提到，當此書成稿時，經再三考慮還是加上了“中辦秘書室整風——‘黑旗事件’始末”一個章節，依然堅持用 1958 年盛行的極“左”觀點寫“黑旗事件”。

為什麼林克就不能堅守自己的看法？不能堅持 1958 年的政治定性？就必須按照後來的政治觀點來寫“黑旗事件”？後來給出的所謂“極左”，具有特定的含義，與當時的“黑旗事件”根本掛不上鉤。在黑旗事件中，如果存在“極左”，那顯然是何載及其背後的支持者是“極左”，是他們把給他們提了意見的人打成“右派”，進而打成“反黨小集團”，這不是“極左”，是什么呢？毛主席是及時制止了他們“極左”行為，把一起何載等“極左”分子對“八司馬”製造的冤案平反昭雪了。現在的歷史寫作，濫用“極左”一詞，不但恨不得把毛主席在文革中做的任何事情都說成是“極左”，還恨不得把毛主席一生中做過的任何事情，都要說成是“極左”。所以，“八司馬”就成了“極左”分子，毛主席給“八司馬”平反也成了“極左”行為。照這個邏輯，1949 年前毛主席多次挽救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打小日本，打國民黨，建立起人民共和國，也是“極左”了。這真是荒謬之極！

我是“八司馬事件”中的主要當事人之一，而且，就給何載寫大字報而言，我的確是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但是，由於何載等人對我們搞打擊報復，後來的事情都脫離了我個人和我們八個人的控制。這正是這件事一波三折，直到主席介入才峰回路轉，我們才獲得解放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後，這個事件再次翻轉過去了。現在，我已經把知道的都寫在這裡了，對歷史做了一個完整的交代，算是向歷史作一次證。這個作證等於是為那些曾經遭受何載和工作組打擊，後被毛澤東主席解救出來，現在又重新遭受污蔑卻不能再做申辯的逝者說幾句公道話，也為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貫的黨內民主作風提供一點證明。容全堂可以繼續抹黑我本人，繼續不尊重林克，甚至也可以繼續抹黑毛主席。但是，處理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敬請

還是下筆謹慎一些，留給后人一些真正的歷史真相，不要為現實政治主導下的主觀觀念所支配，留給后人一堆主觀主義、唯心主義的歷史垃圾。畢竟，歷史和嚴肅的歷史研究者對於這樣重大的事件終歸是自有判斷的。

第九章毛主席派我們去四川種試驗田

1、大躍進中，中南海里也建起了三座小高爐

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後，大躍進運動在全國範圍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在中南海里也不例外。剛剛從“八司馬事件”中被毛主席解放出來的我們，那更是熱情高漲，干勁沖天。我們響應黨中央大煉鋼鐵的號召，夜以繼日地在中南海里壘起了煉鋼的“小高爐”。那個時候，在中南海里面一共壘起了三座小高爐，其中一座是機要室壘的，一座是我們秘書室的，還有一座是后樓研究室的。

老賁說，那時我們對如何煉鋼，實際上是一點基本的概念都沒有的，就是沖著響應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一定要把鋼煉出來。我們一面看書，按照中國古代的方法去煉鋼；一面請冶金部冶金研究所的同志來跟我們上課。煉出了一塊鋼之後，馬上就拿到冶金部的冶金研究所去化驗，看看是不是合格。人家看到是中南海送來的，當然不敢怠慢，就一次次地給我們化驗。而當時我們是連一點成本的概念都沒有的。

朱德，李富春等中央領導人都到我們小高爐旁邊來看過。他們都豎起大拇指，贊揚我們干得好。

毛主席也來看了。但我發現主席看了之後就只是朝我們笑了笑，什麼話也沒有說。我心裡就想，主席對我們這樣的做法明顯的是不贊成的，不然他一定會表揚我們的。可他一句話都沒說，也沒有批評我們，他這是不願意打擊我們的積極性。主席對群眾的積極性從來都是很注意保護的。說實話，我很能理解後來廬山會議上人們對彭德懷的憤怒心情的：別人都在沒日沒夜、拼死拼活地干，你什么

事都沒有，到頭了卻過來說風涼話。

白天，我們仍在秘書室上班，處理各地的來信。那時我們所收到的信件中，最多的就是向黨中央，毛主席報喜的捷報。而在來信中提出反對意見的很少。

我記得很清楚，上海的一家工廠制造出了我國第一輛小轎車，把它開到中南海來展覽。那是了不得的事啊，解放前我們中國連一輛完整的自行車都造不出來，現在不但生產出來解放牌大卡車，而且連小轎車都造出來了。中南海的人都去圍著看了。我看那轎車的外殼好像還是人工打造出來的。楊尚昆也來看了，經過了“八司馬事件”，他和我們的關係明顯地改善了，他也時常到我們中間來走走了。他對我們說，將來你們也可以去買一輛，開著車來上班多好。這事當時我連想都不敢想的。可他說，你看人家蘇聯，青年人都是自己開著車去上班的。我說，要買那也是楊主任這樣的才能買。他笑著說，我不用買，我有公車。除非等我退休了，才會去買。

應該說，大躍進所激發起的群眾的熱情和干勁，在歷史上是罕見的。它也確確實實的為我國經濟建設作出了巨大的成就。雖然說那時有好些事情在今天看來是很幼稚的，甚至是錯誤的。但在當時它確實是鼓舞著人們，在很多領域里創造出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奇跡出來。我們國家好多東西（包括原子弹、導彈事業）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起步的。

現在關於大躍進的文章可以說是汗牛充棟，但是大部分都為了找些可以用來攻擊毛主席、攻擊共產黨的東西。真正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地評述歷史的卻不多，即使有也多是不讓發表的。

群眾的熱情中帶有盲目性，這是不奇怪的。問題是在這種群眾熱情的背後，卻隱藏著由一些領導干部為了自己的“政績”而刮起來的“浮夸風”。這才真正是要命的。

2、從“共產風”、“浮夸風”到“高指標、高征收”

從劉少奇這個人的歷史來看，他一直是忽左忽右，在左、右之間搖擺不定。解放初期，他對合作化所持的消極反對的態度，和提出所謂“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觀點，都被毛主席批評為右傾思想，并且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可是，到了1958年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劉少奇卻又表現得非常起勁。這可能與他即將就任國家主席有關系，新官上任，總要做點成績出來。他一下子從右傾跳到了極左。你去看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和他在大躍進期間到各地的講話，好些話簡直就是在說胡話。

從1958年的下半年開始，毛主席把很大的精力放在處理“炮轟金門”這件事上面去了。所以劉少奇那時實際上已經是在第一線主持工作了，因為他即將就任國家主席，所以跟著他后面的人，上上下下都有一大堆。

在那個時候，劉少奇講了很多過頭話，例如，“大踏步地提前進入共產主義”就是劉少奇的原話，由於他是在一線主持工作的，這些話到了下面，就成了刮“共產風”的源頭了。他還異想天開地提出了什麼“男女分營”，要把一個個好好的家庭都拆散，夫妻倆只有在星期六才能住在一起，其他時間都要分開住。好些地方都已經按照他說的去實施了，可這樣一來，就弄得怨聲載道，嚴重地影響了群眾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也極大地削弱了群眾對黨的信任。家庭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不要家庭了，這種東西誰會擁護？事實上，這連他自己都不會真正擁護的。陳秉忱告訴我，毛主席對劉少奇的這個主張是很反感的，說他自己和王光美就分不開。根據劉少奇說的，在中南海里一度也醞釀起了要取消家庭。說中南海有很多大屋子，男的可以住在這裡，女的住到那裡。這樣一來，搞得我們也都是人心惶惶的，整天擔心著自己的小屋會不會給收回去啊。如果收回去了，那私人東西放在那兒啊。這話如果是別人說的，那可能大家還不會太在意，可那是劉少奇的講話，你能不把它當回事？

陳伯達那個時候也跟在劉少奇的后面，在《紅旗》雜志上發表文章，說要取消貨幣和商品，還說通過“窮過渡”也能進入共產主義。他的文章一出來，就馬上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取消貨幣、商品，那你公社就可以共大隊的產，大隊共小隊的產，窮隊共富隊的產了。這就是所謂的“一平二調”。後來毛主席在廬山會議的時候把它比作是“青搶紅偷”的“青紅幫”。

然而在大躍進中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共產風”，而是“浮夸風”。後來的餓死人就是和這個“浮夸風”密切相關。

“浮夸風”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放糧食高產的“衛星”。而那些所謂“高產田”、“畝產萬斤”的消息都是在《人民日報》上首先刊登出來的。鄧拓當年是《人民日報》的總編輯，而鄧小平則是黨內分工主管《人民日報》的。當時，劉少奇是怎么講的，鄧小平是怎么講的，而毛主席又是怎麼講的，當年的《人民日報》和許多其他報紙都登出來的。劉少奇的講話當時還印成了書，在全國發行。

劉少奇到下面去視察，說他現在不是擔心糧食少了怎麼辦，而是擔心糧食多了怎麼辦，沒有地方放了。人家報畝產已經達到上萬斤了。劉少奇還問人家，能不能比一萬斤再多一貼。這種話當時都是刊登在報紙上的。

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也浮夸得厲害。還有幾個大區的書記頭腦也都是比較熱的。河南，山東和安徽這三個省都在相互“別苗頭”。你報畝產幾千斤，我就一定要超過你，要上萬斤。你搞了上萬斤，我要不搞上萬斤，那不就是我不行了嗎？那我就要報得更高。這到後來就連一貼常識都不講了。我從小是在農村長大的，你就連麥稈一起稱，也沒有那么多的。

當時東北地區還是比較穩的，沒有怎麼瞎報產量。1958年9月鄧小平去東北視察，當地的領導匯報第二年的糧食產量計劃增產20-30%，鄧小平就批評說：別人都好幾倍的增產，你們才20%，簡直就像是烏龜爬。把當地的領導罵得灰頭土臉的。他這話就登在1958年10月的《人民日報》上。

鄧小平那次去東北視察，是帶著田家英一起去的。田家英在大

興安嶺時被一個不知什么的蟲給咬了，手臂腫的很厲害。田家英回來跟我說，鄧小平下令，讓醫院一定要給他治好。田家英為了這事非常感激鄧小平。不過田家英也說，鄧小平雖然是生在農村，但他家里是大地主出身，他從來就沒種過地，農業上的事他根本就不懂。

據我知道的一些情況，當時各個地方也有不少人是反對搞浮夸的，可他們卻都被認為是思想保守而受到批判，有些甚至受到處分。最典型的像安徽的省委書記曾希聖，他不但搞浮夸搞得厲害，而且他底下的人都不能反對他，誰反對他，他就說人家是右傾，反黨，就把人家打下去。換了一批人上來，還是反對他，他就再把人家打下去。這樣幾次一打，還有誰敢再反對他。毛主席開始對他還挺相信的。山東的舒同搞浮夸出了問題，主席就讓曾希聖去把山東也管起來。可後來一了解，曾希聖的浮夸比舒同還厲害，就叫他不要再管了。下面對曾希聖的意見也反映到中央來了。劉少奇說，這個人曾經對革命有過特殊貢獻的，除了毛主席，誰對他有辦法？河南的吳芝圃吹牛也吹得很厲害，他也整了很多反對他吹牛的人。

“浮夸風”所引起的糧食生產的“高指標”，直接導致了 1958 年秋季糧食征購時的“高征購”政策的推行。你報了一畝地能打兩千金糧食，那征購 50%、就是一千斤。結果你實際上連一千斤都達不到，那征購以後，農民就顆粒不剩了。

3、毛主席根本就不相信報上的“衛星”：畝產萬斤糧

林克在大躍進時期，一直跟著毛主席到各地視察，他對這一時期主席的情況很了解。那次他隨主席一起從天津參觀回來，我看到報紙上登出來的那張小孩子站在麥穗上的照片，就去問林克，報紙上所說的事情，他到底實際看到過沒有。他說他沒有看到，但他說他能想象把那些麥穗堆在一起，是很匝實的，小孩子站上去，坐上去都是可以的。但那並不是自然生長的，是人為地堆出來的。我問林克那是不是真有萬斤糧呢。報紙上說，主席在天津問了：真一萬

斤嗎？真這么多，吃也吃不完，怎麼辦？林克告訴我，主席這樣說，就是不信這個萬斤糧，懷疑萬斤糧的。主席說了這些話之後，就叫林克他們去把這個畝產萬斤糧的事給弄清楚。林克他們下去一了解，原來那是種試驗田的人，在糧食成熟得差不多的時候，半夜里把好幾畝田里的小麥、稻子都挖出來，把它們都集中到一畝田里，然後澆上水，讓它們繼續長。林克說，這樣一搞，稱出來的結果真有一畝地幾千斤的，但是一萬斤是沒有達到的。他把了解到的情況照實都告訴了主席，主席笑了笑說：原來是這樣的。林克還告訴我，當時主席特別關照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們千萬不要跟著去瞎說。

毛主席不相信畝產萬斤糧，但下面報上來的數字卻一個比一個高。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在他的報告中就說，四川省糧食產量最高的是畝產上萬斤，平均是畝產兩千多斤。為了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糧食。1959年初，主席就命令田家英帶著秘書室的工作人員親自到農村種試驗田去。

田家英向我們傳達了主席的指示，他說，主席講，岸英當年從蘇聯回來的時候，我就讓他去向農民學習，拜農民為師。你們也要親自下去，要跟農民一起勞動，拜農民為師。你們下去以後，要找一塊最好的地，量好面積，用最好的種子，用農民的最好的辦法，自己種，自己管理，不要別人插手，從下種到收割，全部自己來，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糧食。打下的糧食，你們也要自己去稱，是多少就是多少，不準多一斤，也不準少一斤，回來把結果告訴我。

4、到四川種試驗田

1959年，剛過完春節，田家英、逢先知、李學謙、駱文惠和我五個人組成了一個小組，田家英當組長，我擔任臨時支部的支部書記。同去的駱文惠是來自四川重慶的一個姑娘，她是二科的科員。李學謙是三科的科員，來自河南，也是一個女同志。我們一行來到了四川省新繁縣的大豐人民公社。

我們下去以後，就分散到不同的中隊去。田家英去了一中隊，但因為他經常要去省里和其他地方開會，所以他住在公社，也沒有多少時間下地。逢先知是他的秘書，跟他一起，天天東跑西跑的。駱文惠去了另一個中隊，她干農活比我行，但她畢竟是個女同志，一個人搞實驗田有困難。李學謙又在一個中隊，她倒是也搞了塊實驗田，但規模沒有到一畝。

我小時候在農村呆過，我姥姥是個貧農，那時我常幫著姥姥在田里干些農活。雖然那時我還小，但也知道一畝小麥能打一百多斤，頂多兩百斤就很不錯了。現在，毛主席要我們來實地做調查，我是很高興的，我心裡也很想搞清楚，在一畝地里究竟能生產出多少糧食來。盡管在農田里勞動是很辛苦的，尤其是種水稻，兩條腿泡得黑乎乎的，時常還會有螞蝗爬在你腿上吸血。

我種的試驗田是在新繁縣崇義鄉大豐公社第四中隊的第六小隊。聽說我們是中央派下來的，當地的干部都很積極配合。我說要一塊最好的田來種水稻，他們就給了我一塊最好的稻田。說是一畝，我不放心，就自己去丈量，有六百六十多平方米，差一點就是一畝。另外，我還劃了一塊麥田，也差不多是一畝。我交代說，這都是我的田，別人誰也不能碰的。

我是在北方長大的，對水稻不懂，盡管小時候也在地里勞動過，可真正對農活卻還是一竅不通的。於是我就從耕田開始學起，農民教我怎麼套牛、牽牛、架犁、扶犁。一開始我覺得這挺容易的，比我寫文章找材料容易多了。可實際一干，就出了洋相。那農田下面的土層其實是不平的，不同地方泥土的硬度也不一樣，因而是有深有淺的。所以扶犁的時候是有講究的，碰到硬一點的地方，要把犁尾壓一壓，把犁尖翹起來一點，或者把整個犁往上抬一下，就能過去，否則就拉不動。可我開始並不知道，看到前面的牛停下來不走了，還以為是牛偷懶，我揮動鞭子就往它身上甩，想嚇唬它，讓它快走。那牛被嚇了之後，就一個使勁往前沖，一下把犁都弄斷了。前面我嘴里還哼著小調，一付很得意的樣子，忽的就叭嗒一下摔倒在田里，弄了個嘴啃泥。田邊上看著的小孩就叫啊、笑啊，弄得我

非常狼狽。邊上的老農看見了就趕緊上來把我拉起來，看我全身都是泥，趕緊帶我去附近河里洗了洗。再回來一看，犁也壞了。那犁可是農民的寶貝，當時這樣一副犁要四十多塊錢。我忙說由我來賠，當時我的工資也就一百來塊，這差不多是我半個月的工資了。可是一位公社來的干部說，上級有規定，你們干部下來勞動，損壞的農具都由公社負責來賠。我現在想起這事來還是覺得挺內疚的。

換了一付犁，我想再給牛套上繼續去犁田。可那牛是會記仇的，它死活也不讓我套了。這時老農民對我說：你要拍拍它的馬屁才行。我問，怎麼拍牛的馬屁呢？他就教我，你去弄點它喜歡吃的嫩草來喂它，喂的時候要讓它看見是你喂的。你一邊喂還要一邊向它作檢討，說牛啊，對不起，我讓你受驚了。我照著樣做了，果然有效。沒多少時間，那牛又聽我使喚了。不過，打那以後，隊里干部就不怎麼讓我犁了，怕我再弄出事情來。

耕完田還要播幾天，讓太陽曬一曬，然后再用耙來把整塊田耙平整了，這樣放上水以後，泥塊在水里就變得細膩松軟了，這時才可以在田里插上秧苗。

那時的報紙上整天都在宣傳要密植，說只有密植才會高產。而且（四川）省里還規定，要用什么“螞蟻出洞”、“雙龍出海”的方法進行密植，也就是把秧苗插得越密越好。可當我去征求農民意見的時候，農民卻對我說，老戚啊，你要信了報上說的那套，那你的試驗田就打不出多少糧食來了。農民講，他們聽了那些宣傳是已經吃過虧的。“螞蟻出洞”、“雙龍出海”，秧苗對著秧苗，密得不得了，可等秧苗長起來的時候就倒伏了。農民講種地的學問，可能是講不過教授、學者的，但是講實際知識，講通風，講稻苗授粉與蜜蜂的關係、與風力的關係，土壤深耕與密植的關係，土壤肥力和收成的關係，這些因素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管理的作用，那都講得頭頭是道。他們說不能硬性規定行距間距，你要根據具體情況來看的。我覺得，這就跟毛主席常講的“具體情況要具體分析”是一個意思了。我就說：聽你們的，你們平時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後來關於這個密植的問題，我還按照農民跟我講的意見，把各種情況作了匯總，給

中央寫了一個專題報告。

接下來，農民又告訴我，要想增產，就得到城里去拉人糞。對莊稼來說，人糞是最好的。他們還說，我們去拉，人家不會給我們。你是從中央來的，你到城里去拉，哪里都會給的。人糞不值錢，但拉回來就是糧食。于是，我就找了幾個年輕人跟我一起拉著板車到成都市里去拉糞。這一拉就差不多拉了一個月。從新繁縣崇毅鄉到成都市區，大概有 20 多公里路。有時在路上遇到下雨，我們就躲在板車底下躺一會，等雨小了再走。有一次，我們剛從城里拉著糞出發，就下起了大雨。雨太大，回不去了。我就想到省里的招待所住一晚上，第二天再走。省委的招待所在老皇城里，那里過去是個軍閥的公館。招待所的門衛一看我們是拉糞的，說什麼都不讓我們進去。一起去的農民指著我跟他們說，他是中央下來的人。人家不相信，哪有中央下來的人拉糞車的。我告訴他們打省委某個處長的電話，他們打了電話，知道我確實是“北京來的”，馬上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安排我們洗了熱水澡，換了衣服。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一早，我們離開了招待所，回到了新繁。但從這以後就是再遇到大雨，我也不去招待所了，因為我覺得這怪麻煩人家的。我們老祖宗種地，是沒有化肥的，都是用人畜的雜便來當肥料的。那時四川還有林苕子作肥料的。苕子的學名叫紫雲英，它的嫩葉和苗尖還可以吃。但是你把苕子翻倒在田里爛了，那就是肥料了。我看到當時報上都登著，施肥越多越好，這樣產量才會上去。我就想把拉來的人糞都澆到我的地里去。老農看見了就對我說，老戚，你貪心了。實際上並不是肥越多越好，放到一定量就夠了，多了，莊稼反而長不好，干不好還會把莊稼弄死。不信，你拿幾棵秧苗回家去做個試驗就知道了。我照老農說的去試，果然到了第二天，秧苗就枯萎了，沒兩天，秧苗就死了。拔起來一看，底下根都爛了。泥土太肥了，把秧苗的根燒死了。

等插下去的秧苗長起來後，老農告訴我要去間苗，就是要把長得不好的苗拔掉。我說，拔掉後不是苗就少了嗎？老農就說，這種長得弱的苗以後是不會結果實的，但你不把它拔掉，它就會爭肥，

這樣就影響了好苗的生長，就會影響收成。老農還教我看什麼樣的苗算是弱苗，要去掉。

那個一直在幫我的老農叫老宋，他跟我非常要好，我很相信他。從耕田、耙田到插秧、除草、施肥、間苗，整個田間管理，我都是跟他學了，然後自己來做。那農民可真好，你只要跟他們交了朋友，他們什麼都跟你講。老宋叫宋德成，他後來當了大隊書記，2012年我到四川時，去看他，他還健在，居然也還記得我。他說他從來沒有把我當壞人看過。我問他，我當年種的田呢？他指著一群樓房說，都蓋了樓房了。我順著他指向看過去，那里已經變成了一片住宅區，已經沒有耕地了。

我那時種的是早稻。過了幾個月，到了收割的時候，我就讓隊里安排了民兵，叫他們扛著槍日夜在我的試驗田四周把守著，不許有一粒糧食帶進來或若帶出去。收割起來的稻子，一個稻穗都不許落下，全部都要收起來。然後就放到打谷場上，在一個方桶形狀的摔墊上把稻粒摔下來。那摔墊很好使，一摔稻粒就下來了。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撿起來。等到過秤的時候，我眼睛就一直盯著秤桿，高一點、低一點都不行，必須是平的，最後得到的產盤是500多斤，不到600斤。老農們說我的產量是不低的，能超過它的人並不多。現打的稻谷里還含有水分，曬干入庫的時候還要掉秤，到底會掉多少，我不知道。我就根據老農告訴我的經驗比例值來做調整。那個時候我的腦子里想的就是，這是要報告給毛主席的數字，必須搞實，虛一點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騙毛主席了。

5、與勞動模范羅世發的談話

在大豐公社種水稻，前后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從犁田、耙田、施肥到插秧、灌溉、追肥再到除草、間苗、其他田間管理，一直到收割、脫粒、過磅。整個過程我都是在經驗豐富的老農的指導和幫助下進行的，而且可以說是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

肥料、最精心的護理，最後得到的水稻單產也就是 500 多斤。另外，我劃出的一塊麥田，那是人家已經在種了的。我沒去參加管理。但到了收割的時候，我也像秤水稻那樣的一斤一斤地把它稱出來，共計是三百來斤。老農們也說我的產量不低了，能超過的農民不多。我就問他們：那你們的報告不是說平均有二千斤嗎？農民回答我：那都是干部讓報的。你不多報點，他們怎麼升官呢？我又問：那畝產萬斤又是怎么回事？他們就告訴我：那所謂的萬斤糧，是把快熟的稻子從其他的地里挖出來，然後把它們集中到一畝地上去，這就是衛星試驗田。那麼多稻子塞得田里都滿滿的了，小孩子都可以站上去踩。這情況與當初林克跟我說的他在天津所看到的幾乎是一樣的。

當時，在農業戰線上有兩個聞名全國的勞動模範，一個是江蘇的陳永康，還有一個是四川的羅世發。可是之前，在羅世發給主席的報告里，也說他種的地畝產是兩千斤。但我聽當地的農民講，本來人家是要他報一萬斤的，他堅決不肯，只報了兩千斤。我就想，我得到的產量只能代表我這個地方的糧食產量，不能代表其他地方的。當地農民說的話也不能全部相信。我應該親自聽聽羅世發他自己是怎么說的，才能下結論。於是，我就決定親自去拜訪羅世發。

羅世發當時有一大堆頭銜：四川省勞模、全國勞模、全國人大代表等等。各地去找他的人很多，他都應付不過來。他不是我所在的這個公社的，我要是一個人自己過去，恐怕還見不到他。所以，我就聯系了新繁縣縣委的曹書記，曹書記是個地道的農民出身的老幹部，可他對知識分子很尊重。我也算是個小知識分子了，又從中央來的，他對我也很尊重。我和他很談得來，在談話中我覺得，他也希望國家做的計劃和毛主席的指示，要符合下面的實際情況。我跟他說，我這次下來就是因為毛主席想要了解真實情況。他跟我說，那你一定要好好工作，不能辜負毛主席的委托。從我下來以後跟他的幾次接觸中，我覺得他是個蠻有魄力的人。而且看得出來，他是願意讓我調查到真實情況的。盡管他往上報的也是畝產兩千斤，但他實際是不願意這樣做的。在私底下他跟我說，他要不這麼報告，他這個書記也就當不了。就是這樣報了，他還挨批評呢。因為他報

上去的產量在各縣的報告中還是最低的。

我把想去和羅世發見面談談的想法說了，曹書記一聽，就說他陪我去。我說，不行，你是人家的父母官，人家見了你可能就不敢說話了，還是我自己去談吧。你給他打個招呼就行了。就說我是個不懂農業的知識分子，想跟他請教點有關農業的知識。曹書記爽快答應了，馬上通過電話和羅世發打好了招呼，還叫了崇義鄉的周書記陪我同去，給我領路。

那時陳伯達的秘書史敬棠正好來四川辦事，他順便過來著看田家英，田家英不在，就來看我。他也想順便了解一下農村的實際情況。我已經約好要去看羅世發，我就讓他跟我一起去。我又叫李學謙也跟我們一起去。

去找羅世發談話，我還是很有信心的。我覺得，他是個黨員，又是人民代表。只要我能講清利害，他是會說實話的。我也沒有別的要求，只想知道他真實的產量究竟是多少。

我們幾個人同羅世發見了面以后，我就感覺出來這個勞動模範是一個很實在的人，他沒有脫離農民的本色，他和有些整天只想吃吃喝喝的干部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先和他拉了一些家常，贊揚他這個農業專家對四川、對國家作出的貢獻，然后我就介紹了我自己種試驗田的詳細經過，還說自己並沒有按照報上說的那樣去做密植。他聽了就說：老戚啊，你不用多說了，其實在你剛開始種試驗田的時候，我就已經去看過了。聽他這樣說我倒覺得驚訝了，問：你這個勞模，真去看了我的試驗田？啥時候去的呀？我一點都不知道啊。他說：你插秧的時候，我就過去看了。上面派下來種田的，我都要去看看的。都說田家英帶了個工作隊來種莊稼，我就想去看是不是又是下來做做樣子，來瞎胡鬧還是干啥的。我還帶了幾個公社里的人一起去的。我看了以后就跟他們說，這個工作隊看來真是毛主席派來的，他這個試驗田種的是內行的。我一看就曉得，你那個插秧不是根據上面規定的‘雙龍出海’，是按我們農民的意見插的。他又說：我們實際上也沒有照省里的密植要求做，但在我們的報告上還是要寫是按照上級的要求做的。真要搞那個密植的話，那是要死

苗的。我們都是7、8寸的距離，都不是雙龍出海，雙龍出海太密了，苗長不大就倒了。你們是按老百姓的搞法來做的。毛主席派來的人就該這個搞法。

聽他這樣一說，我就問：那你的產量為什麼那麼高呢？我卻才這麼一點兒？才500多斤？他聽了就顯出了有點為難的樣子，瞪大眼睛看著我，不說話。不過我看得出，他並不是對我的話有反感，而是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我就說，老羅啊，你別看毛主席地位那麼高，他的計刺，他的指示，可都要根據下面真實情況來定的。下面報告上去的情況如果不真貨，他的指示就會脫離實際了。毛主席就好比是一個加工廠，如果材料不好，那出來的產品也就不好了。所以，你可要說真話啊。要都是假材料，叫毛主席怎麼領導啊？你看，我來了這麼長時間了，我種的試驗田，用的方法都跟你的一樣，可產量也就幾百斤，哪有幾千斤。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到這個時候，羅世發才說：老戚啊，你別問了。我就實話告訴你吧。哪有什么兩千斤啊？連兩千斤都沒有，又哪來的一萬斤呀？我這個地就是最好的了，去年用的種子也是最好的，結果也就打了八百斤。他們省里派來的干部整天都在這裡，都知道真實情況的。但讓我到各個地方去做報告，人家都是幾千，幾萬的，我這個勞動模範只打了幾百斤，那不是給領導抹黑嗎？為了不給領導抹黑，我就只能說兩千斤了。其實根本就沒有兩千斤，就是八百斤。

我又問他，那別的地方也都是瞎說的？他說，別人我不敢說，江蘇的陳永康，他報了最高四千斤。我問他，你是怎麼打的？我們都是種地的，都知道的，誰也騙不了誰的。陳永康就跟我說，老羅啊，別問了，你都知道，還來問我，哪裏有四千斤。我問他，那你去年到底打了多少？他說，也就八百來斤。

這就是當時四川糧食產量的真相，從中也反映出了全國糧食產量的真相。我們是幾個人一起去的，在現場聽羅世發說出這些真相的並不是我一個人。

跟羅世發談完回來，我把談的情況跟縣委的曹書記說了。曹書記說：羅世發報的這個產量，下來的干部都不敢去推翻它的，也推

翻不動的。你是用了什么法子啊？我說：沒用什么法子呀，就是實話實說，我告訴他，你這個勞動模範的糧食產量，牽涉到國家制訂的計劃和毛主席的決策。可能是我的誠懇打動了他，他才跟我講了實話的。我又問曹書記：我把情況報告上去。將來，你要是為這事挨批評怎麼辦？他說：你的調查跟我沒有關係。你在報告上別提我就可以了。一個多好的干部啊，可在那個時候也不得不說點瞎話。

6、給毛主席寫《關於四川新繁縣糧食生產真相的報告》

和羅世發交談之後，我就把我種試驗田的結果，和從羅世發那里所了解到情況分別寫了一個報告。在關於試驗田糧食產量的報告中，我如實地寫上了自己所種的試驗田的產量，我還特別強調了我用的都是最好的土地、最好的肥料和最精心的護理。關於和羅世發談話情況的調查報告，我把我怎麼講的，羅世發怎麼說的，羅世發說話的時候是什么表情，都詳細寫進去了。因為史敬棠也參加了和羅世發談話的全過程，而且他還當場做了筆記。我把報告寫好後，就跟他說，你也聽了羅世發說的，這是給主席的報告，你也看看。他看了以後表示同意報告的內容。我說，那你也一起簽個名吧。史敬棠也是贊成要對毛主席講實話的，所以就毫不猶豫地簽了名。他的級別比我高，是抗日戰爭時期的老幹部，又是陳伯達的秘書，影響力比我大，我就讓他把名字簽在前面。李學謙也參加了談話，我讓她也簽了字。所以最後這個報告是三個人署名：史敬棠、戚本禹和李學謙。報告的題目就叫做《關於四川新繁縣糧食生產真相的報告》。

報告寫好後，我就立即派人把報告直接送給正在參加廬山會議的田家英。田家英看了之後在報告上加了一句：這是史敬棠、戚本禹他們親自調查得來的報告。把報告呈交給了毛主席。

附錄：關於四川新繁縣糧食生產真相的報告

田家英同志：

我們在 6 月 7 日到四川新繁縣禾登鄉羅世發所在公社訪問。參觀了他們的莊稼、食堂，並和羅世發（他現在是全國人大代表、農業勞動模範）談了一陣。

羅世發所在公社原來是新繁人民公社的禾登大隊，權力下放以後，改為公社。羅世發現在具體來到這個公社的第一管理區。第一管理區共有土地 5600 多畝，人口 3400 多人（862 戶），勞動力 1800 多個。我們在訪問中，著重了解了這個管理區取得糧食產量和并田、密植等問題。現將我們了解到的一些問題和羅世發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報告如下：

一、去年的產量究竟有多少？

去年中共新繁縣委整理的關於選派羅世發出席全國農業先進單位代表會議的材料上說，跟世發領導的那個管理區水稻平均畝產量是 1929 斤（以稻谷計算，市斤制，下同）比 1957 年增產 214%。

今年 3 月，羅世發在省萬人生產動員大會上說，他們管理區，去年水稻平均畝產量經過地委、縣委反復查倉核對的結果是 1304 斤，比 1957 年增產 112%（見 1959 年 3 月 25 日《四川日報》）

但是，這些數字都不真實。實際上，去年水稻平均產量遠遠沒有這麼高。今天他談出真心話。他說，就他自己在小隊里參加收打的情況計算，水稻的平均畝產並沒有突破千斤關。真實情況是：雙季稻：兩季加起來，平均畝產有 1000 多斤；

中稻：一二等田，平均畝產量有 700 多斤；三四等田，平均畝產量只有五六百斤；有一塊最好的上等白鱈泥田，畝產量是 900 多斤。

他們去年雙季稻的面積占水稻面積的 30%。這樣，早、中、晚三季加起來拉平計算，平均畝產量大致在 750 斤、800 斤左右。羅世發認為“就按上述真實產量數字，去年的農業產生還是大躍進，成績是很大的，是誰也推不翻的。

羅世發還談到他們這個管理區幾年來水稻平均畝產的情況，現列表如下：

年代	1955	1956	1957	1958
产量(市斤)	605	608	613	750

根據這個增產數字，1955 到 1957 兩年水稻增產率只有 1.32% 而 1957 年到 1958 年的一年間，水稻增產就達到 22.34%-32.12% 之間，這個管理區增產速度是很快的。

羅世發說，“毛主席講得硬是對，一畝田能增產個二三百斤就算成績很大了。不講去年躍進數字，今年誰真正做到平均畝產 800 斤，都是應該得到金牌獎章的。”

他又說，“事實上去年真正能產上個八九百斤，都是不簡單的，我們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農民在一起講私房話，全國最有名的勞動模範陳永康的水稻，平均畝產只有八百斤，報的卻是二千斤。這是私房話，不能追究，追究起來，開起會來會要整死人。”總的來說，羅世發是一位風格相當高的農民黨員。但是他和我們談水稻真實產量時，思想上還是有矛盾的。他說：“產量問題是個大問題，是兩條道路鬥爭，說不對，否定了大躍進。右派才否定成績，我怎么能否定成績！”有時他又說：“我是共產黨員，當不當全國代表不要緊，要緊的是國家。你畝產七八百斤，卻上報二千斤，國家說打個折扣吧：一千四，征購四百斤，給你們剩一千斤，幾百斤做口糧，幾百斤做牲畜糧，留幾十斤做種子，幾十斤儲備糧，多余的還可以再賣點給國家。這個賬不是很對嗎？好！四百斤征購糧真交了，就露相。”“我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聽了很多報告，你虛報個躍進數字，國家計劃就要受影響，更嚴重的是社員吃飯問題，這是個大事情，如果交了糧吃不上飯了，怎麼辦？我著急啊！”“主席講得對，要說老實話，農民聽了都贊成（按：他們公社向農民講述了毛主席要講真話通信的精神，但沒有詳細傳達毛主席的通信），去年報這么多，今年怎麼辦？我們當干部的心焦啊！”“當然我們這個隊不能代表人家，人家也許有先進的。”“剛才說的這些話別人來了我不能說，參觀團，記者來，領著他轉，什麼也看不出來。報二千斤，我也能報，抽查也抽查不出來。你們來了我得說真話，說真話，對黨有好

處。”“別人來我也不敢說，說了背時，開會一追，是否定大躍進！”

新繁縣今年和去年的糧食產量，現在還沒有最後算出來，羅世發說，黨委也沒有做研究，不敢說。一種估計是 400 斤左右。但從今年春季麥子收交帳上看，似乎不夠這個數目。羅世發這個管理區今年小春麥子是 880 畝，完成征收人任務 22 萬斤，留麥種 17000 斤，還有 3 萬斤沒打的麥泡泡。照這樣算，產黃有 340?350 斤。究竟實際有多少，還摸不很準。這個管理區有一塊 1 畝多田的麥子，長得最好，原來計劃是畝產 1 萬斤，專家評定是 2000 斤。生長後期李井泉同志來參觀過，說起碼能打 2500 斤，實際收的結果是畝產 788 斤半。這塊麥田高產的經驗是：

肥料足（泥巴肥 1 萬斤，商品肥 100 斤，尿水 100 挑）：深耕 1 尺，種子 35 斤；密植規格 3×7 寸。

二、衛星田造成的浪費很大

去年這裡也刮了一陣并田放衛星的風，在人力物力上都造成了很大的浪費。整個管理區并了 40 多畝田，動員了 600 多個勞動力，搞了三四天。結果并的秧子都沤爛了，臭氣四溢，顆粒未收。按照平均產量計算，這 40 畝田少收谷子 3 萬多斤，可以供給全管理區社員吃半個月。此外，為了并田還吹了許多竹子做搬運工具。群眾到現在還對這件事情不高興。

三、密植問題

羅世發對現在推廣的密植規格有很多意見。

去年這裡總結和推廣的水稻密植規格是 3×7 寸。但實際上農民栽下去的大多數是 4×7 寸、5×7 寸，有一小部分是 4×8 寸、5×8 寸，或者是“7 寸、7×7 寸的。真正栽下 3×7 寸的並不是很多。此外，他們去年還試驗栽了一些 1×2 寸、3×3 寸，2×5 寸和 3×3×7 寸的雙行條栽（即雙龍出海）。從收貨的結果看，過分密植的 1×2 寸產量最低，畝產只有幾十斤。3×3 寸、2×5 寸和 3×3×7 寸的產量也不高。產最高的是 4×8 寸，畝產有八九百斤。

今年上級全面推廣 3×3×7 寸、3×7 寸的密植經驗，而且規格質量要求很高。許多社員和干部思想不完全搞得通，但是又不敢講。

現在秧子長起來了，又開始返黃，追加肥料又怕倒伏。特別是 3×3 $\times 7$ 寸的早稻，莊稼樣子長得雖然很好看，但實際上質量最差。羅世發領我們參觀時，用手撥開田畠中的禾苗給我們看，許多禾苗莖部細弱，子母秧枯萎，吊吊短小，有有效穗只占三四成。羅世發說：“如果記者專家來參觀，站在田坎上看看，數數田邊上的吊吊，敲敲算盤子，保險能敲出個一二千斤。但是最後打起谷子來，沒幾百斤。”

羅世發說“密植還是好的，也不能保守。有些規格才栽了一年，還不能就做結論。有些規格栽下去後，減了產，也不能都怪密植，因為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不過根據目前條件，大面積的密植規格還是 4×8 寸、 5×7 寸、 7×8 寸，為好。

羅世發聽說我們所在的大豐公社今年栽了很多 6×7 寸、 7×8 寸的秧子，他說：“現在 6×7 寸、 7×8 寸的抬不起頭來，將來收谷子倒可能翹尾巴。”他的理由是 6×7 寸、 7×8 寸雖然每畝的窩數比較少，但是沒窩兒率強，一窩秧子可以頂 3×7 寸的好幾窩。算起賬來，總穗數不一定比 3×7 寸的少。而且節省種秧苗，游秧子、追肥都方便，只要田間管理好，增產還是有把握的。

此致

敬禮

史敬裳 戚本禹 李學謙

1959年7月1日

第十章 我所知道的廬山會議的若干情況

1、李井泉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

田家英在廬山會議後告訴我，毛主席把我們送上去的《關於四川新繁縣生產真相的報告》看了好幾遍，批示將它作為廬山會議的會議文件印發下去。關於我們種試驗田的報告主席也認真看了。然後主席就把李井泉找來。毛主席找李井泉談話時，田家英也在場。主席問李井泉，四川糧食食畝產究竟是多少斤。李井泉不假思索就回答毛主席說，有些地方一千多斤，有些地方兩千多斤，平均是兩千斤。主席就問他，那怎麼田家英他們小組自己下去種田，才只有五百多斤？主席說著就把我們的報告給李井泉看。李井泉看了報告上寫的糧食產後就說，這不可能。他們調查得不對。他們說的這些產量是假的，是受了下面右傾保守思想的影響。他說，我都親自下去看過，的確是兩千多斤。李井泉還說，一定是他底下的人因為他們是中央派去的，故意向他們瞞報了產量。田家英當場否認了他的說法。這樣，當著主席的面，李井泉就跟田家英爭了起來，李井泉說田家英是帶著框框下去作調查的，這樣做就是否定大躍進。還說田家英是不是故意想要拆他的臺。主席就說：你看了他們寫的報告，他們這都是自己下去親自種的，親自打的，而且還自己親自去一斤一斤的秤出來的。你下去種過沒有？打過沒有？秤過沒有？李井泉說沒有。主席就說，沒有，那你怎么就否定人家呢？可李井泉還是繼續堅持自己的說法，他說，他要自己派人下去再作一次調查。

李井泉在當時的地方領導人中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在省、市領導中，就他和柯慶施兩個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我見過他好多次，他

一出來，那是前呼後擁，不得了的。我們的報告其實是說明了他向中央報告的產量是虛假的，這個他如何接受得了，這是牽涉到他政治地位和前途的事。而主席對他說的，看上去就幾句話，但其實是分量很重的幾句話。而且真正給李井泉打擊大的還不是我們所報的糧食產量，而是由他自己樹立起來的勞動模范羅世發所說的那些話。

李井泉立刻派了四川省的統戰部長親自去找羅世發，核實是不是跟我們說過這些話。平時羅世發去北京或其他地方開會，省里都是由統戰部長去通知他的。李井泉就專派了這麼一個羅世發最不敢頂撞的領導去找他核實情況。

統戰部長不敢怠慢，立即帶著人下去調查了。後來大豐公社的羅書記和周書記來北京看我的時候，把當時的經過情形告訴了我。統戰部長先是去了大豐公社，他們一群人是開著好幾輛汽車去的，聲勢浩大。然後他們又去了我種糧的那個小隊，問隊里的農民，戚本禹下來種田有沒有那回事？產量是不是 500 多斤？農民告訴他，是的，是老戚自己種的，自己打的，自己秤的。稱出來的糧食就是 500 多斤，600 斤不到。隨後統戰部長就去找羅世發，他把我們寫的報告念給他聽。並不無暗示地說，戚本禹他們向毛主席報告的是不是真實的？戚本禹在報告里說，是你跟他說的，你的畝產最高只有八百多斤。你是真這麼說的，還是他們記錯了？

羅世發可真是了不起啊！他頂住了，他說了真話。羅世發對統戰部長說：戚本禹他們沒有欺騙毛主席，我是這麼跟他講的，畝產只有八百多斤就是我說的。羅世發當時在全國的農業戰線上的影響是很大的。他這一來就把這個畝產萬斤糧的謊言給揭穿了，他的這句真話在當時真不知道解救了多少中國的老百姓啊！同時也解救了我。1986 年，我從秦城監獄出來的時候，頭一個想去看的人就是羅世發。可惜那時他已過世了。我心中一直都默默地在想，後人真應該為他建一座銅像，以紀念這位敢講真話的偉大的勞動模範。

統戰部長也實事求是地把他所了解到的情況，跟李井泉報告了。李井泉這才在毛主席面前認了錯。

後來在“七千人大會”的時候，李井泉還特地到會場上來找我，

當面向我道了歉。

2、彭德懷的“意見書”

本來召開廬山會議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糾正在大躍進中所出現的“左”的錯誤。毛主席採取的方法是讓全黨都冷靜下來，通過認真的看書、學習和討論，來總結經驗和吸取教訓。所以一開始，毛主席把這次廬山會議叫做開“神仙會”。毛主席自己就帶頭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等書，而且還開了個書單給黨的高級領導干部一起來學習，以引導全黨一起來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

事實上，從1958年的秋天開始，毛主席就察覺到在大躍進中所表現出來的過左的錯誤傾向，并通過召開各種會議，發表了一系列的講話來加以糾正。為了制止下面的干部對上隱瞞真相，對下逼迫群眾講假話的錯誤行為。毛主席甚至還用“黨內通信”的方式，親自給全國生產小隊以上的各級領導干部寫了一封信。我記得，我們在四川種試驗田的時候，中央辦公廳打電話來，在電話中把主席的信傳達給了我們。田家英遠親自通過公社的有線廣播，把主席的信念給了農民聽。可是田家英的普通話不標準，農民反映說聽不清楚。田家英就特地去挑選了一個公社廣播臺的女播音員來念，那位女播音員朗讀得很好，後來田家英還想把她介紹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這封信在當時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好多群眾就把主席的信當作一個有力的武器，用來抵制上面領導的瞎指揮。但是，也有很多地方都不把主席的信對下面進行傳達，封鎖了主席的聲音。

在廬山會議上，毛主席對李井泉的批評給會議的震動也很大。一些在大躍進中吹的厲害的領導人，像湖北的王任重、山東的舒同、河南的吳芝圃、安徽的曾希圣都感到心虛了，因為他們都虛報過糧食產量。特別是吳芝圃，大躍進的時候他最能吹了，所以在會上都沒有人願意理他，因為大家都覺得是上了他的當，受了他的騙。

但是主席對這些在大躍進中犯了左的錯誤的同志，主要是要通過贊書學習，來提高他們的認識，讓他們從所犯錯誤中吸取教訓，更好地工作。而不是要把他們都打下去。不但如此，主席還肯定了他們干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毛主席說了：放假衛星當然是不好的，但是如果能把假衛星變成了真的衛星，那不就好多了么。即使對在大躍進中說了很多過頭話的劉少奇，鄧小平，主席也沒有對他們提出嚴厲的批評。只是說劉少奇說“共產主義”是“言不及義”。他讓陳伯達他們專門編了一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的書，供全黨學習，以使全黨真正懂得什么是共產主義。

可是一些往大躍進中反對搞“浮夸風”的，或者因為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而受到批評，甚至受到錯誤打擊的同志這時候心里還是覺得憤憤不平。其實，這些人的力蛩也是挺大的，但就是沒有人出來領頭。像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周小舟，在大躍進時，因為他沒有怎么吹，被說成是插“白旗”的；而他臨近的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卻靠著虛報糧食產量，是到處揃了“紅旗”的。可是到後來湖北的糧食出現了緊張，卻開口要去向湖南去借糧了。與田家英被派去四川農村作調查的同時，毛主席還派了陳伯達去福建，派了胡喬木去江蘇的農村進行調查。結果他們兩個都因批評當地領導搞浮夸、說假話而受到了當地領導的抵制和排斥，搞得很不愉快。然而這些人當中如果沒有人出來挑頭的話，那他們也只能在心里面覺得不滿，發發牢騷而已。

就是在這個時候，彭德懷在小組會上的一通發言，就把那些對大躍進有意見的人都匯集起來了。彭德懷當時在黨內的實際地位是很高的。雖然他不是政治局常委，但因為在朝鮮戰場上取得的勝利，使他的威望一下子升得很高。他在開廬山會議之前去蘇聯和東歐訪問，赫魯曉夫就把他稱作是“國際英雄”，並且用接待元首的禮儀破格接待了他。可能當時在黨內，除了毛主席，其他的人沒有一個是在他的眼里的。而那個時候，毛主席已宣布退居二線，劉少奇剛當上國家主席不久。彭德懷又是主持軍隊工作的人。而且取代了粟裕當了總參謀長的黃克誠又是和他從“平江起義”開始就在一起的，

關係特別好。所以他在這個時候的表現就顯得更加微妙了。後來毛主席中央常委會上當著面對彭德懷說，有很多同志擔心，我死了以後，沒有人能管得住你。這句話確是實話，并非虛言。

彭德懷在小組會上的發言，雖然得到許多人的擁護和響應。但會議本來還是按照原定的議程，準備在通過相關決議以後閉幕。在這個時候彭德懷給毛主席寫了信。毛主席看了信，就把信作為“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批給了大會。

即便像彭德懷後來自己所說的那樣，他的信主要是針對著劉少奇的。但從信的內容來講，實際上是埋著很多釘子的。他所用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個詞，了解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這實際上是在發出進行路線鬥爭的信號。所以毛主席把它叫做是“下戰書”。田家英後來告訴我，“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句話，是張聞天看后建議彭德懷加上去的。

在會議討論彭德懷的“意見書”時，張聞天黃克誠及不少同志又分別在小組會上，發表了支持彭德懷意見的發言，使得會上的分歧與鬥爭更加尖銳起來了。

這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中蘇之間關係出現的變化。在廬山會議召開前，赫魯曉夫貿然向中國提出，要在中國建立長波電臺和核潛艇基地，受到了毛主席的抵制，使得赫魯曉夫對毛主席大為不滿。而彭德懷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卻是很曖昧的。彭德懷在主持軍委工作期間，把解放軍的服裝一律改為了蘇式的軍服。赫魯曉夫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一直是採取敵視和攻擊的態度。但他對彭德懷卻是大加贊揚，就是在舉行廬山會議的期間，赫魯曉夫正在美國訪問，他在美國發表的演講中也公開地贊揚了彭德懷。而就在彭德懷率領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剛回來，蘇聯就宣布停止向中國提供原子弹樣品，和停止在核領域與中國的合作。這顯然是一種向中共施加壓力的表示。此外與彭德懷一起去訪問蘇聯的同志向毛主席反映，在訪問期間，蘇聯曾撇開中方的翻譯，而與彭德懷單獨進行了會談。這明顯是不正常的。

廬山會議期間還有一件陳毅匯報的事。當時陳毅留守北京，相

當于看守內閣，有臨時處置權，可以調動軍隊。期間蘇聯駐華使館武官去見陳毅，并要求與他個別談話，陳毅就把秘書都叫走，只留下翻譯。蘇聯武官司開門見山說，你們中央在廬山開會，你在北京可以乘機把權力拿到手里。陳毅一聽，火冒三丈，立即把這個武官請走了。陳毅馬上把這個情況匯報給了主席。主席說，你讓他多講幾句嘛，蘇聯策反也不是一次了。蘇共領導人是一直想分化中共上層，想支持反對派把毛主席搞掉的。後來賀龍訪蘇時，也企圖策反賀龍，說他們一個元帥就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可以把毛主席搞掉。賀龍當場發脾氣，并報告總理。總理立即向蘇方提出抗議，不再出席會議，回國了。彭德懷後來被指責為“里通外國”，應該是事出有因的。在後來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就說，別的人都可以平反，就是彭德懷不能平反，因為彭德懷“里通外國”。文革運動中，我寫《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闡述的主要思想就是批判珍妃對光緒皇帝說出的主張：借助外國人的力量八國聯軍，幫助光緒皇帝廢掉慈禧，重掌政權。這種思想，也是現在國內一些人的想法。到今天我愈加理解了毛主席為什麼這麼重視對《清宮秘史》的批判。毛主席對外部勢力時時企圖尋找機會干涉中國內政是異常警惕的。

田家英後來還告訴我，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厄運，還與李銳在山上的表現有著很大的關係。

3、李銳的揭發交代與廬山會議的轉向

廬山會議結束後，在會議期間一直在主席身邊工作的林克，告訴了我在廬山會議上發生的這樣一個情況。在廬山上，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周惠、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李銳等幾個人經常晚上聚在一起。山上站崗的警衛戰士發現了一個異常的情況，就是等他們這些人都進了屋子以後，就把屋子裏面的燈都關上了，別人還以為裏面沒有人。等過了幾個小時以後，人又一個一

個地從屋子里面走出來了。警衛戰士把這個情況都作了記錄，把他們幾點關的燈、幾點開的燈、都有什么人進去、出來等等，都做了詳細的值班記錄。負責會議保衛工作的是羅瑞卿。羅瑞卿當時不僅是公安部長，而且他還是中央的“防止突發事件委員會”的負責人。羅瑞卿看到了值班戰士的記錄，也覺得很奇怪。他就親自到那個地方去看了，他在屋子前面的一個小樹林里觀察。直到那些人一個一個地從屋子里走出來。走在最後的一個就是李銳。李銳這個人走路和別人不一樣，別的人走路是朝前看的，而他卻是老往後面看的。大概就跟小說里說的司馬懿差不多。可就在他回過頭來看的時候，恰好同從小樹林里走出來的羅瑞卿對上了眼。這一下就把李銳給嚇壞了。以為他們的事情都已經被羅瑞卿發現了。

李銳就一個人連夜跑到主席那里去，要求見主席。見到主席以後，把他們在一起開會所說的話都說了出來。在李銳向毛主席作坦白交代的時候，林克都在場。

主席聽了李銳的坦白交代以後，就馬上找來羅瑞卿問了情況。然後就又把周小舟、周惠等人找來談話。李銳知道主席又找了周小舟、周越談話，生怕他們說的要比他說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了補充的交代和揭發。把他們在一起說的，什麼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還要壞等等的話都說了出來。李銳甚至還揭發說，在他們開小會的時候，他親耳聽到彭德懷給部隊打了電話。所以當李銳說他們是裴多菲俱樂部時，毛主席說，什麼裴多菲俱樂部，是軍事俱樂部。

前些年，當時的湖南省委譜記周惠寫的回憶錄里，第一次把這件事說了出來。周惠所寫的情況和當時林克跟我說的差不多是一樣的。

李銳所揭發和交代出來的問題，在廬山會議上掀起了軒然大波。大家一聽，原來彭德懷他們不只是對大躍進中所發生的一些錯誤有意見，而是把矛頭針對著毛主席和中央的領導的。彭德懷是國防部長，黃克誠是總參謀長，問題的嚴重性是顯而易見的。

會議馬上從克服大躍進中的錯誤，轉到了對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批判。這樣一來，廬山會議就徹底轉向了。不僅彭德懷

等領頭的幾個人受到了批判。連田家英也在小組會上受到了批判。

4、田家英叫我們從四川連夜撤回北京

那還是在廬山會議期間，我還在四川農村。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秘書室副主任陳秉忱從北京打來的電話。陳秉忱在電話里對我說：國慶節快要到了，你們趕緊收拾一下馬上回北京來參加籌備工作。而且還有別的重要任務，你們一天也不能耽擱，馬上啟程回北京。我說，這麼急，火車票都不好買，怎麼辦？他說，你們說是中央的，還買不到火車票？我告訴他，火車站人擠人，票真的很難買。他說，那你們就坐軟臥回來，坐軟臥的錢就從他的工資里拿出來給我們。因為我當時只是個科長，按規定是不能坐軟臥的。

我放下電話就馬上通知了逢先知、李學謙。那時駱文湛已回她的四川老家探親去了。然后我就連忙收拾行李，到公社要他們幫我把行李運到火車站。在火車站碰到了逢先知。李學謙卻沒能來得及過來，她說，最快也只得要明天才能走。我們也不能等她了。我們趕了當晚的火車回了北京。

回到北京才知道原來是廬山出事了。陳秉忱告訴我，田家英打電話來，說他在廬山挨了批判。他怕你們繼續留在四川，也會挨斗。所以叫你們趕緊撤回來。果然，後來大豐公社的周書記和羅書記到北京來看我也對我說過，幸好你們走得快，否則，廬山會議的精神一下來那你也是右傾了，你恐怕就走不了。像新華社四川分社的記者就挨了整。羅書記和周書記都挨了斗，說他們是跟著田家英搞右傾的。可是後來也斗不下去了，因為我在那裡種試驗田，周書記、羅書記都沒有直接參與。我去找羅世發談話，周書記也就是帶個路。最后是讓周書記為給我帶路的事寫了檢查。

田家英從廬山會議回到北京之后，就在我面前連聲地大罵李銳，說他是小人，小人，卑鄙無恥的小人。胡喬木也說，李銳怎么可以把我們在私下里聊天所說的話，都斷章取義地說出去呢。陳伯達、

胡喬木和田家英宣布從此與李銳斷絕往來。

李銳有記筆記的習慣，陳伯達一直擔心李銳把他說過的話都記在筆記上。在文革的時候，他叫我去抄李銳的家，把他的筆記本抄出來。我說，由中央文革組織人去抄李銳的家怕不大合適。後來他就讓葉群布置吳法憲，派人去抄了李銳的家。陳伯達拿到李銳的筆記本后，當即就把它撕得粉碎。

5、關於毛主席解救田家英、胡喬木和陳伯達

田家英、胡喬木和陳伯達都參加了彭德懷的“小會議”。這是為什麼呢，主席讓田家英帶著我們去四川種試驗田調查糧食產量，也讓陳伯達，胡喬木下去搞調查了。他們一下去調查，就會發現問題，就要把真實情況匯報給主席。這就都要和地方領導發生衝突。田家英是因為把我在四川做的調查報告給了主席，揭穿了四川的糧食產量浮夸，使李井泉受到主席的批評，從而得罪了“西南王”李井泉。李井泉那時當然會想：你田家英來四川調查，我對你那麼好，什麼會都請你參加，奉你若上賓，本來四川是工作上的模範，向國家交了多少糧，結果你一個調查報告，把四川說成是搞假的，這不是在主席那里捅我一刀嗎？李井泉是從來就沒有受到過這樣的打擊的。可想而知，這件事之後，李井泉對田家英的態度會怎樣。田家英還罵了王任重搞浮夸風，當時各路諸侯中，李井泉，王任重是最厲害的，柯慶施也算一個。三個大諸侯，田家英得罪了兩個，所以他的日子就不好過了。胡喬木也是，他在湖南也是到處批評指責人家，日子當然也一樣不好過。陳伯達在福建，也都是因為類似原因而不受地方領導歡迎的。他們這三個人拿李井泉、王任重這些人是沒有辦法的，在彭德懷站出來掛帥反對李井泉他們，向浮夸派發起批判的時候，就都很自然地跑到彭德懷一邊去了，但對於彭德懷的本意可能是並不知道的。

他們在“小會議”上到底說過毛主席哪些壞話，現在也是眾說

紛紜。當時，李井泉說田家英罵毛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田家英聽到就很吃驚，他以為是李井泉瞎說，就問他“你怎么知道？”還辯白說“我沒有”。李井泉就說是李銳說的。田家英這才知道李銳把什麼都坦向了。李銳後來改口：“是我講錯了，不是田家英說的，是我說的”。李銳是看到情形不對了，想把事情都承擔下來，但這時候誰也不相信他了。

說“鐵托殺了許多反對他的人”，說“毛主席還不如斯大林，是和鐵托是一樣專制”。這個話應該是有的，因為有好幾個材料相互印證，但到底是誰第一個說出來的，現在已經無法搞清楚了。其實主席沒有殺過一個反對他的人，連王明這樣的也沒有殺。有人造謠說王明吃了藥，遭人毒害，一大堆醫生出來證明說那是胡說八道。張國燾看不起主席，張國燾要走人，主席連他的女兒也不為難，也送出去。張國燾要回來，主席也同意，只要他做一個檢討就可以，張國燾檢討‘也不願意，就沒有回來。所以，王明都罵說主席厲害。主席歷來主張，大部不抓，一個不殺。在這方面，主席是最開明的，歷史上也無人可比，怎么能把他們和鐵托相提並論？

田家英恨死李銳了，從廬山回來後，在我的面前大罵李銳是“小人、小人，無恥的小人”；說李銳上串下跳，小會上講的最多，卻把什麼都推給別人；說李銳向主席坦白，不講他自己的，專講別人的，還亂咬人，誣告。李銳說田家英在什么地方當面給主席說過“主席百年以後會留下罵名”這樣的話。但是，就我對田家英的了解，田家英是絕對不敢這樣講的。他平時見了主席很害怕，很謹慎，哪來的膽量講這樣的話？李銳的這個話不可信。田家英和李銳一起背后罵主席，田家英的原話是這樣說的：我什麼時候離開主席，就死給主席看。他這是發牢騷，發不指名的牢騷。陳伯達也恨李銳，說他當叛徒。胡喬木也罵李銳，因為李銳把他也出賣了。

前幾年，周惠把李銳當年的表現都講出來了，李銳反駁周惠。我可以作證，當時田家英他們都認為李銳這個人是小人。那些罵主席的話私下講講，就好比是對領導有意見，也就算了，大家都一樣的。他到主席那里去坦白，就變性質了。我們是不敢講的，事實上

我們對主席很尊重，也不曾那樣講的。毛主席後來批判彭德懷，引用他們小組會上的幾句話，有些不是彭德懷講的，而是張聞天說的。張聞天在裏面起的作用很大。據他們後來自己說，誰在小組會上講話、講什麼、怎麼講，都是張聞天事先和他們打好招呼的。他們還說開會關燈是因為怕熱。

不管他們三個到底說了什麼，主席也沒有讓田家英寫檢查，也沒把胡喬木、陳伯達如何。各個省市對他們三個攻擊得很厲害，主席就說“他們都是我們的秀才”，就把他們解救出來了。其實，當時根本不是這幾個人的事。彭德懷軍隊里是有支持的，這幾個大秘書和彭德懷搞在一起，要不把他們和彭德懷分開，就不知道事情會發展到什麼程度。當年曹操官渡之戰後，從袁紹那裡收繳了很多圖書文冊，其中有一部分是曹操軍中和許都的人給袁紹的私密書信，是一些動搖分子在兩軍勝負未見分曉的時候，拉關係、留後路、甚至接洽投降的見證。就在那些寫信人忐忑不安的時候，曹操出人意料把這些書信全部當眾焚燒了，曹營軍心、政心頓時安定。主席絲毫不輸曹操，一句話就讓幾大秘書的事情過去了，那才是鬥爭的藝術、團結的藝術。所以，在廬山會議後，田家英回來給我們作報告，傳達廬山會議指示精神，批判彭德懷就很激烈。那個報告記錄我現在還有的。他說彭德懷怎麼怎麼反黨，怎麼怎麼野心家，必須要把彭德懷打倒，要在黨內批判。他講得比主席在文革中說劉少奇的大字報還厲害。

應該遭到嚴重處理的是李銳，主席把李銳看透了，說他是蔣干。蔣干為曹操服務，被周瑜利用。主席的意思是說李銳是彭德懷派來的，結果給看穿了。這是聽林克說的。主席連對李銳的處理都是寬大的，他同意了陳伯達的意見，沒有把李銳列入“軍事俱樂部”里，也沒有開除他的黨籍，只給一個黨內處分。主席一貫是這樣，你坦白了，匯報了，承認錯誤了，他就從寬了。主席要是把李銳和彭德懷一樣處理，那李銳就嚴重了。劉少奇說，他又不是中央委員，算不了什麼。其實，不是中央委員，卻是一個起了很壞作用的核心人物，有那麼嚴重違反組織紀律的事情，也該嚴重處理。現在攻擊毛

主席最厲害的，而且篡改廬山會議事實真相最起勁的，居然也是這個李銳。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6、廬山會議真正的教訓

廬山會議後，黨內就開展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原來因為在大躍進中搞“浮夸風”、虛報產量而受到批評的一些人，這個時候也起勁地反起右來了。結果不但是一些支持彭德懷意見的人受到了批判，而且一些對大躍進中的錯誤做法提出了正確意見的同志，也被說成是同情彭德懷的觀點而受到了打擊。當時胡喬木總結出了一句話，犯左的錯誤總比犯右的錯誤好。因為前者只是個方法問題，而後者則是立場問題。這在黨內流行一時。

然而，實際上由大躍進時期搞的“共產風”，“浮夸風”所產生的一些嚴重後果，在1959年的時候就已經顯現出來了。由“虛報糧食產量”而導致的“高征購”使得一些地方的老百姓斷了糧。中央那時就已經在想方設法向斷糧的地區回調糧食了。而所謂的“共產風”，搞“一平二調”也嚴重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勞動的積極性。緊接著連續三年的在全國大範圍的自然災害使得情況更加糟糕了。而蘇聯又在這個時候停止了對中國的一切援助，并要中國向它歸還因抗美援朝而向它所借的債務。全國進入了困難時期。

有好些人把所出現的困難的主要原因，說成是因為批判了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的批判是有著深刻的國際國內的背景的。試想，如果當時不批判彭德懷，而是完全採納彭德懷的意見，那將會出現怎樣的一種情形呢。恐怕黨就會分裂，全國也將要陷入到一片混亂中去了。

把彭德懷說成是糾正大躍進中“左”的錯誤的代表，也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就說了，你彭德懷所提出的“意見”，有哪一點是超過了我們當時已經在進行著的對“左”的錯誤的糾正和批評呢？一點都沒有。彭德懷只不過是要利用這些在大躍進

中所犯的錯誤，來達到他所要達到的目的。

但是，在批判彭德懷的右傾錯誤的時候，也確實把“左”的錯誤的批判掩蓋過去了，甚至是把“左”的錯誤說成正確的東西，使得這些錯誤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從而造成了進一步的危害。這正是毛主席後來在文革的時候所講的，是“一種傾向掩蓋了另一種傾向”。而這種情況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也是多次地重複的出現的。

1962年我在秘書室主編《群眾反映》的時候，就曾根據當時群眾來信中所反映的意見，整理了一個報告。報告的主題是，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行為事實上是嚴重干擾了黨對在大躍進時所犯的“左”的錯誤的批評和糾正。所以彭德懷對後來出現的困難局面是負有很大的責任的。報告是給周總理的。總理看了以後，同意我在報告中說的意見，把我整理的報告批發了下去。在我現在還保留著的我的“日記殘頁”中，還記載著這件事情。只是報告的原文後來被抄走後就不知下落了。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在大躍進期間帶頭搞“左”的東西的人，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也是最起勁的人，到後來卻漸漸地改變腔調了。他們把通過各種方法把彭德懷塑造成了一個“大義凜然”，“為民請命”的悲情人物。現在應該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們這樣做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錯誤都推到毛主席的頭上，作為否定毛主席的一個重要的武器。

有關“廬山會議”的文章和書籍也不計其數了，可悲的是，其中大多數的文章和書籍，都是置歷史事實和真實文獻于不顧，竟然是把那個在廬山上有著拙劣表現的李銳的所謂的筆記當作了最權威的依據。

還有一個流行很廣的傳說是來自楊尚昆的日記，他說毛主席在讓彭德懷重新出來工作的時候，對彭德懷說，也許真理是在你這裏。我認為這是不真實的。毛主席從來沒有在其他任何場合說過類似意思的話。而在彭德懷也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說過主席曾經和他說過這個話。而且那個時候，毛主席已經下定搞文化大革命的決心了，正在組織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了，所以我認為是不可能說出這

樣的話的。我當時聽到傳達的是，主席對彭德懷說，我當初反對你是真心實意的，現在支持你出來工作也同樣是真心實意的。這個話是完全符合毛主席對待犯錯誤的同志所採取的一貫的態度和做法的。它反映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度和膽魄。這是其他的人所學不來的。

看來，雖然都已經過去大半個世紀了，但在“廬山會議”這件歷史事件上卻還一直是云遮霧罩的，相信後代的歷史學家是一定會還“廬山會議”真面目的。

第十一章 去二七機車車輛工廠勞動

1、毛主席和人民一起度過困難時期

1959年下半年我還在四川農村的時候，就發現糧食的供應已經很緊張了。我發現，就是在天府之國的四川，當時的糧食供應都有了問題。但是我覺得，四川的人民真是偉大，盡管他們自己的糧食很緊張，我親眼看見他們還是用“雞公車”，馱著糧食一車一車的往火車站運，去支援其他比他們更缺糧的省份。

回到北京後，翻秘書室每天都會收到各地群眾大量的來信，反映缺糧的問題。有的還把他們吃的、用不知道什麼東西摻在一起的、一種黑咕隆咚的東西寄過來。我們把這些情況都寫成報告呈送給中央和毛主席。

毛主席也讓他的身邊的工作人員和警衛戰士，利用他們回家探親的機會，了解一下他們所在地方的人民群眾的生活狀況，回來向他報告。一次，一個警衛戰士從他老家帶回了當地群眾吃的糠團，我們也都看了，那東西黑黑的硬硬的。後來這位戰士把它拿去給主席看了，毛主席拿著這個糠團就把它硬吃了下去。一邊吃，主席還一遍流下了眼淚。那位戰士後來跟我們講了這事，我們都還怪他，不應該把這種東西拿去給主席看的。從那以後，毛主席就吩咐他身邊的人，把分配給他的肉和蛋，全部送到中南海的大食堂里去，他不再吃這些東西了。並說，要到全國的農民也能吃上這些東西的時候，他才吃。總理知道以後急壞了，他怕影響到主席的健康，想了很多辦法。可是總理自己卻也把分配他的東西送去了食堂，自己也吃得很少。

那時候很多國際友人和海外僑胞知道國內供應緊張，就寄來很多食品、營養品到中南海來送給毛主席。那里面什麼樣高級的東西都有。我們秘書室收下這些東西後，就請示毛主席。毛主席就讓我們把這些東西全部送到人民大會堂去，用來招待外賓。一位印尼的華僑送來了好幾斤上等的燕窩給主席。主席也讓把它送到人民大會堂去。後來有一次主席咳嗽得很厲害。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聽說吃燕窩可以治咳嗽。就去問大會堂還有沒有燕窩，大會堂說，就留了一點了，大概二三兩的樣子。就把這些燕窩拿回來悄悄地做在湯裏面給主席吃了。這恐怕是毛主席一生中的最高的享受了，那還是在他自己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下享受的。

直到 1961 年的春節，那時我在二七機車車輛工廠勞動，我讓身邊的工人把他們回家過年時、當地群眾吃的東西了解一下。他們回來後就向我反映說，現在的情況好多了，過年的時候村里還殺了豬，都能夠吃上餃子了。我把這個情況寫了個簡報給了辦公廳，辦公廳就把它登在了“情況簡報”上。主席看了這個消息，在上面劃了道道。

現在有些人一說起這三年困難時期來，就把它說得昏天黑地的。其實，正是在這個困難時期裏面，我國的人民和他們的領袖，所表現出來的戰勝困難的勇氣和精神，是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的。這種情況如果是放在任何其他的國家，或者我國的其他時期的話，那才不知會鬧出怎麼樣的人間慘劇來。

當然，在困難時期，也並不是所有的共產黨員和黨的領袖，都有毛主席周總理所表現出的那種真正共產主義者的風範的。

2、和以前整過我的人一起下廠勞動

1959 年廬山會議後，黨內開始了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北京市委向中央辦公廳反映，那些因為在中南海“八司馬事件”里犯了錯誤而被下放到北京郊區勞動的干部，在背地里牢騷很大，有

的甚至還流露出了對彭德懷的同情。田家英知道后就把他們叫回來進行了整風，並向他們傳達了廬山會議的糧神。當田家英把這次整風的結果報告給毛主席的時候，毛主席就對田家英說，你們讓犯錯誤的人自己下去勞動，也沒有很好的去關心和照顧他們，他們當然會有情緒。盡管他們以前做的是錯誤的，但你們那些積極分子應該帶著他們一起下去勞動鍛煉，一起改造思想。並且要以身作則，做他們的榜樣，讓他們慢慢認識自己的錯誤，把思想轉變過來。

田家英向我們傳達了主席的這個指示。然後田家英就問：你們誰願意帶他們下去勞動？可是好一會沒有人應聲。本來田家英並沒有考慮讓我下去。因為我 1959 年差不多下去了一年了，剛從農村回來。但我覺得主席稱我們是積極分子，叫我們帶犯錯誤的人一起下去勞動，如果大家都不報名，這不太丟人了么。於是我就報了名，田家英很高興。田家英叫我再選一個人做我的助手一起下去。我選了五科的姜德久。

安排去哪里勞動，田家英覺得現在的農村的糧食很緊張，一些農民情緒不高，怨言較多，容易給犯錯誤人的思想造成負面影-鄉，工廠的生活條件要比農村穩定，工人的覺悟也高，這樣比較有利于犯錯誤同志的思想改造。田家英又叫我們選工廠，有人提出到首鋼或北京機器廠去，而我選了北京郊區的二七機車車輛工廠，這個廠以前叫長辛店鐵路工廠，為紀念京漢鐵路工人的“二七”大罷工而改名的。這個工廠的工人富有革命傳統。毛主席在他的青年時代也去過這個廠，蔡和森，鄧中及等好多革命前輩當年都在這個廠工作過。大家都覺得好，最終就選了去這個廠。

1960 年夏天，我和姜德久就帶著王剛、程之、張道靜、張一平、馬之江、裳西林、張萬祥、張殿科、武允勝等一共十幾個人去了二七機車車輛工廠，田家英指定由我擔任支部書記。

到工廠後，和工人師傅一接觸，那個感覺可真好。工人們對各種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卻很少有什么牢騷和怨言。他們工作積極，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他們可能是聽說了我們都是犯了錯誤下來的，開始以為我也是犯錯誤的，就跟我講，吃一虧、長一智嘛，犯

了錯誤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可以改嘛！他們很會講道理，怎麼認識錯誤，怎麼改造自己，都能講出一套來。在生活上他們也挺照顧我們的。所以我們都感覺到心情很舒暢。工人師傅帶著我們一起勞動，我們就老老實實的給他們當“學徒工”，看到自己勞動馬上能干出成果來，加工好的零件馬上就能派上用場，那心里就別提有多高興了，覺得自己真是給社會主義建設盡了一份力了。而且工人們都很直爽，互相之間勾心斗角的事很少，不像在機關里那樣。

到了熱情豪放的工人中間，那些犯錯誤同志的郁闷情緒很快就沒有了，大家整天都在一起勞動，晚上又都睡在一個宿舍里頭，有說有笑的。過去那些你是我非的事，個人受到什麼委屈的事，就都放到腦後去了。

王剛在“八司馬事件”時是秘書室主任，因為執行“何載路線”，受到了主席當面的批評。下去勞動的時候情緒一直很低落。他的身體不好，我就安排他去干一些檢驗之類的比較輕的活。他對我挺感激，覺得我不但沒有報復他，還很照顧他。

就在王剛下放勞動的時候，他聽說劉華峰（原來是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書記處書記）調任西北局辦公廳副主任；李東治（原來是中南海機關的黨總支書記）調去遼寧省當了省委書記處書記。他就很有意見了，他跟我說，當初都是他們派他去秘書室的，他也都是按照他們的意見來整我們的。結果他倒是犯了錯誤，下來勞動。而他們怎麼反倒升官了。我把王剛的意見匯報給了田家英，田家英對這事也很有意見，他就匯報給主席。主席當時也從報紙上看到李東治為遼寧省委書記處書記的報道。這樣主席就批了，怎麼犯了錯誤反而升官，是怎麼回事，要鄧小平去查。後來就把那兩個人人都被降了級。所以那兩個人後來對田家英都恨得要命。

漸漸地王剛和我的關係就逐步改善了。他把當時他們怎麼商量整我們的事都跟我講了。文革後，鄧小平把楊尚昆的原班人馬都召回到中南海，劉華峰還是當中直黨委書記，王剛重新做秘書室的主任。那時我的妻子仍在秘書室工作，我出獄後，聽我妻子說，王剛對她不錯，並沒有反過來報復她。相反對她還挺照顧，還悄悄地問過

她要不要到秦城監獄去看我。

我出獄的時候，張萬祥第一個跑來看我，他也不管別人會說什麼。武允勝後來在遼辦省委辦公廳當處長。他知道我要去東北，大老遠的派車子來接我，給我安排好吃好住的，每天陪著我玩。我問他們，當初你們不埋怨我嗎？他們說，開始挺埋怨的，可看到你整天都跟我們一起勞動，我們心里知道你這也是受了我們累的。而且那時你對我們都挺好，以前我們整了你，開始還怕你會報復，可你一點也沒有。所以我們的怨氣也就慢慢地消了，對你沒有意見了。

馬之江是個三八式的干部，原來是彭德懷“一野”的。調來秘書室之前他是在部隊搞情報工作的。廬山會議後，開始他還表現出是同情彭德懷的。我們在勞動中熟悉了以後，他也跟我說些心里話，他說彭德懷這個人其實他自己也是很蠻干的。打寶雞的時候，都是彭德懷在指揮，那時已經收復了延安，主席過了黃河了。當時我們的傷亡很大，底下向他反映，說這樣打不行。可他還是堅持一定要這樣打下去，結果不知死了多少人。

3、和工人打成一片

二七機車車輛工廠是個萬人大廠。主要是修理火車頭和研制內燃機火車。廠里的設備很齊全，從煉鋼、鍛造一直到研制開發出新的產品出來。

我是在工具車間勞動。工具車間是廠里比較重要的一個車間，很多新的技術設備都在這個車間。那里幾個老師傅都對我非常好，手把手地教我學習掌握各種技術和手藝。時間一長，我都和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每逢休息日，我還常騎著自行車到他們家里去。但是那時正是糧食供應最緊張的時候，所以我去工人家里的時候都是自己帶著吃的，或者帶著糧票給他們。

1960年正是最困難的時期。農村農民的口糧不足，中央決定，要減少城市的口糧標準，支持農村。干部、工人都要減少，各人自

報，大家評議。工廠里的情況就復雜，工種不一樣，勞動強度就不一樣，像煉鋼的、翻砂的，體力消耗很大。我試著干過幾天鍛壓，那干活時是滿頭大汗，干完了一點力氣都沒有了，肚子不吃東西根本不能支持，平時吃一碗飯，這時吃五碗飯都不夠。工人的總體糧食定幾個平均是 40 多斤，輕體力勞動三十五斤，重體力勞動的四十幾斤，最多的有五、六十斤。除了考慮工種還要考慮個人情況，有個人天生就是大肚子，他們的飯量比普通人要大一兩倍，吃不飽就叫喚，這種人即使是在一般的工種，也得按重體力工種照顧。而女同志呢，就要讓一讓。按照我的工種（機器工人），可以報三十五斤，但我只報了二十八斤，因為我並不是每天都參加勞動。其實即使是三十五斤也是不夠吃的。但是如果我們每人每月能節省下五、六斤糧，拿到農村就能夠養活很多人了。我們中的馬之江，他身高體壯，分派他搞翻砂，他平時就是吃五、六十斤，可按工種定量是五十斤。他問我該報多少，我說你是中央來的人，帶個頭，就減兩斤吧。他減了兩斤後，老是叫肚子餓。我在四川農村種地時得到一個經驗，飯吃不飽，喝點糖水就過得去，我就叫馬之江餓了去喝點糖水，就這麼對付過去。

後來我們想辦法自救，節假日去荒山中摘點可以食用的野菜樹葉，晚上回來把這些野菜樹葉洗干淨，蒸一蒸當飯吃。在公路邊上有很多苦菜葉、蒲公英什么的，我們都挖回來吃。苦菜葉洗干淨，揉一揉，拌點鹽，吃到嘴里有點苦，但別有味道。

盡管生活很艱苦，但工人們的勞動干勁並不減弱。赫魯曉夫跟我們鬧翻後，把蘇聯專家全部撤回去了。二七廠那時正往試制三千馬力的內燃機，之前都是蘇聯專家在幫著搞的。有些蘇聯專家和我們的關係還挺好，走的時候就故意的把內燃機的設計圖紙留了下來，回去就說，是早給了他們的，現在要不回來了。後來二七廠的工人和干部就硬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把內燃機火車給製造出來了。我把這個喜訊也報告給了中南海。

自在工廠時間久，慢慢的我也發現出了一些問題。主要是有些基層干部，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權力搞一些特權。那時一個基層

的支部書記權力還挺大的，他領導的車間就是一個小小的獨立王國，車間所有的人和事都得聽他的命令，書記叫干啥就得干啥。諸如調換工作崗位、增加工資，這些都是書記最後拍板的。而且經過了反右運動以後，誰如果給書記提意見，那嚴重的他就可以說你是反黨了。我知道有個車間的支部書記，長期壓制一個給他提過意見的工人，同樣條件的人都提級了，可就是不給他提級，也不給他長工資。大家都看到，這個人勞動最好，成分也好，可大家都提了，就是不給他提，別人也不敢說什麼。還有個車間書記，車間里的漂亮姑娘有好幾個都給他霸占了，其中有兩個姑娘分別被工人們戲稱為東宮、西宮。這兩個姑娘，沒做出過什麼突出成績，但級別卻是工人里面最高的。這事是一個老工人跟我講的，老工人還說：你們總在上面呆著，不知道下面的事。老百姓的反映你聽聽就是了，不能說沒有，沒有的事老百姓不會隨便說。但到底有沒有我也沒看見。這個老工人的意思是明確的，但話說得非常圓通。我說，你這樣說不等于沒說嗎？他說：那你就自己捉摸去吧。

4、《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

1960年底到1961年初，中央重新印發了毛主席早年寫的一篇《反對本本主義》文章，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要求干部深入到工廠、農村，幫助群眾克服困難，解決群眾所遇到的問題。中央連續召開了幾次工作會議來落實這件事情。田家英、胡喬木和陳伯達也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各帶一個小組下去了，各中央機關和各個部委也都聞風而動，一時間調查之風真興起來了。

當時二七機車車輛工廠也來了好多調查組，因為它是個大廠，上面的主管部門多。有鐵道部的、國家計委的、北京市委的和總工會的，都來了。但是有些調查組下來，並不是為了解決問題的。他們是因為都不願意去農村，因為農村苦。所以就都到工廠來。可他們來了工廠以後也不參加勞動，廠里還得請他們的客。一些工廠的

領導也都樂意陪著這些下來調蜜的人一起大吃大喝。那時國家供應雖然十分緊張，可為了保障一線工人的需要，國家還是規定要給在第一線的工人保證供給一定量的油、肉和雞蛋。比如對高溫作業的工人每天有半斤肉，重體力勞動工人每人每月有五、六斤肉到十幾斤肉，還有油、雞蛋、大豆、花生等。此外，對技術工人和身體不好的人，也有一定的特供。現在為了招待上面下來的調查組，就把這些國家規定給一線工人的東西扣了下來，給調查組的人吃了。工人們對這種做法意見很大。我們一起下來的有兩個同志是在食堂干活的，他們就把食堂每天都招待了些什麼人來吃，吃了什麼，吃了多少，都記下賬來。誰來食堂開小灶，他們都記了賬。當時食堂有個像現在飯店的包房一樣的小客廳，每次廠里干部來陪調查組吃飯都有肉、有魚、還有酒。而調查組一下來，也就開個會，開完會就吃，一吃就一兩個小時。然后再在廠里的招待所住兩天，寫個報告，就算完成調查了。如果有個部長或副部長下來，那就更不得了了，吃吃喝喝要到晚上十點多。那兩個在食堂工作的干部告訴我，那些給重體力工人和技術工人等的特供和專供，至少有一半是這樣給吃掉的。那時二七廠的黨委書記姓吳，是個抗日幹部，他倒還好，不怎麼陪著去吃。可廠長就不管那麼多了，廠長姓關，是個長征幹部，在戰爭中斷了一只胳膊。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經常陪上面來的人來食堂小客廳里吃吃喝喝。

這些事情聽多了，看多了，我就有了個想法，你們是來調查的，卻不深入到基層去，不和工人搞“三同”，就這麼吃吃喝喝的，道算是什麼調查研究啊？我決定把這個情況向中央反映一下，於是我就寫了一篇《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的報告。我在報告里寫道，毛主席提倡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大家都說好，都紛紛起來響應。但是，有些調查組下來以後並不好好深入下層，也不找工人、干部談話，就是聽了幾個領導的匯報就寫了調查報告，也不管其中的內容有些根本就不符合下面的實際情況。現在是調查成了災，十幾個上級部門都派人下來搞調查，把工廠招待所都住滿了，整天都在那里吃吃喝喝，把相當大一部分分配給工人的肉、魚都吃了。在報告里，

我把問題總結為“十多少”，像“昂首望天的多，下去勞動的少；吃喝的多，和工人同吃同勞動的少（其實不是少，是根本就沒有）”等等。

這個報告是在 1961 年 5 月上旬寫好的，然後就交給了田家英。田家英看了報告以後，覺得這個報告寫得很好，他對我在報告中所反映的情況也感到很氣憤，再好的政策到了底下就都歪了。他在報告前面還附了一個他寫的短信。

報告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對這個報告一連寫了三次批語：

（以下是摘自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年譜》的內容）

5 月 28 日閱田家英報送的戚本禹 5 月 12 日寫的材料《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和田家英報送這個材料的信。田家英的信中說：秘書室工作人員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長辛店機車車輛工廠勞動。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給我，反映一些機關、學校人員到工廠作調查的情況。這個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中間值得注意的問題。戚本禹的材料說，他們利用業余時間摸了一下各級領導機關到長辛店機車車輛廠做調查研究工作的情況，認為在二十幾個調查組的工作里，比較普遍地存在著“十多少”的問題。毛澤東為戚本禹的材料擬了一個題目《調查成災的一例》。批示：“此件印發工作會議各同志。同時印發中央及國家機關各部門各黨組。派調查組下去，無論城鄉，無論人多人少，都應先有訓練，講明政策、態度和方法，不使調查達不到目的，引起基層同志反感，使調查這樣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災難。”30 日，毛澤東對這個材料再次批示：“此件，請中央及國家機關各部門各黨組，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一直發到縣、社兩級黨委，城市工廠、礦山、交通運輸基層黨委，財貿基層黨委，文教基層黨委，軍隊團級黨委，予以討論，引起他們注意，幫助下去調查的人們，增強十少，避免十多。如果還是如同下去長辛店鐵道機車車輛制造工廠做調查的那些人們，實行官僚主義的老爺式的使人厭惡得透頂的那種調查法，黨委有權教育他們。死官僚不聽話的，黨委有權

把他們轟走。同時，請將這個文件，作為訓練調查組的教材之一。

可是中央文獻出版社的編輯卻故意遺漏了毛主席寫下的下面的一段批示：

“現將戚本禹的報告發給你們。戚本禹是好同志，他是抵制中直黨委扶右反左的一個中央辦公廳的干部。他給我的報告，你們看看，現在的調查研究弄成了什麼情況。”

5、共同勞動結成的友誼

1961年6月，我們結束了在二七機車車輛工廠的勞動鍛煉，我仍回到秘書室工作。一回到秘書室。我就給田家英打了個報告，說跟我們一起下工廠去的王剛等人在勞動中表現得都很積極，他們的思想也都有轉變，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因此，從工廠勞動回來以後應該給他們分配工作，而且對他們以前所犯的錯誤，也可以取消或者減輕原來的處分了。

原來對王剛的處分是開除黨籍。通過一起在二七廠勞動，我們彼此都增進了了解，相互之間產生了感情，他也認識到了自己以前的錯誤。從二七廠回來後，我們就提出能不能把對他的處分改為“緩期執行”。田家英給主席匯報，主席表示同意。田家英向我們傳達，主席說這是個成功的經驗。主席還說，“緩期執行”這一條可以試試看，如果效果確實好，可以寫進黨章。文革中，我們中央文革小組還討論過，想把這條用來處理犯走資派錯誤的一些干部。王剛高興極了，說多虧了戚本禹，否則誰替我們去跟主席說話啊！1976年10月以後，王剛又被調回到秘書室當主任。

其他的人也都分配了工作，有的繼續留在秘書室。張一平原來是從中央警衛局調來秘書室的，就又回了中央警衛局。後來他當了毛主席紀念堂管理局的局長。我出獄後去看過他，我們一起談起了汪東興。他很蔑視地說，那是條連主人都咬的狗。他還告訴我，1968

年我被捕審查以後，汪東興為了整我的材料，把他們這些人都找去，要他們揭發、批判我。汪東興原以為他們都因為“八司馬事件”而受到了處分，所以是都對我有仇的。結果他們幾個除了說我有些自高自大、批評人太厲害之類的小事，其他的什麼東西都弄不出來。倒是原來在“八司馬事件”中跟我站在一起的有幾個人，後來我進中央文革後又加以重用，在我被捕後，可能是為了撇清自己，和我劃清界線，而亂說我一氣。

通過在二七機車車輛工廠的勞動鍛煉，我深深地體會了毛主席關於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和正確對待犯錯誤同志的思想是何等的英明偉大啊！

第十二章 天津調查和主辦《群眾反映》

1、隨陳伯達、田家英等到天津搞工業調查

1961年國民經濟調整已經取得很好效果，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農村六十條》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由於糾正了“一平二調”、“共產風”的錯誤，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經濟核算制度，保障了人民公社的健康發展，農村的形勢逐步好起來了。這時，毛主席要著手解決工業的問題了。為了制定《工業七十條》，他叫陳伯達、田家英組織一個調查組到天津做工業調查。

調查組出陳伯達擔任組長，田家英任副組長。下面設三個小組，一個小組去鋼鐵廠、一個小組去機械廠、還有一個小組去公交單位。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柴沫、副主任馬仲揚分別擔任了兩個小組的小組長。另一個小組由我擔任小組長，柴沫和馬仲揚都是抗戰時就入黨的干部，都是正局級，跟田家英是一個級別的。而我當時還只是個科級，是被破格重用的。

我帶的小組是去了天津機床廠搞調查。剛開始調查的時候，對工廠所存在的問題，怎麼查也查不出來。從賬面上來，一切都是正常的。我心裏有點納悶，而另外兩個小組下去後，遇到的情況也與我差不多，都查不出哪裡有什么問題。這時我就想，應該下去和工人們一起勞動，也許這樣能了解到一些真實的情況來。我在二七機車車輛工廠時當過學徒工，雖然技術要求太高的活做不了，但一般的活還是可以干的。我開過車床，也可以獨立操作磨床，但銑床的難度大，我不行。二七機車車輛工廠用的還都是進口的機床，都是比較精密的，而這裡用的都還是國產的，比較簡單，我上手就能干，

而且還操作得挺麻利。工人師傅一看，哎，是行家啊！就這樣工人們一下子就跟我搞得很親近了。在二七廠的時候，還代理過車間的支部書記，知道怎么和工人，特別是老工人打成一片。這種經驗，這時正好也派上用場了。

我結交了車間里的一個會計，不久我們兩人就親如兄弟了。一次我們在一起吃飯，他見我一付苦惱的樣子，就問我怎么回事。我說，我實在弄不清楚這個廠的真實情況究竟是怎樣的，怕完不成下來調查的任務。會計悄悄告訴我，你想了解工廠的真實情況，就該去找銀行。我問：找銀行干嘛？他說，工廠的盈利、虧損是多少，銀行都一清二楚的，否則它怎么貸錢給你啊。

聽了會計的話，我心頭豁然一亮。銀行是管著錢的，工廠上交利潤，下發工資，都是要通過銀行的。後來我知道，那時銀行的主要業務就是管企、事業單位的錢的，而且一家銀行還不只是管一、兩家工廠，它所在區域的很多單位它都管。老百姓的存款那只是捎帶的小事。辦理老百姓的存款，手續復雜，利潤還少。而給企業貸款，把國家的撥款貸給企業，坐收利息，利潤還高。

我到市里開了張介紹信，就去銀行作調查，這一下就把問題都給搞清楚了。工廠的利潤是產生在哪里的；工廠的虧損又是怎么造成的；出現了虧損以后工廠又是怎么處理的；在賬面上又是做的？銀行都跟我說了。比如某批產品的質量有問題，出了次品、廢品，工廠就和銀行商量，如何銷掉這筆帳，而把出現的虧損攤到別的地方去。可是這樣一來，其實是國家受了損失。

從銀行把問題搞清楚了之后，我就去找了廠長，我問他，有一批產品你是怎么處理的，為什麼在賬上沒有顯示？廠長聽了大吃一驚，朝我看了半天。他早就從工人那里知道我經常和工人一起干活，而且我還會開機床。但他以為，我是不可能從工人那里了解到的這些情況的。我也沒跟他說我去過銀行。所以他搞不清楚我究竟是怎么查出他們的虧損的。看到事情已經瞞不住了，他又知道我是從中央來的，所以干脆就不瞞了，他把怎么銷賬、怎么做虛假利潤等情況，都給我講了。講完后他說，既然你都已經知道了，那我大概也

干到頭了，要被撤職了。我對他說，我雖然只是個小干部，但既然你都跟我講了老實話，那我可以保證至少在我工作期間不會撤你的職。就是將來你因此而被撤了職的話，我也會向市委書記去替你說情的。

後來我知道了，那時有很多工業企業都是在瞎報成績的。它的帳面上都做得很好看，可很多是假賬。我查了相關的資料，當時我們的廢品率是較高的，就是跟蘇聯和東歐國家相比，我們也是沒法比的。很多產品報廢了，國家損失了大量資金，但這些在賬面上卻並沒有反映出來，報上去的還都是取得的很大成績。這種情況並不只是個別工廠的問題。

我把所調查到的情況，匯報給了陳伯達。陳伯達聽到我們調查出了真實的情況，就表揚了我們。他問我是怎麼調查出來的，我把前后過程都講了。柴沫說，你怎么不早告訴我們，我們也可以這樣去調查啊。我說，咱們沒有在一起開過會，所以我也沒有機會跟你們講，再說我去銀行調查之前也不知道能不能查出問題來。他說，那你也該先通報一下呀。我說，我也不知道你們在那裡啊。實際上，我當時認為他們都是老干部、而且還是大干部，肯定比我有經驗、有辦法的。我只是發愁我自己調查不出問題來怎麼辦，根本沒有想到要通報他們。陳伯達認為我這個從銀行找突破的辦法很好，之後他自己去調查工廠也都要找銀行。這事現往都已經不新鮮了，都知道銀行重要了，可在當時企樂和銀行的關係確實還不大有人知道的。

天津調查前后歷時幾個月，到 1961 年底，我們結束調查，回到中南海。陳伯達叫我起草了一個天津工業調查報告，我就把調查到的各種問題都寫了進去。這個報告主席也作了批示了。後來制定的《工業七十條》，也參考了我們的這個天津工業調查報告。薄一波說，我們調查出的許多內容是別人都沒有調查出來的，他承認那時在工交口所發布的一些成績中是有夸大成分的。

不過我那時感覺到，毛主席往制定《工業七十條》的時候，他最關心的問題是怎麼才能讓工人，在工廠里真正做到是當家作主的問題。而絕不是要制定出一套什麼方法，來監管工人。他不希望把

工人的勞動搞得太緊張的，就像他後來在作“五七指示”時所說的那樣的。當時華東局有個干部給主席寫信，說工廠應該建立起有工人參與的監察的制度和相應的機構，而且工廠如果搞得好就應該和工人的利益掛起鉤來。主席很重視他的意見，批示要找人研究。當時陳伯達還曾經發起過批判“計件工資”，他認為那就是資本主義剝削工人的“泰羅制”。這曾引起過一些爭論，但後來也不了了之了。

2、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之間的關係

這一時期我和陳伯達的直接接觸多起來了，因為他是三個小組的總負責，經常要我去向他匯報工作。但我在無意中卻發現，只要我去向陳伯達匯報工作，田家英就不高興。那時他們兩人之間的矛盾已經很大了。我夾在他們中間，左右為難，不好處理。田家英以前對我一直都很好，可在這次調查中卻老挑我毛病，只要是被陳伯達肯定和支持的事，他都說我辦得不好。

陳伯達、胡喬木和田家英作為毛主席的秘書，在廬山會議上，因為都和彭德懷站到了一起而都受到了批評，但是主席都把他們保了下來。陳伯達當時就馬上轉了過來，他在廬山上就寫了批判彭德懷的文章，還被主席引用過。胡喬木也寫了批判彭德懷的文章。可是從廬山會議以後，胡喬木的身體就一直不好。也可能是因為受到了驚嚇和刺激，他老是睡不好覺。本來他寫東西筆頭很快的，可那時哪怕讓他寫點小的東西，他都覺得吃力了。這一直到文革發生以後，他一直都是處於這種狀態。主席倒是很關心他，還專門寫信安慰他，叫他放下工作，安心養病，好好休息。胡喬木和田家英的關係很好。他們兩個和陳伯達的關係卻都不好，他們碰在一起就老要說陳伯達的壞話。

陳伯達這個人心眼小，他和田家英的最初的矛盾，是因為主席原來讓陳伯達起草他在“八大”上的閉幕詞，可陳伯達引經據典，長篇大論的，寫了幾次主席看了都不滿意。作為閉幕詞，提綱挈領

的就可以了。後來主席就叫田家英重新寫，主席對田家英起草的閉幕詞很滿意。這樣一來，陳伯達對田家英就很嫉恨了。

田家英跟我說，陳伯達對自己手下的人很不好，就像對奴隸一樣。陳伯達的秘書姚一、史敬棠都一天到晚挨他的罵。到最後他們給調走的時候，陳伯達把他們的鑒定都寫得很壞。柴沫也是屬於陳伯達領導的，可是他和陳伯達的關係也不好，他老往田家英這裏跑，他和田家英談得來。陳伯達因此也對柴沫記恨在心。

3 、主辦《群眾反映》

在 1961 年底，我參加天津調查結束以後，仍然回到了中南海的秘書室。在討論我的工作安排時，田家英說，戚本禹農村也去過了，工廠也了解了，毛主席又說他是個好同志，那就應該讓他做些重一點的工作、全局性的工作了。中央辦公廳常務副主任龔子榮的部下聳若英告訴我，龔子榮也提出來，戚本禹這個人很優秀，要給他加擔子。

那時的秘書室還是照例每天都要把群眾的來信來訪整理出來，匯總後寫成報告呈給主席。以往我在秘書室的時候，匯總的工作通常是由我來做了。可那時候經常會遇到一個問題，主席在看了我們送上去的反映群眾意見的報告後，經常會直接在上面作出批示。我們送得多了，主席的批示也就多了。這樣一來，不僅劉少奇、楊尚昆他們有意見，連周總理有時也會有意見。因為許多事情他們都還不知道，主席已經知道了，主席一旦作了批示，這讓他們就感到很被動。尤其是在 1959 年初主席宣布退居二線之後。這個矛盾就更明顯了。

這個時候，田家英他們就商量了，干脆我們秘書室就搞個刊物，把群眾來信來訪所提出的意見都集中在這個刊物上，把它們綜合地反映出來，然後把刊物分送給主要的中央領導。

田家英把他這個辦刊物的設想，以及他提出的負責辦刊的人選，

向毛主席作了匯報，立即得到了主席的同意。

田家英他們幾個秘書室的領導經過討論，決定刊物的名稱叫《群眾反映》，並決定讓我來負責辦這個刊物。

那時中央辦公廳還有另外兩個刊物，一個叫《情況簡報》，它主要是摘編各地和中央各部給中央的報告中的重要內容的。那是由后樓研究室負責編的；另外一個刊物是由機要室編的《機要簡報》，它的內容主要是羅列出每天收到和發出的重要電文。他們都有一個專門的班子，有專門的人員來搞刊物的。可田家英讓我辦這個《群眾反映》，卻從頭到尾就是我一個人。我又做主編，又做編輯，又做記者，甚至連校對都是我自己來做。至于刊登什麼內容，田家英也讓我來決定的。他和我有個默契，他說，重要的事情你得給我打個招呼，其他的你就自己簽發好了。他對我說，你現在已經是秘書室的重要人物了。因為一個“八司馬事件”，一個主席稱你是好同志，你在中南海里的名氣很大了。其實，我心裡明白，他之所以讓我來簽發，是萬一出了什麼問題，他還可以有回旋的余地。果然，後來楊尚昆為了《群眾反映》的事批評了田家英好幾次（在楊尚昆的日記上就有提到），田家英就都往我頭上推。而我在那時又是被楊尚昆看作是個“刺頭”的人，在“八司馬事件”的時候就和他頂過，所以他對我也有點頭痛，加上我不是他直接的下屬，所以他也不好直接來找我。楊尚昆曾經多次提出要由他來審稿，可他也只是往口頭說說，並沒有作出正式的決定，所以我都沒有去加以理會。因為如果經過他的審稿，那還能刊登什麼內容呢。

我請陳采忱（那時他已擔任了秘書室副主任）來題寫刊名，可他說，這是給中央主要領導看的刊物，由他來題寫刊名不妥當，他建議採用從古代的碑帖上集字辦法。結果他集選了隸書體的字樣做了刊名。

《群眾反映》這個刊物是不定期的，一般就是四頁紙，內容滿了就出版。有時內容沒有滿，我就編上一些“零訊”，內容就是一句話，兩句話的。有時內容多了也有增加到八頁的。而遇到有重要情況的時候則可以即時出版。所以通常都是三天出一期，也有的時候

是一個禮拜出一期。如果收到的群眾來信比較集中，那也有一兩天就出一期，甚至一天就出幾期的。

刊物是由機要室的“機要印刷廠”印制的，這個廠就往中南海的邊上。田家英和印刷廠打了招呼，只要有我的簽字，工廠就開印。工廠印制好了，就交由機要室發送。

刊物分為有編號的和不編號的兩種，有編號的上面寫著：主送：主席、劉少奇、朱德、總理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分送：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不是全部都送的，而是送給分管的書記。不編號的，有的是只送給主席，有的是只送給主席、劉少奇和總理等人。

主席和其他主要的中央領導看了之后，如果在上面作出了批示的，中央辦公廳就馬上會把批示連同刊物上發表的報道，一起抄送給相應的部委或省、市。各部委，各省、市收到以后都會很快去處理，把問題解決。

頭幾期出來之后，我就找了林克，讓他去跟主席說，現在群眾來信不送了，改成送《群眾反映》了。沒想到，往開頭的幾期《群眾反映》上面，主席就一連作了三次批示。這一下子就把這個刊物搞得影響很大了。後來，我問林克，主席是不是經常看《群眾反映》？林克說，你不用問了，少送一期都不行，主席要來催問的。在文革的時候，葉群也跟我說過，林彪對《群眾反映》也是每期都費，一期不落。幾天沒有看到，他就要問：《群眾反映》呢？

自《群眾反映》出來之后，秘書室各個科室都會把他們收到的、並認為是重要的群眾來信送來給我；有時田家英也會把他認為重要的一些信件轉給我；甚至連楊尚昆也常叫他的秘書送來材料，讓我在《群眾反映》上登出來。盡管楊尚昆對我辦的這個刊物是很有意見的。但是當他看到毛主席常在刊物上面作出批示，他知道通過這個渠道解決問題比其他的要快一點。

那時我也經常到秘書室的各個科里去走走，看看有什么重要的東西。有時為了更好地了解群眾在信中所反映的問題，我還獨自一個人到反映問題的群眾那里去，實地了解情況。

有一次，來自本溪地區的皮匠寫來了信，反映現在原材料的價格上漲得很厲害，可是有關部門卻對皮革制品的價格控制的很嚴，使得他們的生產和生活都遇到了困難。我了解到他們都居住在一家旅店里。我就一個人跑去那家旅店，跟他們住在一起，了解他們的情況。後來我把這個情況在《群眾反映》上登了出來，很快問題就得到了解決。那些皮匠都對我表示非常感謝。

4、毛主席痛恨腐敗，支持《群眾反映》 揭露黨內官僚主義特殊化

前面說了，在《群眾反映》創刊前，中央辦公廳后樓其實已經有一個《情況反映》，是楊尚昆他們主持搞的，主席是經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創辦的《群眾反映》的報告送交上去后，主席還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群眾反映》出來后，毛主席也是每期必讀，毛主席對《群眾反映》的批示就比對《情況反映》的還要多。這說明這份小刊物的影響力很快就超過了《情況反映》。

譚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厲害，誰都不敢惹。譚震林當時是管農業的副總理，享受首長特供，可是葛慧敏對特供還不滿意，還用首長專用的軍用飛機去農村采購活雞。帶活雞是不能坐飛機的，葛慧敏就很強硬說是首長要的，非讓人家運。活雞是放在一個筐里運的，下了飛機，要把筐還給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雞從筐里拿出來的時候，一失手，那雞在機場里到處飛。這下問題大了，飛機場最怕這個飛的東西了，那雞萬一躡到飛機的發動機里面去，飛機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衛趕緊去抓，結果一大群人就在機場里面抓雞，鬧了個大笑話。

機場寫信把這事反映到中央辦公廳來了。信到了我這里，我就去查，一查就查到是譚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她這個人很小氣，在家里把好來西藏起來不讓服務員碰，好吃的也不讓服務員吃，還罵服務員。服務員就給毛主席寫信，秘書也寫了信，都告這個葛慧敏，說她跟毛主席講的艱苦奮斗、干部要做榜樣距離太遠了。其實葛慧

敏早就有名，她喳喳呼呼的，中央領導都知道，毛主席也知道，說過“譚震林是夫人專政”。

我把反映葛慧敏的材料綜合起來，寫了兩張紙，做了一個標題叫做“群眾對葛慧敏同志的意見”。我對譚震林實際也是有意見的，他把農業管成什麼樣子了？！搞浮夸，畝產幾千斤、幾萬斤，不都是他寫的報告嗎？首先他應該出來承擔責任。有困難了，他自己又不艱苦奮鬥。恐怕他夫人去搞雞鴨，也是他同意的。這象話嗎？就是不是他同意的，也該主動管一管的。

因為牽涉到具體的人了，登載前需要上級審批，我是先找了田家英，跟他說，這個東西要登出來，譚老板可能會對你有意見（那時候一般不叫譚震林，叫譚老板）。田家英說他也有這個擔心，但他對葛慧敏也是意見很大，她搞出這麼多不象樣的事，他也是願意登出來的。我說，那就登了？他猶豫了一陣，說是不是再找一下龔子榮，他不批不好。龔子榮當時是辦公廳的黨委書記，是總理那里調來的。辦公廳大事是楊尚昆管，其他的事都是龔子榮管。抓子榮跟譚鋐林沒有什麼特別關係，不會報復我們。我一想，算了，不問了，登就是了。

登出來後沒幾天，一傳十，十傳百地傳開了，中南海都知道群眾告了葛慧敏的狀了，都拍手稱快，見到我就舉大拇指，意思是說：你敢碰葛慧敏，好樣的！那時候，哪個省委書記有個出格的事，我都要向中央打報告反映，都登出來都不稀奇的。但這個葛慧敏的丈夫是譚老板，比省委書記都大，中南海群眾對她有意見，但沒有人敢碰她。譚震林是書記處書記，自己也有一份《群眾反映》。據他們說，葛慧敏看到後嚎啕大哭，在院子里大鬧，說《群眾反映》登的都不實。但是中南海的大人、小孩都高興，連給她家送飯的、打掃衛生的都知道了，都感到出氣了。

當時，工交口的一些很高級別的領導經常大吃大喝，喝醉了還亂講話，群眾就寫信反映給毛主席，我們也是把它全登出來了。有些省級的領導賭博，輸了錢還向秘書借錢，群眾反映上來，我們也把它登了。這些反映特權、反特殊化的內容特別能震撼大家。看了

這些例子，就知道為什麼中央高層都要急著看《群眾反映》了，像林彪這樣的人，也是一期都不落的。

龔子榮那時候是支持反對特權腐敗的，對我也很好，要我學黑老包（包公），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要鐵面無私。他說，我們現在這個國家，就是少這麼一個機構，把這些事情都反映上去，你辦的這個東西就取到了這麼一個作用。因為這些，我對他的印象是好的。不過，在文革中我才知道，龔子榮與劉少奇的來往頗多，打倒劉少奇很多事情牽涉到他。汪東興要打倒龔子榮，他就下臺了。

習仲勵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他是很符合主席的思想的，毛主席很器重他，專門調他來主管中宣部。習仲勵也是支持我大膽辦《群眾反映》的，不但支持，還派了人來我這里學習經驗。

在我的工作日記上還記載著這樣兩件事：

1962年5月9日，許（許明，當時是國務院副秘書長）電告：習仲勵同志認為《群眾反映》辦得很好，他每期都看。傳閱範圍正副秘書長。上次給總理的報告，總理已閱，并在中央同志間傳閱了。……下午國務院電話：他們要派三個主任來了解我們辦《群眾反映》的情況。……5月11日國務院秘書廳來副主任陳等三人，了解我們辦《群眾反映》的情況，談了五點。

毛主席把習仲勵專門調去管中宣部也是眼光獨到，當時《劉志丹》小說事情還沒有發生，習仲勵把中宣部管得很好，連胡喬木都佩服他，在底下跟田家英說，習仲勵的水平比別人要高一個檔次了。在文化戰線上，他是個帥才，我們只是將才。

毛主席更是痛恨黨內腐敗，支持《群眾反映》揭露黨內官僚主義特殊化。毛主席看到譚震林夫人葛慧敏用飛機買活雞的簡報，馬上在上面做了批示，大意是：譚震林同志閱，請譚震林同志注意影響。毛主席是要譚震林自己對葛慧敏進行教育。沒幾天譚震林就打電話給田家英了，叫田家英“有意見好好說嘛，不能這麼整人”。田家英推說他不在，不知道，不是他批的。譚震林從此也和我結下梁子了。後來在文革中出現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譚震林罵我、罵中央文革，很大成分就是報我這個仇的，就是罵中央文革的話里

他也帶著罵我。

毛主席一生都是痛恨腐敗分子的，所以我能想象毛主席為什麼要支持辦《群眾反映》這個刊物，還每期必讀，還經常批示一些文章。現在大家都知道，1949年進城之前，中央開七屆二中全會，毛主席提出“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兩個務必”）。毛主席還提出不許以個人名義祝壽、命名。這些都是為了防止共產黨變質。歷代中國農民革命最後都失敗了，就是因為革命成功之後農民領袖蛻變為新的地主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革命是很典型的。這支農民革命軍進了北京城，就把自己變成新的地主、新的封建統治階級了。李自成自己沒有腐敗，但是他沒有約束好大將牛金星、劉宗敏這些人。這些人都腐敗了，到處搶美女、搶金銀財寶。據說陳圓圓就是劉宗敏搶的，而牛金星搞了很多小老婆，占了大房子，坐的是八抬大轎，這就是當起地主了，而牛金星本來還就是個地生階級。蔣介石的國民黨高官，雖然好像都是資產階級，好像有文化、有教養、知書達理，但也走了李自成的老路。抗戰結束後，國民黨進了上海、南京，所到之處都是大搞“五子登科”（車子、房子、票子、女子、位子），結果民心喪盡，被廉潔、自律的共產黨趕到臺灣去了。所以，毛主席講，到北京是趕考，要考好，要考及格，千萬不能走李自成和蔣介石的老路。那時候，他在很多會談上都反復重申這個問題的。

毛主席是不斷地號召，但總有干部一進城就把毛主席的號召都忘掉了，或者主動放鬆要求腐化變質了，或者是中了糖衣炮彈了。第四章說過，毛主席責令羅榮桓處理過一批已經變成了“牛金星”、“劉宗敏”的軍隊將領。不久，毛主席又在1951年底、1952年初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三反”是在黨內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是在私營企業中“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是直接反明著的資產階級的。在三反中，毛主席頂住各種壓力殺了劉青山、張子善兩個大干部、兩個功臣。在五反中，群眾被發動起來了，資產階級的各種不法行為受到一次嚴厲打擊，一些罪行重大的還遭到處決。

這兩次運動的確純潔了黨的組織，但黨內腐敗並沒有就此絕跡。1954年暴露出來的高崗腐敗變質問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當然那只是高崗案附帶揭露出來的，不是高崗案的核心。

其實黨內的“高崗”不止一個，而是很多。這些“高崗”也沒有因為高崗搞腐敗身敗名裂就自己主動收斂。照我說，葉劍英也有“高崗”的毛病。高崗功勞很大，主席很器重他；葉劍英救過中央，功勞也很大，主席還感謝他。但葉劍英是公子哥兒，風花雪月不斷，換老婆太多。這個比高崗還不象話，高尚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純道德問題；而葉劍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問題遮蓋起來了。葉劍英離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記不清。1957年黨校輪訓，他愛人也在黨校，是我的同學，她姓吳，那時還很漂亮，他就不要她了，葉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時就大罵葉劍英“老不死的，老東西，玩弄婦女，老不正經，好話說盡，他很會……”。還有很多難聽的話！毛主席不會聽不到一點葉劍英的事，但沒有人出來揭發，毛主席也不能把他怎麼樣。杏則，在現在不又多了一宗毛主席迫害老革命案？葉劍英家里沒有全家福，後來離婚，也亂搞，大概是糊涂了。總理總是支持葉劍英的，這是為什麼，我是有點不理解。

在困難的時候，社會和人的陰暗面更容易暴露出來。現在一般人知道，在三年困難時期，主席自己都不吃肉。這本來是一種示范行為，要求黨的領導干部嚴于律己，要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而且1960年底毛主席就大興調查之風，一個目的也是要黨的干部更加關心人民群眾的生活。但是，即使主席示範了，調查之風也起來了，很多人還是利用自己的特權，拼命想辦法來享受。像《群眾反映》登載出來的工交口干部大吃大喝、省委書記賭博輸錢後要秘書向公家開銷賬目、譚震林和他夫人用飛機運活雞這些事，都還只是被群眾檢舉出來的情況，實際的情況比這些要多，甚至還要嚴重。當然，實事求是地說，由於毛主席一直是堅決反對黨內腐敗，並且進城後就在不斷對腐敗問題進行各種各樣的打擊，當時黨內的腐敗、特殊化，總體看的確還不是很嚴重。譚震林夫人葛慧敏利用特權，搞幾只雞，用飛機帶回的事情，和今天共產黨內許多大小官員貪污腐敗

的嚴重性比起來，似乎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樁。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在老百姓的眼里，就和現在貪污幾千萬是差不多嚴重了，就是很大的事兒。防微杜漸，所以毛主席對這類事情是不姑息的。

葉子龍是主席的五大秘書之一，是秘書室機要室主任。他那時經常打著主席的旗號，用主席的名義搞女人，他要搞哪個女人，就對人家說“毛主席要找你談談話”，把人家女的騙走。這是李銀橋告訴我的，是不是這樣，我不清楚，但根據當時的各種事情來看，我相信李銀橋沒有瞎說。後來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情都暴露出來了。他的機要室調來一個很美麗的女孩，他就占為己有。他私自調車，也沒有請假，把女孩帶到天津去偷偷過兩天，回來的時候車壞在路上，他要路過的卡車拉他，又不敢說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車隊用車記錄，他調車走了，說是去天津送文件。中央電話打到天津，天津說葉子龍沒有來送文件。葉子龍是主席機要室的主任，失蹤了。這事就大了。是不是國民黨特務干的？中央和天津那邊就都警惕起來，天津那邊就派出大量警力，從天津搜索到北京這邊來，結果在一個路口發現一輛壞車，一個司機，另外一男一女共三個人。經核實就是葉子龍他們。他沒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沒有任務，事情就這麼敗露了。後來主席要求整他的風，其他人揭發，就整出了葉子龍很多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對這些事當然是很不高興的，就把葉子龍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銀橋、徐業夫。

葉子龍還曾偷賣一架蔡斯高級相機，那是一個外賓送給主席的禮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葉子龍送給新華社，葉子龍沒有送給新華社，而是把它拿出去賣給了拍賣行。那個時候，拍賣行的手續登記是很嚴格的，誰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級攝影家看上了這款相機，或許他以為主人也是一位攝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誰，結果查到是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的葉子龍。葉子龍不是攝影家，怎麼會有這麼高檔的相機？他把這事反映到楊尚昆那里。楊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個半”之一，葉子龍卻從來都不把楊尚昆放在眼里，楊尚昆就利用這個機會搞葉子龍的名堂。

這個葉子龍也真是不檢點到極點。1962年開春，毛主席派他帶人到河南信陽調查那里的餓死人情況。他去了，調查工作是敷衍塞責，大吃大喝卻是每場必到，更加惡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興致勃勃，找姑娘，開舞會，不亦樂乎。這些情況林克反映給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葉子龍光是搞女人，還只是一個生活作風問題，他也沒有強迫人家，都是人家自愿。而在信陽搞的那些事情則是很典型的官僚主義特殊化，是大問題了；把公家的東西拿出去賣錢，則屬於嚴重的貪污行為，在當時也是大問題，若是一般人最起碼是要給個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的，甚至被拘留起來的。但他畢竟是長征干部，老資格，主席又很念舊情的，就只是把他從身邊調離了事。葉子龍也有回憶錄出版，他光寫別人怎么怎么，可他自己的這些事一樣都不提。現在還有人說葉子龍1962年被調離機要室是受到迫害，這哪里是迫害？要說迫害，那就是楊尚昆迫害他。葉子龍從來不把楊尚昆放在眼里，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趕出機要室，他去找中辦楊尚昆，想謀個北京市委的副書記或者某個部委部長的位子，楊尚昆一面當面應著，一面轉過臉就罵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結果給他弄了一個北京輕工業局的副局長。葉子龍嫌官小了，楊尚昆就說，沒有處理你就不錯了，你還嫌官小。要說誰迫害葉子龍，那就是楊尚昆，沒有別人。

譚震林、葉劍英、葉子龍他們這些人的這些事，我當時就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事還不知道多少。即使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在困難時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劉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說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個胡同里蓋一個小別墅，他還說不行；第三次在懷仁堂后面搞一個大院子，嶄新的大花園，非常豪華，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樣的，他才滿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興得很，每天要換三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們夫妻經常出來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服，很講究。劉少奇就是不懂馬列主義的，也許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頭馬列主義，不想搞真正的馬列主義，因為真正的馬列主義不許搞

特權。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的秘書揭發說：“……困難時期，劉少奇吃螃蟹，吃一點黃，其他都扔了。他不吃，我們拿來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劉少奇全家過這種生活，這是困難時期啊！至于鄧小平，他的確是很能干，但中南海的許多警衛戰士都知道，他從來都是講享受的。他的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鄧小平他家是一個大地主，因傳說的原因，離家出走了。據說這事當時還鬧得很大，所以他後來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國了。共產黨“講成分論，但不唯成分論，重在個人表現”。鄧小平個人表現怎麼樣呢？張云逸揭發，右江起義危急關頭，不打招呼就離隊，置革命成敗與眾多起義戰士的生命于不顧，現在自我辯解說是去找中央匯報工作。這樣的一個人怎么可能與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年主席調“五馬”進京，讓鄧小平當總書記，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認為他不行。我也是懷疑的，但參加過一次他的會議之後，我就發現這個人是很厲害的，能抓問題的綱要。那次會議，李富春主持，我是會議記錄，會上要解決的問題混亂一片，我都無法記錄，可鄧小平提綱挈領抓的幾個問題，就是全部問題的綱要。這讓我大吃一驚。他是剛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關鍵問題，其中一個是剪刀差問題。他說他知道農民是吃虧了，但現在問題還不能解決。他講出了為什麼不能解決的道理。那次會議之後，我對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里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變質那麼厲害，1959年國家進入困難時期，毛主席、總理都很節儉，可是鄧小平在養蜂夾道還是大魚大肉不斷，山珍海味不斷，而且還有各種娛樂設備，搓、摸、洗、泡什麼都有，改革後出來的會館就是養蜂夾道那個模式的。他實際上從那時就墮落為腐敗大官僚了，但毛主席還不知道。

毛主席在1962年9月擊退了“三自一包”的資本主義回潮風，不久又開始大張旗鼓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搞走資派。這是與黨內各級干部居然在國家最困難時期還在大搞官僚主義特殊化這一實際情形有密切關係的。主席在延安整風的時候，就借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提出來了防止腐化的問題，而且在進城的時候就再三講，連警衛都知道，都記住了：我們進城是趕考，不要當李自成、

劉宗敏，搞腐化是要被趕出來的。李自成的軍隊進城搶美女，搶金銀財寶，被人趕出來。這段歷史我後來也研究過，郭沫若其實沒有怎么詳細講。主席是借他的題目發揮，警告“不要搞腐化，被趕出來”。但懂得主席深意的黨內干部不多。那時主席還沒有形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但是主席是按照這個思想去做的，他在思想上已經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了。主席曾說黨內沒有幾個懂馬列的人，我那時覺得主席講得過分，不以為然。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還有那么多其他中央委員，那么多人，怎么就沒有懂馬列的呢？是後來經過了文革我才真正知道了主席這番教導的深刻。這也是后話。

第十三章 七千人大會和會後黨內 出現的兩條道路鬥爭

1、關於七千人大會的大會講話

就在我主辦《群眾反映》後不久，1962年1月，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龔子榮通知我以《群眾反映》主編的身份，列席參加這個大會。

七千人大會的主會場在中南海的懷仁堂。第一天在大會上講話的是劉少奇。不過劉少奇那天在大會上只是做了口頭講話，他代表中央向大會做的報告，是事先印發給大會代表的，並沒有在大會上念。

劉少奇在講話中閉口不談他自己在“大躍進”期間所做的事和所講的話。反而假借著某個地方的群眾之口講，造成“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當談起責任的時候，他只是說，這些責任全都應由中央來承擔，卻絲毫不說他本人應該承擔什麼責任。這在當時會議的現場上就給人一個明顯的感覺，他把責任都推到毛主席身上了。特別是他講得激動的時候，一副慷慨激昂樣子，好像錯誤都是別人的，而他則是糾正錯誤的人。我當時在現場聽了心里就覺得很不是個滋味。在劉少奇講話的時候，會場里到處都在竊竊私語地議論著，很嘈雜。

由於劉少奇的講話是口頭講話，後來七千人大會以後中央有個文件，裡面匯集了中央領導在大會的講話，我看了一下，劉少奇在會上說的那些尖刻的話上面都已經沒有了。

後來我知道，劉少奇的這種表現可以說是一貫的。在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統治時期，劉少奇也同樣是表現得很“左”的。當年毛主

席寫的批判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九篇文章里，就點了胡服（即劉少奇）的名的‘可是到了延安整風的時候，他也是像個沒事人那樣的大批王明的“左”傾，一點不提自己在那個時候所犯的錯誤。後來在“五一六通知”通過以後，他就說“五一六通知”里面講的“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那樣的野心家”就是朱德，在中央的會議上批斗了朱德。

緊接著，第二天林彪就在大會上講了話。林彪那天的講話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當時林彪手里拿著幾張稿紙，可他並沒有照著稿紙來念，而是脫開稿紙講的。林彪的聲音非常洪亮，一點都沒有生病的樣子。他前面說了幾句以後，緊接著他就講，不是毛主席犯了錯誤，是我們自己犯了錯誤。你說有哪件事情，毛主席沒有事先提醒過我們？都是我們沒有按照他的意見去做，所以才出現了錯誤，才遇到了困難。他說，刮“共產風”就是主席最早提出叫我們糾正的，虛報糧食產量也是主席首先發現了提出糾正的。接著他就說，歷史證明，凡是我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我們就取得成績，就取得勝利；凡是我們沒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去做的，我們就犯錯誤，就遭遇到困難。他這幾句講得鏗鏘有力，全場鴉雀無聲。我在現場聽了之後，所感覺到的效果要比後來看到的印成了文件的效果好多了，這與劉少奇講話時的會場氣氛恰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從此林彪在黨內的威信就大為提高了。

過了幾天，毛主席在大會上作了講話。毛主席的講話照例是高屋建瓴，博古通今；他語言生動，詼諧幽默。把整個會場的氣氛都帶動起來了，會上所有人的情緒都隨著他的講話起伏跌宕，時而滿堂大笑，時而靜默無聲。毛主席講到，所有中央所犯的錯誤，都由他第一個來承擔責任，因為他是黨中央的主席。所有與會的人聽了無不為之動容。毛主席講話的主題是要加強黨內的民主集中制。

為什麼毛主席要在這個時候強調這個問題呢。建國十幾年了，前面幾年逛得都很順。當時擔任黨和國家的各級的主要領導人基本都是從長期的戰爭中打出來的，他們中的好些人都是戰功卓著的，也有思想覺悟。但是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對於國家政權的運作，和組

織大規模經濟建設都是沒有經驗的，對經濟管理和科學技術則可以說都是從一竅不通開始的，有的甚至連文化水平都還是很低的。他們有的只是戰場經驗和對部隊的管理經驗，最多也只是在根據地做群眾工作的經驗。但就是憑著這樣一股革命熱情和干勁，他們也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硬是把這麼大的一個貧窮落后，千瘡百孔而且外部條件也極其惡劣的中國搞得欣欣向榮，蒸蒸日上。1956年召開“八大”，毛主席讓田家英給他起草開幕詞的時候，中心的意思就是要大家在成績面前不要驕傲。經過了“大躍進”的高潮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低谷，這些在管理上、技術上缺乏經驗和知識的問題都充分地表現出來了。像在大躍進時期的“命令主義”、“瞎指揮”，有些表現不但是幼稚，甚至是無知的。但你不能說他是有意想把事情弄壞的，而是他以前在戰場上就一直都是這麼干的。在戰場上，你違背客觀規律，那是會立見勝負，馬上就看到後果的。但在經濟建設中，你違背了客觀規律，那不是馬上可以知道結果的，可能要過些時候才會嘗到滋味的。所以，從“大躍進”到“三年自然災害”，給全黨包括毛主席都是一個嚴重的教訓。不過，對於在“大躍進”時期的錯誤，毛主席始終認為，大家的出發點都是好的，是要干社會主義的，是急於想讓國家擺脫經濟落後情況的。所以，當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要把它提升到“路線鬥爭”的時候，就被毛主席認為那是企圖分裂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所以在七千人（在這個七千人當中，可以說絕大多數的不是紅軍指戰員、就是抗日老幹部）大會上，毛主席主要是強調了要加強黨內的民主，要克服官僚主義，要加強黨內的民主集中制。毛主席主動承擔了中央的第一的責任，也主要就是為了不過多追究底下人的責任，而讓大家從錯誤和失敗中總結出經驗教訓。

2、參加小組的討論

我是以《群眾反映》主編的身份列席參加會議的。同時，中南

海后樓研究室的《情況反映》派了一個編輯，名叫王青林和我一起列席會議。我們兩個是可以任意到各個小組，參加旁聽他們小組討論的，因為這樣可以方便我們把所了解到的情況，及時地反映給中央領導。

由於安徽的問題多，在困難時期死的人最多，群眾來信也最多。所以我特別注意安徽組的討論，去參加他們的小組討論的次數也最多。在安徽小組的討論會上，我親眼看到，那些參加會議的地委書記和縣委書記們，對曾希聖可以說是憤怒到了極點了，他們控訴他在大躍進中怎麼虛報成績，怎麼打擊迫害抵制他搞“浮夸風”的干部；以及當後來發生饑荒的時候，群眾沒有吃的，都餓死人了，他又是怎樣下令封鎖消息，不讓上報；誰要是說了真話，他就殘酷打擊誰，不但把人家的職務一擋到底，有些還被打成反黨集團或反黨分子。那些縣委書記們在批判曾希聖時那個激動的樣子，簡直無法形容。有幾個人在說到激動的地方幾乎就要沖上去和他拼命了，像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樣。都幾十年過去了，那個場景在我腦子里還是清晰如當年。

我參加小組討論後，就把所聽到的這些情況，通過“情況反映”匯報了上去。劉少奇也知道了有關的反映，他聽說由於曾希聖本人也在小組討論的會議上，所以還有好些人不敢在會上發言。後來安徽小組再開會，劉少奇就不讓曾希聖去參加了。這樣在後來的小組會上，發言就更加激烈了。有的人甚至提出要開除曾希聖的黨籍，送他去勞動改造。各個地、縣都有人提出這個要求，而且也沒人提出反對的意見。劉少奇知道了後說，這個問題大家不要講了，曾希聖對黨有特別的功勞，不能隨便開除黨籍，大家有意見可以講，但處理由中央來研究決定。

我從一些老同志那里得知、曾希聖在長征時候是負責電臺的，是他領導破解了國民黨軍隊來往電報的密碼。他這個人非常聰明，經常是別人破解不了的密碼，他都能破解出來。那時有人甚至開玩笑說，這個曾希聖一定是國民黨派來的，不然他怎麼什麼都知道？曾希聖後來是從部隊的情報部門調出來當省委書記的。這麼一個聰

明人，而且又是老革命，怎么餓死了那么多老百姓他都不關心，還要把反對他搞浮夸的人打成反黨集團呢？可見一旦地位變了，人也容易變。

在七千人大會上，追查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事是會議的一個重要的內容。毛主席在大會上說，對出現餓死人的省、市要進行檢查，并責成他們匯報對群眾生活安排落實的情況。如果哪個地方餓死人而隱瞞不報，或者看見群眾餓死而不管的，查出來要受嚴厲處分。他還再次強調：不準餓死一個人是我們的一貫政策。

在這次會議期間，毛主席就親自派了在他身邊工作的葉子龍、林克，去河南信陽調查餓死人的情況。中央派了董必武（董老當時是中央監委書記）親自帶人去安徽調查究竟餓死了多少人？但是曾希聖想方設法掩蓋真相，聽參加會議的安徽代表揭發，當地政府把中央調查團可能要去的地方的挨餓的村民，都集中到幾個偏僻的村里，每天供應他們一些稀飯喝，等中央調查團走了，才讓他們回去。而那些饑民們由於被集中了以後還可以得到一些食物吃，所以也沒有什麼意見。這樣中央派下去的調查團，最後也沒有能把全部的真相都調查清楚。

在七千人大會一結束，中央就決定把曾希聖調離安徽，讓他到華東局去當第二書記，實際上是閑置了起來。中央決定調李葆華擔任安徽的省委書記。李葆華是個有共產主義理想的人，他是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搞集體經濟的。毛主席對李葆華的父親李大釗是很有感情的，他親口對我們說過，李大釗是他的老師。後來在文繭中，我和李葆華談過一次話，他說他當時在安徽搞的是“責任田”，不是“包產到戶”。他搞的責任田是集體的。他對“包產到戶”是加以限制和抵制的。李葆華一上任，就處理了原來曾希聖底下的一些人。李葆華的工作作風與曾希聖完全不同，下面支持他的人很多。所以到了文革的時候，安徽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保李葆華的是“保守派”，可安徽的“保守派”力量很強大。而在安徽的造反派里面，卻反而有很多是被李葆華處理過的原來曾希聖的那些人，他們在文革中也跟著造反派一起造起李葆華的反來了，可是安徽的

造反派的力量始終很小。而毛主席在文革中也一直是保李葆華的。

在會議期間，我也去參加了幾次四川的小組會議。因為在 1959 年的時候我去四川種過糧，盡管四川在“大躍進”的時候也有“浮夸風”，虛報糧食產量，在困難時期也有餓死人的情況發生。但在最困難時期，四川還拿出了很多糧食支持其它的省市。

在大會期間，李井泉專門跑到我的辦公室來找我，他對我說：1959 年，你們在四川作的調查是對的，我錯了。當時我還跟田家英爭論，被主席批評了。現在我已經給田家英道了歉。因為那個報告是你寫的，我也要向你道歉。李井泉是個老同志了，那時頭發就已經都白了，他態度那麼好地來給我這麼個小干部道歉，我當時是很感動的，對他的印象很好。在幾年後的文革中，我也沒有怎麼說過他不好。

3、調查各地餓死人的情況

關於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多少人的事，在七千人大會以前就已經在做了，在七千人大會上，追查餓死人問題也是一個主要議題。會上有很多反映，許多人聽到反映，心中都堵得慌。主席的警衛員說，主席在讀會議簡報時，看了地方上的發言，眼中含淚，飯都吃不下。毛主席要求追查這個餓死人的具體情況。當時先有個初步統計說餓死的人是三百多萬。主席說了，都不得隱瞞數字，不然要受嚴厲處分。後來叫大家放下包袱說實話，又報上來一些，再加起來就有四百萬。安徽最多，八十萬。

七千人大會是第一次對餓死人數字匯總。七千人大會之後，相關的調查更加細緻地展開了。

當時後樓研究室的綜合組，匯總了全國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材料。這件事是由陳麒章具體負責，王青林協助他，我剛去後樓研究室的時候也是協助做這方面的事，當時還有一個姓周的記者，也是個老干部，他也一起參加了這項工作。我們的任務就是搞清楚，

困難時期全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因為這事正好是在 1963 年我寫《評李秀成自述》文章之前，而且事情又是特別重大，所以我印象是很深的。

七千人大會是全國五級干部大會，全國的縣委書記都來了。開過了七千人大會，全國的干部都不怕講實話了，餓死人是過去的事，都知道隱瞞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而且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就說了，誰瞞報就要受嚴厲處分；我們這時又特別向各地打招呼，統計數字要真實，誰不講真話要負責任的。那時，安徽曾希聖已經調離安徽了，他被調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虛報數字。安徽是餓死人最多的省份，曾希聖不在了，安徽上報的數據也比較真實了。其他地方的上報數據也都比較真實。所以，1963 年各地上報的數字是可靠的、可信的。只是個別地方實在很難統計出來，是用估計的。

我們所得出的數字，比七千人大會上的又有所增加，接近 600 萬。我們打算向主席、總理報告 600 萬。但有一個姓曹的地委書記說，實際上恐怕還不止這些，因為有一些邊遠地區可能統計不出來，是估計出來的。我們接受了他的建議，在 600 萬的基礎上，增加了 20%，這樣就達到 720 萬。事實上，到那個時候的氣氛完全都變了，誰都怕因為瞞報而受處分。有人提出在 720 萬上再增加一些，最多不超過 800 萬。所以最後上報總數是 800 萬。這 800 萬也是了不得的，當時我們心里是很不好受的。漢朝末年的大災荒，死了 2,000 萬；抗日戰爭的死人總數是 3,000 多萬。而在和平時期，三年死了 800 萬人，那也是不得了的事啊！

我覺得，當時的調查報告是由綜合組根據各地上報的數據和材料經過反復的集體核實，研究做出來的，是很嚴格的。如果說數據還有不準確的地方，那 800 萬只會是多了，不會是少了。因為真正在邊遠地區，人煙稀少，而且可以當作食物的動物、植物又很多，所以餓死的人反而是少的。那個 20% 的修正值實際是放得太寬了，何況在這個放寬了基礎上又增加了 80 萬。

參加當年調查的人，有個叫靳耀南的，是山東的一個地委書記，我和他關係很好，在后樓研究室解散之後，我曾把他調過來當了我

的秘書。他也是一個重要的見證人，可惜現在已經去世了，很可能他的后人會知道一些相關內容，如果是這樣，就希望他的后人有一天能出來說話。

4、關於餓死人的時間和原因

一直以來，有許多人錯誤地以為是大躍進辦食堂餓死了人。其實，辦食堂是不會餓死人的，只會撐死人。當然，這是造成了一定的浪費，但這些浪費根本不足以導致後來發生的饑荒。

1959 年開春我到四川新繁縣去種試驗田，一有空余的時間我就騎著自行車去周圍的農村搞調查，差不多把新繁縣周邊方圓二百里的地方都跑遍了。我採訪了很多農民，他們都說，58 年好啊，58 年辦食堂，我們比賽吃，看誰吃的多，結果有人吃撐了，送到醫院，想拉開肚子，把吃下去的拿些出來，結果肚子還沒有拉開，人就死了。這樣的事，我聽到的就至少有三次。就是說，撐死人的事還不是個別現象。

事實上，辦食堂是劉少奇首先提倡的，當然，主席也沒有反對，也出來講話表示支持的，這是實際情況。關鍵的不是食堂，現在的人不是都願意有食堂嗎？食堂省事、方便。可在當時也造成了很多浪費和一些負面的東西，這也是事實。為了知道食堂到底好不好，主席特別叫田家英搞過一個關於食堂的調查報告，那是田家英唯一的一個他自己獨立搞出的報告。我曾經問過他對食堂是什么態度，他說他是“維持派”。理由是，與其讓一些干部貪污了糧食，還不如讓食堂把糧食統一管起來，統一管理起來了，農民多少還有點吃的。在廬山會議上，毛主席把我寫的和田家英的關於食堂的調查報告，一起批給了大會。

困難時期的饑荒也并不是一下子突然出現的，是在 1959 年初開始露出苗頭的。那時，在我去新繁縣大豐公社種糧的時候，第一天吃的是干飯，後來就越來越稀了。不是農民對我們不好，是沒有那

么多糧食給我們吃，不光一個隊這樣，各個隊就都這樣。農民說，我們沒去之前，他們都吃菜粥，還很稀，家里有病人了才到公社領點糧食回去。這就說明糧荒那時就開始出現苗頭了。我們工作隊下去，上面是撥了糧食給公社的，我們吃的比老百姓的好，老百姓也跟著吃得好一點、飽一點了。所以老鄉們是非常歡迎我們去的。但撥給工作隊的那點糧食是解決不了多大問題的，我到底下小隊裏面吃飯，都沒怎麼吃飽過。那時工作隊有規定，不能自己帶餅干等干糧下去，我們就偷偷帶點糖什麼的應急。

當地有些農民小青年，很喜歡聽我講故事，尤其是講歷史故辦，他們覺得比他們聽過的說書還好聽。這些小青年來聽故事，總會把他們家里好吃的帶點來給我們吃。記得有個女孩子，家里很困難，但她還是每次都帶些東西過來給我們吃，她自己卻不吃。大家發現後，都不忍心吃她的東西了。

我們下去後不久毛主席來過電話，我估計田家英在電話里把我們看到的情況都給主席匯報了，他還告訴了主席 1958 年下面的糧食產量虛報嚴重。全國情況差不多，同期都有糧荒的苗頭。到 1959 年夏季收穫後，全國普遍出現瞞報產量、私分糧食的事情。這就說明事情在起變化了，全國真正開始出現糧荒了。新繁縣大豐公社黨委里那些人比較有頭腦，他們在大躍進的時候就是把一些糧食交給國家，一些卻放到公社的倉庫裏面保管起來。他們知道糧食產量沒有報的那麼高，有的農民把糧食種子都交了，到了開春，如果農民連種子糧都沒有了，那明年的生產就不能維持了。他們藏起來的糧食，一部分就是要當種子來春發給農民的；另一部分就是作為公社儲備糧，用來對付糧荒。我們到大豐公社後不久就看見（不是公社告訴我們的），公社叫大隊的人到公社裏來，把公社的存糧往下運，那基本就是種子糧為主。1959 年夏收之後他們又私下搞儲備，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瞞報、私分了吧。這個時期，糧荒雖然有了，卻沒有達到餓死人的程度。吃不飽又沒有餓死，關鍵的就是公社偷偷搞的那個儲備糧！公社在最關鍵的時候發點給農民起到了作用，而且有的農民家里有病人了，還可以到公社去領一點照顧糧。此外，農民在自

家的田梗上種的粗食是不交公的，歸自己，像葫豆（蠶豆）、南瓜，那也挺管用的。

有一次我騎自行車在達縣跑，實在累了就到一個小店買碗面吃。吃著面我發現有兩個人在等著我，好像是找我有事，看上去他們是正經的農民，不是流浪漢。我邊吃邊問他們是不是找我有事、什么事。他們說：“等你吃完了，我們喝點湯”。我一聽是這么回事，就說：“這我都吃過的，不衛生”。他們說：“你一來，我們就注意你了，你不會有病的”。我覺得很不好意思，當時，我還帶著一點糧票，就給他們買了一碗面，叫他們分著吃了，還給店主說多給點湯。我正這樣安排著，后面又來人了。我看情況不對，我也沒有那么多糧票和錢，就趕緊騎車走了。這事兒是都發生在 1959 年初。這就是說，這個時候，農民已經很困難了。據我後來向人打聽，像這樣的農民，去飯館喝人家剩下的湯水，主要是出于節省，遠不日已經餓翻了。而且，這種情況也是個別地方，不是很多地方都有。

但與此同時我也見到，盡管四川的糧食已經很緊張了，自己都吃不飽，老百姓卻還把很多糧食用“雞公車”（一種手推獨輪車）推去火車站、碼頭，交公糧支持全國。

我從四川回到秘書室後，就收到了大量群眾來信、來訪，反映有餓死人的事。還有一些從中央辦公廳下放去河南、山東的干部以及一些地方上的干部也來信反映說，他們那里有很多因饑餓而患了浮腫病的人。這些情況秘書室馬上匯總後報送給毛主席。主席看了這些訊息，立刻和總理商量採取緊急措施，用軍車調糧給斷糧地方的群眾。

1960 年夏，我去二七機車車輛工廠的時候，常在星期天和廠里的工人一起去他們家，著到工人都比較困難，吃的是玉米、高粱，還吃不飽，但沒聽說有餓死人的，只是有個別得浮腫病。那時我們也都定量了，定量不夠吃，和我一起下去的馬之江也得過浮腫。我聽說外地有餓死人的，又知道四川是浮夸風的重災區，我在那裡種過試驗田，農民對我們很好，我對那裡是有感情的，就打電話給宋德成，問他四川有沒有餓死人的事。他告訴我：“別的地方有餓死人

的，但我們這里沒死人。這多虧了你老戚、田家英來了，我們得到了照顧”。我在四川的時候沒有親眼看到餓死人，老宋現在也說他們那里沒有餓死人。我相信老宋說的話。

造成 1959 年開春后的粗食緊張和後來的大饑荒，一方面的原因是 1958 年很多粗食沒有收上來，豐產不豐收，因為農村很多壯勞力都去大煉鋼鐵了，田里人手不夠，很多莊稼都爛在地里了。這個情況我 1964 年在北京通縣搞四清的時候也得到了農民的證實。不過這還只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一個是遭遇了自然災害，一個就是“浮夸風”。

現在很多人不承認天災。其實當時北方發生大旱、南方出現大水災的情況都是客觀存在的。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七分人禍”他不是用來推卸自己的責任而諉過于人的話，那應該指的就是“浮夸風”。可他自己和鄧小平卻正是這個“人禍”的主要責任人。

毛主席是黨內第一個提出要糾正和制止“浮夸風”的人。從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就不斷講話，要求糾正左的錯誤。1959 年春、夏之交，他寫了那個黨內通信，直接發到生產大隊支部這一級，并要大隊的干部直接去給農民去講，要他們都來抵制高指標、抵制“浮夸風”。但我知道，全國很多地方都沒有把毛主席的信傳達下去，因為一傳達，毛主席批評他們了，他們就很難辦事了，四川省就是這樣的。我估計四川省就我們新繁縣傳達到了公社、大隊，這還是我們工作隊去傳達的。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把各個生產隊拉上線，接上有線廣播，連到公社。前面說過，開始是田家英親自去廣播站讀毛主席的信。但田家英的口音不標準，當地農民不完全能聽懂，後來就選了個初中畢業在公社工作的小姑娘做廣播員。她口齒很清楚，田家英還說要把她調到中央廣播電臺來工作，當然后來也沒有調成。

“浮夸風”確實是造成困難時期餓死人的主要的人為的原因。瞎報良食產量可是不得了，產量報高了，征購就多了。報二千斤，那征你一千斤也不算多，可你實際只有 500 斤，最多也不過 800 斤，

那你怎么辦？連帶種子糧全部交征還不夠，後果會怎麼樣？那不就要出餓死人的事情。

湖北王任重搞浮夸是最厲害的一個，征起糧來又是最厲害的。粗食都征走了，湖北的糧食都不夠了，武漢面臨了斷糧的危險。他就派人去把長江上從四川經武漢運往上海的糧食搶下來。後來上海把這事告狀一直告到主席那里。

田家英與王任重的矛盾很大。田家英告訴我，那時王任重向主席匯報工作，常常是在自己的兩個口袋里準備兩份材料，看主席的情緒和態度決定用哪份材料，主席傾向“糾左”，他就拿出糾左的材料來陳報；主席要批右，他就拿出批右的材料來匯報。發生餓死人的主要年份是 1960 年。到 1961 年情況就有所緩解了，因為國家進口了很多糧食。但是肉食、雞蛋、水果還很緊張。當時蘇聯向我們逼債，為了還債，征收了大量的農副產品。所以，市場的供應很緊張。

5、七千人大會以後黨內出現的分歧

一個中央的工作會議，擴大到全國的縣級以上（當時又叫“五級干部會議”，即中央、中央局、省、地、縣五級）的干部（包括一些重要的工礦企業和軍隊）一共七千多人來一起參加，這是建黨、建國以來所僅見的。這件事的本身就體現了毛主席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博大的胸懷，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雄偉的氣魄。現在有些人說什么“七千人大會”是毛主席認錯的大會，那完全是胡說八道。

從 1959 年上半年開始，為了從 1958 年所刮的“共產風”，“瞎指揮”等錯誤中走出來，毛主席就一直在考慮如何調整人民公社體制，提出要縮小核算單位，搞隊為基礎。毛主席是黨內第一個重視以小隊為基礎的中央領導。他好幾次在視察的時候向地方領導征詢過意見，但他沒有說這是他自己的意見，而是說“有人認為如何如何”。是用一種征詢意見的方法，他要說是他自己的意見，那地方領

導恐怕就會順著他說了。到 1959 年初的第二次鄭州會議，毛主席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想法就基本形成了，只不過那個“隊”還相當于以前的高級社，即大隊。

在 1961 年 1 月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主席提倡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說要讓 1961 年成為調查年。他親自下令讓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各帶一個小組，到不同的地方繼續去搞農村調查。

1961 年 3 月，毛主席在廣州主持“三南會議”（西南、中南、華南），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條例》，即後來一般說的“農村工作六十條”。農村情況就開始大為改觀了。

1961 年秋，田家英按照毛主席的思想為中央起草了《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中央打算正式確定“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核算制度，并規定至少三十年不變。這個“隊”不再是大隊（相當于之前的高級社）而是“小隊”，相當于解放初的初級社，一般是 10 到 20 來戶人家。“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核算制度，是在七千人大會上獲得通過并隨即正式下發全國農村的。

當時毛主席親自抓了三件事：縮小公社和生產隊的規模，取消農村公共食堂，改變農村基本核算單位。改變了人民公社成立初期的一些幼稚的和錯誤的做法，使得人民公社這個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體制，逐步得到了鞏固和完善。現在很多人一說到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就是“絕對平均主義”。這實際上是對人民公社制度從發生到發展再到完善的過程的不了解。實際上在新的核算制度之下，人民公社完全廢止了“一大二公”，消除了核算單位太大造成的過于平均的弊端。

到了 1961 年秋，最困難的時期實際上就已經過去了。我國農村在 1962-1966 年出現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高增長，糧食是平均每年增長 260 億斤，棉花是平均每年增長 600 萬擔。這些現在都是存案可查的。

我記得 1962 年的時候，當年我在四川種試驗田的大豐公社有個干部給我寫來一封信，他在信上說：老戚，不要著急，我們現在這里是風調雨順，一年就能把經濟恢復過來。我當時就把這封信選登

在了《群眾反映》上了。沒有想到，毛主席在《群眾反映》上看到了這封信，非常高興，馬上把它批給了全體中央常委看。

在七千人大會結束以後，毛主席就去了南方，中央工作又交給在一線的劉少奇來負責。可是毛主席前腳剛走，劉少奇後腳就在中南海的西樓召開在京的中央常委會議，（後來就把這次會議叫做“西樓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就推翻了七千人大會對形勢以及我們工作中的成績和錯誤所作的判斷。把形勢說得是一片黑暗。認為工作中的成績和錯誤不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甚至也不是“三七開”，而是錯誤占了主要的地位了。這些東西首先都是由陳云提出來的。在文革中，總理要財貿口的領導與造反派批判陳云，就把陳云在西樓會議上的講話拿出來批判了。劉少奇、鄧小平的看法當然也都是和陳云的看法一致的。總理當時的態度也不是很明朗，好像是有些地方贊成，有些地方反對。後來毛主席把這種對形勢估計是一片漆黑的說法，叫做刮“黑暗風”。

其實對形勢作悲觀估計，主要的目的就是為實行“包產到戶”作輿論準備的。陳云當時就是竭力主張“包產到戶”，甚至要“分田到戶”的，他說如果不搞“包產到戶”，那恢復經濟至少需要八年，搞“包產到戶”就只要四年。而劉少奇則更過分，他是堅決主張分田到戶的。這些也就是後來毛主席所批評的“單干風”。

在七千人大會上，一些在大躍進期間因為反對“浮夸風”而受到錯誤打擊，以及在廬山會議以後又被錯誤地打成“右傾機會主義”的同志得到了平反。這一來，連彭德懷都向中央寫了“八萬言書”，提出要翻案。這就是後來毛主席批評的“翻案風”。

6、圍繞“包產到戶”問題黨內展開的兩條道路的鬥爭

關於“包產到戶”的起源，最早是安徽曾希聖搞的，他1961年就已經在安徽做單干試點了。當時主席聽說後也沒有完全否定它，只是說，你們可以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但是到了1962年，

各個地方的單干風越刮越大了。劉少奇的秘書姚立文，他是除王光美之外，劉少奇的最重要的秘書。平時我們常碰面的，關係也挺好的。可我們在一起的時候都很少談論重要事情的，因為大家彼此心里都明白，是“各為其主”的。可有一次我問姚立文，怎麼少奇同志老批那些“單干”的材料，主席不是反對這樣搞的么？姚立文說，你不知道，要不是少奇同志壓著，下面的呼聲還要高呢。

但實際上劉少奇不但是支持搞“包產到戶”的，而且他是主張要搞“分田到戶”的。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建議，說下面調查的結果顯示，中國的農民要土地，要求分田，你只有給他們土地，他們才會有積極性。主席聽了十分生氣，斥責了田家英，認為他給自己做秘書做了那么多年，都不知道什么叫社會主義，還跟著人家后面跑。主席問田家英，這究竟是你的意見，還是別人叫你來說的。是誰叫你來說的。其實主席說這個話，他心里就已經是很清楚的了，這一定是劉少奇叫田家英來說的。可田家英當時還堅持說，沒有誰讓他來說的，那只是他自己的意見。毛主席就此對田家英徹底失望了。

圍繞著是否搞“包產到戶”所展開的黨內鬥爭具有前所未有的特點。之前在黨內發生的高崗、彭德懷事件，主要還是一些歷史恩怨和如何維護黨內團結、防止出現黨內的分裂的問題，並沒有往是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件事上發生爭議。而這一次的鬥爭則是關係到了究竟走社會主義的集體化的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的“單干”的道路問題了。

毛主席很清楚，當時政治局常委的多數和他的意見不一致，如果在這個時候召開中央常委會或者常委擴大會，來表決走什么道路這樣一個大政方針的話，他很可能會變成少數。這樣一來，主張“包產到戶”的那些人馬上就可以轉變黨的路線。其實，像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他們所考慮的問題也不是單純的個人權力問題，或者僅僅是個人的利益問題。那樣看問題的話，只是把問題庸俗化了。他們都是有著自己的政治抱負的，至于他們的抱負是不是正確，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在這個層面上來講，這絕非是單純的個人權力之爭，而是方向路線之爭。這並不是說他們

不要權力，而是說權力是為路線服務。

這個時候，我深深體會到了毛主席駕馭黨內鬥爭的高超的藝術。他首先召開了由各大區，各省、市領導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為召開中央全會作了準備。因為在那些具體負責地方工作的領導中，反對搞“包產到戶”的占多數。

第十四章 北戴河會議反對“包產到戶” 和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

1、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的一些情況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在北戴河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緊接著，8月26日至9月23日又在北京舉行十中全會的預備會議。

田家英參加了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那時從北戴河到中南海有直達的班車，所以他常在北戴河和中南海兩頭來回的。8月25日和26日，他在秘書室室務會上分別傳達了會議的情況，這些我當時都記在自己的工作13記上了。田家英傳達的具體內容可見下章日記殘頁的1962年8月25日、26日兩天的日記。

2、《群眾反映》編印“關於群眾對‘包產到戶’的意見”

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嚴厲批評黨內一部分人的“包產到戶”的主張。這之前，田家英讓我整理《關於群眾對“包產到戶”的意見》等材料，通過《群眾反映》發給中央領導同志參考。田家英實際是支持“包產到戶”的主張的。

說實話，我對“包產到戶”不是那麼積極，為什麼呢？首先是我小時候自己就對農村有一點了解，覺得農村那種小農經濟沒有出路，中學時候讀關於蘇聯的書，知道了斯大林在蘇聯搞集體農莊，我就覺得中國是不是也要搞集體農莊。1959年到四川種試驗田，對農村也有更切實的了解了，我覺得“包產到戶”以後，首先公糧收不上來，很多農戶肯定要瞞產，少交公糧。其次農村已經有些小的拖拉機了，小土地都一塊一塊的，統一耕作很難，推廣良種和新的

生產方法都很難。結合到早年看過的蘇聯的集體農莊的材料，我就基本認為走集體農莊的道路才是我國農村的根本出路，大片土地還是要搞合作化，“包產到戶”只能是一些比較特殊的地區的迫不得已的選擇。不說我自己的具體認識，就是從情感方面講，我也是贊成毛主席的路線的。我中學時候就是下決心要跟著毛主席的，沒有想到後來居然到毛主席身邊來工作了。1957 到 1958 年發生了中南海的“八司馬事件”，我是主要的組織者之一，我們遭到何載等人的打擊報復，後來是毛主席親自解救了我們。大躍進中出現了浮夸風，毛主席不是像彭德懷那樣，只顧批評別人，而是一方面想盡辦法制止浮夸風，一方面挽救那些犯了浮夸風錯誤的各級干部。在困難時期，毛主席一方面與人民同甘共苦，一方面在全黨大興調查之風，而且在聽到匯報說那些在“八司馬事件”中犯了錯誤被下放勞動的同志也應該下去勞動鍛煉，順便去作調查研究，了解下面實際的情況。我當時也去了二七機車車輛工廠，還是帶著犯了錯誤的王剛等人一起去的。回來後，我打報告說，他們都改造好了，可以取消處分、可以分配工作了。主席很快就批了。經過這一系列的事情，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主席的胸懷和一個共產黨領袖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就更加認定了主席選擇的路就是正確的路，搞社會主義不會錯。

總之我是沒有完全聽田家英的，而是把反對“包產到戶”的意見也搞了一個材料。我選擇了三件有代表性的，用了“反對‘包產到戶’”的小題目，也登在這個專輯里了。這樣一來，反對的和贊成的兩種材料都有了。雖然份量不是一樣多，但一個來信多，一個來信少，這也是客觀情況。田家英看了以後還半開玩笑地說，你這人滑頭，兩邊的東西你都送，那你就總是正確的了。

譚震林是反對搞“包產到戶”的，他看到《群眾反映》的這個專輯後，覺得抓到把柄了。他在小冊子的空白處，寫滿了他的批示，把“包產到戶”批得個體無完膚，說它是倒退，是一股逆流，是一種反對社會主義的傾向。還說《群眾反映》的編輯是在為資本主義呼喊，要追查。本來在秘書室閱覽室里就有一份《群眾反映》了，現在又多了一份譚震林批示的抄件，大概是譚震林的秘書放在那里

的。我心里明白，譚震林這樣做，實際上是想報一仇之箭，因為我們反映過他夫人用軍用飛機買活雞的事情。這些人，你別看他是老革命，都是睚眦必報的。

看到譚震林的批語，楊尚昆就叫龔子榮來找我談話。我說，我們收到了很多群眾來信。我就請示了田家英，田家英叫我專門編一個專輯，送給中央領導做參考的。楊尚昆就去問田家英：戚本禹說是你叫他編那個東西的？田家英為這個事情對我很惱火，來問我，你怎么告了密？我一愣，問：我告什么密了？他說，你不是告訴別人是我叫你編輯的嗎？你跟別人說干嘛？你知道這個事情有多大，是反黨的，你這不是陷害我嗎？我說，我真不知道中央這些事，而且我反映的也不全是贊成“包產到戶”的，也有反對“包產到戶”的啊。

龔子龍他們去查，果然有我說的反對“包產到戶”的材料，只是譚震林不知道為什麼沒有看到。所以龔子榮就向中辦黨委寫了匯報，說人家編的專輯里也有反對“包產到戶”的來信，兩種意見都向中央反映了，這是他們的工作職責。他們是反映群眾的意見，不是搞他自己的意見，這是對的，為什麼要追究責任？他們沒有責任的。

彭真知道此事後對譚震林說，你有意見可以，但不能去追查人家呀。如果他們什么都不反映，我們怎么知道底下的情況。當時彭真是反對“包產到戶”的，他看了那些反對“包產到戶”的意見，覺得講得很有道理。

後來田家英對我說，虧得你搞了一個反對“包產到戶”的材料，不然就說不清了。

不久中央下了反對“包產到戶”的指示，我們科長開會傳達，馬上就有一個人出來說戚本禹搞的那個“包產到戶”的情況反映是右傾機會主義。好在田家英也在會上，他就說，反映情況就是右傾機會主義，那誰還敢工作呢？之後就沒有人敢講話了。

3、關於八屆十中全會的一些情況

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並沒有強調提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的鬥爭，而是重新提出階級鬥爭。講社會主義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

一開中央全會，那些各大區的書記，省委書記當時大多數是主張搞人民公社的，走集體化的道路的，都不同意搞“包產到戶”。所以，這樣一來，毛主席在中央全會上就是多數派了，其他的常委成了少數派。劉少奇他們即使想搞單干，在會上也不好說出來了，就只好一起跟著主席講階級鬥爭了。

在我的工作筆記中也有當年田家英傳達的關於十中全會的內容，亦錄在“日記殘頁”一章中。

田家英在傳達中未提及劉少奇、鄧小平，也未提及陳云，只提了鄧子恢，但鄧子恢並不是政治局委員。在十中全會上正式挨主席批評的也只是鄧子恢。

至于彭德懷，盡管他在廬山上是強烈反對劉少奇在大躍進中的一些“左”的做法的。但他在“包產到戶”問題上卻又是和劉少奇完全一致的，他也主張分田給農民。

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有一個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長篇講話：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口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早期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

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復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是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

後來從主席的這個講話里，歸納出了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流傳到了群眾中間，就被簡化成了“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但是毛主席強調“階級鬥爭”主要是他看到了在整個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里都還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而且他逐步明確了這種危險主要的並不是來自下層，而是來自黨內，尤其是來自黨的上層。而這些在以後都早已成為了歷史的事實。

而我們的黨內鬥爭中，有這樣一個特點，由於毛主席的崇高的威望和他在黨內外所受到的廣泛擁戴。公開地提出與毛主席相對立的意見的並不多。可是有些人卻總是善于把毛主席所提出的口號，在實際的執行中變成另外的一套東西。1957年的反右運動，後來就被變成了把反對自己的人打成右派的“反右擴大化”運動了。而八屆十中全會重新提出的“階級鬥爭”的口號，在實際生活中又被搞成了是針對下面群眾的東西了。大搞階級教育，強調階級出身等一系列的做法就是這樣搞起來的，到後來就逐步發展成為“四清”運動中的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形左實右”錯誤傾向，和文革初期的“資反路線”及“聯動”的“唯成分論”。而到了毛主席去世以後，他們卻又倒過來把自己搞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帽子戴到了毛主席的頭上。

這一年的年底，毛主席在他生日的那天作了首詩“七律·冬雲”：“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向來都把詩中的“蒼蠅”解釋成是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其實，那一年，從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一直到八屆十中全會，毛主席在黨內同樣是經歷了怎樣的驚濤駭浪啊！

第十五章 日記殘頁 (1962年4月20日-1962年10月24日)

日記殘頁的全文及說明

我在中南海工作時，有個隨手記日記的習慣，雖草率、隨意，不連貫，散亂錯雜，但真實、私秘、便于翻查。可惜這些日記多在文革受審時失落了，也許被有心人收存起來，或者當作廢紙處理了。只有 1962 年 4 月 20 日-1962 年 10 月 24 日的日記殘頁，在我 1986 年出獄時夾在歸書中退還給我了。

寫殘頁中日記的時候，我正在秘書室主編《群眾反映》。殘頁中所記述的那幾個月正值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召開前和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期間的事。其中雖只是一些片言只語，但也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這個歷史重大轉折時期黨內、國內的一些事情，頗有歷史參證作用，遂整理出來，以供後來的歷史研究者探索研討。括號里的字是我在整理時新加的說明。

(1962年4月20日以前日記遺失)

1962年4月20日，晴

《群眾反映》35期付印。批評葛惠敏（譚震林夫人）一稿占首條。

【注】有關譚震林的夫人葛惠敏買雞並用專機運雞的事，我在前面第十二章里已作了敘述。

1962年4月21日，晴

耕畜問題嚴重，告姜（德久）、陳（希梅），整理材料。

【注】耕畜問題嚴重，是指當時的情況。

姜德久是秘書室一科的科員。他是和我一起去二七機車車輛工廠勞動的。後來他調去貴州省委辦公廳工作。在文革的時候，就是他給我講了貴州省軍區司令李再含支持貴州造反派的事。後來我被捕，他和李再含也都被作為“516分子”抓起來審查了很久。陳希梅是個大學生，是一科的一般干部。

1962年4月22日，晴

與林克（短）信，請他將葛惠敏材料〈《群眾反映》35期〉送主席閱。發編《群眾反映》36期，加編者按。

【注】林克是主席身邊一組的工作人員。

1962.4.23, 晴

楊（尚昆）主任送來上海〈群眾來〉信，反映第一機械工業部不顧大局。編為37期。

【注】楊尚昆對上海的陳丕顯有意見，他就把信給我，叫我登出來。盡管他對我搞的《群眾反映》很有意見，但他也經常會拿了很東西叫我給他登的。他也知道這樣問題好解決。

1962.4.24

主席要《草字訣》，已請（北京市）文化局劉子章（局長）找到兩冊送去。現書店又找到（一部），石印，品相不佳，不送了。讀清史（十全武功章）。

見到王任重《讀書筆記》，（送）給田家英（閱）。

【注】十全武功章是主席看過的，主席看過的書我都會自己去買一本來看。

王任重的讀書筆記是在湖北（油）印的，當時湖北的干部差不多是人手一本。

1962.4.25, 晴

林克已將《群眾反映》35期送主席閱。

(中辦副主任)龔子榮找陳秉忱(中秘副主任),對《群眾反映》刊載批評葛惠敏的信不滿。傳達楊尚昆主任的話:“人是猴子變的,要照顧人家的面子。”

(陳秉忱來告我楊尚昆的不滿意見時,見我在看清史,便叫我查孫愷陽是誰?我一查,他就是蔚遼名督孫承宗。)陳以30元人民幣在琉璃廠購得孫愷陽所繪魯仲連祠(古畫),上有何子貞題字。人們多不識孫愷陽是誰?此畫遂為陳秉忱低價購得。

毛主席要《辭海》(解放前版)、《中華文選》(新版)(主席和田家英均在杭州)。急告中國書店找書,中國書店找到《辭海》,但無《中華文選》,又找中華書局辦。

朱老總為我收藏的《幽蘭賦》題字,蓋大章。

【注】陳秉忱是我們秘書室的副主任,他是山東陳XX的孫子,寫的一手好字。中蘇友好條約的中文正式簽字文本就是他用小楷抄寫的。

孫承宗的那幅畫是陳秉忱送給了康生的,他叫康生在上面題了字。後來康生都把這幅畫交給了國家。

孫承宗當過明朝的國防部長。他是抗清的。康生叫我寫本關於他的書,我寫了,交中華書局出版了。後來批《海瑞罷官》的時候,彭真他們把我寫的這本書找出來,要交到主席那里去,說這也是寫“國防部長”的。王力跟他說,不行,戚本禹是八司馬,你們這樣做,不是又搞出個八司馬了嗎。他們聽了之后就想把交上去的這本書撤回來,但已和關鋒的文章一起交上去了,撤不回來了。主席當時對彭真說,他們的事,三年以后再說。三年過后,我們真的被抓了。這也許是巧合,也可能主席知道,一場大的政治運動,一些勇敢分子後來都是要受到處分的。

何子貞是明代有名的書法家。

朱德是用黃庭堅的字體給“幽蘭賦”題字的。這幅字在我被捕后被中央辦公廳抄走了,沒有歸還給我。

1962. 4. 26, 風

(整理了一份)《如何應付中央》的材料，刊《群眾反映》。

修改關於王剛等人問題的決定。

中央辦公廳(後樓研究室)同志對《群眾反映》有好的反應。

葛惠敏信在高層震動頗大。

晚觀看評彈：《長征組詩》，凌文波表演精彩。

讀清史。分析乾隆之治的矛盾。

看考茨基《土地問題》。

【注】對《群眾反映》登載了批評葛惠敏的信，普遍的反應是“很好”。

一些領導干部都告誡自己的家屬，千萬不要惹出像葛惠敏那樣的事出來啊。

考茨基說，小生產是不可能搞社會主義的，連資本主義也不能允許小生產的大量存在。

1962. 4. 27, 晴

(《中華文選》買不到，向北京中華書局編輯部急購。中華書局問是誰要？)請示秉忱同志，告以是主席要，(他們說立即送)，下午他們派一女同志送來(辦事員付錢，他們說是送請毛主席審閱，不要錢)。開會討論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會)報告，下午去書店購《世界通史》三卷、影印《顏真卿祭侄稿》一卷。共價十元。與秉忱欣賞《祭侄稿》，發現釋文竟有七、八處錯誤。

【注】我對林彪的那個講話影響特別深。當時我就在現場聽的。他的講話要比後來印發的文字要精彩得多了。林彪上來就說，不是主席犯錯誤，是我們犯了錯誤。凡是我們離開了主席，我們就犯錯誤。不信，你們自己去查一查，有那件事情主席沒有說過，我們沒有照著做就是了。主席後來問羅瑞卿，你講得出這樣的話嗎。

劉少奇的報告當時我們也討論。劉少奇的講話根本就不檢討自己，其實大躍進的時候，他是講得最厲害的。但他一點都不檢討自己。主席把責任都攬到了自己的身上。他卻說什么，三分天災，七

分人禍。給人聽起來好像都是主席的錯誤，他自己什么錯誤都沒有。劉少奇一貫是這樣的，以前他犯左傾錯誤的時候，他也是批評別人犯左傾錯誤，好像他是一貫正確的。

1962. 4. 28, 晴

(中辦秘書室) 開室務會討論〈精簡〉編制的……。(這是) 克服目前困難的重要措施。

主席要(我們去) 買一些古典名著送人。(書單:)

東周列國志

兩漢演義

三國演義

曲選(顧明編, 上海光華出版社)

聊齋

【注】秘書室本來就只有一百人不到。主席要各單位都要精簡人員，所以秘書室也作了精簡。

1962. 4. 29, 陰

上午接見河北淶縣復員軍人，反映村干部貪污問題。

下午為主席購書，跑了東西城，強差配齊。(《曲選》品相不好) 看陳毅同志在人大報告。

1962. 4. 30, 晴

給家英同志發信。

《文匯報》發《京華何處大觀園？》，考證大觀園原址，并肯定《紅樓夢》是一部自傳體小說，與李希凡有不同看法。昨《光明日報》發吳晗，《並為爭論的爭論》，亦與李希凡意見相左。

晚看電影《東進序曲》，政治內容與藝術水平均好。

1962. 5. 1, 晴

上午同女兒至天安門歡慶五一。

讀《紅巖》。

1962. 5. 2, 雨復暗

接家中信，妻妹工廠（國營紡織）停工、工人還鄉處理。工作錯誤，造成如此后果，心中不安。

去中國書店，遇文化局長劉子章，他們看到主席要《草字訣》（知道此書有用），正在組織影印發行。

1962.5.3, 晴

今日是（我們八司馬因積極參加整風運動挨批斗）的四周年，（四年前）這一天，主席給我們撥開烏雲，重展紅旗。

【注】這天就是1958年主席在中南海和我們講話的那天。每年的這一天，我們八司馬都要碰在一起紀念紀念。

1962. 5. 4, 晴

編寫《阜新煤礦工人（對領導）不滿》的報告，刊《群眾反映》。

1962. 5. 5, 晴

室務會議討論編制問題。

1962. 5. 8, 大風

參觀首都第六屆書法展，很多好作品。

朱德總司令：回憶井岡山詩、毛語錄：〈中國文化從古代文化而來，這個條幅寫得好）

董老：錄龔自珍詩，好。

謝無量：行草杜詩，別有一體。 ”

邵宇：（美術學院院長）行書，新詩（艱難曲折縱然多，業績永垂千秋！）好。

老舍：行書，汕頭行，好。

寧斧成：大處落墨（隸書），極有特色！

（其他如）沈尹默、沈鈞儒、劉子章、謝資哉、鄧拓、郭老、歐

陽予倩、李苦禪、黎錦熙、老舍、凌子風、趙樹理、顧頡剛、葉聖陶、王昆侖、何香凝等人書法，亦各有好處。

1962. 5. 9

（上午值班室告我）國務院秘書廳來電說：“習仲勛同志（國務院秘書長）認為《群眾反映》辦得很好，他每期都看，傳閱范圓至副秘書長。”

許明辦公室來電，上次給周總理（關於彭德懷問題看法）報告。總理已閱，并批請中央同志傳閱了。

下午值班室又告，國務院秘書廳來電，（習秘書長要）他們派副主任等三人來了解我們辦《群眾反映》情況。

今日賂得《努爾哈赤實錄》一冊。

【注】國務院是由秘書廳管群眾來信來訪的。習仲勛擔任國務院秘書長以後，就由許明管來信來訪了。

許明當時是總理的辦公室主任。關於彭德懷問題看法的報告是我匯總了群眾來信的內容寫給總理的報告。當時給彭德懷翻案的事鬧得挺厲害。我匯總的報告中主要是說，如果當時在廬山上沒有彭德懷的干擾，那後面也不會犯那麼多的左的錯誤。本來廬山會議是要糾正左的錯誤的。彭德懷一鬧，就使會議轉為反右了。所以說彭德懷一直是在干擾著主席的步驟，到現在都還在干擾。總理把這個報告批下去之後，這個看法為大家所認同。

習仲勛派人來取經的事，我在前面第十二章里說了。

1962. 5. 10, 晴

辦信。

田家英來長途電話，告以寫好王剛等人結論部分。

晚看《老子》。

【注】田家英當時跟著主席在北戴河開中央工作會議。那次會議是八屆十中全會的預備會議。

1962. 5. 11, 晴

編輯《群眾反映》第40期（《將軍之子》）。

國務院辦公廳陳副主任等三人來訪，了解我們辦《群眾反映》經驗，我們談了五點體會，如少而精等，其他不能多談。

晚去懷仁堂看贛劇《西域行》。

【注】國務院辦公廳來了三個人，都是老干部，很老的干部。總理有個缺點，他身邊用的都是老干部。不大用年輕人。主席這里就用像林克、田家英這些青年人。

關於“五點體會”，前面第十二章講了。

1962. 5. 12, 晴

向仲華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對《群眾反映》的揭發作了一些檢查，不深刻。

（軍委）總政組織部對《群眾反映》第1-2期《關於軍隊干部》特殊化等問題作了檢查，（認為）群眾反映情況基本屬實。

看《偉大的歷程》紀錄片。

【注】向仲華當時是裝甲兵司令。有人來信反映他搞生活特殊化，在“群眾反映”上登了。他承認，并寫了檢討，表示接受意見。我把他的信也登在了“群眾反映”上。這事是羅瑞卿過問的。當時部隊搞特殊化確實很厲害。主要是吃喝風，七大盤子八大碗的。把公家的招待費都用來自己喝酒了。當時還是定量供應時期。還有就是占用公房，公物。裝修自己的房子。把公家的東西用來送禮，送給自己的親成朋友。但當時貪污的事情還不多。搞女人的事卻很多。

1962. 5. 13, 晴

購《燕山夜話》、《焚書》、《文選》。夜讀《焚書》。

【注】我看了《燕山夜話》，當時就寫了個批評信給《前線》雜志編輯部。說你寫的這些東西太過分了。誰都看得出，你是在攻擊中央領導的。你要提出的指導方向究竟是要往哪里指導啊？可他們不讓登我的這封信。而是給我回了個信，說你這個意見有合理的方

面，但是我們的意思并不是你說的意思。所以你的信我們就不登了。後來據他們在文革中的交代，這個回信的每句話都是經過鄧拓仔細斟酌后寫的。我當時是用了“戚誼”（我在團校用的名字）的筆名寫這封信的。他們就到處去打聽，戚誼是誰，可查了以后，誰都不知道是誰。

當時不僅是我，中央辦公廳，后樓研究室好多人都寫了信給他們，他們一封也沒登出來。後來主席批評了《燕山夜話》。我就把這信拿了出來。康生看了就說，什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就是證據，這是典型的壓制批評。後來他指示把我的信全文在《光明日報》上登了出來。

1962. 5. 14, 風

看各地〈向中央送的〉文件，“包產到戶”的呼聲很高。

楊（尚昆主任）批評（《群眾反映》）以前刊載的東西有（些內容）不妥。但我想讓中央負責同志了解一下社會存在的黑暗面也有好處，工作有缺點，怕人知道，不是正確態度。編發《群眾反映》第41期。

夜讀《莊子》。

【注】楊尚昆感到有壓力，他說，軍隊對他有意見。因為人家都以為《群眾反映》是楊尚昆管的，是楊尚昆想弄他們。他們說軍隊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怎麼說得我們一片黑暗呢。其實軍隊是有好的一面，可是一些高層領導搞特權也確實是搞得很厲害的。楊尚昆對《群眾反映》的態度是比較實用主義的。一方面他對誰有意見，他就把許多材料拿來叫我們登出來，比如他對華東局的柯老有意見，對陳丕顯也有意見。因為陳丕顯是聽柯老的。他就叫我登。但我登出一些批評其他領導的群眾來信，他就對我感到不滿意了。

1962. 5. 16, 晴

整理《山林的災難》。

1962. 5. 17, 晴

秘書室支部大會通過王剛等人（原）黨紀處分緩期執行。〈主席指示，有些黨紀處分試行緩期執行以觀后效的辦法，如行得通，可以向中央建議推廣。〉

1962. 5. 19, 星期六，晴

編輯《群眾反映》第 43 期。

晚看翦伯贊《歷史問題論叢》。

1962. 5. 21, 星期一，晴

龔副主任把反映內蒙蝗災告急的信壓了 20 幾天，實不應該。

1962. 5. 22

葛惠敏寫來帶訴書，說對她的批評意見是余先覺聽壞人講的。龔子榮指示，把她的意見全文刊載《群眾反映》。又聽說葛要找楊（尚昆）主任鬧，楊指示龔子榮接待。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編輯《群眾反映》44 期、45 期。與姜德久加班趕寫：《德州地委領導干部違法亂紀》。

【注】葛惠敏不只是申訴，她是反攻了。這些人哪有這麼容易得罪的。

龔子榮指示，把她的來信全文照登。我就以“葛惠敏同志對上期群眾反映意見的答復”為題把她的來信照登了。這一下，大家對她的意見更大了。楊尚昆說，他找譚老板解釋那不是他弄的，是下面人弄的，譚震林聽都不聽。他總認為，不經過你們的同意，底下人怎麼能登呢。他當時還不知道是我決定登的。那時我還是個小人物。等他知道是我登的，那對我可以說是恨之入骨了。這些人可以說都是睚眦必報的。所以也很好理解他們後來對文革的態度的。我這件事做得不但楊尚昆被動，連田家英都很被動。譚震林老找田家英的事。

主席對譚震林罵得很厲害，可總是保他。大躍進的時候他吹得

最厲害了，他對餓死人的事應該要負主要責任的。他也不檢討。所以，我們對他意見都很大。不過他倒是堅決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只是他自己卻挺會享受的。他是工人出身。他是鐵桿要搞集體化，工業化的。他和江青關係很不好。他給林彪寫信罵江青是武則天。可能這多少和我也有點關係，因為他看到江青那麼相信我，重用我。

“二月逆流”的時候，他沖張春橋發火。其實張春橋沒有得罪過他，我倒是得罪過他的。只是那天我正好請假在家里寫文章，沒有去參加會議。否則，很可能他會沖我來的。

其實我內心也是挺矛盾的。後來他被打倒了，主席還是要保他。江青讓我給群眾去做工作。我在群眾大會上說的是最有說服力的。我說，譚雖然有錯誤，但我們要看到，他和劉鄧是不一樣的。他在黨內是擁護毛主席的，是堅決主張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是堅決反對“包產到戶”的。據說他當時聽了以後還挺滿意，說這小子算講了句人話。

1962. 5. 25, 晴

(參加中辦會議。楊尚昆主任傳達)

中央決定派 100 名部長級干部下去，加強重點縣的工作。中直機關各單位都要抽人，胡耀邦、廖魯言、李頤伯已報名。楊（尚昆）說，《群眾反映》最近幾期內容尖銳，把譚老板的老板娘也批評了。這個人大家對她反映不好，用飛機（往北京）帶東西（活雞活鴨），多少人都有意見。但我怕這樣會引起譚老板誤會，以為我在整他。我上次向譚老板說明了，他說，他倒沒什麼，（只是）葛惠敏緊張。楊說，以後刊登這類東西，要和他多商量商量。晚看湘劇《生死牌》。（聽林克說，毛主席看過這場戲，對幾個人爭搶死牌一節很感慨。）

【注】林克還告訴我，主席跟他說，你們八司馬的時候，是不是也是這樣的。寧可自己挨斗，也要保別人。林克說，是的。當時楊尚昆搞八司馬事件，首選的目標就是林克。因為他和主席的關係最好，主席很相信他。他說，當時大家為了保護他，都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拉，叫林克不要作檢討，由他們來作檢討，不讓人家抓到林克

什么把柄。主席說，你們八司馬這些人都夠意思，夠朋友的。像生死牌里面一樣。

1962. 5. 26

晚看意大利影片《她在黑夜中》，這個影片，似可在社會上公演，以比較資、社兩個社會的優劣。

1962. 5. 27, 晴

整理《機關生產弊病很多》。

參觀中國美術館。

【注】當時是經濟困難時期。為克服困難，一些機關就自己組織生產。有的搞農業生產，有的搞捕撈。生產的東西就在單位里分，往往是領導分得最多，底下群眾卻很少。大家都有意見。還有的拿東西到市場上去賣，比市場價格便宜，造成了與民爭利。群眾都有意見。有些機關農場還和農民爭地。後來主席批了，一旦情況好轉，就把生產給農民去搞，機關不要再搞了。

1962. 5. 28, 星期一，晴

中國革命博物館來人商量毛主席的禮品保管問題。我講了我所知的列寧博物館的沿革和此館對宣傳無產階級革命的重大作用，供他們思考。

【注】送給主席的禮品很多，有外賓送的，也有內賓和華僑送的。這些東西都歸秘書室管。內賓送的，我們一般都給錢，這些錢都是從主席自己的工資和稿費里拿出來的。可有些是華僑寄來的 你也沒法給錢。有個華僑送來好幾斤燕窩，說是給主席增加營養。可主席不吃，讓把這些燕窩全部拿到人民大會堂去，用來招待外賓。

這是主席的廚師告訴我們的。文革期間，一位龍虎山的老道給主席送來了他自己做的“長壽丸”。說真的有效，他已經活到九十多歲了。主席看了笑笑說，他不相信這個東西。讓汪東興拿去處理。汪東興拿了就放在自己嘴里嘎嘣嘎嘣的吃了起來。還叫我也吃。我說，

我不吃，萬一這里面有毒。他說，書呆子，給主席送的東西，他敢有毒？其實我心里是想，給主席的東西，主席又沒讓你吃，你怎么能吃呢？張耀祠在邊上也跟著一起吃。

我跟他們說了列寧博物館是怎么收藏列寧用過的東西的情況。他們說，這個好。問我是否去過蘇聯。我說沒有，我看過一本列寧博物館寫的小冊子，搬來照本宣科的。他們覺得很有啟發。不過現在弄的什么主席用過的瓷器，還稱作“毛瓷”。這純粹是瞎弄的。主席根本不用那東西的。

1962. 5. 29, 星期二

田家英回北京，（決定）整理《關於“包產到戶”的建議》等材料（通過《群眾反映》，發給中央領導同志參考）。

關於“包產到戶”的建議，田家英意見，現在要站住，不要松口，一松口，集體化就有渙散的危險。已經實行“包產到戶”的，可以讓其存在下去，不要急于糾正。

又決定即刻整理《〈廣東沿海農民〉外流香港》問題的材料。此事據說已在國際上引起震動，英國外交部給我們照會，態度尚好。美國則想借口此事干涉我們，他們想把此事提交聯合國，肯尼迪已講了幾次話。國民黨假惺惺要撥款救濟。此事我們早應向中央反映，現在報告都慢了。

葛惠敏之事引起震動，主席（把這期《群眾反映》）批給好幾個人看了。

王剛（正式調地方工作），昨晚來道別。（看起來）他對我們還是有感情的。（畢竟大家在一起勞動了一年多。後來又一起下去調查研究。）

【注】主席的批示是在很小的範圍傳閱的。我沒有見到過。但我知道內容是批評譚震林的。但主席只是讓他自己去處理這件事的。那在中南海里影響可大了。大家都覺得高興，那譚老板平時誰敢去惹他啊。好些人在中南海里遇見我，都笑嘻嘻地向我伸出大拇指。

1962. 5. 30, 星期三, 晴

電話告廣東省委辦公廳，注意一個做過十年機要工作的劉某（正在乘機偷渡香港），不能讓他去香港。

田家英上午來辦公室，談起群眾對龔同文（王任重、梅行等合寫文章的筆名）文章的意見。田說，（在最近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向王任重反映了三條意見：

一、龔文說要超過毛主席，不妥。

二、龔文說不要迷信馬克思，也不妥。

三、不允許別人批評龔文的文章，批評龔文就是右傾，右派，不對。

田家英說，第一條是狂妄；第二條是荒謬。因為不要迷信馬克思就意味著不要迷信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叫別人不迷信科學根本不通。如果不要迷信馬克思指的是不要迷信馬克思本人則無的放矢，因為現在根本沒聽說有誰對馬克思有什么個人迷信！赫魯曉夫也只是說對斯大林有個人迷信，他都沒敢說對列寧有個人迷信，何況馬克思！

第三條是應制民主，專制。

田說，王任重聽了他的批評，沒吭聲。第二天承認錯誤，并派宣傳部長去北京去向陸定一作交代說明。

田還說，他在會上還批評了柯老（慶施）那里的人，對錯誤的東西不作研究就聞風而起，對正確的東西，卻以穩重為名，加以抵制。柯老表示考慮他的意見。

（田又對葉子龍有意見，）他說（主席調離葉子龍工作后），葉子龍不服從（北京市輕工局副局長的）工作分配，向楊（尚昆）主任說，要去郵電部當副部長。楊（尚昆）主任說，“他還要當部長，當個局長都不行。”

田說，這次真遺憾沒把葉子龍貪污的冰箱和貂皮領子的皮袍子收回交公。

田又傳達楊（尚昆）主任意見，叫我們向下面打招呼（幫助何載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注】王任重的這些言論確實是不對。雖然王任重當時作了檢討。但田家英也就此和王任重結下了梁子。田家英垮臺后，王任重一連喝了好幾天酒。

後來，陳伯這寫了處理田家英的報告給主席。王任重馬上向主席告田家英的狀，說他怎麼到處散布“包產到戶”的言論。

說實話，王任重是一直堅持搞社會主義的。到打倒他的時候，

也查不出他有什么反對搞社會主義的言論。文革后，他也沒有支持鄧小平搞“包產到戶”。更沒有支持搞私有化。彭真也是這樣的。文革后，彭真和鄧小平的關係一直不好。黨內有好多人其實都看不起鄧小平的。張云逸就老是說，鄧小平在紅七軍的時候就是逃跑。

其實，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們在文革中對這些人不是用打倒的辦法，而是用團結的方法，也許結果會好一點。

文革一結束，雖然這些人都和鄧小平他們聯合起來反對文革。但他們中的很多人並不像鄧小平那樣，要搞資本主義的。他們還是要搞社會主義的。

田家英批評柯老。他對柯老有意見，對張春橋也有意見。那時他狂妄得很，自以為是毛主席身邊的人。這也注定了他日后的垮臺。我後來也很狂的，想說誰就說誰。別人不敢說的，我敢說，也是目中無人的。所以我也必然會垮臺。但是，我只是在性格上和他相近。我和田家英有個區別，我是堅持搞社會主義的。而田家英後來實際是轉向劉鄧那邊去了，要搞資本主義。

田家英批評王任重、譚震林他們，主要是批評他們的左。田家英不主張搞集體化。

而我是批評他們的右，搞特殊化，脫離群眾，鎮壓群眾。但我也是很欣賞他們堅持搞社會主義的。

冰箱是蘇聯送給主席的。主席不要，葉子龍就拿去用了。

那種蘇聯冰箱很大很重。我也用過，那本來是王稼祥的。他搬出中南海后，可能因為那冰箱太重，也可能是又買新的了，那冰箱沒搬走，留在屋子里。我調去《紅旗》雜志以后，我家也搬到中南海外面去住了。文革開始后，聽說西糾、東糾的那些人在調查我們的

住處，揚言要對我們採取什么“黑豹”行動，把我們消滅。反映到江青那里，她就下令把我們都保護起來。關鋒住的地方比較大，所以就派部隊去他家保衛。叫我就搬回中南海里，就住在王稼祥原來住的四合院里。我的隔壁住的是黃老。

何載的右派帽子當時被摘了，他後來去了山西。那里的人挺照顧他的。文革後，他去中央組織部當了副部長。冤家路窄，我1986年被放出來後，去深圳的一個朋友那里住。聽說邊上的一棟樓里住著一個北京退休的大干部，還老招漂亮的小姐給他作特殊服務。我心裡奇怪，是哪個大干部呢。後來一打聽，原來是何裁。他也腐敗了。

1962.6.1, 星期五，晴

下午聽田家英作目前農村形勢的報告。

整理“關於‘包產到戶’的建議”，準備印成一冊。

1962.6.3, 星期日，風間雨

去長辛店鐵路工廠看望老工人。

1962.6.4-6.6, 星期一、二、三，晴

4日學文件，5日、6日校印“包產到戶”建議分發中央各同志。

1962.6.9, 星期六，晴

習仲勛同志批了一件江蘇省反對特殊化的來信，（指示刊《群眾反映》，）上午整理排印。

〈下午〉看《陝西省委書記鋪張浪費幾件事》材料，整理排印。

【注】那些都是在一線的高級領導人。

1962.6.12, 星期二，晴，晚小雨

編輯《吉林省委特殊化》材料，付印。

1962.6.18, 星期一，晴

編輯《堅決與特殊化作鬥爭的六名黨員》（刊《群眾反映》。
近期看《三里灣》、《我們村里的年輕人》等電影。

1962. 6. 19-22

工作之余，看了《秦史綱要》和西方文學名著節錄。
又欣賞了陳伯達以 80 元購得明拓《孔宙碑》，秉忱題跋。康老藏有此碑之宋拓本，有宋人、明人及清人高南阜題跋，（秉忱為給伯達藏本寫跋，借來對照）我感覺此本不似宋拓，宋、明跋文皆偽，唯高跋似真。

1962. 6. 23

為《群眾反映》編輯《論工資制度與干部特殊化的關係》。

1962. 6. 24

看望（前中秘副主任）彭達彰同志，他最近要下去擔任縣委書記。

他向我談了對譚震林和王震將軍的意見。

譚震林在 1959 年 10 月在省委窗記會上講了許多錯話，既不了解情況，又主觀片面，下去就住最豪華的賓館，不深入下層，應派他下鄉，讓他做點實際工作，改正錯誤。

王震工作不實事求是，高指標，大帽子壓，今年才承認錯誤。

彭又說現在有些地方大興土木，勞民傷財。黑龍江領導借口給中央領導修招待所，里面猶若迷宮。（聽說葉子龍乘主席外巡）把春藕齋裝修了一下，主席回來氣得不得了。主席英明，不走隋煬帝的路，有些地方簡直是在重蹈隋煬帝的覆轍。

1962. 6. 29, 星期五, 晴

編輯《邊境前線動態》。

1962. 7. 9, 星期一

近日編了 5 期《群眾反映》(61 期-65 期)，內有《對劉仁同志的意見》，周總理批示的《關於干部侵占農民田地的情況》及楊(尚昆)主任《保薦安徽責任田》的材料等，責任田一期，田家英不同意刊載。

讀《努爾哈赤實錄》、《東北通史》，又讀《民約論》。

看電影《古巴革命的故事》。

1962. 7. 13, 星期五, 雨

田家英找我談話。對《群眾反映》有如下意見：

(一) 標題要客觀。傾向性要正確。中央未決定的問題，不要有傾向性。如對“包產到戶”來信，就不能亂用支持性的標題。鄧老(子恢)主張“包產到戶”，但他的意見尚不是中央的決定。他還不很同意鄧的意見。楊(尚昆)主任《保薦安徽責任田》的信就不宜刊載，所以我叫你緩辦。出了錯誤，我們負不了保薦的責任，我們也不十分了解安徽的責任田實際如何。

(二) 編者按里有些提法要慎重考慮，我們是中辦的刊物，要考慮辦公廳負責同志和其他領導同志的關係問題。(三) [本刊訊]宜改為[本刊綜合材料]

編輯《安徽定遠縣有些人乘平反機會毆打干部，干部不敢外出》。

1962. 7. 14, 星期六

毛主席在上周末，與中秘女同志談起群眾來信工作情況，他問主張“包產到戶”的來信有多少，都是哪些人寫的(要有個分析)。全國精簡工作情況來信反映如何？等等。田家英聽匯報後，決定向主席做個工作報告，室務會議決定，由我起草。

【注】我當時聽說別人向我轉達的主席的意思，我知道主席對“包產到戶”是有看法的。

1962. 7. 16, 星期一, 雨

昨天星期天到團校老友趙素行家，見到他新婚妻子林敏(在北

京圖窗館工作，空軍轉業人員）。他告訴我許多團校同志的消息：吳劍迅（班主任）在建築工程部，杭冠華在美術學院，陸愷在浙江省團委，王碧霞（國校校花）在建築工程部，周祖熙在體委，朱孝倫、韓彬在團中央。

趙素行在軍委工作的，他的夫人也是空軍轉業去北京圖書館工作。後來是她告訴我，有人在整我的材料。韓彬是工農干部，就是他堅決推薦我去中南海工作的，他說這個人將來有希望。他是我們班級管組織的。

【注】馮文彬那時是團校校長，這個人威信不高。他看到漂亮的女同學就走不動了，老找人家談心。我們看了都覺得他太過分了。後來胡耀邦調他去當了中辦主任。他居然提出要張玉鳳陪他睡覺，被張玉鳳臭罵一頓。張玉鳳給中央寫信，說怎麼有這樣的辦公廳主任？說主席，總理都對她很尊重的。胡耀邦馬上把他撤了。

1962. 7. 21, 星期一

春藕齋演出京劇。八時，毛主席來了，坐在一排中間，江青坐 在右邊，彭真和夫人也來了，坐在主席左邊。我正好坐在二排主席身後。劇目《失空斬》，譚元壽演諸葛亮。主席對此劇唱腔很熟，常跟著板眼頻頻點首，演出中與江青低聲評論演員唱腔工夫。閉幕時主席夫婦、彭真起立鼓掌、致謝。

1962. 7. 24, 星期二

聽說明天主席要去北戴河，所以周末的京劇演出，提前到今日。今日演出有三位著名演員，張君秋、譚富英、裘盛戎。劇目《大保國》。演員出場時，主席和江青鼓掌歡迎。演出中，主席不斷以手擊拍，悠然自得。一個跑龍套的在臺上昏倒，後來說是因為首次見到主席怕演不好，精神過度緊張，以致暈場。江青馬上叫人抬他至臺後，請醫生急救，醫生來時，人已蘇醒，江青跑上跑下，看了他好幾次，回來告訴主席沒事了，主席才放心。演出結束時，主席又問他好了沒有，演員們感謝主席的關懷。

編輯《群眾反映》第 66、67 期，主要反映機關生產弊病等問題。

1962. 8. 5

母親自上海帶鵬兒來北京圈聚。一早即乘公共汽車去車站接他們。

編輯《我國人口發展與糧食生產的關係》稿，準備刊登《群眾反映》，供中央參考。

鑒賞田家英收藏的清人錢灑書寫的《爭座位帖》，字寫得真好。要是顏真卿能看到都會高興。

1962. 8. 6, 星期一

崔英今天來看我，告訴我前些時她在游泳時見到主席，主席聽說她丈夫在下放農村時因公殉職，對她表示慰問，讓她扶養好子女。主席說她的名字好記，《西廂記》里有個崔鶯鶯。又說“《西廂記》的文章寫得很美，可以多看看，我看過十幾遍呢！”

【注】崔英是朝鮮族人，是我科里的科員。

1962. 8. 7, 星期二

《群眾反映》出刊《黃牛（投機倒把者）辦工廠》。

田家英回北京，談目前形勢，說現在很多問題中央尚在討論，意見不一，《群眾反映》暫時不要多出，少表態。

1962. 8. 18

母親今日回上海。這次母親來京，陪她吃了北京烤鴨，請她看了馬連良、張君秋演的京劇，新鳳霞演的評劇，她很高興。說自己也住進了皇帝住過的中南海，知足了。我忙于工作，多年來對父母照顧很少，送她上火車時，心中很不是味。

1962. 8. 25, 晴，星期六

《孫承宗》小冊子寫完，準備送中華書局出版。

田家英回北京，談起中央政治局擴大會某些情況。

這次談得較多，較雜。要點：

(一) 現在有人又在大講大好形勢，說過去下馬多了，主張再上馬大干。

(二) 會上不少人批判“包產到戶”主張，說這是兩條道路問題。譚震林最起勁，提出許多似是而非的批判，又列了許多沒有根據的增產指標。尾巴翹到天上了。

(三)〈許多人對陳正人意見很大。〉說陳在會上做假報告，報告說他去湖南等地看到老百姓紅光滿面。事實上他根本沒深入農村。同他一起下去調查的同志看他說假話，氣得不得了！楊（尚昆）主任知道了此事，說叫人寫個匿名信，讓《群眾反映》刊登一下。田說，這辦法不好。不如寫個有名有姓的信。據說陳正人是個老革命，《毛選》第一卷中有他的大名，但為人作風很不好，過去是高崗的干將，黨內受過批評。他喜歡一個花旦演員，收人家做干女兒，為干女兒大擺宴席，一派舊社會的老頭子作風。〈田說，不巧這件事被田看見了。〉陳正人又請田吃了一頓飯（意思是讓田別向外說）。生活上的事就算了，但他政治上看風使舵，一派資產階級的政客作風，叫人看不慣，還到處說田架子大。

(四)有一次起草中央文件，里面有句“如實反映情況”，陳伯達正說要修改一下，改“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反映情況”，陳說，否則，淨在內刊上反映包產單干思想，也變成了“如實反映情況”。田說，我就反駁他。我說，如果有包產單干思想，就要如實反映，讓中央知道呀！胡繩說，若按老夫子意思，那在美國就要說，“用資產階級立場、觀點反映情況”啦，大家哄笑。陳伯達的“修改”意見，只好作罷。

(五)中央會上，鄧子恢受到重點批判。主席找他談話時，他只字不提他自己對“包產到戶”問題的看法，事實上，他在外到處作報告，鼓吹這種意見，實在是不顧組織紀律。可他檢討時不從自己找原因，卻拉扯上了田家英，說他“受了田家英的湖南農村調查的影響”。田（家英聽后）發了火，事實上他的到處報告在先，田的調

查報告在后。批評鄧子恢沒組織沒紀律到處做報告，應該挨批評。後來黑了心，說受別人影響。這樣的人被人家批死了，也沒人同情。後來有人把這些情況轉告鄧子恢，鄧說，“唉，弄錯了，誤會，誤會！”

(六) 會上也有人就這些情況批評田家英，田大笑，引文天祥的詩，“姓名不列中心策，后天皇土地分明之。”意思是我是沒有名望的人，但是誰愛誣人民，老天爺是知道的。

(七) 陽家英、吳冷西商量，確定我們不能看風使舵，應反映的情況，仍要反映。關於“包產到戶”的建議仍可以在內部刊物刊登，以讓中央了解下情。(戚注：可我在主張“包產到戶”的建議外，又在《群眾反映》上刊載了一件正面反對“包產到戶”的材料，卻受到田家英的批評，說我動搖。我受到田的批評，感到委屈，向田說，上次你回來講《群眾反映》編輯方針時，說主張“包產到戶”的材料可登，卻沒說反對“包產到戶”的意見不能登呀！他說，你這是表白自己，怕登了“包產到戶”的建議，受批評。我說我那時根本不知道中央是怎么討論的，更不知道“包產到戶”的主張在中央擴大會上受到批評，這不是什麼表白，當時我也不需要向誰表白呀！我只覺得反對的意見也是一種動態，不管自己贊成反對，也應該整理出來，予以刊登，否則中央的人怎麼知道也有人反對“包產到戶”呢。況且包產單干，到時候糧食收不上來怎麼辦？農村兩極分化怎麼辦？也要研究一下呀！田說，我不管你怎么看，我不同意說“包產到戶”是兩條道路的鬥爭，如果中央說是，我也說是，但是我保留自己的意見。我說，那是來信人說的。只是一種意見。)

(八) 田說，兩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會上也受到了批評(兩個馬克思主義者是指王任重、陶翻，田家英說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意含諷喻)。他們一會兒左，左得出奇。比如他們堅決主張，把主張“包產到戶”者開除出黨。一會兒右得厲害。比如他們堅持田間管理一定要“包產到戶”，那就是安徽省的責任任田，五統一。他們的前后的主張豈不矛盾！？

(九) 田說，兩個市場，兩個價格，中央仍主張維持。

〈十〉只是田間管理怎么搞，中央尚沒有拿出一個辦法。〈田指著我說，你有興趣，我同意讓你下去調查研究，再放個衛星出來！我說，你都沒有辦法，讓我下去，我哪拿得出辦法？田又問其他人誰有興趣，沒有人應承。〉

晚，看英國電影《紅菱艷》。是一部富含哲理的藝術片（痛苦的哲理）。

1962. 8. 26

田家英在室務會上繼續談形勢：

(一) 田說，陳伯達很左。他是昧著良心的人。天津調查，干部向他反映農民有單干的要求，他不向中央反映，卻大談形勢大好。向中央轉的材料也是講大好的材料，而且說這就是馬克思抓主流的思想方法。田說，這是實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田還說，陳伯達在北戴河想把他的秘書逢先知拉過去。拉著逢為他做事情，逢以外出有事搪塞過去了。陳伯達這麼多年沒培養出一個秘書來。他總是和秘書搞不好。史敬棠對他那麼忠順，碰管他還是要用史敬棠，卻又看不起人家。

(二) 田說，廖魯言是王八羔子！說是下去，其實是呆在東北賓館里休養。這次左得要命，攻擊人家是兩條道路的鬥爭。

(三) 田說，他在北戴河會議上發言一小時，但他沒有昧著良心去批判人家“包產到戶”是兩條道路的鬥爭，如果昧著良心說話，那我會比那些家伙講得更好。田說他自己的發言也是個“滑頭發言”。

“我反對說保留點自由市場就是資本主義，但我不直接說，而是大講資本主義的前提是勞動變成商品，而不是保留點商品經濟就是資本主義。我說奴隸社會就有商品，還有大投機商呢，但那不是資本主義。我這一說，譚震林很聽得進去，我明明反對取消自由市場，譚靈林卻大聲贊同我的意見哩！他竟聽不出我在反對他給自由市場扣資本主義帽子呢！我在反對他，他不知我在反對他，還贊同我呢！田說，我還反對說按勞分配產生兩極分化。但我不這麼講，而是引證哥達綱領批判。大講哥達綱領說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原則。社會

主義也有分化，那是一部分貧農和中農、富裕中農的分化，不是變成剝削階級的兩極分化。譚震林也聽不出我在反對他，也在會上表示同意我的意見。”

(三) 田說，中央機關的有些負責人如王鶴壽等，反對“包產到戶”，比地方上的同志吵得兇。

(四) 李井泉左得歷害！

(五) 譚震林甚至講這樣的話，你們講形勢要實事求是，是什么講什么，好轉就好轉，至于征購任務可以商量，所以大家都要做一片光明派，抵制一片黑暗。但征購任務不增加，而且今年還要進口糧食。

(六) 田說，但願劉少奇、鄧小平同志能拿得穩，不會讓他們胡搞。

(七) 田說，周總理引證毛主席的詩安慰他，“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田說，“這是總理怕我年少氣盛。”總理還說“遵義會議後遭打過敗仗呢，有些人不執行毛主席的路線。

(八) 田欣賞《左傳》所記周天子的話：以理服人，不以力勝人。但省委書記們水平不高，講理論他們聽不懂。

(九) 田說，陸定一前一天在宣傳部大講“包產到戶”的好處，這次中央開會，他聽了一些風聲，馬上轉舵，又大講“包產到戶”的壞處。我沒有這個本事。陳伯達、陸定一、陳正人、廖魯言都是如此！

(十) 譚震林在會議中與楊（尚昆）主任大吵一頓，批評楊是右傾（即支持“包產到戶”）。

室務會議在聽了田家英關於中央會議一些見聞的談話後，向他匯報了中秘中層干部生活會的一些情況。田聽後對三個人講了一些意見：

(一) 戚本禹。“(1) 有才氣，但不夠堅定，容易動搖，如‘包產到戶’，聽到一些風吹草動就又刊出了反對‘包產到戶’的材料；

(2) 有私心。如《調查研究的調查》，給了我，又給彭真。這不是自投羅網嗎？他會聽你的批評，早知道，我不給你轉報主席了；(3)

在天津調查工廠時，除了干工作組的，又搞了自己一套《指去銀行做金融調查》。”

(二) 對呂澄。“(1) 私心太多；(2) 兇得很，粗暴，民主作風缺乏。(3) 上臺保不定干出什么事，如整馬之江就是，不放心。”

(三) 對李公綽。“扶不起來，太自私。”

(這是田家英一次對八司馬三個成員的批評。會后八司馬成員馬芷蓀對我們說，“可能是夫子最近心情不好，對你們批評重了。”但當時我的確不是很在意。)

1962年10月24日

田家英在中辦秘書室室務會議上傳達北戴河八屆十中全會若干問題。

會議主題是階級和階級鬥爭。

(一) 國際上，蘇修做了八件事，伊拉克、印度、原子弹，和平大會等，沒有一件做對的。

和平大會上，我們的團長對赫魯曉夫講話表示欣賞，犯了一個錯誤。

(二) 國內有兩股風：翻案風和單干風。

第一，翻案風

彭德懷要翻案。寫了八萬字的申訴書。他推翻了過去的檢討，說：“過去的檢討是追逼出來的，在那種情況下，我只好要什么給什么，不是我真的想法。”彭還極力否認對自己“里通外國”的批評，說他不懂外語，如何“里通外國”？

事實上，這個“里通外國”，他翻不了。

(1) 他與赫魯曉夫說，中國過去不了解你的政策方針，現在了解了；

(2) 他曾與布爾加寧說，社會主義國家要建立一個統一體；

(3) 蘇聯曾派一個華裔（蘇藉）情報人員，單獨與他聯系；

(4) 赫魯曉夫在外國公開說，彭德懷是他最好的朋友，高崗也是他的好朋友，毛澤東是穿舊了的破套鞋；赫魯曉夫至今仍然支持彭

德懷。

還有很多材料不宜公開。中央沒有冤枉他。

彭德懷還在申訴書里吹捧自己早在 1927 年八一南昌起義前就在軍隊里組織士兵委員會，搞平江暴動。

彭德懷很善于在我們困難時期搞些活動干擾我們的工作，廬山會議我們上了他的當，現在不上他的當了。我們現在主要抓當前工作，他的問題中央已經組織了以賀龍為首的委員會來審查處理。除了彭德懷要翻案，最近又出了高崗的翻案。

習仲勛從宗派主義出發支持李建彤的《劉志丹》小說，要為高崗翻案。可是毛主席保護習仲勛，此案已交由總理、康生同志去審查。

第二是單干風。

毛主席分析在困難面前，黨內有三種人：

一、堅決克服困難，不動搖，如林彪、周總理、柯慶施、李井泉、彭真、陶鑄；

二、動搖害怕的，如鄧子恢；

三、幸災樂禍的，如彭德懷。

鄧子恢在民主革命中是堅決的，但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準備。過去大砍合作社，現在又大力宣傳“包產到戶”，到處做報告，在黨校做報告，很多人同情他。又在軍委后勤部做報告，等等。羅邁同志用自己犯錯誤的經驗教育他，不知他能改正否？

毛主席要我們堅持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他根據山東、河南等地同志的匯報分析說，再有三年時間，農業經濟會得到恢復，集體經濟會有個大發展。

田家英在傳達中未提及劉少奇、鄧小平的政治態度，也未提及陳云，只提了鄧子恢。但鄧子恢並不是政治局委員，在十中全會上正式挨主席批評的也是鄧子恢。

(三) 毛主席要我們堅持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他根據山東、河南等地同志的匯報分析說，再有三年時間，農業經濟會得到恢復，集體經濟會有個大發展。

第十六章 調后樓研究室和 去唐山搞四清試點

1、從《群眾反映》調去后樓研究室

楊尚昆對我主編的《群眾反映》，一直都是意見很大的。盡管他有時也經常會找我刊登一些批評他所不喜歡的人的東西，但他總是擔心我會給他捅出妻子來。特別是因為葛慧敏的事情，搞得他和譚震林的關係很緊張。後來在關於“包產到戶”的群眾意見專輯問題上，他和田家英都受到了譚震林的攻擊。所以他就與田家英商量，調離我的工作。

大概是 1963 年中，龔子榮找我談話，說辦公廳后樓的《情況反映》，那麼多人都沒有搞出多少東西來，倒是《群眾反映》這麼個小刊物，給中央反映了不少情況，所以現在決定把你調到后樓研究室去加強《情況反映》的編輯工作。就這樣，我離開了《群眾反映》。調去“后樓”的時候，龔子榮給我登記表上寫的是研究員。但我有自知之明，自己還很年輕，而在“后樓”工作的都是些黨內資格很老、級別很高的老干部。所以在參加開會時，我都自覺坐在最後一排。

對於這個調動，老實說我是有心理準備的，因為《群眾反映》辦得太尖銳，領導干部一有點什麼特殊化的事情就給登出來，這當然使很多人感到高興，但也必然會使一些人感到不舒服，特別是那些喜歡搞特殊化的領導，他們總感到坐臥不安。

田家英對我的工作倒是一直都很支持，而且他有個特點，從來不譏諷過于下屬。這一點我很敬重他。他有時候接受楊尚昆的意見，也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他那時也堅決主張“包產到戶”，實際上是

已經完全倒向了劉少奇、鄧小平那邊去了。而楊尚昆是執行劉少奇、鄧小平路線的，所以他也是得罪不起的。

《群眾反映》在我手里一共辦了一百多期，我走后，是馬芷蓀接辦，她辦得也不錯。不過，後來林克告訴我說，主席就不大看了，也沒有再作出什么批示。

2、后樓研究室

最開始的時候，各地（包括各大區和各省市）給中央的報告，也都是由秘書室來處理的。後來中央辦公廳認為，這樣一來他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就成立了一個專門的機構，來處理各地給中央的報告，以及向中央提出他們的研究結果和建議方案。而各地給毛主席的信件和文件則仍由秘書室處理。由于這個機構設在中南海的后樓，所以就習慣地把它叫做“后樓研究室”。除此之外，它沒有其他正式的名稱。它也沒有設立主任，都是一個個獨立的組，例如綜合組、工業組、農業組、文教組、群眾組。總共有三、四十人，都是些級別很高的干部。各組的工作都是直接向楊尚昆或龔子榮（中辦副主任）匯報。

1963年我調到后樓研究室的時候，分配在綜合組。組長陳麒章，他原來是饒漱石的大秘書。1954年，饒漱石出事后，楊尚昆就讓陳麒章去查饒漱石的歷史問題。他去查了，然后就實事求是地匯報說，沒查出有什么問題。所以楊尚昆對他很信任。直到文革后，陳麒章還一直是在中央辦公廳做研究工作。

《情況反映》就是綜合組搞的，由陳麒章負責。我剛進去的時候就是協助他搞《情況反映》，一起工作的還有王青林和一個姓羅的記者。當時《情況反映》的主要工作是調查和向中央綜合匯報各地關於農村的情況，因為那時農村的工作是影響到全局的大事情。主席那時對農業是抓得很緊的，其他方面關於工業、文教的東西他不大看，關於農業的情況他是一定要看的。所以凡是下面報上來的關

于農村情況的，我們都要及時匯報上去。主席也都看了，在上面劃了一道一道的，具體的批示好像不多。

3、去唐山搞“四清”運動的試點

1963年的6月，中央辦公廳組成了農村調查工作組，去農村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稱為“四清”運動）的試點。我參加了去冀東唐山地區撫寧縣的工作組。王光美去的桃園大隊就在我去的那個地方附近。

在三年困難時期，社會上出現了各種混亂的現象，黨內的思想也比較混亂。當時我們從群眾來信所反映的情況中了解到，社會上各種奇奇怪怪的現象又死灰復燃了，一些在建國後被取締的封建迷信活動也表現得十分猖獗，有些地方甚至還出現了私娼。伴隨著封建迷信活動的是各種謠言都起來了，有的謠言甚至都傳到中南海里來了，說某年某月某日是什么什麼的末日啦，等等。

可也奇怪，到1962年底的八屆十中全會一開，毛主席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以後，那些東西馬上就全部躲藏起來了，像一下子全都消失了一樣。

我們下去的主要目的，是調查如何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經過一段時間的了解，發現當時農村存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干部的私分和私賣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還很普遍。生產小隊的小隊長和會計等幾個主要的干部，瞞著群眾私底下給自己多分些糧食，然后再把這些糧食悄悄地拿到“自由市場”上賣出去。當時國家規定的糧價才一角幾分，可拿到自由市場上去，那就是好幾倍的價格了。而且這種情況在小隊裏面還好點。因為那時莊稼收上來以後，都是放在谷場上一堆一堆地分好，然後由隊里的十幾戶人家自己去認領的。大家都看得見的。要私分掉很多比較困難。可到了生產大隊和公社以後，那里的干部要私分的話，就方便多了。可這些事情你別以為群眾都不知道，他們都是看在眼里記在心里的。所以

我們下去的時候，在隊里一發動，馬上就會有一批“勇敢分子”站出來，揭發干部存在的問題。

其實任何一次的群眾運動，首先站出來的一定是這些“勇敢分子”。這些人平時比較活躍，但他本人的表現不一定好，身上常有不少的缺點。比如偷雞摸狗，搞個“破鞋”的都有。運動一來，首先起來的往往就是這些人。後來毛主席也說過，這些人還是有用的，但不能依靠他們來掌握政權，把權力交給這些人往往是要出問題的。

而王光美她們在桃園大隊搞得就很神秘，工作組幾個月都不進村，而是秘密地搞什么“扎根串聯”，挨家挨戶地摸情況。當時我們聽到這種做法覺得很不以為然的，沒有這個必要嘛。你下去把群眾發動起來，情況不都清楚了么。所以我們沒有多加理會。後來劉少奇把它搞成了所謂的“桃園經驗”，要在全國推廣，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這時候我們才覺得這里面有問題的。

劉少奇這些人，雖然是極力否定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反對毛主席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但是在具體的做法上，尤其是針對群眾運動的時候，那他們搞起階級鬥爭來是絕不含糊的。這從 1957 年的反右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實行“資反路線”時的做法，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文革以後，鄧小平否定了毛主席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可到“六四”的時候竟然動用軍隊來鎮壓群眾運動。這種做法可以說是如出一轍的。

而毛主席非常重視階級鬥爭，但他始終認為，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時期，真正的危險主要是來自執政的共產黨的內部，尤其是來自黨內的高層。毛主席後來在文革的時候把劉少奇在“四清”中的做法稱之為“形左而實右”，道理就在這裡。簡單地說，毛主席主張的階級鬥爭，它的主要矛頭是對著上面的。而劉少奇他們的鬥爭矛頭則是主要地對準著下面的群眾的。

到了 1964 年，毛主席明確地提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受到了劉少奇他們的抵制和反對。這樣，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格局就此形成。

第十七章 《評李秀成自述》 發表的前前后后

1、我為什麼要寫《評李秀成自述》

1962年底，在我擔任《群眾反映》主編的時候，我從主席的閱讀書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國方面的書，于是我也把它找來讀了，其中有呂集義編寫的《李秀成自述》這本書。在呂集義的書里，他把李秀成在囚籠親筆寫下的自述的原件，用照相版放在書里面。“李秀成自述”的原件後來被曾國藩家里的人帶去了臺灣。這些照片是曾國藩的家人在逃去臺灣之前拍下來的。此外，我還找了一些相關的書籍來閱讀。在當時，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三個人可以說是研究李秀成的最權威的人物了。他們對《李秀成自述》寫了很多的考證和評述。其中以羅爾綱寫的《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影響最大。羅爾綱的書毛主席也看了，但他並沒有在上面寫下什么批示。

我看了羅爾綱的書之后心中頗不以為然。羅爾綱在書中是把李秀成當作農民起義的了不起的英雄來歌頌的，而把他向曾國藩寫的“自述”說成是曲線救“國”，說他是像三國時候姜維一樣的向敵人“偽降”。

可是我看了李秀成的自述以后，就斷定這個家伙是已經投降變節了的。你作為一支軍隊的統帥能假投降嗎？你這么做，那么多的部下不都是跟著你一起投降了嗎？那還有什麼真投降和假投降的呢。況且李秀成還在他的“自述”里面向曾國藩獻計，哀求他放他出去，去招降那些還在抵抗的作戰部隊。而且他所獻上的那些計策都是具有可操作性的。這明明是一個變節者的自白書，為什麼羅爾

綱他們要那麼曲加解說呢？

為了弄清李秀成到底是否假投降的問題，我又到北京圖書館去查閱了一些史料，更想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在1963年春節期間，我一個人整天呆在家里，集中精力寫成了《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先生商榷》一文，我主要的觀點，就是否認《李秀成自述》是一個農民革命英雄“堅定的革命立場”的表現，認為那是一個革命變節者的自白書。

文章寫出來了之後，我是打算向《歷史研究》雜志投稿的，因為這個雜志當時是史學界最具權威的刊物。在投稿前，我也想和秘書室的同事討論一下，卻找不到一個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於是，我把文章拿去給田家英看了，因為一方面他對歷史有興趣，同時他又是我的領導。田家英說，他也沒有時間仔細地看，就讓我把一些基本的觀點給他說了一下。田家英聽了之後沒有反對，說寫得挺好。後來有人說文章是田家英指導我寫的。其實不是，他當時並沒有給過我任何指導。後來我還聽說了，田家英私下里對《歷史研究》的人說，戚本禹這個人不怎麼樣，叫他們先不要發表。據說，黎澎當時對田家英說：像戚本禹這樣的文章，我們不發，別的地方也會發。我當時聽了還覺得挺納悶的，為什麼田家英要這樣的表裏不一呢。還有人說這篇文章是江青、毛主席授意讓我寫的，那更是無稽之談了。也有人把我的這篇文章，和後來文革運動中抓“叛徒集團”聯繫在一起。盡管從後來的客觀效果上講，是起到了這樣的作用的。但是就我當時所處地位來講，我是不可能有這樣的先見之明的。這完全是我自發寫的。要說我寫這篇文章的動因，我只是聯系到了當時正在進行的與蘇聯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的鬥爭。我認為赫魯曉夫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對列寧、斯大林開創的革命事業的背叛。而我對叛變革命的行為向來是深惡痛絕的。

文章寄出之後，我就隨中央辦公廳的農村調查工作組去冀東搞“社教”的試點工作了。我去的地方是一個偏僻鄉村，那裡連郵局都沒有，也看不到報紙。有一次我到唐山地委開會，看到《人民日報》登的新出版的《歷史研究》目錄，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經在八月

出版的《歷史研究》1963年第四期上發表了。但我一點也不知道北京已經連續開了好幾次會，在批判我的文章了。

2、圍繞《評李秀成自述》一文的風波

當年的9月底，我隨農村調查組回到了中央辦公廳。我一回來，秘書室的同事朱固、田崇淨、梁川，和中央辦公廳圖書館的小李就來看我，他們告訴我北京對我的文章反響很大，還告訴我中央宣傳部和近代史研究所已經分別召開了會議來批判我的文章。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後來我了解到，原來，我的文章在《歷史研究》發出來後馬上就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那一期的《歷史研究》印數不多，一出來之後就售空了。當時發行量很大的《北京晚報》在1963年8月2日刊登了關於這篇文章的報道和節選，現照錄如下：

【本報訊】最近出版的《歷史研究》第四期，發表了戚本禹寫的《評李秀成自述》一文，在這篇文章里，作者對李秀成後期的思想行為提出了一些和大多數歷史學家不同的看法。

《李秀成自述》是李秀成在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被曾國藩的部隊所俘虜，在囚籠里寫的。在自述里，他竭力表明自己參加革命不是由於明確的革命意識，而是“迷迷茫茫”，順勢干去，猶如“騎上虎背，不得不由”。他說，這場革命是一番“大劫”，他很不幸被鄭入了這“劫亂”。他還用很多篇幅去阿諛稱頌清期皇帝和曾國藩，甚至表示自己願效忠於這些反動統治者，如果他們肯收留他，他願意為他們收服當時還在英勇鬥爭的太平天國軍隊。

以前許多研究太平天國歷史的專家（如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等）認為李秀成自始至終對革命都是忠心耿耿的，他寫這個自述，貴在是別有苦心，他想借此騙得敵人的信任，以便利用機會保有革命實力，並且還要利用曾國藩等漢族地主同滿族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利用曾國藩去反對外國侵略者。

戚本禹在他的文章里認為，判斷一個人的動機應以他的社會實踐為標準，李秀成在自述里提出了一套“招降”太平天國軍隊的毒辣計劃，這套計劃如果實行起來，每一條都會奏效，可以極大地幫助曾國藩摧殘和瓦解革命實力。李秀成在自述里把清朝皇帝和曾國藩看成一體，同樣加以吹捧，根本沒有什麼“利用滿漢矛盾”的痕跡。李秀成表示要嚴防“洋鬼”這固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背叛了堅決反抗侵略者的革命群眾，竟想依賴投靠外國資本主義的封建反動派去反鬼，這是一種倒退，完全不應該“表彰”。總之李秀成的投降變節是確鑿事實，他的自述是叛徒的“自白書”。

由此戚本禹認為，不應該把李秀成作為革命英雄向廣大群眾進行宣傳教育。李秀成雖然在太平天國歷史上起了一定作用，但最後卻喪失革命氣節，背叛了革命事業。這樣一個變節的“自白書”，彪炳于革命史冊是沒有道理的。

可以預計，對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評價問題，將會引起學術界熱烈討論。

很多讀者都是從《北京晚報》的報道中知道這篇文章的。但是，一般讀者都不知道我這個作者是誰。在爭論中，贊成的人和反對的人都是一大批，包括我所往的中央辦公廳也是這樣。很多有身份、有地位的學者對我的觀點很反感。據說羅爾綱看了我的文章之後氣得跳腳，說我毀了他一生的研究。而當時中宣部的大人物是贊成羅爾綱等人的觀點的，在他們看來羅爾綱等人的觀點是不容討論的。而我所提出的反對的觀點是大逆不道的。所以，中宣部要干預爭論了。

9月，周揚在中宣部召集很多學術界的大人物開會，遠親自主持會議，對我的文章進行指責和批判。參加會議的有劉導生、張友漁、侯外廬、尹達、劉大年、黎澍、丁守和、關鋒、林聿時、吳傳啟、翦伯贊、吳晗、秦柳方、沙英、吉偉青、林潤青、于光遠等。由於周揚已經明確發話，會議基本是一邊倒的，關鋒等少數幾個人沉默不語。周揚對文章的批判最為嚴厲，他說：“李秀成和曹操不同，這個不全是學術問題，而是帶有政治性的問題，應當提交中央宣傳部

討論，開部務會議，還應當請中央考慮。這關係對太平天國、對革命先烈估價問題，李秀成是無產階級革命以前的革命領袖，我們是從他們那里來的……要改變對他的評價，是帶政治性的問題。”周揚還批判我的文章是“攻其一點不計其余”，是典型的修正主義手法。

我的文章是《歷史研究》的編輯丁守和與執行主編黎澍同意發表的，所以在會上就有人資責、埋怨《歷史研究》不該發表這篇文章。黎澍辯解說，戚本禹是在中央辦公廳工作的，他的文章也經過田家英看過的。周揚說，田家英不管這方面的工作。

為了消除我的文章的影響，周揚在會上提出幾個辦法，一是中宣部先發一個通知，讓各地不要再轉載戚本禹的文章了；二是由劉大年寫一篇文章批判戚本禹、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仍出《歷史研究》發表，以作為史學界的基本態度；三是在劉大年文章寫好後，史學界開一個討論會，會後要公開發布消息，表示史學界在批判戚本禹的觀點，以正視聽。

果然，在中宣部開會之後，中央報紙和各省市地方報紙都不許轉載我的文章了。中國近代史研究所還專門召開討論會，討論對李秀成的評價問題。會議由所長劉大年主持，參加會議的有范文潤、牟安世、侯外廬、王戎笙、翦伯贊、張寄謙、李文海、袁定中、李侃、鄧拓、林潤青等約一百人。會上是一邊倒的，都是肯定李秀成，批判戚本禹。而且批判戚本禹的調子還很高，說戚本禹的文章“歪曲顛倒歷史客觀事實”，否定了英雄的“光輝形象”。會後他們寫了篇報道送中宣部審定。

對我的文章的批判聲勢浩大地展開了，而我這個文章的作者卻一無所知。這也難怪，我自參加工作後，只寫過一點在內部刊物上發表的小文章，沒有正式參加過什麼學術討論。所以在學術界是毫無聲譽，默默無聞的。中宣部和學術界的那些大人物，我是一個也不認識。就連同意發表我的文章的丁守和、黎澍，我當時也不認識(關鋒也是後來才認識的)。我既不是領導干部，也不是學者，更不是教授。所以中宣部組織批判我的文章，進而動員史學界的名家對我搞大規模的圍攻，當然就不必通知我這個文章的作者了。周揚這些人

在文革后宣傳人權和人道主義很積極，可他們當年卻好像並不尊重一個被他們批判的無名小輩的人權，也不講什么人道主義。

然而我在中央辦公廳的領導、同事和朋友都很關心我，把他們所知道的有關批判我的情況都告訴了我。對整個情況最了解的是中央辦公廳管文化學術的研究員兼組長李波人，還有我的領導經濟學家何均、陳麒章等人。他們都來安慰我，叫我對中央宣傳部周揚開的會不要太在意，說“主席還沒有說話哩”。田家英對周揚他們在批判我之前，沒有給他打個招呼也不滿意，他氣憤地說，他（周揚）也太霸道了。

我是文章的作者，是周揚他們批判的對象，我當然希望能更多了解會議對我批判的具體情況。過了國慶節，我即打電話找負責發表我文章的丁守和，可打了幾次都沒有找到他，我就給他寫了封信。原信如下：

守和同志（請轉告劉桂五同志）：

幾次打電話沒有找到您。我前一段時間在鄉下做調查，前天始返京。歷史研究所討論李秀成的會，沒有參加上，不知會上都有些什麼意見，如果有時間，您是否可以大概地同我講講。我已經聽說了一些意見（人大、師大的）。還想多聽一些意見。

我的電話是：6725（不是6554）

如果來信寄中辦就可以了。

盼復，

握手。

本禹

10月2日

丁守和收到我的信之後，就約我到近代史研究所會客室見面。我如約而去，他告訴我，周揚和劉大年召開的那兩個批判會的一些情況。還悄悄跟我說，這次批判會的來頭很大，不僅周揚在管，而且周總理也過問了。周揚的講話和部署是報告總理批准的。

丁守和講這些話的時候有些緊張，其言訥訥，欲說又止。這我理解，畢竟近代史研究所和《歷史研究》都歸中宣部管，我的文章

惹了這麼大的禍，他作為文章的發稿人和《歷史研究》的負責人之一，可能面臨撤職甚至下放勞動的處理。可我自己當時的心理狀態和丁守和不一樣，一是我經歷過 1958 年的“八司馬事件”，有點鬥爭的經驗了。1958 年到 1963 年已經 5 年了，這五年里我又成長了許多。二是我已經從辦公廳同志那里知道了毛主席正在關心這件事。他們告訴我，一組（負責毛主席工作、生活和警衛的工作組）派人到國書館找有關太平天國和李秀成的書籍，說是主席和江青要的。所以當時我心里很坦然。我向他表示了對自己文章的態度：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劉大年他們把會議的報道文稿送到中宣部，中宣部立即組織人馬字斟句酌、反復推敲、定稿完畢，準備發表。可就在這個時候，毛主席正在研究我的文章的消息也傳到了中宣部。于是，中宣部就把報道壓下來了，不久又打電話通知各地，說今后凡是歌頌和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不要再發表了，戲劇不要再演出了，批判戚本禹的文章也不要發表了。短短幾天的時間，中宣部一前一後、出爾反爾、互相矛盾的兩個通知，讓下邊不知道怎麼辦，也不知道上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與這種情形相似的，黎澍在文革後把我罵得一錢不值，可當年他卻曾親口對我說過：你能成為新中國的梁啟超，你筆端有感情。

還有一個總是喜歡造謠生事，又從不負責任的前《光明日報》負責人穆欣，在文革後說我聽說中宣部在批判我之後，嚇得“惶惶不安”，趕緊檢討。可在當年他卻正是把我捧上了天的人。

倒是當時擔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的劉大年，他奉周揚之命寫的《李秀成評價問題》在 11 月下旬出了初稿，他大概是通過黎澍從田家英那里知道了毛主席在找太平天國書籍，在研究李秀成評價問題，感到對於如何評價李秀成問題把握還不大，就在把文章送給周揚審閱的同時，也把文章送請田家英審閱。劉大年這樣做是需要勇氣的，因為他已經從會議上周揚的發言中，聽出周揚對田家英的反感。田家英看了劉大年的文章，說他寫得很虛偽，觀點上前后矛盾。這也不全怪劉大年，李秀成的自白書，對曾國藩“老人”餉媚之詞寫

得太過分了，劉大年也沒有辦法給李秀成做辯護。田家英叫我把劉大年的文章拿回去看看。其實，我在這之前已經從近代史研究所黨委領導人劉桂五那里，得到了劉大年以《歷史研究》來稿的名義（未署名）的文章初稿。我想，劉桂五這樣做大概也是劉大年自己的意思，目的是聽聽對立面的意見。劉桂五這個人平和樸素，沒有架子，我也不好為難他，就在文章送來兩周后，給了他一個答復：“我懷著很大興趣讀完了無名氏同志的大作‘李秀成評價問題’。我同意文章對李秀成被俘以前的功績的評價，也注意到了他不采羅氏偽降說，但是我還不能同意他對李秀成自述的評價。”我最後寫道：“李秀成自述問題是否可以展開進一步討論？與此文意見不同的文章能否再發表，希望給我一個復示。”後來他們也沒有給我什麼復示。

3、江青向我傳達毛主席的批示

1964年春天，江青三次派人來找我，前兩次因我去了外地，第三次江青的秘書沈同打電話找到了我。他讓我在我當時辦公的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隨後他就帶我去了江青家里。見面之後，江青對我說，她從《歷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覺得好，就把文章連同《北京晚報》的報道，和《光明日報》的內部動態一起送給了主席。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書找資料，主席看了很多有關太平天國的書呢。江青拿出一本藍色封皮的線裝書對我說：最重要的是這本。這是臺灣新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狀》，白紙黑字呀。這是上海市委宣傳部張春橋他們從香港進口的，毛主席仔細看了，還在書中夾了條子。毛主席說你弄不到這本書，叫我把這本書送給你，叫你繼續研究，繼續寫文章。她還告訴我，主席說了，別企望用一篇文章改變人家研究了一輩子的觀點。接著江青說：主席終於對李秀成問題表態了，他批了十六個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接著她說：這可不是個簡單的表態呀，這是大是大非呀，是一場牽涉面很大的原則鬥爭啊！國內外的修正主義者，都是反馬克思

主義的革命叛徒呀！江青還告訴我，主席的批示是寫在一份報道學術動態的材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給了中央有關領導傳閱；在批示的最後，主席還寫著“退江青”的字樣。她說，批件正在傳閱中，等退回來後就給我看。江青最後對我說：你做了件好事，給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驕傲，還要再看材料，繼續寫文章。你別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麼。

可是不知為什麼，可能因為忙，主席的批示江青後來沒有拿給我看。所以我開始還以為主席批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後來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這句話。後來鄧力群告訴我，主席寫的是“忠王不終”，是晚節不保的意思。鄧力群從康生那里看到主席的批件了。

1966年5月我因主席召見去了上海，住在錦江飯店，正好那天總理也到了上海，也住在錦江飯店。晚上曹荻秋、魏文伯宴請總理，也請我出席作陪，在宴會上總理與我說了不少話，還約我第二天早晨到飯店的頂層呼吸新鮮空氣。第二天早8點不到，我就去了。總理先問我的經歷，我告訴他年輕時在上海參加地下黨、搞學生運動。總理說他30年代也在上海搞過地下工作，對上海很熟。在談話之中，總理忽然很誠懇地說：我對不起你，周揚批你是我批準的。其實我也覺得你的文章寫得好，有氣勢。可他們都要批，講了好多理由。我也沒有好好研究就批準了。幸虧主席及時發現了，不然可要犯大錯誤。

總理曾在文革時的一次群眾大會上，喊出了“向青年歷史學家戚本禹同志學習”的口號。可是，在我1968年被捕後，總理卻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說，戚本禹的文章也是讓別人幫他寫的。我是一直都很敬重總理的，到現在還是這樣。可對總理的這個講話，我也一直是有意見的。當然，在當時總理也只是出于政治鬥爭的需要。

4、後續的事情

我寫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這下可出了名了。胡喬木，田家英

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寫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對我說，你找他們干什么，她讓去找康生。田家英，胡喬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這兩個人不可靠。後來的歷史也證明，江青是對的。

按照江青傳達的毛主席的指示，1964年夏天，我寫了關於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問題？》。

文章初稿寫好後，我就去找康生領導的反修寫作班子幫助修改。在釣魚臺，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體成員的熱烈歡迎。記得王力當時還對我說，你的文章對我們寫反修文章都很有啟發，最近廣播的一篇反修文章中的一句“你們傾伏爾加河之水，也難以洗刷背叛革命之恥辱”，就是從我文章中的“化長江的波濤，也洗不淨李秀成背叛革命之恥辱”移植而來的。在討論修改我的文章時，吳冷西、姚溱講的意見最多，他們認為我這第二篇文章氣勢不足，不是高屋建瓴，是跟著對手的調子來申辯自己，好像理虧似的，要知道不是我們理虧，是他們理虧。康生提出連帶汪精衛都要好好地批。他說，汪精衛曾是辛亥革命的英雄，後來當了漢奸。聯上汪精衛，人們對李秀成的英雄情結就化解了。我虛心聽取了他們的意見，根據他們的意見修改出來的文章果然氣勢大增，江青看了也說好，還說：我叫你去找康老沒有錯吧。姜還是老的辣，他可是一顆老姜。

這篇文章的最後修改稿在發表前，又送總理、康生、江青、陸定一、周揚、陳伯達、田家英、吳冷西、范若愚、許立群、關鋒、黎澍、鄧力群等審閱。他們或電話或書面給了我回話，周揚也在電話里表示支持。關鋒等人對文章又作了最後的修改。

在這之前，李秀成問題的論戰是按照《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陳俊生擬定的計劃進行的：重發我在《歷史研究》發表的批判文章，陸續在報刊上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文章，以便展開討論。這期間在中央召開的一次文藝口的會議上，周總理和康生分別在講話中談到李秀成問題。我根據當時的記錄稿整理他們的發言要點如下：

周總理說：太平天國李秀成的問題可以討論。忠王李秀成，是近代史上的突出人物，但後來寫了個自述，向曾國藩投降，并表示願意為曾國藩收編太平天國的隊伍。有人認為李秀成這樣做是出于

策略。但無論如何，投降是錯誤的，面對忠王這個“忠”字，那是有愧的。曾國藩是殺害革命人民的劊子手，怎么能向他投降呢？這樣的人能稱為忠嗎？這個問題可以討論，但他的自述白紙黑字，是沒法改變的……太平天國的英雄還是應該寫，陳玉成就是一個。

康生說：現在報紙上大登評論李秀成的文章。李秀成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現在羅爾綱和戚本禹有兩種意見，一個說他是英雄，一個說他是叛徒。戲劇界也上演了《李秀成之死》。辛亥革命前，汪精衛辦《明報》好不好？好！刺殺攝政王好不好？好！大革命時在廣東干革命好不好？好！到武漢當左派好不好？好！但後來寧漢合流，他投靠了蔣介石，反共啦！後來又投靠日本人，當漢奸！老百姓誰不罵他！對原來的革命者，後來投降叛變應該怎么看？希望你們認真想一想。李秀成究竟好不好，你們心中應該有個數。

1964年8月23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同時發表了我評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歷史研究》也在1964年第四期發表了這篇文章。本來是決定先由《人民日報》和《歷史研究》發表，然後各地報刊轉載的，可是時任《光明日報》領導的穆欣卻找我要清樣，他堅持要和《人民日報》同時發表。我請示康生，康生和他關係很好，所以同意文章在這兩張報紙同時見報。

這篇經過釣魚臺反修班子修改的氣勢恢宏的文章，見報後在各地迅速被轉載，很快就在全國意識形態領域形成一場大討論。本來在我第二篇文章沒有發表時，支持和反對我觀點的文章都有，折中于兩者之間的也有，現在大家聽到了周總理和康生的講話，又看到中央報刊的表態了，於是支持我觀點的文章大增，反對我觀點的文章大減，慢慢的就不大見了。這又是我始料未及的，也不是我願意看到的，更不是我造成的。我始終是希望它是一場學術爭論，但是持反對意見的人不寫文章了，所以本來我起草了第三篇文章，并以《紅旗》未定稿印了幾份，以征詢意見的，這時也沒有發表的必要了。

導致一場學術討論發生變質的其實正是周揚這些人。我後來才知道，毛主席當年對周揚他們用政治手段干預學術討論是很惱火的。

直到 1966 年 3 月 30 號，主席在上海同康生、陳伯達以及一批學術專家等人談話的時候，還提到這件事，說：什么叫學閥？學閥就是那些有閥無學，自己不讀書，不看報，不學習，包庇叛徒李秀成，到處發通知，不準登戚本禹文章的人。

對於與我持不同學術觀點的羅爾綱，後來在文革時候，我負責歷史所的運動時，我不準歷史所的造反派整羅爾綱，我說那是學術爭論，而且羅爾綱在解放前是積極支持民主運動的。所以，羅爾綱在文革期間沒有受到什么沖擊。

5、伏契克的呼喊：警惕呀，人們！

以上就是《評李秀成自述》引發的學術和政治風云的大致過程。我的文章不是一些人自以為是的“遵命文學”，也不是其他什么人叫我寫的，那是我體會毛主席的歷史觀之后純粹的個人自覺行為。讓我始料未及的是，這篇文章就像一塊巨石從高高的山崖掉進了山下平靜的大湖，在史學界掀起那場大波浪，還引發了文學界、戲劇界、機關、學校的大爭論，甚至有很多工廠也卷進了爭論。還有傳聞說作者是山東大學歷史系畢業生，《評李秀成自述》是作者的處女作。

該文發表三年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運動中對叛徒集團的批判和我個人的浮沉，使該文又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文革中也有人問我：“你寫《評李秀成自述》，是不是知道主席要解決叛徒問題呢？”這個問話中的“叛徒問題”不是李秀成的背叛問題，而是指抗日戰爭初期“六十人自首叛黨”案。我寫《評李秀成自述》的時候，根本就還不知道有“六十人自首叛黨”的問題，因此不可能有這種聯系。而且我認為毛主席那時也沒有想到要解決什么“六十人自首叛黨”問題，他的著眼點就是江青說的是國際、國內的修正主義的問題。

導致一場健康的學術討論發生變質的是周揚一伙人。周揚他們的政治干預，讓毛主席警惕起來，最后有了毛主席關於李秀成的十

六個字的批示。我有時甚至想，要沒有周揚干預這場學術討論，就沒有毛主席對周揚干預的惱怒和關於李秀成的擲地有聲的十六個字的批示，那我戚本禹後來的命運會是什么？

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半遵命的”的——實際是我和反修班子合作的結果，但也不是針對什么“六十一人自首叛黨”之類的問題，而是為了把學術討論引向深入。由於這第二篇文章發表之前就有康生、周恩來的對於李秀成問題的事先表態，一場轟轟烈烈的學術大討論很快就無聲無息了，這同樣留給後人很多的思考。大討論結束後，我很快就和關鋒、鄧力群、陳茂儀、陶文鷗、王夢奎、鄧紹英、滕文生、王銳生等十幾個文化戰士，一起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農村去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了。

文革中我的幾篇影響很大的文章，有《評李秀成自述》、《為革命而研究歷史》、《評〈前線〉和〈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和《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等。我比較滿意的是最後這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的指導寫的，而且毛主席改過的，後來又經過中央文革小組幾次討論修改方才定稿。毛主席是無產階級的大權威，他也是滿意的。《評李秀成自述》這篇文章，實際上就等於把某些關於叛徒的觀念改變了，而且引起了爭論。而《為革命而研究歷史》重申了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思想，更是在整個史學界引起震動。這三篇文章都是毛主席點過名的，本身也都有豐富的學術內涵。《評〈前線〉和〈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這篇文章基本上是一個政治評論，主要是指出，彭真他們說“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本身沒有錯，但他們自己就沒有貫徹，卻是他們自己所說的“以勢壓人”。就說這個對我的《評李秀成自述》的批判，關起門來批判我，完了還要開大會，組織學術界權威圍攻我，都不讓我參加會，出了文件也不讓我看。這平等嗎？主席批評彭真他們的話比我要厲害得多：說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你們從來就沒有平等過。

我曾經是那麼幼稚，以為幾篇文章就可以讓革命勢力戰勝背叛

革命的勢力。那是多么不切實際的幻想。一滴水可以照見太陽，我還清楚記得，我的評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發表後，我耳邊響起了各種衷心贊揚和意圖捧殺的聲音，上面提到的那位《光明日報》的領導人，當時對我好話說盡，還繪聲繪色，還引用毛主席的詩詞說我的文章“橫掃千軍如卷席”（我不敢當，當然否定，他卻還是笑瞇瞇的）。他在文革中落難，我念及舊情，請示江青、康生、陳伯達，又拉上關鋒一起到報社去保他，想不到如今罵我最兇、不惜造謠誹謗我的又是這位老兄。就是他說我盜竊魯迅手稿、向江青告密等等無稽之談的始作俑者。這位老兄對於一個友人都是如此反復，那麼他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會持之以恒嗎？他身上有無李秀成的影子？進而我想，李秀成“忠王不忠”，又“忠王不終”。如果把當初跟著毛主席革命的人，都放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中來看，那麼就會看到多少“忠王”不忠，多少“忠王”不終，多少“忠王”不忠當然也就談不上不終啊！一些人在毛主席奄奄一息的時候，就企圖向他的家人和他的事業開刀；一些人在毛主席尸骨未寒的時候，就真的向他的家人和事業同時開斬；一些人說了“永不翻案”，卻一朝權力到手，就什麼案都要翻。中南海的“八司馬事件”案不是翻了嗎？李秀成批判案不是也翻了嗎？就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案不是也翻了嗎？歷史已經證明：不僅在幾千年來缺乏科學理論指導和社會新生力量支持的農民革命之中，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復鬥爭，就是在有科學理論指導和先進階級力量支持的無產階級革命之中，同樣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復鬥爭。

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伏契克（1903-1943）在法西斯監獄中，寫下過永垂不朽的《絞刑架下的報告》，他以自己的生命向我們大聲呼喊：

警惕呀，人們！

我願伏契克的呼喊，永遠回蕩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天空。

附錄：

評李秀成自述

——并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

太平天國後期的重要將領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同治三年）7月22日被曾國藩的軍隊俘虜了。他在敵人的囚籠里寫了一個自述。這個自述，從它的史料價值來看，無疑是極其珍貴的；但是，從它的根本立場來看，卻是一個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自白書”。

矛盾的歷史現象

歷史的現象是多么矛盾。驍勇善戰、叱咤風雲的農民革命將領卻寫了一個阿諛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書”。偉大和渺小，光榮和恥辱混合在一起了，多么不調和，多么不一致！怎樣對待這件事，怎樣理解這件事？幾十年來，歷史學家曾經給我們提供了多種不同的解釋。

“這是根本沒有的事，英勇的忠王怎麼會寫出喪失革命氣節的自述！？一定是曾國藩的偽造。”有人曾經簡單地否定自述的真實性，來為李秀成辯護。但是，經過歷史學界一番爭鳴之後，這種說法現在已經站不住腳了。

又有人說：忠王在自述里確實寫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敵人的话，甚至表示要向敵人投降，雖然這些話對李秀成的英雄事蹟來說是個污點，但是那都是假的。忠王的目的在於利用“偽降”來爭取敵人的寬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時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分化滿漢統治者，並且爭取曾國藩調轉槍口去對付外國侵略者。主張這種說法最力的是羅爾綱先生。

羅爾綱先生在《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1951—1957年開明書店、中華書局版，以下簡稱《箋證》）“三版自序”里說：“必須先對忠王的委曲的隱秘的心事有所了解，然後才不致入了那些誣罔先烈的皮毛之見。”（羅爾綱：《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1951—1957年開明書店，中華書局版，三版，第6頁。）他在該書三版的考證里指出：“在忠王自己打算，如果經過偽降，得到釋放，借招降為名，先保存革命的實力，然後等待曾國藩與滿清皇朝之間的矛盾的爆發，或滿清皇朝、漢族官僚地主與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之間的矛盾的爆發，他就企圖利用這一情勢的發展，來保存自己的實力，發展自己的實力，從而推翻反動統治，以達到恢復太平天國的目的。在當時

的客觀情況看來是很有可能的，這也就說明使忠王採取這種企圖是有他的條件的。”（同上，第34頁。）

在《箋燈》四版的考證和說明里，羅爾綱先生進一步論證了上述觀點。他分析李秀成寫自述的動機，除了“總結太平天國革命的經驗教訓”以外，主要有兩項：“第一，保民為樂……就是要求曾國藩放下屠刀，保存革命群眾的力量。第二，防鬼反為先（防備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要求曾國藩把對內的矛頭轉而與人民一道共同對付外國侵略者。”（羅爾綱：《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四版，第36—37頁。）忠王之所以用“極委婉曲折的敘述，甘言蜜語的詞句，甚至不辭窮恥極辱用了‘投降’兩字”，乃是為了實現這樣深遠的政治意圖，以免“刺激敵人，招致敵人疑忌”。（同上，第36—62頁。）這種“苦心”，“真是千秋還可以共見。”（同上，第65頁。）

為《箋燈》作序的周邅先生也支持羅爾綱先生的意見。他說：“從現在殘存的文獻來看他（李秀成）當時的態度，是利用封建統治者內部的矛盾，保存革命力量，把鬥爭的矛頭轉向更大的國外侵略者，這三者是不可分的整個復雜思想的體現。……這是革命實踐的要求，這不僅不是一個幻想，更不能作為怕死，妥協投降看待。……李秀成作為一個農民革命領導人，英雄人物，是沒有什麼減色可說的。”（同上，第8頁。）

整理出版了自述部分真跡梁岵廬先生也說李秀成是“偽降”。廣西僮族自治區通志館在《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補本》出版前言里說：李秀成“忠貞堅定的態度，使人有理由深信他之所以在自述中帶些頌諛敵人、污損自己的話，是有其苦衷和政治目的的，決不能聽信曾國藩所污蔑的‘宛轉求生、乞貸一命，的鬼話’”。（《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補本，前言》以下簡稱《校補本》，廣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0頁。）校補自述刻本的呂集義先生也說：“在全部自述中，盡管忠王為了幻想實現他的某種政治意圖，不得不說了一些污損自己的話，但在字里行間仍然到處表現出他的堅定的革命立場”。（《校補本》，第18頁。）

相當一些人同意了上述的意見。有些中國近代史的作者，在自

己的著作里，也以上述的觀點解釋了這一頁歷史。

忠王不忠，歷史的事實掩蓋不住

問題真的解決了嗎？沒有。

歷史不是可以隨意雕琢的大理石。歷史是客觀的存在。客觀的歷史真像是不能更改的。

李秀成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有才干的農民革命軍將領。他在太平天國後期的革命鬥爭中起過很大的作用。在太平天國領導集團內訌以後，革命隊伍內部陷于混亂，清軍乘勢進逼，革命事業一時遭到了嚴重的危險。為了挽救局勢，李秀成曾經和陳玉成等人一起，英勇機智地率領太平軍大敗湘軍和江南大營、江北大營，解除了南京的包圍。以後，又乘勝東進，解放了蘇杭地區，使革命顯出重新振作的趨勢。他還曾經指揮農民革命軍多次地打垮過外國資本主義的反革命聯軍，表現了中國人民堅決反抗侵略者的無畏精神。他在蘇杭地區為人民做了許多好事，使這個地區一度成為太平天國的重要根據地。李秀成太平天國革命史上的這些功績是應該予以充分估價的，是不能抹殺的。但是，他在被敵人俘虜以後喪失了革命氣節、背叛革命事業的事實，也是否定不了的。在他的自述里，頌揚敵人、譴毀革命事業的話是那樣的清楚，那樣的明白，以致任何辯解在這種冷酷的事實面前都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李秀成在自述里美化了敵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最美麗的字眼稱頌太平天國的死敵⁷曾國藩、曾國荃兄弟。他贊美曾國荃“有德之人，深可服佩”、“智才愛眾”“惜士恩良”；贊美曾國藩“恩深量廣，切救世人之心”，“仁愛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恭維他們“恩德巍峨”“運算良才”、“明才足過”“蓋世無雙”、“謀才福擇（澤），無此（所）不能”。

他贊美臭名昭著、軍紀敗壞的湘軍“將相勤勞”、“兵壯”“力足”“營規分明”、“能受苦堅”、“此軍常勝，未見敗過”。（同上，第31、32、44、52、60、84、107頁，按照本文引用李秀成自述原文，均已按自述原稿影印本校改過。）

當李秀成寫這些話的時候，被他稱為“恩深兼有德”、“仁愛惠

四方”的那支“救世人”軍隊，正在南京城里大顯身手：“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遭殺死。……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截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余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于四遠，其亂如此，可為發指。”（《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三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76頁。）

在自己的兄弟姐妹、父老妻兒被敵人這樣屠殺的時候，一個革命將領，卻昧著良心去稱頌那些最反動的殺人劊子手，難道這還能夠可恥嗎！？

美化敵人，必然要丑化自己。李秀成也不例外。在自述里，太平天國偉大的革命鬥爭竟然被說成是“忽（屈）悞英雄”、“快死世民”，“違犯天命”、“害民害眾”，“先機之定數”、“世人之劫數”。在自述將近完畢之際，他懊喪地嘆道：“何生天王而亂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各見《校補本》，第29、51、52、122頁。）

李秀成在自述里對天王洪秀全的責備特別苛刻。他批評天王“不問賢良”、“不問國事”，“不修得（德）政”，“不以軍民為念”，責備他“用人不專，信人之不實，讒佞張揚，明賢偃避，豪杰不登”。（同上，第28、43、51、108頁。）但是，在這方面他所舉出的具體事實，則有不少是不真實的。例如：他說天王對他不信任，把他母親、妻子扣在南京作“押當”。這不是事實。他說，南京被圍，城內無糧，他向天王“求放窮人之生命”，“主不從依”，“不得已強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婦，準出城外逃生。”（同上，第102頁。）這也與事實不符。在南京城破的前一年，天王為了解救危局，曾經封他為真忠軍師，托以全國軍政最高權力，但是他在自述里對這件事只字不提，反而說，天王如何如何排擠他，甚至說，“我在京並未任合城之事”。（同上，第94頁。）這些問題，羅爾綱先生在《箋證》里都指出過。應該說，洪秀全不是沒有錯誤的，同時也不能要求李秀成正確地評判洪秀全的功過；但是，無論如何他不應該不顧事實，用一些歪曲了或者夸大的罪名在革命領袖的臉上抹黑。

他這樣指責天王，夸大他跟天王之間的矛盾，實際上包含著在

敵人面前表白自己的意圖。他把自己的革命歷史描繪成這樣：他一開始就是受“惑教”而參加革命的，“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總怕蛇虎傷人。”（同上，第6頁）“我自小為民不知，勇敢而來”，一路“迷迷而來”，“蒙蒙而隨”，“造成今日患害”，“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為也”。（同上，第19、29、51頁。）他把自己在太平天國後期率領革命群眾取得的巨大勝利說成是：“初任重事，又不周詳，糊糊塗塗而作，此時國未當絕，亂作而成，亂行不斜，故而保至今也。”（同上，第33頁。）他說，他之所以仍舊呆在革命隊伍里，不過是“奇（騎）上虎輩（背），不得不由。”“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違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作不良（不）義不孝？何人而肯輩（背）井離宗，離親別友，去戚離鄉？”“我不故（過）在秦為秦，為（在）楚為楚”。（同上，第29、47頁。）除了強調自己沒有革命意識以外，還表示他早因為自己“本是忠直賢良，（不）幸未逢明主”，而有動搖之意了。只可惜清軍“凡拿是廣西之人斬而不救”，不然，太平軍“解散久矣”。“因我粵人，無門他入，”所以才堅持革命至今。如果這次“曾中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清（請）聖上，肯救此粵之人，甚為美甚”。（同上，第19、44、93頁。）

李秀成在自述里，不僅絕不隱瞞他思想的動搖，而且也不掩飾他一度有過的投降活動。

南京保衛戰最危急的時刻，李秀成的一個妻舅宋永祺出城同曾國荃營下的一個師爺拉上了關係，商談了投降的事。大概這個人不善于做叛賣勾當，以致來往十幾天，還沒有得到實情。宋永祺嗜酒，醉后失言，把李秀成同他談的一些機密語，向一個想投敵叛變的松王陳德風講了，陳德風得了風聲就寫信來問。恰巧這天李秀成正在府中召開糧務會議，陳德風的信為補王莫仕葵順手打開了，大家看了信就質問李秀成，隨后又把宋永祺押了起來，準備正法。這樣一來，事情弄大了，鬧得“合城驚亂”。“朝臣”們也都不同情李秀成。後來虧得李秀成用銀子疏通了莫仕葵，才把事情平息下去。李秀成在自述里說：“自此之后，四時有人防備，恐我有變心。”（同上，第

106 頁。

不但如此，他還反復強調自己過去已經做了許多有利于清軍的事情，來向敵人表“功”。

表“功”的表現之一，是一再地說自己過去如何禮待獲自“大清皇上”的俘虜。

第一件事是打下揚州，“揚州知府被拿，當而禮敬，將其全家一一尋齊，當即訊問該知府願降與不降？肯降即可，不肯從，皆由自愿也。該（知府）不從，……后將該知府送由仙女廟而去，發盤川銀三百五十兩而行。”（這段話，《校補本》滿鈔。）

第二件事是打下蘇州，俘虜了“清朝文武候補大員無數，滿將多員，俱未傷害，各欲回家，無盤川者，我給其資，派舟送往。（《校補本》，第 56 頁。）

第三件事是打下瑞州，俘虜了清將李錫揚，“見是勇將有名之人，心內痛惜英雄，故未殺害”，後來勸降不成，“仍言（然）禮待，并未鎖押，悉聽其由”，過了幾天，“發盤川銀六十余兩，其不受而去江西”。（同上，第 64 頁）

第四件事是打下杭州，“當即傳令諸軍”，對“被獲滿洲兵將”“不準殺害，私殺害培（賠）命”，不願投降者，“給費”“準其回國”。“在省候補、候任清官無數，業亦給費其回”。被獲人員的高級官吏林福祥、米興朝等，“我亦不殺，禮而待之，又未鎖押，落在書房，與我文官閑及（敘）。”“林、米二人欲去”，“即備舟只一條，由杭州到上海，各給銀三百兩”，不僅對俘虜優客禮待，就是對清朝陣亡的將軍、都統，也派人到處“尋其尸首，用棺木埋之”。那個“甚得軍民之心”的巡撫王有齡，城破自殺，尸首是李秀成單騎到后花園親自尋見的。找到尸首后，李秀成用“大清”的“衣帽朝服”把他入殮，後來又“點足五百人”、“給舟十五條”、“費銀三千兩，”把他的棺木護送回鄉。寫到這里，李秀成發表他的感想說，“各扶其主，各有一忠”，“惜看英才義士”，“死不與其為仇”。（同上，第 69—72 頁。）

李秀成為什么這樣優容禮待那些被俘人員，又為什麼這樣隆重保護那些堅決反革命分子的尸首呢？有人認為這主要是為了以優待

俘虜的政策去爭取敵人。就算是這樣吧，那末，在李秀成自己變成了敵人俘虜的時候，還講這些，卻又是為什麼呢？這時已經沒有敵人可爭取了，講這些話恐怕還是為了讓敵人“爭取”自己吧。李秀成自己說：“非我參是好言，光我之薄面，皇天明照，不敢隱瞞。”（同上，第 56 頁。）不是表“功”是什么！（據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記載，李秀成在一次談話中曾經向他說：“至于用兵所到，則未當縱殺，破杭州得林福祥、米興朝皆禮之，官眷陷城者，給票護之境上，君獨無所聞乎？”也是一種表“功”的口氣。見《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三冊，第 374 頁。）

表“功”表現之二，是一再地說自己過去如何寬恕投靠“大清皇上”的革命叛徒。

第一件事，叛徒李昭壽“獻滁州投大清，我亦未責，將其在京所配之妻，瞞我天王而偷送付”。（《校補本》，第 35 頁。）“我亦未責”的話不是事實，但是其表“功”心理，昭然可見。

第二件事，納王郜永寬等人早就要叛變了，“雖悉其為，我亦不罪。”還告訴他們：“現今我主儻（蒙）塵其勢不久，爾是兩湖之人，此日由爾便，爾我不必想（相）害。”後來“這班返（反）臣不義”將慕王譚紹光殺死，“投與李撫臺”。“獻城未及三日，被李撫臺殺害”。（同上，第 92、93 頁。）

第三件事，松王陳德風在圍城時私通“東門外簫軍門”，事泄被捕，“該與我想（相）好，……當即出計保之，代用去銀一千八百余。然后保陳得風之命。”（同上，第 104 頁。）

赫赫有名的忠王，原來是個軟骨頭，這真出乎反動派的意料，老奸巨猾的假道學家曾國藩對付軟骨頭當不乏手腕，于是在兩次“深惠厚情”的談話之后，這個所謂“萬古忠義”的忠王在于向反對派遞交了降表。自己投降了不算，還要替反動派在大江南北打起招降的白旗。

“先忠于秦，亦丈夫信義，楚肯容人，亦而死報。收復部軍，而酬高厚，余兵不亂四方，民而安泰。一占（沾）清帝之恩，二占（沾）中堂、中承（丞）之德，萬世威名……我生而本無才略，秉直心院

(愿)，見義而從，別無他也。……見中堂、中丞大人量廣，故而直表真情：我肯與中堂、中丞出力，凡是天國之人，無不收服。中堂、中丞大人欲除我患，代收齊此人回來，爾除亦是是(是字衍文)好事。我喪國亡，收齊此眾，免亂世民，平我之心，而為百姓，得中堂、中承(丞)相將免勞，免費國之財貨。此是被獲承恩厚待，直心直說，并非而有別意，懇請揣之細詳，便知的實。”(此段《校補本》漏鈔，當補于第31頁。)

“今天國已亡，實大清皇上之福德，萬幸之至。今我在天朝，亦忠其為，其國軍亡，我為洪姓之將，外眾將兵具(俱)是我轄。今見老中堂恩惠甚深，中承(丞)大人智才愛眾，惜士恩良，我願將部下兩岸陸續收斂(全)，而酬高厚，……願收齊人眾，盡義對大清皇上，以酬舊日有罪愚(于)民。若我主在邦全，我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國亡，我兵數十萬眾，亂壞世民間，我不能衛，同其害民，皆我之罪也。天朝失國，今蒙恩代(待)，願代收齊報德。今而扶洪姓為將，今已被拿，本處早日誅刑，承蒙遲究，敢帶(感戴)靡涯。今國敗盡，免我兵不可再壞凡民，老中堂以及中承(丞)大人肯容此舉，室及(實乃)大清皇上格外之福，萬民同占(沾)中堂雨露之恩。若我能(有)此本事收復，恐防我他心，仍祈刑正國法，如辦不成，正國法是定。我此者，實因欲保民為樂之意。恐中堂不信我有此為，仍鎖在禁，容我辦為，付人我用，可在皖省居中，兩岸好辦。心虔有余。無有二意，如承因(恩)肯納，具(俱)辦齊全，決不負意。祈勞高才揣度，否合可為？”(《校補本》，第112-113頁)

自述的最后部分被曾國藩撕毀了，但是，就在最后幾行間，堂堂天朝的軍事統帥已經自認為是“大清民根”了，而革命軍隊和革命群眾，則變成了“眾匪”。(同上，第119、121頁。)

據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說，李秀成在死前，還寫了十句絕命詞，“敘其盡忠之意”。(《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三冊，第381頁)許多人拿這件事來證實李秀成的“凜然節氣”，可惜原詞沒有留下來，否則或者可以設實為這種說法找到一些實在的根據。但是，就算是

為太平天國的革命事業盡忠吧，已經太遲了。“既干進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把詩詞化為長江的波濤，也洗不淨這一頁投降變節的可恥記錄。

總之，無情的事實說明了：李秀成的自述並不是為了總結太平天國革命的經驗教訓而寫的“革命文獻”，（有人根據《清史記事本末》的一條材料，說李秀成在寫自述以前對清朝官吏說，“速將紙筆來，吾當書之，吾史館實錄為爾曹焚掠盡，吾不述，奚以傳后。”但是這條材料的可靠性很成問題，在目前已經發現的目睹李秀成寫自述經過的人的記載里，都不能得到證實。）它只不過是為投降的目的而寫的一個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自白書”。

問題的焦點是怎樣評斷李秀成的動機分明是一個投降變節的“自白書”，可是羅爾綱等先生卻說這個投降是假投降，說自述里那些“頌謾敵人、污損自己”的話，都是欺騙敵人的。

問題的焦點是怎樣評斷李秀成的動機。

為了對歷史負責，必須遵循正確的歷史觀點。

毛主席說：“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 870 頁。）評斷歷史人物主觀動機的好壞，唯一的標準是他自己的社會實踐，這裡必須避免主觀的臆測。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自述，是他投降變節思想的合理的產物。

我們且分析一下李秀成提出的十條綱領，即“招降十要”。李秀成認為，“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復此等之人眾齊來”，就可以迅速平定天下，“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校補本》，第 119 頁。）“招降十要”就是為這個目的而提出的。

“招降十要”的辦法之一，就是用“恩赦兩廣之人”的政策，瓦解最堅決的革命隊伍。“肯散兩廣之人，其客易辦”。他主張利用太平軍的俘虜作宣傳工作，以使“人人悉中堂、中承（丞）寬恩赦他，其心免結，圓事速成。”他又建議曾國藩“出示各省遠近州縣鄉村，言金凌（陵）如此如此，今各眾不計何具（俱）救，仍舊為民”。（這裡以及以下所引“招降十要”原文，均見《校補本》，第 113—

118 頁。)

在這裡，李秀成又一次表示要利用天朝統帥的威信，親自參加招降活動。

李秀成在“招降十要”的結尾部分里說：“昨夜承老中堂調至駕前訊問，承恩惠示，真報無由。罪將一身屈錯，未逢明良，今見老中堂恩廣，罪將定要先行靖一方酬報。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願，歡樂歸陰。”

在這裡，分布在大江兩岸的太平軍變成了李秀成晉見新主人的見面禮。羅爾剛先生在《箋證》里說，李秀成這裏寫的“罪將”句並不是向敵人“低頭”，而是說罪在“不能保衛太平天國”；“死而足願，歡樂歸陰”的話，表明李秀成早有了為革命而死的決心。（羅爾綱：《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四版，第 35、64 頁）羅爾綱先生似乎錯誤地領會了李秀成的意思。李秀成的“罪將”明明是向敵人表示懺悔的自稱；“死而足願，歡樂歸陰”明明是向敵人表示忠心的諛詞。翻譯成現代的話，就是：“我的罪極大了，您老卻這樣恩待我，真使我粉身碎骨難以報答。今后為您赴湯蹈火，犧牲生命都是心甘情願的。”試問，從這裏能夠找出什麼為革命而死的決心呢？

李秀成的招降計劃，共分三步：

第一步，“先收我兒子為先”，要曾國藩準他找人帶著他的親筆信，去辦這件事。

第二步，“要收我堂弟李世賢為首。李世賢之母親及其家眷被蘇州李撫臺溧揚（陽）帶云（去），業寬養重代（待）。欲收我弟，速見攻（功）者，求中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其視（事）母至孝，今我被擒，辦此者之易甚也。”李世賢是太平軍在長江以南的大部隊，招降李世賢是消滅太平軍的重要一著，清廷對這件事很重視，李秀成死后，還下諭旨向李鴻章查問情況。李世賢後來沒有投降清朝，但是李秀成為了招降李世賢竟然想拿人家的母親做人質，簡直是不擇手段了。

第三步，兒子、堂弟“收復”以後，再收聽王陳炳文。“陳炳文與我至愛，兩好作為親親。我今被獲在此，我文至，其定肯從。其

各肯從成此事。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陳炳文從，汪海洋亦至，我家弟從，朱興隆、陸順德從之定也”。“又收黃文金”，“其事定成”。“天朝獨我部眾，我將我部收齊，其余各記（寄）話而從。”

李秀成南京突圍時保護過的幼主，現在變成了重新檢驗他政治立場的試金石。他知道，他必須對這個重大的原則問題表示態度，否則新主人就不會信任他。

他解釋道，他過去保護幼主，是一種“愚忠”。他估計幼主一定在突圍時被殺害了，“此人必不能有了”；但是，萬一幼主沒死怎麼辦呢？幼主，這點象征革命的骨血，對有過“朱三太子”鬧事經驗，又受過農民大革命浪潮衝擊過的，腐朽圮敗的清朝統治者，卻是一個危險的人物。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呢？李秀成彷徨了。

曾經主張“不計是王是將”，都“赦其死罪”的忠王，對這個老天王臨危托孤、清白無罪的小主人，也愛莫能助了。“查幼主果能到處，再有別樣善謀，又再計效（較）”。李秀成的“鐵膽忠心”，在這裡完全被碎了。

李秀成還表示，在天朝將兵“收復”以後，他還願意為鎮壓北方的農民起義軍效犬馬之勞。“罪將邦（幫）籌為引……穩（捻）匪作亂，舉手而平。”（羅爾綱先生曾經在一個注解里說：“忠王所說的‘捻匪’乃指蒙城、亳縣起義群眾里擾害人民的分子。……那些擾害人民的壞分子，在革命內部看來，也還是以匪看待的。”《箋證》四版 125 頁。這也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捻匪”是指幾個壞分子說的，那麼“舉手而平”的當然也只是幾個壞分子，除掉了幾個壞分子，革命隊伍更健康了，革命事業更發展了，這樣，李秀成“辦好兩岸”、“先靖一方”的保證又怎麼實現呢？）這真是最徹底的背叛了。

這些事實，這些徹底叛賣革命事業的行動綱領，難道還不能說明李秀成的真正居心嗎？

李秀成的“招降十要”，每一條都可以馬上實行，而且都可以立即收到應有的效果。當然，在實行的過程中，也一定會遇到堅決革命派的抵制；但是，它仍然可以幫助敵人更快地摧毀大江南北的革

命隊伍。

李秀成不會“助紂為虐”，干出這種卑鄙的勸降勾當嗎？請看他向敵人立下的軍令狀吧。“如辦不成，正國法是定。”他的頭顱和熱血已經為他投降的決心作了擔保。

是真投降還是假投降，李秀成自己不是清清楚楚地答復了嗎？這就是我們評斷李秀成動機的根據所在。能不能說，李秀成的招降的為了保存革命群眾的力量，也就是“保民為樂”呢？

對革命群眾，李秀成確實主張“亭（停）刀勿殺”。不殺當然比殺好。但是，李秀成的不殺是有條件的。這條件就是：徹底投降，不再革命。從太平軍出來的李秀成深知，革命群眾是“殺之不盡”的，而且殺的越多，反抗的也越多，所以“平定天下”要以“仁愛為刀”。否則，“雖中堂兵欲爭，能平此等，實有費力費財”，而且“爾兵到此，其又去被（彼），何不有亂于民？被為（圍）嚴緊，尚有計他逃，不獨該在外許廣野而無別計者乎？”由此看來，李秀成這種以“仁愛為刀”的不殺辦法，對反動派來說，倒的確的一種大有好處的萬善之策。無怪乎殺人如麻的“曾剃頭”曾國藩，看了這一段話，也要向皇帝說“其言頗有可采”了。（《曾文正公全集》，卷20，《賊首分別處治粗籌善后事宜折》。）

也許，在李秀成自己想來，他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甘願從此作一個“順民”，他想保存自己兒子和部下的生命，也必須誘使他們都變成甘願被套上奴役之輒的“順民”。但是這種想法本身就是投降變節者特有的可恥的想法。他所設計的招降辦法並不是什麼保存革命實力的策略，而是一種瓦解革命實力的策略。革命群眾的生命既不能用乞求的辦法保存，更不能用投降的辦法保存。革命群眾的生命只能依靠革命群眾自己機智、英勇的鬥爭來保存

。

能不能說，李秀成是發了挑起滿、漢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而投降曾國藩的呢？

這種說法也是缺乏事實根據的，至少，從現在有的材料里，找不出這種根據。相反，我們從李秀成的自述里，只能看到他經常把

“中丞大人”、“老中堂”、和“大清皇上”并提，而且總是把“大清皇上”寫在前頭。此外在他的自述里，歌頌“大清皇上”的詞句屢屢可見。如“清朝有厚福”、“大清之福”、“滿洲之人過我大國為帝，此是天命而來”、“此是大清皇上鴻福”“仍大清再復升平”、“大清皇上格外之福”（《校補本》，第 49、55、69、107、113 頁）等等。從這裡似乎找不出一點挑起滿、漢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線索。

曾國藩、李鴻章、趙烈文這些鎮壓農民革命頗有經驗的巨奸大慾們對李秀成的態度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們並不認為李秀成是“偽降”。曾國藩對李秀成的評論是：“宛轉求生，乞貸一命”，“獻諛乞憐，無非圖延旦夕一命。”（《曾文正公全集》，卷 21，《欽奉諭旨分條復陳折》。）趙烈文在日記中兩次記述李秀成“有乞活之意”，有“乞恩之意”。至于李鴻章對李秀成的看法就更難堪了。李鴻章本來對李秀成非常害怕，在來往文書里有時稱他為“忠老”，後來知道李秀成寫了一個投降的自述，在致曾國荃的信里說：“阱虎乞憐，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

既然如此，曾國藩等人為什麼不接受他的投降，反而認為“此賊甚狡”，“不宜使入都”，而且迫不及待地把他殺了呢？

這個問題並不難理解。李秀成在整個革命戰爭期間始終活躍在最前線，又是後期太平天國最主要的將領之一，他對於戰爭的顛末經過是了如指掌的，曾國藩、李鴻章和清軍其他部隊狼狽潰敗、腐敗無能，奸淫捕掠以致欺君賣國的獨種劣跡在他腦子里有一本清帳。他在曾國藩面前固然盡量頌揚這位“侯爺”，但是對李鴻章就並不客氣，隨筆拈出幾件事情，就揭了李鴻章的老底。假如準他投降，清廷一定會命他入朝，誰能擔保他到了北京不會照樣把曾國藩的丑事揭露一番呢？曾國藩深知清廷對他是非常猜忌的，而他十幾年來虛誑欺騙朝廷的勾當又不知有多少！雖然李秀成自述里沒有挑起滿漢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意思，但他曾國藩卻不得不深加戒備。他權衡反革命利害的輕重，就斷然把李秀成送上了斷頭臺。

“生當做人杰，死亦為鬼雄”，李秀成卻含著羞憤的眼淚，懷著失節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國”。

談字里行間的“革命立場”

呂集義先生說：李秀成的自述“字里行間仍然到處表現出他的堅定的革命立場”。他舉出了實例，如“在時間上寫的是太平天國天歷”，“在稱謂上仍然稱‘天朝’、‘天國’”，寫上帝、天王時抬格，“凡是為太平軍攻克的城池都書作‘克服’，而被清軍攻陷的地方則作‘失’或‘失守’”，“起義的字眼更是數見不鮮”（《校補本》，第18—19頁）等。羅爾綱先生也引證了這些材料，並且認為這表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其“文字的實質和精神，依然表現著堅定的立場”，他還說，對這一點“不僅要從中國傳統的春秋史筆的書法去體會”，而且還要和當時的叛徒聽王陳炳文、寧王張學明等人在投降文書里誣蔑天朝的軍隊為“賊匪”、“賊壘”，稱頌清朝的法令為“欽命”、“國法”等作比較。（《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四版，第63頁。）

怎麼解釋這些現象呢？既然李秀成要投降了，為什麼在自述里還使用著革命隊伍里的稱謂，保持著太平天國的用語習慣呢？

什麼事情都有發生、發展的過程，投降變節也不例外。決定投降變節是一回事，養成投降變節的全部心理和習慣又是一回事。李秀成可以在一個極短的時間里作出投降變節的決定，卻很難在一個極短的時間里養成投降變節的全部心理和習慣。一個歷史學家說過，“臣妾簽名謝道清”的南宋皇太后，當她手拉著小孫子朝見忽必烈大汗的時候，她還沒有養成全部的奴才心理。同樣道理，在農民起義烽煙里翱翔過的雄鷹李秀成，當他被敵人抓住，決定投降變節的時候，他也還沒有具備完備的叛徒心理。這一點李秀成自己意識到了，他在自述里，不是明白地向曾國藩的“師爺”們說，“恐有違犯字樣，是煩勞清心改除可也”（《校補本》，第84頁）嗎！如果有一個“師爺”，真的按照李秀成的請求，替他把“時逢甲子”一類的話，改為“同治三年”，李秀成大概不會提出抗議吧！決定問題性質的是自述的根本立場，而不是某些習慣稱謂。投降還是不投降，革命不革命，這是檢驗李秀成階級立場是否堅定的根本標志，離開了這個根本標志，其它一切都不過是枝節末端而已。

舍去了充滿李秀成自述里的那些投降變節的話不管，只去埋首

考證幾句表面上符合太平天國習慣的稱謂和用語，其結果就會把一個變節分子當成“曲線救國”的英雄。

太平天國的另幾個叛徒在投降文書里污蔑天朝的軍隊為“賊匪”、“賊壘”，稱頌清朝法令為“欽命”、“國法”，這當然是無恥之尤了。這說明他們的叛徒思想早就成熟了，所以一見了蟲賊就會做出卑鄙可恥的奴才相。但是拿這幾個叛徒作尺子，仍然否定不了李秀成投降變節的事實。事實上，在李秀成自述的最後部分，所謂“字里行間”的“革命立場”或者什么“春初史筆的書法”，再也找不見了。在這裡，農民的“起義”，已經變成了“亂民”、“害民”，革命方面的“失”或者“失守”，已經變成了“大清”王朝的“收復”或者“平定。”最嚴重的是太平天國的革命軍隊和革命群眾，在這裡已經被稱為“眾匪”了，這個字眼已經和叛徒的口吻完全一致了，至于稱清朝的法令為“國法”，則早就有了。

可見，只要投降變節，就會認賊作父。心理和習慣上的不協調、不一致終究只是暫時的現象。

關於“防鬼反為先”

李秀成的“防鬼反為先”的思想，經常被當作證明他並非真投降的論據。“防鬼反為先”的確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這一點也洗白不了他投降變節的錯誤。

封建反對派和外國侵略者同是太平天國革命的敵人。在太平天國的革命者看來，一個是“妖”，一個是“鬼”。投降了“妖”，請他來防“鬼”，或者投降了“鬼”，請他來反“妖”，同樣都減輕不了他背叛革命事業的錯誤。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來進行革命鬥爭，是一種革命的策略；但是叛變了自己的階級，並且企圖不擇手段地替反對派作招降工作，甘心情願地去策助敵人“平復”“眾匪”，“安定”天下的人，是談不上什麼革命策略的。

太平天國的革命事業是在封建反動派和外國侵略者的聯合進攻下失敗的。“妖”、“鬼”盡管有矛盾，但是還是一家人。如果背棄了太平天國的革命事業去投降封建敵人，企圖請他們來防備外國侵略者，那只能是一種無法實現的幻想。這一點，近百年的歷史已經為

我們做出了結論。

從太平天國起義到失敗的十幾年里，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兩個階級在戰場上同外國侵略者相遇過。一個是清朝政府代表的地主階級，一個是太平天國代表的農民階級。他們的對手都是英、法侵略者，但是鬥爭的結果是那麼不同。地主階級很快向侵略者妥協、投降、割地、賠款；而農民階級進行了英勇的戰鬥，給予侵略者嚴重的打擊，並且以自己堅決反侵略的光輝榜樣，激發了後人的英勇鬥爭。歷史事實證明，抗擊外國侵略者，只能依靠革命的群眾。革命的群眾即使在挫折、失敗的困難情況下，也能用自己的力量給外國反對派以沉重的打擊。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一個曾經依靠革命群眾同外國侵略者作過鬥爭的農民領袖，背棄了革命的路線去投靠封建反動派，而且還幻想依靠他們來反對外國侵略者，這在歷史上不是進步而是退步。

李秀成的投降變節是不是因為歷史條件的限制？

有人用“歷史局限性”的觀點來為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辯護。他們說，李秀成在自述里所以“夾雜著一些對敵人過分期待的話語”，是因為他“對陰險狠毒的階級敵人認識上有歷史的局限性，”是因為“農民革命的局限性”。（《校補本》前言；《箋證》四版，第39頁。）

如果這種說法是指：李秀成的投降變節作為舊式農民革命中常常會出現的現象之一，是這種農民革命的歷史局限性的一種表現，這是對的。

但是，如果認為因為舊式農民革命有著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對於封建統治者的認識上的局限性，所以，投降變節行為對於李秀成來說就是難以避免的，是不必加以責備的，是可以原諒的，那就完全錯了。

農民群眾的英勇鬥爭在新的社會階級形成以前是歷史的唯一的動力；沒有這種鬥爭，歷史就不能前進一步。自己放棄鬥爭，還以策劃招降的辦法來協助封建統治者瓦解這種鬥爭，這不是歷史對他的局限性，而是他對歷史的反動。

舊式農民革命打擊了封建統治者，但是不可能推翻封建社會。

農民群眾認不清封建制度的本質，他們常常反對舊日的壞皇帝，而擁護新的所謂“好皇帝”。但是李秀成卻不是這樣，他是去擁護壞皇帝，而污蔑自己的天王；他是企圖去幫助當時農民群眾正在反對的壞政權，而出賣自己的太平天國。這不是農民階級的意識局限了他，而是他對農民階級的背叛，是他對農民階級的罪行。

同李秀成一樣出身、一樣成長、一樣失敗被俘，有著一樣的局限性的許多別的太平天國將士，卻沒有象他一樣投降。

有一個和李秀成時代相同、家鄉相同、出身相同、境遇相同的偉大人物。這就是青年英雄，勇猛善戰，世罕其匹的英王陳玉成。他在 1862 年（同治元年）被另一個反動將軍勝保俘虜了，勝保勸他投降，他寧死不從，而且還描敘勝保打敗仗的情形譏笑敵人。後來終於被殘酷殺害了。有一個無名氏，寫了一篇《陳玉成被擒記》，替我們記下了這個偉大農民領袖在敵人面前堅貞不屈的英雄氣概。

“玉成既為苗沛霖所賺，解至勝保營。玉成入，勝保高坐脣貽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為！爾本吾敗將，何向吾作態！’勝保曰：‘然則傾聽為我擒？’玉成曰：‘吾自投羅網，豈爾之力。吾今日死，苗賊明日亡耳！爾猶記合肥官亭，爾騎兵二萬，與吾戰后，有一存乎？’勝保默然，予酒食，勸之降。玉成曰：‘大丈夫死則死耳，何餃舌也！’”（見羅爾綱《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自傳》，《歷史教學》，1953 年 4 月號。刀口余生《被捕紀略》里也有類似記載。）

相同的時代，相同的家鄉，相同的出身，相同的境遇，一個巍然矗立，一個屈辱變節，“歷史局限性”為什麼競會有這樣的不同！？

也許有人想李秀成被俘的時候，南京已經被敵人攻破了，歷史條件還是有些不同。那麼我們看看另一些歷史人物吧。有一個差不多和李秀成同時被俘的太平天國領導人，這就是干王洪仁玕。

這個洪仁玕是李秀成看不起的人物。他是有缺點的，但是他被敵人俘虜以後的壯烈表現，卻是李秀成之類永遠不及的。他在反對派面前自稱“本藩”，直指敵人為“妖軍”。他崇高的氣節，堅定的立場，視死如歸的決心，表現了太平天國英雄們為革命不怕犧牲的

偉大精神。

他的自述：

“故趙宋文天祥敗放五坡嶺，為張宏范所擒，傳車送窮者，亦只知人臣之分當如此，非不知人力之難與天抗也，予每讀其史傳及正氣未嘗不三嘆流涕也，今予亦只法文丞相已。”（《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二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847 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漢青。”洪仁玕不愧為文天祥浩然正氣的繼承者。

再看另一個歷史人物。

這就是那個在國家危難時投筆從戎的遵王賴文光。他在南京城破後仍然繼續在長江北岸艱苦地同反動派作堅決鬥爭。他聯絡並且領導了北方的農民起義兄弟捻軍，把清朝名將僧格林沁和曾國藩的新湘軍打得落花流水。不幸 1868 年（同治七年）兵敗被俘，他對慘酷的刑戮毫無畏懼，真是赤膽忠心的鐵打好漢。他堅持革命氣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還在自述里無情地揭露反動派殘暴不仁的反動本質，斥責敵人“行一不義，殺一無辜。”

他在自述的末尾，敘述自己復國不成，以身殉節的心情，慷慨激昂，悲憤壯烈，使人讀後為他堅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感動不已。

“獨力此間數載，戰無不捷，彼霜蹈雪，以期復國于指日，恐獨立難持，孤立難久，是以于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張宗禹、幼沃王張禹爵、懷王邱遠才前進甘陝，往連回眾，以為犄角之勢。天不佑我，至于今日，夫復何言？古之君子，國敗家亡，君辱臣死，大義昭然；今予軍心自亂，實天敗于予，又何惜哉？惟一死以報國家，以全臣節。”（同上，第 863 頁。）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賴文光的自述，才真正是太平天國英雄的“就義歌”。

同一時代，同一種歷史條件，卻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物。一種人寧死不屈，慷慨赴義；另一種人投降變節屈膝媚敵。怎麼能用“歷史局限性”來為後一種人辯解呢？

英雄為什麼還會投降變節？

歷史上有過這樣的英雄，他們曾經騎著駿馬，馳騁在疆場上，同敵人進行過殊死的戰鬥，但是他們最後卻經受不起失敗的考驗。

“士眾滅兮，名已潰”，在軍隊潰散，身陷困境的時候，他們的風雲壯志消失了，於是喪師辱志便接踵而來。這種人在太平天國的歷史上也不是個別的。蘇州的叛將，“渺一目”，屢次打敗英法侵略者的寧王周文嘉，上面說道的聽王陳文炳，都是這樣的例子。

李秀成的投降變節不是偶然的。

從他的自述里可以看出，他雖然曾經進行過勇敢的戰鬥，但是在他的思想里，對於洪秀全、楊秀清等人倡導的太平天國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確的認識和堅定的信念。他在太平天國後期鬥爭越來越困難時，就逐漸失去了對革命事業的信心。他形容自己是“騎上虎背，不得下騎”。因此，一旦別人能把他從“虎背”上拖下來，他是不會再去堅持革命氣節的。

他在參加革命前受到許多封建思想的感染。所謂“天命”、“天數”、“明良”、“在秦為秦，在楚為楚”一類東西，都是這種思想遺毒的反映。

他雖然是貧苦農民出身，但是從士兵變元帥以後，首先從生活上，慢慢從思想上逐漸背離了本來的階級，做了元帥以後的李秀成並沒有保持他難苦樸素的作風。

十年壯麗的天王府，早已煙消雲散，洪秀全的宮殿已經找不著了。但是“忠王府”的遺跡，仍然在蘇州的“拙政園”任人憑吊。

“忠王府”是個未完的工程，幾千個工人長期建築了三年多，到蘇州陷落時仍未竣工。王府的設置富麗堂皇，“內外四五十間，純用金銀裝飾。”（姚濟：《小滄桑記》，卷下。）叛徒獻城以後，李鴻章入踞蘇州，這個騎奢淫逸的反動將軍見了“忠王府”也不禁嘆到：“瓊樓玉宇，曲闋洞房，真如神仙窟宅。”（李鴻章致弟李鶴章信，轉引自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增訂本），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243頁。）

李秀成的金銀財寶也不少。有一次因為同洪秀全鬧矛盾，被勒令交出餉銀十萬兩。南京陷落以前，他說自己銀米都沒有了，但是

為了給叛徒陳德風等人疏通，一次還能拿出成千兩的銀子。

具有象征意義的一件事是李秀成的性命，最後竟給一堆珍珠寶物斷送了。

“我命該絕，……身上帶有寶物，用綢紗帶捆帶在身，哪知此日心如此之迷，到此破廟亭（停）息，將此珍珠寶物吊在樹下，……那邦（幫）百姓得我寶物，民家見利而爭，帶我這邦（幫）百姓，去問那（幫）百姓，兩欲分用。被邦（彼幫）百姓云：‘爾問我分此物，此物是天朝大頭目有，如（余）外別無。爾必拾獲此頭目。……因此我藏不往（住），是以被兩國（個）奸民獲拿。’”（《校補本》，第110—111頁。）

此目的“心迷”，乃是往日“心迷”的結果。李秀成當初如果不貪戀這堆珍珠寶物，他是可能安全回到自己部隊的。

明朝末年，被清軍俘虜的洪承疇，因為屢次拂掃衣服上的塵土，被范文程窺破了他心理上的秘密，“一衣猶愛惜如此，況其身耶？”果然，正當崇禎皇帝準備親自為這個道德典范舉行祭奠的時候，他已經批上了皇太極的詔襲，做了滿族統治者的奴才。既然如此，我們對國破家亡時念念不忘珍珠財寶的李秀成，又怎么能企望他堅持革命氣節呢？

李秀成的自述作為一種太平天國的史料，有重要的價值。但是，現在的問題不是史料價值問題，而是對它的根本評價問題。

由於李秀成已經不僅是歷史學家研究的對象，而且是各方面拿來在群眾中進行廣泛宣傳的人物，因此，正確地估計他的表現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

我們祖國人民的光榮鬥爭傳統是反抗階級壓迫，反抗民族壓迫的革命傳統。中國近代史上許多可歌可泣的革命鬥爭正是這種傳統的繼續。在太平天國的歷史上，我們也看到了這種光榮的鬥爭傳統，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馮云山、林風祥、李開芳、陳玉成、譚紹光、洪仁玕、賴文光以及成千上萬的革命戰士，盡管他們有這樣那樣可避免的或者不可避免的缺點和錯誤，但是他們堅持了反對封建壓迫、反對外國侵略者的鬥爭，為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勝

利開辟了道路。他們在革命事業遭到失敗，個人生命遭到威脅的時候，仍然繼續爭，絕不變節。他們赤誠的革命忠心，磅礴的革命氣概，在階級鬥爭的歷史上永遠發射著不朽的光芒。他們才是我們歷史上可敬愛的革命英雄，我們應當承繼的正是這種光榮的鬥爭傳統。李秀成呢？雖然他在太平天國革命史上起過很大的作用，但是他最後喪失了革命氣節，背叛了太平天國的革命事業。他的自述既不能代表我們歷史上的光榮鬥爭傳統，也不能作為鼓舞后人戰鬥的榜樣。

如果我們尊重革命的歷史、尊重歷史唯物論的真理，我們便不能讓變節分子的“自白書”繼續彪炳于革命的史冊。

(原載 1963 年第 4 期《歷史研究》雜志)

第十八章 調《紅旗》雜志社和 參加通縣的“四清”運動

1、調入《紅旗》雜志社

1964年夏，我評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問題？》寫出之後，康生告訴我，他本想調我到他們的反修寫作班子去的。可他正打算向中央辦公廳管人事的龔子榮要人的時候，陳伯達卻搶在他之前，向毛主席提出調我到《紅旗》雜志社去。陳伯達是以當前史學領域鬥爭尖銳復雜、為增強該領域中的力量為理由，打報告給毛主席，要調我去《紅旗》雜志擔任歷史組的組長，結果獲得毛主席的批准。田家英跟我說過，要去就去康生那里，不要去陳伯達那里。所以，在鄧力群代表《紅旗》跟我談話，要正式調我的時候，我對鄧力群說，我不想去《紅旗》。鄧力群一聽就板起臉來說：這個事是給主席打的報告。主席批了，沒得商量了。鄧力群也是老資格，又有主席的批示，我沒有選擇了，不得不到《紅旗》雜志社去。

我知道田家英和陳伯達矛盾很深，田家英曾當面給我說過，他擔心我萬一不小心，在陳伯達面前說一些對他不利的話。現在我要調《紅旗》雜志社，到陳伯達手下去工作，當然需要考慮田家英這位老領導的心情。所以，在成行前我專門去給他辭行，請教他我到了《紅旗》該注意些什么，實際上是跟他保證一下，讓他不必有多余的擔心，我不會在陳伯達面前說他的壞話。

陳伯達在爭取我到《紅旗》去的時候很積極，但其實他只是做個姿態給主席看的，說明主席支持的人我也支持。我真的去了之後，他也沒有怎么重視我。我去報到，他也不見我，只是讓鄧力群安排

我在副總編范若愚的一個很大的辦公室里面辦公。等報到后我去他辦公室見他，他也就一句“你來了”，並不和我談具體的工作。後來《紅旗》成立歷史組，他才任命我當組長（正局級）。

康生沒有要到我，但他跟我說，我們這裏的事情你還得干，你要和《紅旗》副總編范若愚一樣，經常來參加釣魚臺的工作。于是，我調出中央辦公廳之后，編制雖然是在《紅旗》雜志社，人卻是經常要到釣魚臺給他們寫文章。可是這年的十月，赫魯曉夫突然下臺了。這樣一來，反修寫作班子的任務就沒有了，隨後它們就作為彭真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寫作班子了，“二月提綱”開始也是由這個班子起草的。康生和彭真的關係很好。平日里康生在中間一坐，秀才分坐兩邊，一句一句地討論文章。但是“二月提綱”最後的定稿是彭真定的，是彭真拿到家里讓許立群他們幾個人又作了修改的，沒有經過康生他們。在康生那里，主要動筆的是吳冷西和姚溱。王力主要是擔任記錄。後來王力說“二月提綱”主要是由他起草的，那是瞎說。王力的特點是擅長記錄和在記錄後很快地把觀點整理出來。在這點上，別人是比不上他的。但要說寫文章，他的筆頭不行。

然而陳伯達卻一直沒有給我什麼工作。只有一次，賀龍要人給他寫《賀龍傳》。陳伯達很起勁，他要我參加，因為我是《紅旗》歷史組組長，所以他要我來主持編寫。我當時就推說我對軍隊的情況不熟，堅決推辭了。其實我當時多少還是知道點軍隊的事的，知道是很復雜的。而且江青也跟我說過，連她自己對軍隊都很謹慎，從來不多說話的。我怎麼能去寫這個《賀龍傳》呢。：

因為沒什么事可干，而我又是個閒不住的人，所以那年（1964年）入冬，我就主動要求去參加“四清”工作隊。

2、參加“四清”運動

我去了北京郊區的通縣，參加那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稱“四清”運動）。鄧力群是帶隊的隊長，陳茂儀（《紅旗》雜志秘書

長）任副隊長，蘇星、關鋒、海波、鐘林和我分別擔任小組長，其他還有十幾個文化戰士，陶文鵬、王夢奎、鄧紹英、滕文生、王銳生等。我帶的小組來到了宋莊公社的翟里大隊。

翟里大隊的一個副大隊長叫鄧慶福，他私分私藏了不少糧食，群眾反映非常強烈。我們通過調查掌握了證據後，經過請示就抄了他的家。那時普通的社員家里連吃東西都很少，可是在鄧慶福家里的幾個屋子里卻都是東西。他家院子很大，搬出來很多箱子，打開一看滿滿的都是糧食。為了教育干部社員，我們搞了一個展覽，社員們看了驚訝得不得了，他們從來沒有見到那麼多的東西，吃的、用的、穿的，花花綠綠什麼都有，還有補品、貴重物品，連當時還相當先進的收音機也有，他家的家具也是全村最好的。這些東西在當時是超出普通農民太多了，光是抄出來的糧食堆起來就像座小山！當時的糧食是先由隊里上交公糧，然後是社員按所得的工分來分糧食的，等社員都分完後還會剩下一些，那這些糧食就不在統計數字之內里面的，所以等社員都走了，他就帶領幾個干部私分、私賣。參與的有保管、會計、隊長，這個副大隊長分得最多。一個普通的大隊干部，居然就私分得那麼多的財產。

上有所行則下必有效！有一個小隊長，是個皮匠，也私分糧食，群眾揭發他，他還不承認，硬說是節省下來的。我們從小隊會計那里突破，這個會計先也不講實話。我們說，不講我們就帶人抄家。一聽要抄家，他就主動交代了。我們去小隊長家，發現糧食都藏在柜子里。一個小隊的干部，就那麼一點點權力，就敢在社員的眼皮底下私分集體的東西。所以，社員就沒有積極性了。他們說，我們干那麼多，都是給他們幹部干的，我們工分那麼低，就分一點點錢，一點點糧，他們說是為集體，其實都是為他們自己了。實際上這就是毛主席說的新的地主、新的富農。解放前是公開的剝削，他們這是不公開的剝削。我親眼看到這些之後，就覺得毛主席講重點是鬥爭走資派講得真對。

關鋒管的那個隊，副大隊長也食污，情況和我這個隊的副大隊長類似。也辦了一個展覽，綢子緞子一大摞，皮箱放不下，電器都

是新的，餅干都是鐵盒子裝的，數不過來究竟有多少盒。那時剛從困難時期出來不久，這些都是很高級的東西了。他貪污的糧食多，把糧食高價賣到自由市場上去，錢也就多，所以家里東西自然就多。光是這些東西，他也夠得上是個貪污犯了。當然，就貪污的數值來講那是和現在沒法相比的。而且這個人是曾經做出過一點成績的，他在公社里有點名氣，上上下下的關係都很好。所以，雖然他貪污的證據確鑿，卻因為上面有人給他撐腰，誰也拿他沒有辦法。誰要拿他，他就搬來上面的人，把拿他說成是整群眾，而上面的人居然都是聽他的。關鋒對這事感到非常憤怒，就是要拔掉這個釘子。這個人不光是貪污錢和糧，平時欺壓老百姓的事兒還很多。關鋒很仔細，他讓滕文生搞了一個小冊子，把他的種種惡行、斑斑劣跡都寫出來了，最後還是把他拿下了，開除了黨籍。文革之後，北京市卻給這個人平了反，平反的時候，也不講點具體材料，不談事件的來龍去脈，就是一句話：一批極左分子，在關鋒的領導下，誣陷造謠，加給 XXX 的罪名都是誣陷不實之辭。關鋒到去世的時候對這個事情都不服氣。他指著他當年搞的那個小冊子說：我就寫本書定在那兒，他怎麼翻案也翻不了的。但還是沒有用，他自己人也死了，那本小冊子人家不給他發行。“真理”都是相對的，誰掌握權力了就是“真理”。當然這個“真理”是打引號的。真正的真理是動搖不了的。

我那個大隊的副大隊長鄧慶福也是這樣。文革之後，北京市就給他平反了，說他沒有私分糧食，也沒有貪污。還有一個人，解放前當過地主的狗腿子，他在隊里打谷場管稱桿子，他就利用這個權力和當時糧食緊張，采用“高抬低壓”秤桿的辦法，來霸占和欺壓婦女。他看中誰家婦女，就讓秤桿高高翹起多給人家一點糧食，用這個辦法去誘騙人家；誘騙不成的，他就把秤桿壓得低低的，克扣人家的糧食。有個外號叫“小半仙”的婦女，比較放蕩，她也不結婚，喜歡誰，誰只要給她一點東西，她就跟人睡；但要不喜歡誰，你再給她錢，給她糧食，她也不干。她就是不喜歡這個把秤的，他再怎麼高抬秤桿她也不干，這個人實在沒有辦法，最後竟把她給強奸了。就這樣一個壞分子，鄧小平重新掌權後，北京市居然也給他

平反了。只要當年是我們搞的，北京市一律都給予平反，連證據確鑿的壞人也給平反。理由居然是他們都是當年被我們“迫害”的群眾。這應是人們沒有注意到的，鄧小平、胡耀邦他們平反“冤假錯案”另一面的真相。看看今天中國的農村，許多地方村霸、惡霸猖獗，欺壓老百姓。這些是不是與他們當年的“平反冤假錯案”時不分是非一風吹有關？你再怎麼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你能阻止這些血腥事實的持致發酵嗎？

相比之下，還有個叫老劉的，就沒有這麼幸運了。老劉後來死了，對於他的死，我一直是覺得很遺憾和內疚的，因為是我沒有處理好。在查辦了鄧慶福之後，有群眾說，有個人你們沒有查。他姓劉，雖然現在是貧農，可解放前他當過土匪，還經常搞綁票。一般來說，“盜亦有道”，那個時候當土匪也有當土匪的規矩，不能綁票自己村里的人。可這個人不講這個規矩。曾經綁過村里的人，所以村里的人都不喜歡他。可是我們在“社教”運動中是沒有搞土匪的任務的。再說他都已經是貧農了，解放後也沒有什麼劣跡。而且他的一兒一女，參加“四清”也挺積極的。但是，社員們向我反映了，我也得應著。我說，那好吧，讓他交代交代，把事情說清楚，教育教育。我叫我們工作隊的小周去找他談話。結果一談話，他就覺得很緊張，以為我們搞了鄧慶福之後要搞他了，在小周找他談話後沒兩天，他就跳井自殺了。

人死了事情就大了。小周說，我也沒有逼他，就是照你說的讓他交代交代。鄧力群經歷的事情比較多，他是帶隊的，我趕緊報告鄧力群。鄧力群說，沒多大關係，過去的土匪死了就死了，但是要報案，給北京市公安局報案。我們報案後，公安局馬上來人，法醫一套人馬也來了。人已經從井里拉上來了，法醫翻來覆去地看，照相、記錄，都好了就叫我們埋人。我說究竟檢查出什麼了？法醫說，我們的任務是來看是他殺還是自殺，是他殺就要立案調查，是自殺，那就是村里的事了。我問，那怎麼知道他是自殺的呢？法醫就跟我講，被推下井的人要掙扎，到井里還要掙扎，指甲蓋底下一定有泥灰，這個人指甲蓋很干淨，沒有掙扎的痕跡，他是自己跳到井里的，

沒有掙扎。

這個老劉，家里一大堆人，他一死沒有強勞力了，他家人的生活就困難了。人不死，怎么把他當作土匪都沒有問題。等人一死了，大家卻又同情起他來了，幾十年前的事也原諒他了，反而都覺得是我過分了。其實我又沒有整他，或者是抓他，只是讓人跟他談話。可是人死了，就都是我的責任了。我為這事檢討過。後來為了把他家生活穩定下來，我給他女兒找了一份工作，讓他一家在生活上有個保障，但是他自己畢竟是死了。

通過“四清”，我們把所存的干部都查了一遍，翟里大隊除了那個副大隊長，其他干部都沒有查出很大的問題，那個小隊長的問題也不算大。四清之前社員出工，打了鐘還稀稀拉拉的；“四清”以後，沒打鐘就在鐘底下等出工了。我親眼看見，社員的積極性確實是提高了。社員們說，大躍進的時候，地里的莊稼都沒有好好收，南瓜都爛在地里了，收起來的也沒有人去分，最後還是都爛掉了。1958年確實風調雨順，確實豐產了，但人都去修水利、煉鋼鐵去了，東西收不上來。全國都有這種情況。豐產不豐收，豐收不豐分。老百姓實際沒有分到多少東西。後來農民積極性不高，並不是公社搞得不對，主要還是干部的問題，干部自己貪污，又欺壓社員。社員怎麼會有積極性呢？經過“四清”，把干部隊伍整頓了一下，社員積極性又起來了。

我們工作隊自己都是很清廉的，工作隊所到的地方，干部也不敢貪污，社員分的糧食就多。他們說，你們每年來一次就好了，特別是收糧的時候，你們來跟我們一起收、一起分就好了。這就是說，生產問題解決了，大的問題就是分配問題了，你解決了干部的私分問題，社員的心就順了。我們走了以後，他們連年豐產豐收，這恐怕也是“四清”運動的成果吧。

就在我下去搞“四清”運動的時候，我看到了毛主席新近的一個批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看了之後，我腦子里轟的一下，就像感到地震一樣的。這是我思想上最受

到震動的一次。當時我剛寫了評李秀成那些文章，研究了太平天國的歷史。但在我的認識上，我們黨至多達到了肖朝貴的那個狀態，總的還是革命的。遠沒有達到洪秀全那個地步，洪秀全是已經完全變質了的，成了重新騎在農民頭上的新的地主階級了。沒想到主席已經把問題提到了形成新的與工農階級相對立的剝削階級的高度了。毛主席的這段批示，其實就是與劉少奇辯論的結論。我問了關鋒，關鋒說理論上是這樣的。從理論上講是已經到了出現了新的剝削階級了。我也問了鄧力群，鄧力群表示他對主席批示不理解。但據說鄧力群這些年也已經慢慢理解了。

3、因一封批評信而引起的風波

“四清”運動是一場群眾運動，首先就需要發動群眾起來。如何發動群眾？當時王光美發明的“桃園經驗”，是通過搞秘密的所謂“扎根串聯”，瞞著大部分的群眾。等到他們排查摸底搞清楚之後，由工作隊召開群眾大會對那些排查出來的“壞人”進行鬥爭。鬥爭的方式很殘酷，搞噴氣式，搞殘酷的肉體鬥爭。最早搞“噴氣式”的就是“桃園經驗”。劉少奇則到處推廣王光美的“桃園經驗”。

可是，群眾和那些犯錯誤的“壞人”，平時也是鄉里鄉親的，你要搞“噴氣式”，搞“肉體折磨”，群眾也抹不開面子，反而引起群眾的反感和抵制。所以我們，包括鄧力群都不同意王光美“桃園經驗”那個搞法。我們就是先到群眾中去了解情況，聽取群眾的反映，然後根據群眾反映的問題去調查核實。在掌握了確鑿的證據之後才對這些人進行清查和鬥爭。在鬥爭的時候，也最多是讓他們站著，不去搞什麼“噴氣式”的“肉體折磨”。這樣有理有節的，群眾覺得信服，所以也容易發動。

可是也有熱衷于學習效法“桃園經驗”的。像北京市委的第二書記劉仁就是這樣的。可是當他看到他們的做法受到了群眾的抵制，群眾發動不起來的時候，就認為是下面群眾覺悟太低。他就作了個

講話，說如果你們不想搞，那我們也沒有辦法，那就算了，我們都撤回去。

劉仁的這個講話精神傳達下來后，我聽了是有些看法的。當時我只知道是北京市的一個領導講的，并不知道這是劉仁講的。我覺得，群眾不覺悟，那你就應該去做工作，發動他們起來；而不是去訓斥他們，還動不動要撤走工作隊。這樣的做法完全是一種對待群眾的老爺作風。

雖然那時我已經離開“後樓”研究室了，可是陳麒章知道我在下面搞四清，就叫我把在下面了解到的事經常跟他們溝通一下。所以我一直和“後樓”的一些同志保持著通信聯系，常把我遇到的一些情況寫信告訴他們，大多是些零零碎碎的事。在給一個同志的私人信件上，我就把我對劉仁講話的看法都寫了出來，因為是私人通信，所以我也就寫得比較直接。那位同志看了以后，覺得這封信的內容不錯。他也沒有跟我說，就把信轉到陳麒章那里去了。陳麒章看了以后，認為我的批評意見很有道理，就把信在《情況反映》上登了出來了，而且還從辦公廳保存的北京市簡報里找到了劉仁的講話，把它作為附件一起登出了。

毛主席向來都很反感在社會主義革命中搞神秘化、搞地下鬥爭那套東西的。他從《情況反映》上看到了我的信，就作了批示，是批給彭真的。主席批評了劉仁，說劉仁，你不該這樣講話。這一來，劉仁就很緊張了，他作了檢討，還生了場病，住院治療。不過很快就治好了。

這件事，彭真的意見很大。他找了陳伯達，說劉仁這個人是老革命了。你們批評我們的書記，也先給我打個招呼啊，我可以去批評他的。你這麼一登出來，給主席看了，這事情就弄大了。

陳伯達這個人是沒有獨立自主性的，他的確是像主席說的那樣，經常在黨內這一派和那一派之間搞投機。我們批評劉仁就等於是給彭真難堪了。而彭真當時是中央書記處的常務書記，厲害程度絲毫不在鄧小平之下。所以，陳伯達一看彭真不滿意了，就很緊張。當然說實話，那時候陳伯達怕跟彭真起矛盾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陳伯達來電話批評我：你們是怎么搞的？不經過我同意，怎麼就隨便給人下戰書？我也沒有叫你們下戰書啊。你們寫這東西應該先通知我啊。你是《紅旗》的人，這牽涉到《紅旗》和北京市委的關係，《紅旗》和黨中央書記處的關係，影響我和彭真的關係，彭高是可以隨便得罪的嗎？你們這麼一弄，彭真還以為是我要整他，對我有意見了。

我跟陳伯達解釋：我知道了，以後反映什麼都先通知你。我把我的通信底稿給你看，那只是封私人通信，講得隨便了些，有點上綱上線，並不是正式意見。沒有想到他們會登出來。我往信里說他是老爺作風。現在我收回這話。要不要我給彭真寫信說明一下，這是我的問題，跟你沒有關係。陳伯達說，你別寫了。你和關鋒趕緊到彭真那里去作檢討，認個錯。由於我的信里還引用了關鋒的幾句話，也是比較激烈的，所以他讓我叫上關鋒一起去。

這一下，我和關鋒也覺得犯難了。那封信，主席都已經作出批示了，我們怎麼去認錯呢。說來也巧，陳伯達要我們去向彭真作檢討，彭真也正在找我們。彭真指名叫我跟關鋒去參加北京市委召開的“四清”工作動員大會。我記得那天是天寒地凍，雖然專門給我們弄了個火爐子烤火，我們還是冷得不得了。開了四個小時的會，就凍了四個小時。其他干部沒有火爐子，就更遭罪了。開完會，主持人說，你們兩位請留一下，一會兒有車送你們到彭書記家去，彭書記要見你們。彭真是很大的領導，要見我們，我們不能說不去的。一會兒車子來了，把我們拉倒彭真家。

那是我頭一次到彭真家里，屋里熱氣開放，溫暖如春。以前我給他送文件不止一次，但都是送到市委，沒到他家里去過。這次到他家一看，真是富麗堂皇，比豪華飯店的高級房間還要高級。桌子都是很高級的木頭。吃飯是個專門的房間，很大，存很多精致的擺設。我當時也沒有見過大世面，我在上海見過我爸爸的老板，家里也很氣派的，可那是資產階級，共產黨里面這麼闊氣的我還沒有見到過。田家英住的地方很差，根本沒有吃飯的房間，吃飯都在辦公桌上。當然田家英不是很高的首長。可是，主席家里與彭真的家相

比，也簡直也是兩重天的，暖氣不暖，在屋里呆著也要穿棉襖的。不信就到主席故居去參觀一下，木床、舊沙發……。總理家里我也去過，西花廳，總理和鄧穎超就住在一間小屋，都挺樸素的。

彭真確實是大手筆，領導能力很強。他不但不批評我們，還好像很重視我們。關鋒是老干部，我原以為他會以關鋒為主的。不料，他把關鋒冷在一邊，老跟我說話。

他先跟我們嘮家常，問寒問暖，連我老婆怎麼樣，多大年紀，長得好不好，感情怎麼樣都問，還叫我常到他家里來。我說，我還不知道您愛人叫什麼名字，他就說叫張潔清。然後問我最近在看什麼書。他先說了關鋒的文章好，贊揚關鋒一番。然後就提起了我評李秀成的文章。他對我說，我看到你的關於李秀成的文章，當時就支持你。你的文章寫得好，那麼長的文章，我一口氣看下去了。真是犀利啊，怪不得主席欣賞你。主席的批示我看了。你是對的，周揚他們不對。“忠王不終”啊，李秀成的確是對革命不忠，真正對革命忠誠的是農民英雄陳玉成，我跟你一樣是擁護陳玉成，他不屈而死。你是我們黨培養的新興力量，你要好好努力，不要舉負黨的培養。彭真這麼一說，就把我們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我對他的感覺也一下子好起來了。乘此機會，我就說，有件事我做得不好我對劉仁同志的那個意見應該先向您反映，我直接給辦公廳寫了封信，他們就登出來了。這個事情跟陳伯達同志沒有關係。我們去之前，鄧力群還在通縣，我們跟他通報了彭真要見我們的事。鄧力群也叮囑說，見了彭真要說一下，你們寫的那個情況匯報，是你們自己弄的，不是陳伯達叫寫的。他還說，陳伯達對這個事情很惱火，你們要替陳伯達撇清楚。

彭真說，這有什么關係呢，你有意見，有權利寫。還說，你們的意見很好，對待群眾怎么能用這種老爺式的腔調呢？他說，劉仁這個人呢，就喜歡講反話。他那個意思本來是想反激一下的。他說不管了，那意思是，還是要管的。你們把它當成是他的真話了。其實他不是這個意思。他要是真不管就不對了。他是個書記，怎麼能真不管呢？

我們聽了，也覺得彭真講的很有道理。我說，我水平低，當時是我跟關鋒講的。關鋒也沒有仔細看。我們倆水平都不高，可能領會錯了。主席看了我們的報告認為劉仁不對，就批評了。這是我們做得不好。彭真說，沒關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嘛。主席批評他，批得好啊。弄得他很緊張，心臟病都發了。他以後就知道該怎麼講話了。你要激發人家，就正面講嘛。

彭真這麼一說，我和關鋒倒覺得過意不去了，因為當時我們對劉仁也並沒有什麼看法，只是覺得他的話講得不對。聽過彭真的這些話，我覺得彭真好像不在乎這個事。於是，我再次強調說這個批評不是陳伯達的意見。他說，就是陳伯達的意見也沒有關係。彭真又說，你們《紅旗》雜志辦得很好，工農兵學哲學，主席都說了，我也是這個意見。彭真的這個態度和陳伯達的指斥大不一樣，這使我對彭真更加好感。說完他還要請我和關鋒兩人以後擔任整個北京地區四清工作的顧問，只要我們有時間，所有北京召開的“四清”工作會議都歡迎我們去參加。

聊完了，就吃飯。我第一次吃這麼精細的飯，那豆腐做得比肉都好吃。我老吃豆腐，關鋒是老吃肉，那個肉也好吃。我們在通縣都是“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都是在社員家吃飯的，到工作隊隊部也沒有什麼好吃的。平時在中央開會，我以為吃得也還不錯的。中南海我們吃大食堂，就算好的。田家英請我到四川飯店吃過，也算吃得好，但比起彭真家的這個飯菜，那是天差地別了。

臨走的時候彭真還叮囑我，以後看到北京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跟我寫信，寫我親收，信封上寫上你的名字，他們就不會壓了。我領會他那意思是說，以後北京的事不能再向別人說了，要跟他本人說。對這一點我當時也並不反感，因為那時彭高在黨內很有威望，中央開會也常是他在講話，比鄧小平還厲害。那時還沒有什麼“二月提綱”的事，我確實是把他看作是中央的領導的。我那時才30多歲，比較簡單，還不知道會有那么多矛盾。

我回來以後就對關鋒說，彭真請我們吃飯這麼隆重啊！關鋒說，還不是因為主席批了你那封信。彭真權力大，陳伯達都不敢得罪他。

你寫了那封信說劉仁的壞話，陳伯達要你去說明那不是他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彭真請吃飯還不是因為那封信，因為主席批了那封信。彭真不是說了嗎，以後北京有什么事給他反映，要先跟他打招呼。這樣的話，我們還能說他不好嗎？關鋒對一些事情的看法比我尖銳，他究竟是經驗多。我問他，我跟彭真講清楚沒有？他說，你應該向他說明，你是跟中辦同志個人寫的信。不經意說了自己的看法，不是有意告北京市的狀。應該把這個意思說清楚。我說，那你怎么不當時就補充？他說，你的事我怎麼補充？我仔細一想，覺得關鋒講得很有道理。於是我就給彭真寫了一封信，一來是按照關鋒的意思把我那封信的經過說得再清楚一點，這也算是對向陳伯達有個交代；二來吃了人家的那麼一頓飯，也該說聲謝謝。給彭真的信，不是關鋒叫我寫的，我在信里說了對彭真招待很感謝，希望他轉告劉仁同志，消除誤會。此后我和彭真再沒有什麼來往，也沒有再給他寫過信。

文革一開始，彭真就被隔離審查了，抄了他的家。所有彭真那里的信都交到了康生那里，里面有我寫的那封信。那時候彭真被認為是個反黨集團，所有跟他關係好的，都會受到懷疑和審查。戚本禹響當當的的左派，居然跟他有通信。康生、陳伯途、江青都看了那封信，就說我是拍彭真的馬屁，向資產階級投降。江青還有點懷疑，問我：你怎么跟彭真寫信，跟彭真搞在一起了？我跟江青說，是陳伯達叫我去認錯的。如此這般講了一下過程。江青就問陳伯達，可陳伯達說沒有啊，我不記得啊。還好那正是一起在開會的時候，關鋒也在。我說：“江青同志，這個事關鋒同志可以證明”。關鋒也證明了。江青知道了實情就說陳伯達：“你個老夫子，你自己叫人家去的，你現在又來說人家。”那次，康生也在，王力也在。康生說他仔細看了我的信，彭真請吃飯，一般的感謝，沒有講別的內容，沒有什麼事兒。康生這麼一解釋，這封信的事就算過去了。可後來陳伯達說，康生在包庇戚本禹。

等到我被捕後，開始是陳伯達罵我，後來是總理、康生、江青講話，講我早就投靠彭真。還引用我信里的一句話“在您的家里，

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樣”，說可見戚本禹早與彭真成為一家人了。其實那不過是句客氣話而已。還有人造謠說我在信里寫了“最敬愛的彭真同志”。我給主席都不這麼寫的，怎么可能給彭真寫“最敬愛的”這種話呢？那造謠的人自己沒有頭腦，不等于其他人也沒有頭腦啊。

4、批評“繁瑣哲學”惹出的麻煩

翟里大隊的“四清”運動歸宋莊公社管，而宋莊的“四清”又由上面統一管著，所以經常要我們去匯報工作，填寫各種各樣的表格，有些都是重複的，我們得專門派一個人來應付。正好那時《哲學研究》約我寫文章，我就想現在是繁瑣哲學盛行啊。大大小小的會議，沒完沒了的統計、填表、查問，上面老來人聽匯報，要這材料要那材料，比我們的隊長鄧力群來得還勤，鄧力群有什么事叫我們說說就行了，也並不經常開會的。而他們卻是沒完沒了地折騰你。一天晚上，我越來越氣，就寫了一篇短文，批評繁瑣哲學，關鋒拿去看說好。于是我就把它交給了《哲學研究》雜志。清樣都出來了，鄧力群看到了，就問我，你這個批判“繁瑣哲學”是不是中央有人跟你說了什么啊？我說，沒有啊。他就說，毛主席正在批評劉少奇的“繁瑣哲學”呢。

我當時寫的只是出于自己的感受，并把它提到了哲學高度來講這個問題。沒想到的是，制定“二十三條”時，毛主席和劉少奇發生了分歧，毛主席說“四清”運動主要是解決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主要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劉少奇說，有什么矛盾就解決什么矛盾。主要是解決“四清、四不清”的問題，還說要解決什么“黨內外矛盾交叉”的問題。毛主席就批評他是搞“繁瑣哲學”。

我所講的“繁瑣哲學”是指具體的工作方法問題，跟主席批評的劉少奇搞的“繁瑣哲學”一點關係也沒有。但因為我是從哲學角度講的，所以用了“繁瑣哲學”這個詞。鄧力群是做過劉少奇的秘

書，所以他很敏感。一看我講“繁瑣哲學”就警惕了，以為我是在批判劉少奇，以為我消息靈通，一定是聽到了毛主席批判劉少奇“繁瑣哲學”了。我問他，你怎么知道主席在批“繁瑣哲學”呢。他說是康生跟他打招呼了，說毛主席跟劉少奇發生分歧了。鄧力群跟康生關係不錯，常跟康生打電話。鄧力群說，這個事現在中央還沒有公開，你不要去趕這個熱鬧。我跟鄧力群說，我批評“繁瑣哲學”，批的是工作方法上的問題，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分歧我一點不知道，我在農村沒有回家，自從上次那個私人通信搞出那麼多的事情後，我也沒有和辦公廳通信。鄧力群表示相信，說那你就趕緊把文章撤回來吧，以免引起誤會。你看我都誤解你了，別人誤解就更大了。黨內文件一傳達，你的文章一出去，好像你在反對劉少奇了。這樣的話引起黨內矛盾就不好了。這是中央領導之間的事，現在沒有正式傳達，我們不要作這樣題目的文章為好。我認為鄧力群的意見對，馬上打電話告訴《哲學研究》雜志的林聿時，請他趕緊把文章撤下。他們說目錄都上了，印刷費都付了。我說哪怕印了也要抽下來，損失我賠償，我說這是鄧力群交代的，不能發了。我也不好說怕引起什麼誤會，就說請他幫個忙吧，下次我一定寫一篇大文章。他說那要損失多少錢，我說我來補。他說那倒不用，別的雜志賠錢，他們雜志賺錢，不在乎這點錢。他最後還是把文章撤了。

因為有了這麼一個情節，所以我就特別留意毛主席和劉少奇的意見分歧。有關他們分歧的文件（即“前十條”和“後十條”）發下來後我仔細看，覺得是毛主席對，劉少奇不對。而鄧力群看了後，卻搞調和論，說他們只是一個說法問題。同樣的事情，不同的說法而已。劉少奇也沒有否定搞黨內矛盾啊。我和關鋒都不同意鄧力群的說法，認為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敵我矛盾，內部矛盾，干群矛盾，貪污腐敗，私分糧食，各種人的歷史問題，農村什麼問題沒有，你要找矛盾什麼矛盾都有。這是客觀情況，但是我們的體會是，你不能一天搞那麼多的事情，還要把主要精力放往解決黨內干部的貪污腐化的問題，要讓農民多分些糧食，這才是主要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就好解決了。鄧力群認為，你得把各

種矛盾擺出來，然后才能抓主要矛盾。我們怎么能一進去就知道什么是主要矛盾呢？主席說，什麼都抓是繁瑣哲學，但你擺出各種矛盾，又去抓主要的，就不是繁瑣哲學。我們就這麼隨便議論，也沒有誰要抓誰的辯子。

我原來也不滿意王光美的“桃園經驗”，但只是把它看作是一個工作方法的問題。為什麼毛主席會跟劉少奇產生這麼大的分歧，還專門把陳伯達從農村叫回來寫二十三條呢？後來才理解了，毛主席和劉少奇這個“繁瑣哲學”的問題的根本分歧，毛主席主要是要解決領導干部中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并把這個問題看作是對社會主義事業最具有危險性的。而劉少奇則根本否認黨內存在著這樣的問題，他把運動的方向是指向了在群眾和基層干部中所存在的這樣那樣的問題去了。

江青在文革的時候跟我說，就在那個時候，有一段時間，主席覺得挺納悶的。主席對江青說，以前，劉少奇對他不是這樣的。即使有不同的意見，也總是很委婉的說的。而現在是我說一句，他就頂我一句。

主席所講的，可能就是在討論“二十三條”的時候，主席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時候，劉少奇當場就提出來，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說出來聽聽。毛主席當場就點了兩個人的名，說煤炭部的張霖之和地質部的何長工就是。在此前後又發生了劉少奇不讓主席在會上講話，鄧小平叫主席不要去開會，毛主席手持憲法和黨章去參加會議的事情。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就此形成了。

1965年我從通縣參加“四清”運動回到北京后，就生了場病，當時口吐鮮血。家里的人很緊張，馬上把我送去醫院。沒想到江青和康生都來醫院看我了。我對江青表示感謝的時候，江青說，別謝我，不是我關心你。下面的她就不說了。我就知道是主席在關心我。康生還下了命令，要衛生部保證我的健康。衛生部的副部長親自來。其實後來檢查下來，也沒什么大病，是支氣管破裂導致的吐血，過度勞累所致。

從醫院出來，我又回到了《紅旗》，一邊休養，一邊就寫了“為革命研究歷史”這篇文章。